



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纳博科夫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组相互间有系统联系的个人回忆集，它在地理上从圣彼得堡延伸到圣纳泽尔，覆盖三十七个年头，从 1903 年 8 月到 1940 年 5 月，只有不多的一点突进到以后的时空。20 世纪的散文体大师之一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899 年生于圣彼得堡。1940 年他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其代表作《洛丽塔》《微暗的火》进入现代经典之列，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他曾在威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教授文学。1961 年，他侨居瑞士的蒙特鲁斯。1977 年在那儿去世。。

声明

本书内容系书仓用户从网络中收集，利用书仓在线制作、转换服务生成，存放于书仓，仅供个人收藏、学习使用。

其制作、收藏者承诺不把此内容用于商业用途。

也请借阅者勿公开传播以及应用于商业用途。

书仓网仅止为个人或者机构提供在线内容制作、转换、存储等服务。

书仓网上所有非 epubsys 帐号下的内容均为个人使用行为。



书仓 (shucang.com) , 旨在为读者弥合数字时代电子化阅读中的各种障碍 , 从而让个人获得随时、随地、随意阅读与拥有数字内容的惬意体验。

目前, 书仓网提供的功能有 :

1、在线的电子书报**制作**工具 ; 2、在线电子书**转换** ; 3、在线电子书、文章**存储**分享 ; 4、在线**阅读** ; 5、**手机在线**阅读 ; 6、支持各种不同阅读软件、阅读器的电子书**下载** ;

可以处理的格式包括 epub、mobi、chm、txt、doc、pdf 等。

在线版 : <http://www.shucang.com>

手机版 : <http://shucang.com/m>

目录版 : <http://www.shucang.com/s/index.php>

注 : 比如 iphone/itouch 的 stanza , 已经把书仓放在默认书库中 , 如果没有看到 , 可以手工添加目录版地址。

正文

？

第一章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尽管两者是相似的双胞胎，人看出生以前的深渊，通常比看他（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下心跳）前往的那个更镇静一些。然而，我

纳博科夫

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这样的幻想年轻人并不陌生。或者，换一种说法，最初与最后的事物经常倾向于拥有一种青春期的特征——除非，有可能，它们为一种可敬而严格的宗教所指引。自然期望一个发育完全的人接受两个黑色的虚空，前面的与后面的，像他接受两者之间的奇异梦境一样若无其事。想象，永生者与不成熟者的至高乐趣，应当受到限制。为了享用生命，我们不当过多地享用它。

我反抗事物的这种状况。我感到了这一冲动，要把我的反抗释放出来，警戒自然。一次又一次，我的头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辨认我的生命两端非个人的黑暗中最微弱的个人的闪光。黑暗仅仅是那道时间之墙造成的，它把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一个没有时间的自由世界分隔开来，这是我乐于同浑身涂抹得俗丽之极的野蛮人共有的一个信条。我曾在思想中返回——我返回时思想毫无希望地越来越窄——到遥远的地带，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最终仅仅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除了自杀，我都试过。我’

说d巴，气己忆3曾脱去我的身份，以便把自己当作一个司空见惯的幽灵，并潜入我出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国度。我曾在心中忍受过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和退休中尉的自暴自弃的陪伴，他们记得前生曾经是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是拉萨柳树下的先知。我曾经翻乱了我最陈旧的梦境，寻找钥匙和线团——同时我要说我彻底抛弃了弗洛伊德

的那个粗俗、杂乱、根本上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还有它对性符号的古怪之极的寻觅（仿佛在莎士比亚作品里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和它嫉妒的小胚胎，它们在那天然的藏身之所，窥视着它们父母的爱情生活。最初，我没有觉察到，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是一个监狱。在探查我的童年（仅次于探查一个人的永恒）之际我看到意识的觉醒像一连串互相分隔的闪光，它们的间隔渐渐缩短，直到形成了感觉的大块光域，给予记忆一个湿滑的立足点。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多少是自发地学习识数和说话，然而我是我而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这一内心的知识则似乎是在以后，当我得知他们相对于我的年龄，并把这一发现与之直接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得到了确立。当我想到那显现，强烈的阳光就立刻透过层层叠叠的翠绿图案侵入我的记忆，打上肺叶形的日斑，从这一点来判断，那一次也许就是我母亲的生日，在残夏，在乡村，我曾经提问和估价我所得到的回答。这一切根据摘要重述的原理，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样；在我们最为遥远的祖先的头脑中自省意识的开端必定是与时间感的显露同时到来的。

就这样，当我自己的年龄刚刚揭开的，新鲜而整洁的方程式，四岁，与我父母的方程式，三十三岁与二十七岁，对

纳博科夫

应起来时，某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获得了一次极为鼓舞人心的震动。仿佛在接受第二次洗礼，在比十五个月前一位咆哮不已，淹得半死的半胜利者所举行的希腊正教洗礼（一种旧习俗吩咐我父母藏在门后，我母亲通过那扇半掩的门，设法纠正弄得一团糟的驼背长老，康斯坦丁·维特文尼茨基神父）更为神圣的仪式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种光辉而易变的介质，那正是纯粹的时间因素。一个人与芸芸众生分享它——就像兴奋的沐浴者共享闪亮的大海——他们并非他自己，但是将他们连成一体的是时间的共同之流，一个与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环境，不仅人而且猩猩和蝴蝶也能够感觉到它。在那一瞬间，我深深地察觉到，那抓住我右手的，一身轻柔的白色与绛红色的二十七岁生命，就是我的母亲，而那抓着我左手的，一身坚硬的白色与金黄色的三十三岁生命，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并肩前行之际，我昂首阔步，又奔跑起来，又再次昂首阔步，踏过一块块阳光的斑点，沿着一条小路的路心走下去。如今我轻易就将它与我们在旧时俄国圣彼得堡省份的乡间地产维拉庄园中的一条有装饰性矮栋树的小径认同为一。事实上，从我遥远、孤单、几乎未曾居住过的时间在当今的界限，我看见我微小的自我，在1903年那个8月的日子庆祝感觉生命的诞生。倘若那握住我左手的人和握住我右手的人在我模糊的童年世界里曾双双在场，他们是在一位隐姓埋名的照料者的面具下出现的；但此刻我父亲的军装，骑兵卫队辉煌夺目的制服，胸甲上光润的金色波涛在他的前胸和背脊燃烧，像太阳般呈现，而此后的两三年里，我一直对我父母的年龄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说吧，记忆 5 并时时问到它，像一个紧张的旅客为了对一块新表而询问时间一样。

要注意到，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服完了他的军事训练期兵役，因此我猜想那天他穿上他的旧军团装饰物是作为一个节日的玩笑。于是，我把我完全的意识的第一次闪烁归功于一次玩笑——这又有了重述的意味，因为大地上最先觉察到时间的生命也是最先微笑的生命。

在我四岁时所玩的游戏背后，是那座原始的山洞（而不是弗洛伊德派神秘主义者可能猜想的东西）。在维拉的一间客厅里，一张覆盖着印花棉布的长软椅，白底上有黑色的车轴草，浮现在我的脑际，像历史开端之前地质巨变的某个庞大的产物。历史的开始（以美好的希腊的允诺）离这张长椅的一端不远，一株巨大的盆栽紫阳花灌木在那里开着灰蓝色的花和一些绿色的花，在房间的一角半掩住了一尊大理石狄安娜胸像的基座。在长凳倚靠着的墙上，历史的另一个阶段为乌木框中的一幅灰色浮雕所显示——那些拿破仑战役图画中的一幅，在其中偶然的与讽喻的才是真正的敌手，人们看见，全都聚集于同一块视觉平面之上，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死马，战利品，一个士兵正要刺向另一个士兵，那伤不着的皇帝在凝固的战斗中和他的将军们摆着姿势。

在某个先是用双手而后又加上一条有力的腿的成年人帮助下，长椅可以从墙边移开几寸，从而形成一条狭窄的通道，

纳博科夫

我能获得更多帮助用长椅的长枕垫紧紧盖住它，又以一对垫子关闭它的两端。于是我就有了爬过那漆黑隧道的奇异乐趣，我在里面停留片刻，听我耳中的歌唱——小男孩们在尘封的隐蔽处多么熟悉的那种孤独的震颤——接着，在一次美妙的恐惧的爆发中，在手和膝盖的突然碰撞下，我将到达隧道的遥远尽头，推开它的垫子，看见阳光透过一把威尼斯式靠椅的藤编在嵌花地板上打出网眼，还有两只互相嬉戏的苍蝇交替停落，都在欢迎着我，一种更像梦境也更加美妙的感受是由另一个山洞游戏提供的，在清晨苏醒之际我用我的床单制作了一个帐篷，并听任我的想象以一千种黯淡的方式戏耍亚麻布阴暗的雪道和微光，那光似乎从某个辽远的地方刺透了我昏暗的荫蔽，我想象那里奇异苍白的动物游荡在一片湖光水色之中。我对那架侧面有毛绒绒绵线网的摇篮的回忆，也带回来了手握某一个美丽的，坚硬得令人愉快的，黑如石榴石的水晶蛋的快乐，它是某个难以追忆的复活节遗留下来的；我时常咀嚼床单的一角，直到它湿透之后，接着把那只蛋紧紧裹在里面，以便欣赏和一遍遍舔食那包得严严实实的表面温暖、排红的闪烁，它渗透而出，有一种炽热与色彩的奇迹般的完美。但我做过的最近于滋养美的事情还不是这个。宇宙多么小啊（一只袋鼠的口袋就装得下它），多么微不足道与弱小，倘与人的

意识，与仅仅一段个人的回忆和它的词语表现相比，也许我是过度热衷于我最早的印象了，但是我因此有理由感谢它们。它们指引着视觉与触觉之感性的一条真正的伊甸园之路。在 1903 年秋季一次出国旅行中的一夜，我记得曾跪在我的（有点扁平的）枕头上，在一节卧车

说吧，我已忆 7 的窗前（很可能那是停驶已久的 mediterranean train de luxe ①，它的六节车厢下部漆成了精色而嵌板则是奶色），怀着难解的悲伤看到一簇奇妙的灯光从远处一座山坡上向我招唤，继而滑进了一个黑色天鹅绒口袋：我后来分送给我的角色以减轻我财富的负担的宝石。我很可能已设法解开和卷起了我铺位顶端印有密集图案的窗帘，我的脚踵寒冷，但我仍旧一直跪着，凝视着。没有比冥想那些最初的激动更甜蜜，更奇特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并且确切而言，在人的记忆中拥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是可塑的形式，几乎不用费什么力就能够将它写下；摩涅莫绪涅渐渐变得挑剔而乖戾仅仅是在一个人青春期的回忆开始之时。我还要主张，在贮藏印象的力量方面，我这一代的俄国儿童经过了一个天才的时期，仿佛命运在尽其所能忠实地赋予他们比他们的份额更多的东西，鉴于那场巨变将彻底扫除他们所知的世界。当一切都被存放了起来，天才就消失了，就像那些别的，更加特殊化的神童们一样——漂亮的卷发少年们挥舞着指挥棒或驯服巨大的钢琴，他们最终变成了二流的音乐家，有着忧伤的眼睛和隐痛，他们阉人般的后腿上隐约现出畸形。但即使如此，个人的秘密仍然引诱着传记家们。无论在环境还是在遗传中我都找不到造就了我的精确工具，那无名的滚子，它在我的生命上压出了某个难解的透明水纹，在艺术之灯被拨亮，照彻生活的大页纸时，它独特的图案昭然可见。① 法语“地中海豪华列车”。

纳博科夫失

为了在时间上正确地确定我的一些童年回忆，我只有接受彗星与日蚀的指引，像历史学家在处理萨加的残片时所做的那样。但在其它情形中我并不缺少资料。比如，我看见自己爬上海边湿流的黑色岩石，而诺考特小姐，一位迟钝而忧郁的家庭教师，以为我还跟着她，带着我弟弟谢尔盖沿弧形的海滩走远了。我正戴着一副玩具手镯。当我攀过那些石头，我一直在以一种饶有兴趣的，丰富的，令人深感喜悦的咒语重复着那个英语单词“childhood ①”，它听来神秘又新奇，而当它在我负荷过多的，潮红的小脑袋中与 robin hood ②、little red riding hood ③ 和驼背老神仙的褐色 hood ④ 混和到一起时就变得越来越奇妙了。石头间有些小洼，满盛着微温的海水，而我魔法的低语伴随着我在那些蔚蓝色小水池上编织的某些符咒。

那地方当然是亚得里亚海上的阿巴济亚。套在我手腕上的东西看似一个鲜艳的餐巾环，由半透明的，淡绿间粉红色的赛璐璐材料制成，是一棵圣诞树上的果子，我的一位同龄的漂亮表兄弟昂雅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把它给了我。我感伤

① “童年”。

② “罗宾汉”。

③ “小小的红色骑马头巾”。④ “头巾”。

说吧，气已忆9地珍藏着它，直到它的内部有了黑色的条纹，我在一个梦里断定它们是某次在附近的阜姆对一位可憎的美发师的可怕访问中剪下的头发，它们不知怎的与我的眼泪一起进入了这闪闪发亮的物质。同一天，在岸边一家咖啡馆里，正当我们受到款待之时，我父亲偶然注意到两个日本官员坐在我们近旁的一张桌前，我们立刻离开了一我少不了在仓促间抓起整整一个柠檬冰糕 bombe ①，把它藏进我生疼的嘴里带走。那是1904年。我五岁。俄国在与日本交战。诺考特小姐订阅的英国图画周刊饶有趣味地转载了日本艺术家所作的战争画，展现了俄国火车—被日本绘画风格奇异地弄得像玩具一样—将怎样沉没，倘若我们的军队企图铺设铁路跨过贝加尔湖靠不住的冰面的话。

不过再看一看。甚至更早些我就与那场战争有了联系。同一年初的一天下午，在我们的圣彼得堡宅邸里，我从我的保育室里被带到楼下我父亲的书房，向家族的朋友库罗帕特金将军问好。他结实的，裹在军服里的躯体发出细微的咯咯声，他在他坐的长软椅上排开一堆火柴来给我逗乐，把它们首尾相接排成一道水平线，说，“这是风平浪静的海。”然后他把每一对火柴斜过来将直线变成折线—那就是“一片暴风雨的大海”。他抓起火柴正打算变一个，我希望，更好的戏法，这时我们被打断了。他的副官被领过来对他说了些什么。随着一声俄罗斯式的，慌乱的咕噜，库罗帕特金从他的座位上沉重地站起来，他的重量离开长椅时，轻盈的火柴在上面蹦① 法语“半球形物”。

纳博科夫

跳了一下。那一天，他被任命为远东的俄军总司令。十五年后这个事件有了一个特殊的结局，当时在我父亲从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圣彼得堡往南俄罗斯逃亡途中的某一个地点，在穿过一座桥时，有一个身穿羊皮袄，看似一位灰胡子农民的老人向他攀谈。他向我父亲借个火。接着一瞬间他们各自认出了对方。我希望老库罗帕特金在他朴素的伪装下，设法逃过了苏维埃的监狱，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使我满意的是火柴主题的进展：他展示给我的神奇火柴无人留意，不知被放在了哪个角落，而他的军队也已被消灭，一切

都成了泡影，像 1904 — 1905 年的冬季在威斯巴登，我试图在奥拉尼安旅馆庭园里结冰的水潭上开过的玩具火车一样。追索这样的贯穿一个人一生的主题将是，我想，自传的真正目的。

俄国在远东的灾难性战役日趋临近，同时伴随着的是狂暴的内部混乱。对此毫无畏惧，我母亲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在国外寄居了大约一年之后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是在 1905 年初。政府事务需要我父亲身在首都；立宪民主党，他是它的创建者之一，即将在下一年的第一届国会中赢得多数席位。那年夏天，在他与我们在乡村的一次短暂逗留期间，他怀着爱国的惊愕得知了我弟弟和我能够读写英语而不是俄语（除了 kakao 和 mama）。大家决定由村办小学校长每天下午来给我们上课并带我们散步。

我的第一件水手服的一部分，那支口哨一声尖锐而愉快

说 d 巴，记忆 11 的吹奏，我的童年召唤我返回那遥远的过去，让我再一次与我快乐的老师握手。瓦西里·马丁诺维奇·日尔诺塞科夫有一嘴过分修饰的褐色胡子，一个秃头，有瓷蓝色的眼睛，其中之一的上眼睑长着一个迷人的小瘤。他到来的第一天带来一盒子极为开胃的小木块，每一面各画着一个不同的字母；他会把那些方块摆布得好像它们是无限精美的东西，就那件事而言，它们的确如此（另外还能给玩具火车做成壮丽的隧道）。他敬重最近重修了村办学校并加以现代化的我父亲。作为自由思想的过时的表征，他炫耀地系着他飘垂的黑领带，马马虎虎打得像个蝴蝶结。在他向我，一个小男孩说话的时候，他使用第二人称复数——不是以仆人的僵硬方式，也不像我母亲在极为温柔的时刻，当我发脾气或者丢失了一个小巧的火车乘客之际会做的那样（好像单数太瘦弱无法承受她爱的重负一样），而是以一个男子与他还没有熟识到足以用 "thou" 相称的另一位说话时那种彬彬有礼的平淡。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他会在我们乡间的散步中热烈地手舞足蹈，谈论人性与自由以及军费的坏处，还有反对暴君的可悲的（但是有趣的，我想）必要性，有时他会取出当时很流行的和平主义书籍 dolox oruzhl' e /（贝尔萨·冯·苏特纳的及亡 waffen nieder / ① 的译本）并以沉闷的引文来招待我这个六岁的孩子；我试图反驳它们：在那个温良而又好斗的年龄我挺身而出为流血说话，愤怒地保卫我玩具手枪和亚瑟王武士的世界。在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激进分子都受到无情打击的时候，日尔① 德语"《放下武器 Ir

12 纳博科夫

诺塞科夫被送往一个苦役营但设法逃到了国外，并于 1939 年在日内瓦去世。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靠了他，我才有能力沿着我那条与那苦难十年的道路平行的私人小径再走一程。在 1906 年 6 月，在沙皇违反宪法解散国会之际，它的一批成员，我父亲也在内，在维堡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并发布了一份宣言敦促人民反抗政府。为此，一年半多以后他们被监禁了起来。我父亲在孤独的禁闭中度过了平静的，如果多少点寂寞的话，三月份，带着他的书籍，他的折叠浴缸，和他那本 j. p. 繆勒的家庭体操手册。直到她最后的日子，我母亲都一直保留着他设法偷送给她的信件——用铅笔写在手纸上的悦人书信（这些信我已于 1965 年发表在罗曼·格林伯格所编的纽约俄语评论杂志 voz dus 枷 i' put 户上）。他重获自由时我们在乡下，是村办小学校长领导了庆祝，安排了彩旗（有一些是坦率的红色），在我父亲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在纵树针叶的拱椽与我父亲最喜爱的花，蓝瓶僧帽水母的花冠之下欢迎他。我们这些孩子已经下到村里，而正是在我回忆那个特殊日子的时候，我以最大的清晰看见了那条阳光粼粼闪烁的河流；那座桥，一位渔夫留在它木栏上的一口罐子的耀眼铁皮；生长着菩提树的园，它玫瑰红的教堂和大理石陵墓，我母亲家的死者安息于此；通向村子的遍地灰尘的道路；在道路与紫丁香灌木丛之间，淡绿色矮草的狭长条地，间有小块光秃的沙土，后面遍生苔鲜的白星眼木屋摇摇晃晃地站成一排；在木① 《空中道路》。

说 o 巴，i 己忆 13 建的旧校舍一边，新校舍的石头建筑；以及，当我们匆匆驶过时，从村舍间窜出的那条牙齿雪白的小黑狗，步子极大但全无声息，只在他沉默的奋进最终使他逼近了急驰的马车之时爱短促地吠叫几声。

旧与新，开明的与家长式的特征，致命的贫穷与宿命论的富足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一个夏季里有几次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午餐中间，在我们维拉宅邸的底层那间明亮的，开满窗户的，胡桃木嵌板的餐室里，仆役长阿列克赛脸上带着不快的表情，会鞠躬并低声地（在我们有客人作陪时尤其地低）告诉我父亲一群村民在外面要见见首脑。我父亲会敏捷地从膝上拿开餐巾并请求我母亲原谅。餐室西端的窗户中有一扇临着大门边车道的一部分。可以看见正对门口的一丛忍冬的花冠。从那个方向一次农民式欢迎彬彬有礼的嗡嗡声会传到我这里，看不见的人群在问候我看不见的父亲。随后的会谈由普通的声调引导，就听不到了，交谈就在窗下进行，而窗子已经关上以阻挡热气。可能谈的是请求他调停当地的某一场小纠纷，或是在谈论某一笔特别辅助金，或者是请求允许对我们的某块土地进行收割或砍下我们的一丛遮荫的树木。倘若，像通常发生的那样，要求立刻就得到了允准，那嗡嗡声就会再次出现，接着，作为感激的表征，那位好首脑将接受一次民族特色的考验，被摇晃和抛起，又被大约二十条强壮的手臂稳稳接住。

在餐室里，我弟弟和我会被吩咐继续用膳。我母亲，食指与拇指间拈着一片珍肴，会瞥一眼桌下，看看她紧张而粗野的猎灌狗是否在那里。“un jou, 11, vontl
f laisser tomber ①”，说话的是高莱小姐，一位循规蹈矩愁眉苦脸的老太太，她曾经是我母亲的家庭教师并仍旧与我们住在一起（与我们自己的家庭女教师们关系很糟）。从我在桌前的位置，透过一扇西窗我会突然看见一个悬浮的神奇事例。在那里，在一瞬间，我父亲身穿被风吹皱的白色夏装的形象会显现，在空中光荣地摊开着，他的四肢处于一种奇异的随便状态，他英俊、镇静的面貌朝向天空。接连三次，随着他那些看不见的抛举者嗒嗒有声的强大抛掷，他会这样飞上去，第二次会比第一次上得更高，继而在他最后也是最高的高度，他会斜卧着，仿佛是永远如此，衬着夏日正午的钴蓝色，像一座教堂的穹顶上那些静静飞翔的极乐人物中的一个，他们的衣服上有那么多的皱褶，而下面，一支接一支，蜡烛在凡尘的手中点亮，在一片焚香的雾中形成一群连续的火焰，而神父吟诵永恒的安眠，葬礼的百合花在游动的光里，在打开的灵柩中，隐藏起了躺在那里的无论哪个人的脸。

① 法语“总有一天他们会让他摔下来的”。

第一章

？

第一章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尽管两者是相似的双胞胎，人看出生以前的深渊，通常比看他（以每小时大约四千五百下心跳）前往的那个更镇静一些。然而，我

纳博科夫

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这样的幻想年轻人并不陌生。或者，换一种说法，最初与最后的事物经常倾向于拥有一种青春期的特征——除非，有可能，它们为一种可敬而严格的宗教所指引。自然期望一个发育完全的人接受两个黑色的虚空，前面的与后面的，像他接受两者之间的奇异梦境一样若无其事。想象，永生者与不成熟者的至高乐趣，应当受到限制。为了享用生命，我们不当过多地享用它。

我反抗事物的这种状况。我感到了这一冲动，要把我的反抗释放出来，警戒自然。一次又一次，我的头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辨认我的生命两端非个人的黑暗中最微弱的个人的闪光。黑暗仅仅是那道时间之墙造成的，它把我和我青肿的拳头与一个没有时间的自由世界分隔开来，这是我乐于同浑身涂抹得俗丽之极的野蛮人共有的一个信条。我曾在思想中返回——我返回时思想毫无希望地越来越窄——到遥远的地带，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出口，最终仅仅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除了自杀，我都试过。我’

说d巴，气己忆3曾脱去我的身份，以便把自己当作一个司空见惯的幽灵，并潜入我出生之前即已存在的国度。我曾在心中忍受过维多利亚时代女小说家和退休中尉的自暴自弃的陪伴，他们记得前生曾经是罗马大道上的奴隶信使或是拉萨柳树下的先知。我曾经翻乱了我最陈旧的梦境，寻找钥匙和线团——同时我要说我彻底抛弃了弗洛伊德

的那个粗俗、杂乱、根本上属于中世纪的世界，还有它对性符号的古怪之极的寻觅（仿佛在莎士比亚作品里寻找培根式的离合诗）和它嫉妒的小胚胎，它们在那天然的藏身之所，窥视着它们父母的爱情生活。最初，我没有觉察到，初看之下如此无边无际的时间，是一个监狱。在探查我的童年（仅次于探查一个人的永恒）之际我看到意识的觉醒像一连串互相分隔的闪光，它们的间隔渐渐缩短，直到形成了感觉的大块光域，给予记忆一个湿滑的立足点。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多少是自发地学习识数和说话，然而我是我而我的父母是我的父母这一内心的知识则似乎是在以后，当我得知他们相对于我的年龄，并把这一发现与之直接联系起来的时候才得到了确立。当我想到那显现，强烈的阳光就立刻透过层层叠叠的翠绿图案侵入我的记忆，打上肺叶形的日斑，从这一点来判断，那一次也许就是我母亲的生日，在残夏，在乡村，我曾经提问和估价我所得到的回答。这一切根据摘要重述的原理，都是理所当然的那样；在我们最为遥远的祖先的头脑中自省意识的开端必定是与时间感的显露同时到来的。

就这样，当我自己的年龄刚刚揭开的，新鲜而整洁的方程式，四岁，与我父母的方程式，三十三岁与二十七岁，对

纳博科夫

应起来时，某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获得了一次极为鼓舞人心的震动。仿佛在接受第二次洗礼，在比十五个月前一位咆哮不已，淹得半死的半胜利者所举行的希腊正教洗礼（一种旧习俗吩咐我父母藏在门后，我母亲通过那扇半掩的门，设法纠正弄得一团糟的驼背长老，康斯坦丁·维特文尼茨基神父）更为神圣的仪式中，我感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种光辉而易变的介质，那正是纯粹的时间因素。一个人与芸芸众生分享它——就像兴奋的沐浴者共享闪亮的海水——他们并非他自己，但是将他们连成一体的是时间的共同之流，一个与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环境，不仅人而且猩猩和蝴蝶也能够感觉到它。在那一瞬间，我深深地察觉到，那抓住我右手的，一身轻柔的白色与绛红色的二十七岁生命，就是我的母亲，而那抓着我左手的，一身坚硬的白色与金黄色的三十三岁生命，就是我的父亲。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并肩前行之际，我昂首阔步，又奔跑起来，又再次昂首阔步，踏过一块块阳光的斑点，沿着一条小路的路心走下去。如今我轻易就将它与我们在旧时俄国圣彼得堡省份的乡间地产维拉庄园中的一条有装饰性矮栋树的小径认同为一。事实上，从我遥远、孤单、几乎未曾居住过的时间在当今的界限，我看见我微小的自我，在1903年那个8月的日子庆祝感觉生命的诞生。倘若那握住我左手的人和握住我右手的人在我模糊的童年世界里曾双双在场，他们是在一位隐姓埋名的照料者的面具下出现的；但此刻我父亲的军装，骑兵卫队辉煌夺目的制服，胸甲上光润的金色波涛在他的前胸和背脊燃烧，像太阳般呈现，而此后的两三年里，我一直对我父母的年龄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说吧，记忆 5 并时时问到它，像一个紧张的旅客为了对一块新表而询问时间一样。

要注意到，我父亲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已服完了他的军事训练期兵役，因此我猜想那天他穿上他的旧军团装饰物是作为一个节日的玩笑。于是，我把我完全的意识的第一次闪烁归功于一次玩笑——这又有了重述的意味，因为大地上最先觉察到时间的生命也是最先微笑的生命。

在我四岁时所玩的游戏背后，是那座原始的山洞（而不是弗洛伊德派神秘主义者可能猜想的东西）。在维拉的一间客厅里，一张覆盖着印花棉布的长软椅，白底上有黑色的车轴草，浮现在我的脑际，像历史开端之前地质巨变的某个庞大的产物。历史的开始（以美好的希腊的允诺）离这张长椅的一端不远，一株巨大的盆栽紫阳花灌木在那里开着灰蓝色的花和一些绿色的花，在房间的一角半掩住了一尊大理石狄安娜胸像的基座。在长凳倚靠着的墙上，历史的另一个阶段为乌木框中的一幅灰色浮雕所显示——那些拿破仑战役图画中的一幅，在其中偶然的与讽喻的才是真正的敌手，人们看见，全都聚集于同一块视觉平面之上，一个受伤的鼓手，一匹死马，战利品，一个士兵正要刺向另一个士兵，那伤不着的皇帝在凝固的战斗中和他的将军们摆着姿势。

在某个先是用双手而后又加上一条有力的腿的成年人帮助下，长椅可以从墙边移开几寸，从而形成一条狭窄的通道，

纳博科夫

我能获得更多帮助用长椅的长枕垫紧紧盖住它，又以一对垫子关闭它的两端。于是我就有了爬过那漆黑隧道的奇异乐趣，我在里面停留片刻，听我耳中的歌唱——小男孩们在尘封的隐蔽处多么熟悉的那种孤独的震颤——接着，在一次美妙的恐惧的爆发中，在手和膝盖的突然碰撞下，我将到达隧道的遥远尽头，推开它的垫子，看见阳光透过一把威尼斯式靠椅的藤编在嵌花地板上打出网眼，还有两只互相嬉戏的苍蝇交替停落，都在欢迎着我，一种更像梦境也更加美妙的感受是由另一个山洞游戏提供的，在清晨苏醒之际我用我的床单制作了一个帐篷，并听任我的想象以一千种黯淡的方式戏耍亚麻布阴暗的雪道和微光，那光似乎从某个辽远的地方刺透了我昏暗的荫蔽，我想象那里奇异苍白的动物游荡在一片湖光水色之中。我对那架侧面有毛绒绒绵线网的摇篮的回忆，也带回来了手握某一个美丽的，坚硬得令人愉快的，黑如石榴石的水晶蛋的快乐，它是某个难以追忆的复活节遗留下来的；我时常咀嚼床单的一角，直到它湿透之后，接着把那只蛋紧紧裹在里面，以便欣赏和一遍遍舔食那包得严严实实的表面温暖、排红的闪烁，它渗透而出，有一种炽热与色彩的奇迹般的完美。但我做过的最近于滋养美的事情还不是这个。宇宙多么小啊（一只袋鼠的口袋就装得下它），多么微不足道与弱小，倘与人的

意识，与仅仅一段个人的回忆和它的词语表现相比，也许我是过度热衷于我最早的印象了，但是我因此有理由感谢它们。它们指引着视觉与触觉之感性的一条真正的伊甸园之路。在 1903 年秋季一次出国旅行中的一夜，我记得曾跪在我的（有点扁平的）枕头上，在一节卧车

说吧，我已忆得 7 的窗前（很可能那是停驶已久的 mediterranean train de luxe ①，它的六节车厢下部漆成了精色而嵌板则是奶色），怀着难解的悲伤看到一簇奇妙的灯光从远处一座山坡上向我招唤，继而滑进了一个黑色天鹅绒口袋：我后来分送给我的角色以减轻我财富的负担的宝石。我很可能已设法解开和卷起了我铺位顶端印有密集图案的窗帘，我的脚踵寒冷，但我仍旧一直跪着，凝视着。没有比冥想那些最初的激动更甜蜜，更奇特的了。它们属于一个完美童年的和谐世界，并且确切而言，在人的记忆中拥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是可塑的形式，几乎不用费什么力就能够将它写下；摩涅莫绪涅渐渐变得挑剔而乖戾仅仅是在一个人青春期的回忆开始之时。我还要主张，在贮藏印象的力量方面，我这一代的俄国儿童经过了一个天才的时期，仿佛命运在尽其所能忠实地赋予他们比他们的份额更多的东西，鉴于那场巨变将彻底扫除他们所知的世界。当一切都被存放了起来，天才就消失了，就像那些别的，更加特殊化的神童们一样——漂亮的卷发少年们挥舞着指挥棒或驯服巨大的钢琴，他们最终变成了二流的音乐家，有着忧伤的眼睛和隐痛，他们阉人般的后腿上隐约现出畸形。但即使如此，个人的秘密仍然引诱着传记家们。无论在环境还是在遗传中我都找不到造就了我的精确工具，那无名的滚子，它在我的生命上压出了某个难解的透明水纹，在艺术之灯被拨亮，照彻生活的大页纸时，它独特的图案昭然可见。① 法语“地中海豪华列车”。

纳博科夫失

为了在时间上正确地确定我的一些童年回忆，我只有接受彗星与日蚀的指引，像历史学家在处理萨加的残片时所做的那样。但在其它情形中我并不缺少资料。比如，我看见自己爬上海边湿流的黑色岩石，而诺考特小姐，一位迟钝而忧郁的家庭教师，以为我还跟着她，带着我弟弟谢尔盖沿弧形的海滩走远了。我正戴着一副玩具手镯。当我攀过那些石头，我一直在以一种饶有兴趣的，丰富的，令人深感喜悦的咒语重复着那个英语单词“childhood ①”，它听来神秘又新奇，而当它在我负荷过多的，潮红的小脑袋中与 robin hood ②、little red riding hood ③ 和驼背老神仙的褐色 hood ④ 混和到一起时就变得越来越奇妙了。石头间有些小洼，满盛着微温的海水，而我魔法的低语伴随着我在那些蔚蓝色小水池上编织的某些符咒。

那地方当然是亚得里亚海上的阿巴济亚。套在我手腕上的东西看似一个鲜艳的餐巾环，由半透明的，淡绿间粉红色的赛璐璐材料制成，是一棵圣诞树上的果子，我的一位同龄的漂亮表兄弟昂雅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把它给了我。我感伤

① “童年”。

② “罗宾汉”。

③ “小小的红色骑马头巾”。④ “头巾”。

说吧，气已忆9地珍藏着它，直到它的内部有了黑色的条纹，我在一个梦里断定它们是某次在附近的阜姆对一位可憎的美发师的可怕访问中剪下的头发，它们不知怎的与我的眼泪一起进入了这闪闪发亮的物质。同一天，在岸边一家咖啡馆里，正当我们受到款待之时，我父亲偶然注意到两个日本官员坐在我们近旁的一张桌前，我们立刻离开了一我少不了在仓促间抓起整整一个柠檬冰糕 bombe ①，把它藏进我生疼的嘴里带走。那是1904年。我五岁。俄国在与日本交战。诺考特小姐订阅的英国图画周刊饶有趣味地转载了日本艺术家所作的战争画，展现了俄国火车一被日本绘画风格奇异地弄得像玩具一样一将怎样沉没，倘若我们的军队企图铺设铁路跨过贝加尔湖靠不住的冰面的话。

不过再看一看。甚至更早些我就与那场战争有了联系。同一年初的一天下午，在我们的圣彼得堡宅邸里，我从我的保育室里被带到楼下我父亲的书房，向家族的朋友库罗帕特金将军问好。他结实的，裹在军服里的躯体发出细微的咯咯声，他在他坐的长软椅上排开一堆火柴来给我逗乐，把它们首尾相接排成一道水平线，说，“这是风平浪静的海。”然后他把每一对火柴斜过来将直线变成折线一那就是“一片暴风雨的大海”。他抓起火柴正打算变一个，我希望，更好的戏法，这时我们被打断了。他的副官被领过来对他说了些什么。随着一声俄罗斯式的，慌乱的咕噜，库罗帕特金从他的座位上沉重地站起来，他的重量离开长椅时，轻盈的火柴在上面蹦① 法语“半球形物”。

纳博科夫

跳了一下。那一天，他被任命为远东的俄军总司令。十五年后这个事件有了一个特殊的结局，当时在我父亲从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圣彼得堡往南俄罗斯逃亡途中的某一个地点，在穿过一座桥时，有一个身穿羊皮袄，看似一位灰胡子农民的老人向他攀谈。他向我父亲借个火。接着一瞬间他们各自认出了对方。我希望老库罗帕特金在他朴素的伪装下，设法逃过了苏维埃的监狱，但这一点并不重要。使我满意的是火柴主题的进展：他展示给我的神奇火柴无人留意，不知被放在了哪个角落，而他的军队也已被消灭，一切

都成了泡影，像 1904 — 1905 年的冬季在威斯巴登，我试图在奥拉尼安旅馆庭园里结冰的水潭上开过的玩具火车一样。追索这样的贯穿一个人一生的主题将是，我想，自传的真正目的。

俄国在远东的灾难性战役日趋临近，同时伴随着的是狂暴的内部混乱。对此毫无畏惧，我母亲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在国外寄居了大约一年之后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是在 1905 年初。政府事务需要我父亲身在首都；立宪民主党，他是它的创建者之一，即将在下一年的第一届国会中赢得多数席位。那年夏天，在他与我们在乡村的一次短暂逗留期间，他怀着爱国的惊愕得知了我弟弟和我能够读写英语而不是俄语（除了 kakao 和 mama）。大家决定由村办小学校长每天下午来给我们上课并带我们散步。

我的第一件水手服的一部分，那支口哨一声尖锐而愉快

说 d 巴，记忆 11 的吹奏，我的童年召唤我返回那遥远的过去，让我再一次与我快乐的老师握手。瓦西里·马丁诺维奇·日尔诺塞科夫有一嘴过分修饰的褐色胡子，一个秃头，有瓷蓝色的眼睛，其中之一的上眼睑长着一个迷人的小瘤。他到来的第一天带来一盒子极为开胃的小木块，每一面各画着一个不同的字母；他会把那些方块摆布得好像它们是无限精美的东西，就那件事而言，它们的确如此（另外还能给玩具火车做成壮丽的隧道）。他敬重最近重修了村办学校并加以现代化的我父亲。作为自由思想的过时的表征，他炫耀地系着他飘垂的黑领带，马马虎虎打得像个蝴蝶结。在他向我，一个小男孩说话的时候，他使用第二人称复数——不是以仆人的僵硬方式，也不像我母亲在极为温柔的时刻，当我发脾气或者丢失了一个小巧的火车乘客之际会做的那样（好像单数太瘦弱无法承受她爱的重负一样），而是以一个男子与他还没有熟识到足以用 "thou" 相称的另一位说话时那种彬彬有礼的平淡。一位激进的革命者，他会在我们乡间的散步中热烈地手舞足蹈，谈论人性与自由以及军费的坏处，还有反对暴君的可悲的（但是有趣的，我想）必要性，有时他会取出当时很流行的和平主义书籍 dolox oruzhl' e /（贝尔萨·冯·苏特纳的及亡 waffen nieder / ① 的译本）并以沉闷的引文来招待我这个六岁的孩子；我试图反驳它们：在那个温良而又好斗的年龄我挺身而出为流血说话，愤怒地保卫我玩具手枪和亚瑟王武士的世界。在所有非共产主义的激进分子都受到无情打击的时候，日尔① 德语"《放下武器 Ir

12 纳博科夫

诺塞科夫被送往一个苦役营但设法逃到了国外，并于 1939 年在日内瓦去世。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靠了他，我才有能力沿着我那条与那苦难十年的道路平行的私人小径再走一程。在 1906 年 6 月，在沙皇违反宪法解散国会之际，它的一批成员，我父亲也在内，在维堡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并发布了一份宣言敦促人民反抗政府。为此，一年半多以后他们被监禁了起来。我父亲在孤独的禁闭中度过了平静的，如果多少点寂寞的话，三月份，带着他的书籍，他的折叠浴缸，和他那本 j. p. 繆勒的家庭体操手册。直到她最后的日子，我母亲都一直保留着他设法偷送给她的信件——用铅笔写在手纸上的悦人书信（这些信我已于 1965 年发表在罗曼·格林伯格所编的纽约俄语评论杂志 voz dus 枷 i' put 户上）。他重获自由时我们在乡下，是村办小学校长领导了庆祝，安排了彩旗（有一些是坦率的红色），在我父亲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在纵树针叶的拱椽与我父亲最喜爱的花，蓝瓶僧帽水母的花冠之下欢迎他。我们这些孩子已经下到村里，而正是在我回忆那个特殊日子的时候，我以最大的清晰看见了那条阳光粼粼闪烁的河流；那座桥，一位渔夫留在它木栏上的一口罐子的耀眼铁皮；生长着菩提树的园，它玫瑰红的教堂和大理石陵墓，我母亲家的死者安息于此；通向村子的遍地灰尘的道路；在道路与紫丁香灌木丛之间，淡绿色矮草的狭长条地，间有小块光秃的沙土，后面遍生苔鲜的白星眼木屋摇摇晃晃地站成一排；在木① 《空中道路》。

说 o 巴，i 己忆 13 建的旧校舍一边，新校舍的石头建筑；以及，当我们匆匆驶过时，从村舍间窜出的那条牙齿雪白的小黑狗，步子极大但全无声息，只在他沉默的奋进最终使他逼近了急驰的马车之时爱短促地吠叫几声。

旧与新，开明的与家长式的特征，致命的贫穷与宿命论的富足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一个夏季里有几次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午餐中间，在我们维拉宅邸的底层那间明亮的，开满窗户的，胡桃木嵌板的餐室里，仆役长阿列克赛脸上带着不快的表情，会鞠躬并低声地（在我们有客人作陪时尤其地低）告诉我父亲一群村民在外面要见见首脑。我父亲会敏捷地从膝上拿开餐巾并请求我母亲原谅。餐室西端的窗户中有一扇临着大门边车道的一部分。可以看见正对门口的一丛忍冬的花冠。从那个方向一次农民式欢迎彬彬有礼的嗡嗡声会传到我这里，看不见的人群在问候我看不见的父亲。随后的会谈由普通的声调引导，就听不到了，交谈就在窗下进行，而窗子已经关上以阻挡热气。可能谈的是请求他调停当地的某一场小纠纷，或是在谈论某一笔特别辅助金，或者是请求允许对我们的某块土地进行收割或砍下我们的一丛遮荫的树木。倘若，像通常发生的那样，要求立刻就得到了允准，那嗡嗡声就会再次出现，接着，作为感激的表征，那位好首脑将接受一次民族特色的考验，被摇晃和抛起，又被大约二十条强壮的手臂稳稳接住。

在餐室里，我弟弟和我会被吩咐继续用膳。我母亲，食指与拇指间拈着一片珍肴，会瞥一眼桌下，看看她紧张而粗野的猎灌狗是否在那里。“un jou, 11, vontl
f laisser tomber ①”，说话的是高莱小姐，一位循规蹈矩愁眉苦脸的老太太，她曾经是我母亲的家庭教师并仍旧与我们住在一起（与我们自己的家庭女教师们关系很糟）。从我在桌前的位置，透过一扇西窗我会突然看见一个悬浮的神奇事例。在那里，在一瞬间，我父亲身穿被风吹皱的白色夏装的形象会显现，在空中光荣地摊开着，他的四肢处于一种奇异的随便状态，他英俊、镇静的面貌朝向天空。接连三次，随着他那些看不见的抛举者嗒嗒有声的强大抛掷，他会这样飞上去，第二次会比第一次上得更高，继而在他最后也是最高的高度，他会斜卧着，仿佛是永远如此，衬着夏日正午的钴蓝色，像一座教堂的穹顶上那些静静飞翔的极乐人物中的一个，他们的衣服上有那么多的皱褶，而下面，一支接一支，蜡烛在凡尘的手中点亮，在一片焚香的雾中形成一群连续的火焰，而神父吟诵永恒的安眠，葬礼的百合花在游动的光里，在打开的灵柩中，隐藏起了躺在那里的无论哪个人的脸。

① 法语“总有一天他们会让他摔下来的”。

第二章

15

第二章

当我远溯往昔，回忆我自己（怀着兴味，怀着愉悦，很少有敬佩或厌憎），我一向听从温和的幻像。有的属于听觉，别的则属于视觉，但没有一个曾给我很大的收益。阻止了苏格拉底或怂恿了乔安尼塔·达克的预言性重音已随着我堕落

16 纳博科夫

到了这样的水平，仿佛是一个人在举起和搁下一条占线的共用线电话的听筒之间碰巧听见的什么东西。就在入睡之前，我时常觉察到一种单向的对话在我头脑中一个附属部位继续着，完全独立于我思想的实际倾向。那是个中性的，超然的，匿名的声音，我听见它说着对于我毫不重要的词语——一句英语或俄语，甚至不是对我讲的，那么琐碎，以至我都不敢举个例子，否则我希望传达的坦率就会被一个感觉的殿鼠丘所破坏。这个愚蠢的现象似乎是我同样十分熟悉的某些入睡前的视觉的听觉对应物。我指的不是愿望之翼的一次扑动招来的明亮的心理意象（就像，比如说，一个久已故去的备受爱戴的祖先的脸相）；那是一个人的精神能够作出的最美的动作之一。我也不是在暗示所谓的 *musca 己 volitante*，①——玻璃般心情中的微粒投在视网膜上的影子，它们被看作是飘过视野的透明绳线。也许更接近于我正在思考着的昏昏欲睡的屋景的，是那彩色的一点，一个余影的刺痛，刚熄灭的灯盏就是以此来伤害眼睑的黑夜。然而，这种震惊并不真是在我紧闭的眼前经过的视觉那缓慢、沉稳的进展的一个必然的出发点。它们来而复去，没有困倦的观察者的介入，但本质上不同于梦的图画，因为他仍然是他感觉的主人。它们时常是古怪的。我被恶作剧的侧影，被某个容貌粗糙而面色红润，有肿胀的鼻孔或耳朵的矮子所困扰。然而有的时候，我的照相定义表现出一种颇为令人安心的刀。②的性质，然后我看到

① 拉丁语“职飞的蝇”。② 法语“朦胧柔和气

说吧，记忆 17——好像就反映在眼睑内部——灰色的形象行走在蜂房之间，或黑色的小鸚鵡渐渐消逝于岭雪，或一片淡紫色的幽远在移动的桅杆后溶化。

在这一切之外我还要展示一则有色听觉的好例。也许“听觉”不是十分恰切，因为色彩感似乎正是在我想象一个特定字母的轮廓时，我从口头形成了它这一行为造成的。英语字母中长长的 a（也正是这个字母在我的头脑中留存得更长远，除非它以另一种方

式被说出)对我来说有一种朽木的色度,但一个法语的 a 则唤起了擦得锃亮的乌木。这一黑色群体也包括硬音的 g (硫化橡皮)和 r (正被撕开的一块煤灰布)。燕麦片 n , 面条般无力的 l , 和背面是象牙的手镜。掌管白色。我困惑于我的法语 on , 我把它视为酒在一个小玻璃杯里满溢的表面张力。接着是蓝色群体,有钢铁的 x , 雷雨云 z , 和越橘树 k 。因为在音与形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相互作用 我把 q 看成比 k 多一些褐色,而,不是。的淡蓝色,而是蔚蓝与珍珠母的奇妙混合。相近的色度并不融合,双元音也没有它们特殊的色彩,除非在别的某种语言里为单独一个字母所代表(灰绒绒的,表示 sh 的那个有三支茎秆的俄语字母,一个与尼罗河的激流一样古老的字母,就是这样影响了它在英语中的代表)。

我要在被打断之前赶快写完我的名单。在绿色群体中,有赤杨叶 f , 生苹果 p , 和阿月浑子 t 。多少与紫罗兰相联系的暗绿色,是我能交给 w 的最好的色彩。黄色包括。和 i 的各不相同的黄色,奶色的 d , 明亮金黄的 y , 和" , 它的字母效果我只能表达为"带一层橄榄光泽的青铜色"。在褐色群体中,

18 纳博科夫

有软音的 g 那浓厚的橡皮色调,较淡的 j , 和土褐色鞋带 h 。最后,在红色里, b 具有画家们称为燃烧的赭土的色调, m 是一叠绯红的法兰绒,而今天我终于把 v 完美地比作麦尔兹和保罗的《色彩词典》中的"玫瑰石英"。代表虹,一弯原初的,但显然是泥土的虹的那个词,在我的私人语言中几乎是无法发音的:奴次扔嚼 v 。最先讨论 a " diti 阴。 ol 。形①的作家是,就我所知,1812 年埃朗根的一位白化病医生。

一个视觉专家的自白,在被比我的墙更坚固的墙隔开而看不见这样的泄漏和草稿的人听来肯定是乏味和自负的。然而,对于我母亲这一切似乎寻常之极。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七岁时的一天,当时我用一堆陈旧的字母块在搭一座塔楼。我漫不经心地向她谈起它们的颜色全都错了。接着我们发现她的一些字母与我的字母具有同样的色彩,此外,她在视觉上还受音符的影响。这在我身上丝毫没有引起任何色彩幻觉。音乐,很遗憾我要说,对我的作用只是作为任意的一连串或多或少令人不适的声音。在某些情感环境下我可以忍受一把柔和的小提琴的痉挛,但音乐会钢琴和所有的吹管乐器,音量小时令我厌烦,音量大时就像在剥我的皮了。尽管我每年冬天都要遭受那些歌剧的折磨(在六年里我去听《鲁斯兰》和《黑桃皇后》肯定至少有一打的次数),我对音乐的微弱反应完全被那种视觉的痛苦破坏了,那就是无法在皮曼的肩后读谱或是企图在朱丽叶的花园里黯淡的花朵中想象天蛾却一无所得。我母亲尽了一切努力以鼓励我对视觉刺激的基本敏感。① 法语"有色听觉"。

说 d 巴, i 己门艺 19 她为我画了多少透明水彩画呵；当她向我展现从混和的蓝色与红色中生长而出的紫丁香时，那是个怎样的启示呵！有时，在我们的圣彼得堡房宅里，从她的更衣室（也是我的出生室）墙上的一个秘密隔间，她会取出一大堆珠宝供我作临睡的娱乐。那时我很小，那些闪亮的女用织锦和项链和戒指，其神秘与迷人对我来说简直不逊于帝国节日期间的城市灯彩，那时候，在一个霜夜过于铺张的宁静里，巨大的字母组合图案，王冠，和别的徽章图样，全由彩色电灯球组成——蓝宝石色、祖母绿、深红色——带着一种被施了魔法的节制，闪耀在住户区沿街的前被雪勾出轮廓的飞檐上空。

我童年的多病使我与我母亲更加亲近了。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显示出了一种非凡的数学才能，我在奇怪地缺少才智的青年期完全失去了它。这一天赋在与咽喉炎或猩红热的搏斗中扮演了一个可怕的角色，当时我感到巨大的球体与庞大的数字在我疼痛的脑中无情地膨胀起来。一位愚蠢的家庭教师曾过早地向我解释对数，而我也读过（在一份英国出版的《男孩自己报》上，我相信）某一位印度算术家的故事，他用不多不少两秒钟就能找到，比如说，352947114576027513 2301597342055866171392 的十七次根（我不能肯定我记得准确；无论如何那个根是 212）。这些都是在我的澹妄中茁壮成长的鬼怪，而阻止它们把我挤得灵魂出窍的唯一途径是挖出它们的心脏杀死它们。但它们实在太强大了，当我试图向我母亲

纳博科夫

解释事情时，我会坐起来艰难地拼凑断章取义的句子。在我的澹妄下面，她认出了她本人也曾熟知的感觉，而她的理解会把我扩张着的宇宙带回一个牛顿的模式。

有自我抄袭这一类乏味的文学知识的未来专家，会乐于把我的小说《天赋》中一个主角的经历与原事仔细对照。有一天，在一次长病后，当我仍然十分虚弱地躺在床上时，我发现自己正怀着一种不寻常的轻松与安宁的欣喜在晒着太阳。我知道我母亲已去为我买当天的礼物了，是它们使那些康复的日子如此的愉快。这次会是什么我猜不出，但透过我奇异地朦胧不清的状态这片水晶，我生动地想象出她出门驶到摩斯卡雅街，驶向涅夫斯基大道。我辨认出那辆由一匹栗色骏马拉着的轻便雪橇。我听到它嗤嗤作响的鼻息，它的阴囊富有节奏的咔嗒声，撞着雪橇前沿的冻土块与雪块。在我眼前也在我母亲眼前隐现出车夫的背部，他身着塞得满满的蓝色长袍，包着皮革的手表（两点三十分）束在他腰带的后部，下面弯曲着他满满当当的巨臀那南瓜般的皱褶。我看到我母亲的海豹皮以及，当冰冻的速度加快时，她举到脸上的皮手筒——一位圣彼得堡太太的那种优雅的，冬季乘车的姿势。覆盖到她腰部的大块熊皮的两个角与她座位的低矮靠背两侧的把手由圆环扣在一起。在她后面，紧抓着这两个把手，一个帽子上有徽章的仆人站在滑

雪板后端上方他狭长的支撑物上。仍旧注视着雪橇，我看见它停在特鲁曼商店前（书写工具，铜的饰物，纸牌）。少顷，我母亲从这家店里出来，身后跟着那位仆人。他拿着她购买的物品，我看像一支铅笔。我惊讶她没有自己来拿这么小的一件东西，而这多方面的令人不

说吧，记忆

快的问题造成了一次“思想扩大效应”的虚弱的更新，幸运的是它很短暂，我本指望它已随热病离去了。当她再一次缩进雪橇时，我看见一切都在喷吐着水汽，包括马在内。我也观看着她撑开脸上罩得太紧的贴面面纱时的撅嘴动作，而当我把这写下，往日我亲吻她蒙着面纱的脸时嘴唇所感到的网线的轻柔接触就回到我身边——飞回到我身边，带着一声欢乐的喊叫，从雪一般蓝的，蓝色窗子（窗帘尚未拉起）的往昔传来。

几分钟后，她走进了我的屋子。她怀里抱着一支大铅笔。它曾经，在我的梦想中，大大缩减了尺寸——也许，是因为我下意识地纠正了逻辑警告我可能仍然是澹妄的膨胀世界的可怕残余的东西。现在这物品已证明是一支巨大的多边形法贝尔铅笔，四英尺长和相应的粗。它是作为一件展览物放在商店橱窗里的，而她猜想我向往得到它，像我垂涎于所有不太买得到的东西一样。店员被迫给一位代理商，一个李布奈尔“医生”打电话（仿佛那笔交易实际上还具有某种病理学意义似的）。在一个糟糕的瞬间里，我怀疑笔头是否由真的石墨做成。是真的。几年之后我在侧面钻了一个孔，证实铅贯穿了全长——对法贝尔和李布奈尔医生来说这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完美实例，因为这支铅笔太大了，无法使用，其实也没人指望要使用它。

“哦，是的，”当我提到这个或那个不寻常的感觉时她会说道。“是的，那我都知道，”以一种多少有点怪诞的率直她会谈论诸如复视，三脚桌的木结构里的轻敲声，前兆，和必

纳博科夫

户 vu ① 的感觉之类的事情。一道宗派意识的脉络贯穿着她的直系祖先。她只在四旬斋和复活节上教堂。那种分裂的意图在对希腊正教仪式及其神父的厌憎中自己显露了出来。她在福音书的道德与诗意的一面发现了一种深刻的感召力，但不感到需要支持任何教义。一种来世的惊人的不可靠与它的缺少隐秘没有进入过她的思想。她强烈而纯粹的虔诚所采取的形式是她对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与用凡尘的词语顿悟它的不可能这两者抱有同样的信仰。人所能干的一切就是从疑虑与妄想中瞥见前方的某个真实事物，正

如被赋予了一种整日思考的不寻常毅力的人们有能力在他们最深沉的睡眠中感觉到，在某个比他们纠缠不清又不合时宜的梦魔的阵痛更远的地方，苏醒时刻的有序现实。

用整个灵魂去爱，而把其余的留给命运，是她所关心的简单法则。“vot zapomni〔现在回忆〕”她会用密谋的语调说，把我的注意引向维拉的这件或那件深受热爱的事物——在一个黯淡的春日升上凝乳与乳清的天空的一只云雀，在夜间为远处的一排树画像的炽热闪电，褐色沙子上的枫叶床垫，新雪上一只小鸟的楔形脚印。仿佛是感到了不出几年她那个世界有形的部分就会烟消云散，她对遍布于我们乡村地产的各种时间标记培养起了一种奇特的意识。她怀念自己的往昔，心① 法语“似曾相识气

说 d 巴，i 己 1 艺 23 中所有的正是我此刻怀念她的形象和我的往昔的同一种回忆的热诚。就这样，我多少继承了一个精美的幻影——不可企及的财产、不真实的领地之美——这被证明是为忍受后来的失落而作的绝好训练。她特殊的饰物和印记对于我已像它们对于她一样的亲切而神圣。那里有在过去专为她母亲的特殊爱好而保留的屋子，一间化学实验室；有那棵标识了这个地方的菩提树，在斜上格里雅兹诺（重音在最后）村的路边，在最陡峭处，人们在那里更乐意提着“自行车的两只角”（bika za roga），像我父亲，一个热衷的骑行者爱说的那样，他在那里也曾这样提议过；还有，在所谓的“旧”园里，那个作废的网球场，如今是一个苔鲜、露鼠堆和蘑菇的地带，在八十和九十年代那里是快乐的连续抽杀场面（甚至她严肃的父亲也会脱下外衣，对最重的球拍报以评价的一挥），但在我十岁时，大自然已经把它抹去了，以一块毛毡擦抹去一个地理问题的彻底。

到那时，一个出类拔萃的现代球场已经在庄园“新”的部分的尽头，由为此目的而从波兰输入的熟练工人建成了。在它与那片框起了它的粘土的花地之间隔着一个大围栏的金属网。在潮湿的一夜后地面获得了一层微现褐色的光泽，白线将由德米特里，我们最小的也是最老的花匠，一个温和的，身着黑靴子和红衬衫的矮子，用一个绿桶里的液体白奎重新粉刷，他的刷子落到白线上时他缓缓后退，全身弓起。一道豌豆树篱（北俄罗斯的“黄杨槐，'），中间开着一扇门，正对着球场的屏门，平行于围墙和一条小路，它绰号叫 t 阳户 l' nka stinksov（“天蛾之路”），因为在黄昏里，在与树篱遥遥相对，

24 纳博科夫

也同样在中间断开的边界上，那些毛绒绒的紫丁香要受到天蛾的造访。这条小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t 的横线，它的垂直线是与我母亲同龄的瘦小栋树的小巷，横过（如前所述）新庄园的全长。从那个 t 在车道边的底座俯瞰那条大道，可以非常清楚地辨认出那明亮的小裂口，在五百码之外——或五十年之外，距我此刻的所在。我们当时的

家庭教师，或者与我们一起留在乡下时的我父亲，在我们变化不定的家庭双打赛中，总是找我弟弟合作。“看球！”我母亲会按老规矩喊叫一声，她向前伸出纤足，低下她戴着白帽子的头，舀出努力而又无力的一个发球。我很容易对她发脾气，而她则是对着球童，两个赤脚的农家少年（德米特里狮子鼻的孙子和马车夫长的女儿，漂亮的波兰卡的孪生兄弟）。北方的夏季在收获期前后变得像热带一般。一身猩红色的谢尔盖会把他的球拍插在两膝之间，艰难地擦拭眼镜。我看见我的蝴蝶网靠在围墙上一以防万一。华利斯·米尔关于草地网球的书摊开在一张长凳上，每次交换球权之后我父亲（一位一流球手，能打出一种弗兰克·莱斯利式的炮弹发球和一手美丽的“高急球”）总是迂腐地询问我弟弟和我那“完成动作”，那优雅的姿态，是否已经打得我们措手不及。有时候一场惊人的大暴雨会使我们缩进球场一角的一个棚子，老德米特里会被派到宅子里去取伞和雨衣。一刻钟以后他会扛着一座衣服的小山再次出现在漫长大道的远景中，他走过来时，大路在太阳的重新照耀下会复得它的豹斑，而他的重负也就不需要了。她喜爱所有技巧和赌博的游戏。在她内行的手底，一千块拼图版渐渐形成了一个英格兰狩猎的场面；那初看像是一条

说 d 巴，记忆 25 马腿的，原来属于一棵榆树，而此前一直难以处置的圆块将整齐地嵌进斑驳背景上的一个缺口，能带给人一种抽象然而触手可及的满足的细微震颤。有一段时间，她很热衷于扑克，它是通过外交圈子来到圣彼得堡社交界的，因此某些配置就总与漂亮的法语名字相伴— brelan 就是“三张同花”，couleu，是“同花顺”等等。所玩的牌戏是平常的“暗扑克”，^①，偶尔外加累积赌注和一个百搭的刺痛。在城里，她经常在朋友的府邸玩扑克直到凌晨三点，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一种社交娱乐；后来，在流亡之中，她时常想象（怀着她回忆德米特里的同一种惊疑和愕然）司机皮洛戈夫似乎仍在一个无尽黑夜的严霜中等待着她，尽管，对他来说，一间好客的厨房里搀酒的茶想必对熬过那些个长夜起了很大作用。‘她在夏天的最大快乐之一，正是 hodit ' p 口 gribi（采蘑菇）这种俄国运动。用牛油煎炸并用酸奶酪加浓，她美味的发现物定期出现在餐桌上。品尝的时刻倒不怎么重要。她主要的快乐在于寻求，而这种寻求有它的规则。因此，伞菌是不采的；她所挑选的种类全都属于牛肝菌科中的无毒部分（茶褐色的 eduli、，棕色的，caber，红色的 aura，t 艺 acus，和一些相近的同类），有人称之为“管菌”，而真菌学家们则冷冷地将它定义为“陆生有肉腐败中心有茎伞菌”。它们紧密的菌盖— 在幼年植物上紧紧附着，在成熟植物上健壮，并且开胃地隆起— 有一层光滑（而不平坦）的下层表皮和一个雅致强壮的茎。由于形式上的古典简洁，牛肝菌与长着荒唐可笑的菌褶和衰弱^① 一种牌戏，每人五张暗牌，下注后可以要求换牌。

不堪的柄环的“真蘑菇”大不相同。然而，味蕾胆怯的民族却把他们的知识和胃口限于后者，限于丑陋的伞菌，于是对英美的外行头脑来说，贵族的牛肝菌最好也只是变形的菌覃而已。

下雨的天气会将这样的美丽植物广播于我们庄园的傲树、桦树和杨树下，尤其是它较老的那一部分，在把庄园分成两半的马车道东面。它阴暗的隐蔽所那时会藏匿起令一个俄国人张大鼻孔的那种特别的牛肝菌气味——湿苔醉、沃土、腐烂树叶的一种阴暗、阴湿、令人心满意足的混合。但一个人必得在湿流流的矮树丛中凝神寻视很长一段时间，某种真正美好的东西，诸如一族有伞的幼年 *edulis* 或各种有大理石纹理的，*caber*，才能被发现并被小心翼翼地从泥土中梳理出来。在阴沉的午后，在细雨中独身一人，我母亲挽着一只篮子（里侧被某人的笃斯越橘染成了蓝色），会出发去进行一次漫长的采集旅行。将近晚餐时分，就能看见她从一条庄园小巷迷朦的深处浮现，她矮小的形象身披和头戴微绿的褐色羊毛，上面无数潮湿的小水珠在她四周形成了一种雾气。当她从滴着水的树林中走近并看见了我时，她的脸会显出一种奇怪的，不快的表情，也许是表明糟糕的运气，但我知道那是成功的猎人紧张的，节制的欣喜。就在走到我身边之前，随着一个突然垂下手和肩膀的动作和一声夸张的精疲力竭的“吁！”，她会沉下她的篮子，以便强调它的重量，它过度的圆满。在一张白色的花园长凳旁，在一张圆形的花园铁桌上，她会把她们的牛肝菌铺成同心圆来点数和挑选它们。有海绵般的脏肉的老蘑菇会被剔除，留下新的和脆的。有一会儿，在它们

说吧，记忆 27 被一个仆人扎起送到一个她一无所知的地方，交给一个她不感兴趣的劫数之前，她会站在那里欣赏它们，现出静静的满意的荣光。像一个雨天结束时经常发生的那样，太阳会恰恰在落山前投下一道火红的闪耀，而在那里，在潮湿的圆桌上，她的蘑菇会铺开，五彩缤纷，有的带着无关的植物的痕迹——伸向一顶粘性的浅黄色帽子的一片草叶，或仍旧披在一根有黑点的草茎的环状根上的苔醉。而一只小小的尺蠖幼虫也会在那里，像一个小孩的手指和拇指一样，量着桌子的边框，不时地向上伸展，徒然摸索着它被从中移走的那片灌木林。

厨房和仆役的厅堂不仅从来没有被母亲造访过，而且它们座落在远离她意识的地方，仿佛是一家旅馆的相应部分一样。我父亲也没有管理这宅第的意思。但他还是安排膳食的。轻叹一声，他会在甜食后打开仆役长放在餐桌上的一本簿子，以优雅、流畅的书法写下第二天的菜单。他有个特别的习惯，让他的铅笔或自来水笔就在纸上摇晃，一面思考下一道词语的涟漪。我母亲对他的建议点点头表示模糊的同意或是拉长了脸。名义上，家务由她以前的保姆一手经管，那时她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令人难以置信地满脸皱纹的老妇人（在 1830 年左右一生下来即是农奴），有着一张忧郁的乌龟的小脸和曳行的大脚。她穿一身修女般的褐色衣裙，并发出一种微弱但难忘的咖啡与腐败的气味。

在我们的生日或命名日她可怕的祝辞就是肩上农奴身份的亲吻。年龄在她身上发展起了一种病态

纳博科夫

的吝啬，尤其是对糖和果酱，于是渐渐地，在我父母的庇护下，另外的家务安排，一直背着她，悄悄地开始实行了。对此一无所知（知道了会使她心碎），她一如继往，仿佛是挂在自己的钥匙圈上，而我母亲则尽力用安慰的词句减轻时而掠过这个老妇人越来越脆弱的头脑的疑惑。她是她发霉而偏僻的小小王国唯一的女主人，她以为那是个真实的王国（果真如此我们就得挨饿了），当她迈步稳稳地穿过长廊去存放她在一只盘子里发现的半只苹果或一堆碎 petit — beurre ① 饼干时，身后跟随着男仆女仆嘲讽的眼光。

同时，有大约五十名常雇的仆役但却无人提出疑问，我们在城里的家和乡间地产是一派偷盗旋转木马的奇异景象。关于这一点，据两个无人留意但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嗅觉灵敏的老阿姨说，主厨尼古拉·幸德烈维奇和花匠长伊戈尔，两人都有忠仆似的花白头发，外表严肃，戴着眼镜，正是两个主谋。在面对惊人的、不可思议的帐薄，或花园草莓与温室桃子的一次突然消失时，我父亲，一位法理学家和政治家，感到了无法处理自己家庭的经济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烦恼；但每当一桩复杂的窃案真相大白时，某种合法的疑虑或顾忌总是阻止了他对它有所行动。当常识要求解雇一个卑鄙的仆人时，那个人的小儿子总会似是而非地病入膏肓，而要给他找城里最好的医生的决心就会打消其他的一切考虑。于是，虽有这件或那件事，我父亲也更乐于让整个家务情况保留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上（并非没有某种无言的幽默），我母亲则从她① 法语“小奶油”。

说0巴，记忆29的老保姆的幻想世界不会破灭这一希望中得到颇大的慰藉。我母亲很了解一个破碎的幻觉能多么伤人。最无关紧要的失望对她来说都表现了一场大灾难的各个方面。一个圣诞节前夜，在维拉，在她第四个婴儿出生前不久，她碰巧因一场小病而卧床，要我弟弟和我（分别是五岁和六岁）答应，在第二天早晨不去看我们将会发现挂在我们床柱上的圣诞节长袜里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带到她的房间并在那里细看，以便她能够看着分享我们的快乐。在醒来时，我悄悄与我弟举行了一次商洽，之后，用渴望的手，各自摸着各人装满了小礼物的，令人愉快地寒笨作响的长袜；这些我们都小心翼翼地一件件摸清了，解开束带，打开棉纸，藉着从窗扇的缝中透进的微光浏览每一件东西，把这些小东西重新包起来，把它们塞进它们本来所在的地方。接着我回想起我们坐在母亲的床边，举着那块块隆起的长袜，尽我们所能来作出她希望看见的表演；但我们把包装弄得那么糟，我们所上演的热情的惊奇又是那么拙劣（我看得见我弟弟把眼睛翻上去摹仿我们的法国女教师惊呼，“ah，qu 己。，es t beau ！①”），以致，

观察了我们一会儿之后，我们的观者突然哭了。十年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群爱国者和我的卢卡舅舅向德国大使馆投掷石块。彼得堡被降为彼得格勒，违背了一切优先命名的准则。贝多芬被证明为荷兰人。新闻影片展示着适于上镜的爆炸，一① 法语“啊，多美呀！”

30 纳博科夫

「1 加农炮的抽搐，打着皮绑腿的普恩加莱①，阴冷的泥潭，穿着切尔克斯制服武装着刺刀和子弹的可怜的小查列维奇，他衣衫如此槛褛的高个子姐姐，长长的塞满了部队的列车。我母亲为伤兵建了一所私人医院。我记得她，一身她所厌恶的灰白色时髦护士制服，流着同样孩子气的眼泪责备那些残废农民的刺不透的谦卑，和非全日同情的无效。而更晚些时，在流亡中，回顾着往事，她时常会自责（如今我看到那并不公正）感动于人的苦难不及感动于人类向无辜的自然倾倒的情感负荷——老树，老马，老狗。

她对褐色猎灌狗的特殊钟爱使我爱挑剔的阿姨们头疼。在描画了她的青春岁月的家庭照相簿里，几乎没有一组照片少得了一只这样的动物——通常它富有弹性的身体某个部分被弄脏了，并且总是带着猎猫狗在快照中那种奇怪的，妄想狂的眼光。一对肥胖的老家伙，盒子一号和露露，在我儿时还躲在门口的阳光里。1904 年的某个时候我父亲在慕尼黑一次狗展上买到一只小狗，它长成了脾气暴躁但英俊得出奇的特兰内（我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因为它像一节卧车一样长，一样是一身褐色②）。我童年的音乐主题之一是特兰内歇斯底里的舌头，那时它在我们的维拉庄园深处追踪一只他永远也抓不到的兔子，在黄昏他会从那里返回（在我焦急的母亲站在栋树大道上吹了很长时间口哨之后），嘴里叼着一只服鼠的陈

① raymond poincar 毛（1560 . 5 , 20 ? 1934 . 10 . 15 ），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法国总统。

② “特兰内（trainy）”，由“火车（train）”一词而来。

说 o 巴，记忆 31 旧尸体，耳朵上扎满了芒刺。1915 年前后，它后腿瘫痪，在被施以麻醉之前，它总会阴郁地拖着身子爬过一片片长长的光滑的嵌木地板，像一个。ul de jatt 尸①。之后有人又给了我们一条小狗，盒子二号，它的祖父母是安东·契诃夫博士的契娜和布罗姆。这只最后的猎灌狗跟随着我们流亡，迟至 1930 年，在布拉格的郊区（我孀居的母亲在那里，靠着捷克政府提供的一笔微薄的养老金度过了她的余年）还能见到它不情愿地跟着它的女主人去散步，跳珊着远远落在后面，苍老之极，对它长长的捷克僵绳口络发着脾气——一只穿着打补丁的不合身外衣的流亡之狗。

我们在剑桥的最后两个年头，我弟弟和我经常在柏林度假，我们父母和两个女儿以及十岁的基里尔在那里居住着那些巨大、阴暗、布尔乔亚式的套间中的一套，我曾在我的长篇小说里把它们租给了那么多的流亡者家庭。在 1922 年 3 月 28 日夜，十点左右，在起居室里，我母亲一如往常斜靠在角落的红绒长沙发上，我正巧在给她读勃洛克写意大利的诗——刚读到有关佛罗伦萨的小诗末尾，勃洛克把它与一棵鸢尾属植物精致的，烟雾一洋的花朵相比，而她一边编织一边说，“对，对，佛罗伦萨看上去像一朵 dimn 妙 iris ②，多么真切！我记得——”这时电话铃响了。

1923 年后，当她迁往布拉格，而我则住在法国与德国的时候，我无法经常去访问她；她去世时我也不在她身边，那

① 法语“双腿残缺者”。② 烟雾般的鸢尾花。

32 纳博科夫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每当我计划去布拉格，总是有那种最初的懊悔，人们就是在被无意中发现的时间又一次戴上了它那熟悉的面具之前感到它的。在她与她最亲密的伴侣，叶甫金尼娅·康斯坦丁诺娃·霍菲尔德（1884—1957）——她在 1914 年代替了格林伍德小姐（她则是取代了拉文顿小姐）成为我两个妹妹（奥尔加，1903 年 1 月 5 日生，和埃莱娜，1906 年 3 月 31 日生）的家庭教师——合用的可怜公寓里，她在最后的年月里把她最喜爱的诗篇，从马伊科夫到马雅科夫斯基，抄写下来的一本本札记簿，就躺在她周围，在老旧的二手家具的琐屑物品上。我父亲的一只手的铸模和如今藏于柏林的一幅他在泰赫勒的希腊正教墓地的水彩画，与流亡作家的书籍分享着一个架子，在它们廉价的纸张覆盖物下如此易于碎裂。一只盖着绿布的肥皂盒支撑着她喜欢放在沙发边的，镜框开裂的阴暗小照。她并不当真需要它们，因为什么也没有失去。像一个巡回演出队在仍旧记得他们的路线时，把一片起风的荒地，一座雾霭的城堡，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岛带到各地一样，她也把她的灵魂所保留的一切带在身边。以巨大的清晰，我可以看见她坐在一张桌前静静地凝视着一次单人牌戏中打出的牌：她斜靠在左肘上，把左手空闲的拇指压在脸颊上，手里夹着一支烟在嘴边，而她的右手在伸向下一张牌。她无名指上的一对闪光是两个结婚戒指——她自己和我父亲的，父亲的对她来说太大了，用一小段黑线与她的绑在一起。每当我在梦中见到死者，他们似乎总是沉默、焦虑、奇怪地抑郁，与他们可爱、明朗的本性很不相似。我毫不惊讶地觉察到他们，置身于他们在尘世的存在期间从未访问过的环

说 0 巴，记忆 33 境，在我的某个他们从未谋面的朋友家里。他们分坐着，向地板皱眉，仿佛死亡是一个黑色的污点，一个可耻的家族秘密。当然不是在那时——不是

在梦中——而是在一个人完全醒着的时候，在生机勃勃的快乐与成功之时，在意识最高的高台上，道德才有机会望过它本身的界限，从桅杆上，从往昔和它城堡的塔楼之上。而尽管透过雾障看不见什么，多少会有一种极乐之感，即一个人正在眺望着正确的方向。

第三章

第三章

一位没有经验的纹章学家仿佛一个中世纪旅行者，他从东方带回的奇禽异兽幻想深受他向来拥有的本国动物传说的影响，而非直接的动物学考察的结果。就这样，在这一章的初稿里，在描述纳博科夫家族的盾徽（曾于多年前在一些琐碎

说。巴，记忆 35 的家庭物品中被无心地瞥见过）的时候，我不知怎地把它曲解成了两只狗熊在火炉边摆着姿势，中间支着一张巨大的棋盘的奇景。如今我已细看过它，那面纹章，并且失望地发现它缩成了一对狮子——褐色的，也许毛发过于粗乱的野兽，但并不真像狗熊——舔着它们的排骨，后腿直立，转头回顾，傲慢地展示着那位不幸的武士的盾牌，它只有一张棋盘的十六分之一，两色相间，蔚蓝与鲜红，每一个方格里都有一个银色的博托内十字架^①。在它的上方可以看到武士留下了什么：他坚硬的帽盔和不可食用的颈甲，以及从一种鲜红与蔚蓝相间的叶形装饰中伸出的勇敢的手臂，仍在挥舞着一把短剑。za hrabrost，，“为了勇气”，题铭如是说。

我在 1930 年请教过我父亲的表兄弟弗拉基米尔·维克托洛维奇·戈卢布采夫，一位俄国古物的爱好者，据他说我们家族的建立者是纳博克·慕尔扎（鼎盛于 1380 年），莫斯科维的一位俄罗斯化的糙粗王子。我自己的表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纳博科夫，一位博学的系谱学者，告诉我说在十五世纪我们的祖先在莫斯科公国拥有土地。他交给我一份文件（由尤什科夫发表于《十三至十七世纪的法案》，莫斯科，1899 年），有关 1494 年在伊凡三世治下乡村武士库里雅金与他的邻居卢卡·纳博科夫的儿子菲拉特、艾弗多基姆与弗拉斯之间的一次争吵。在这以后几个世纪里纳博科夫们是政府官员和军人。我的太祖父，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纳博科夫将军（1749—1807）在保罗一世王朝中是官方文件称为“纳博科夫团”的^① boton 阮，嘴端有三叶花样的十字架（用于纹章中）。

36 纳博科夫

诺夫哥罗德卫戍军团的团长。他最小的儿子，我的曾祖父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纳博科夫，在 1817 年是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当时他与未来的海军司令冯·兰吉尔男爵和李特克伯爵一起，在瓦西里·马哈伊洛维奇，戈洛夫宁（后来的副司令）的率领下，参加了勘探新地岛（竟是那个地方）的远征，就在那里，“纳博科夫河”随我的祖先而得名。这次远征的统帅的记忆保留在许多地名之中，其中之一是戈洛夫宁的拉贡，在西阿拉斯加的塞沃半岛，来自那里的一种蝴蝶，尸 a，assius phoebu，golovinus（应该加上一个大大的 si。^①）曾被霍兰博士描述过；但我的曾祖父却没有什么可展

示的，除了那条回旋于潮湿的岩石之间的非常蓝，几乎是靛蓝，甚至蓝得愤怒的小河；他很快离开 t 海军 n , a 夕 ant 户 as le 户 ied marin ②（如我的表兄弟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所说，是他告诉了我他的事迹），并转到了莫斯科卫队。他与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纳西莫夫（那位十二月党人的妹妹）结了婚。我对他的军队生涯一无所知；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他都不会比得上他的兄弟，伊凡·亚历山德洛维奇·纳博科夫（1787 — 1852），反拿破仑战争的英雄之一，以及，在他年老时，圣彼得堡的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司令官，他在那里（在 1849 年）的囚犯之一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等书的作者，那位温厚的将军曾把书借给他读。然而，有趣得多的却是他娶了艾卡特里娜·普希钦，普希金的同学和密友伊凡·普希钦的妹妹，注意，印刷者

拉丁语“原文如此”。法语“因为他晕船”。

① ②

说 d 巴 , i 己 1 艺 37 们 , 两个“钦”和一个“金”。

伊凡的侄子即尼古拉的儿子是我祖父德米特里·纳博科夫（1827 — 1904），他在两个沙皇治下当过八年的司法部长。他娶了（1859 年 9 月 24 日）马莉亚，一位在俄国服役的德国将军菲丁南德·尼古拉乌斯·维克托·冯·考尔夫男爵（1805 — 1869）的 + 七岁的女儿。

在结合紧密的古老家族里某些面部特征一再出现，像疾病的症候或制造者的商标一样。纳博科夫鼻子（比如我祖父的）是俄国式的，有柔和浑圆的上翻鼻尖和侧面的和缓内倾；考尔夫鼻子（比如我的）是一个漂亮的德国器官，鼻梁骨的轮廓鲜明，肉乎乎的鼻尖微微倾斜，有着清晰的凹槽。目空一切或吃惊的纳博科夫们眉头突起，上面仅有稀少的毛发，这样向太阳穴逐渐消失；考尔夫的眉毛弯曲得更漂亮些，但同样尚嫌不足。不然的话纳博科夫们，在他们顺着时间的图画陈列馆退入阴影时，就很快加入了暗淡的卢卡维什尼可夫家族，对于他们我只知道我母亲和她的兄弟瓦西里，对于我眼前的目的是一个太小的样本。另一方面，我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考尔夫系列的女性，美丽的，百合与玫瑰般的姑娘，她们红润的高 pommettes ①，淡蓝的眼睛和一面脸颊上那小小的美人痣，一个小斑似的印记，我的祖母，我的父亲，他的三四个兄弟姐妹，我的二十五个表兄弟姐妹中的一些人，我的妹妹和我的儿子德米特里以不同的浓度继承了它，像同一图案的一幅幅或是清晰或是模糊的翻版。

① 德语“颧颊” o

纳博科夫

我的德国曾外祖父，与尼娜·亚历山德洛夫娜·希什科夫(1819 — 1895)结婚的菲迪南德·冯·考尔夫男爵，1805 年生于柯尼斯堡，1869 年，在一段成功的军人生涯之后，死于萨拉托夫附近她妻子的伏尔加地区领地。他是冯·考尔夫男爵威廉·卡尔(1739 — 1799)和冯·德·奥斯滕—萨肯女男爵艾莱奥诺尔·马格利特(1731 — 1786)的孙子，是普鲁士军队中一名陆军少校尼科劳斯·冯·考尔夫(死于 1812 年)和作曲家卡尔·亨利希·格劳恩的曾孙女安托伊内特·泰奥多拉·格劳恩(死于 1859 年)的儿子。

安托伊内特的母亲，伊里莎白，父姓菲谢尔(生于 1760 年)，是父姓哈同的里基娜的女儿，里基娜(1732 — 1805)是柯尼斯堡一家著名出版社的首脑约翰·亨利希·哈同(1699 — 1765)的女儿。伊里莎白是一位有名的美人。在 1795 年与她的第一任丈夫，那位作曲家的儿子，ju " izrat ① 格劳恩离异之后，她与小诗人克里斯坦·奥古斯特·冯·斯塔格曼结了婚，并且，像我的德国资料表明的那样，成了一位有名得多的作家亨利希·冯·克莱斯特(1777 — 1811)的“母亲般的朋友”，而他则在三十三岁时热情地爱上了她十二岁的女儿海德威格·玛莉(后来的冯·奥尔弗斯)。据说他曾在旅行去万塞—去履行与一位发疯的女士订立的一项激情洋溢的自杀协定—之前为辞行而拜访这一家却未遇，那天是斯塔格曼全家的洗衣日。我的祖先与文学世界接触的数量与样式之多的确是不寻常的。卡尔·亨利希·格劳恩，我的曾外祖父菲迪南德·冯·考尔① 德语“司法顾问”。

说吧，记忆 39 夫的曾外祖父，1701 年生于萨克森尼的瓦仁布吕克。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格劳恩(生于 1670 年)，一位国产税吏("koniglicher polnischer und ku 长角 stlich ' r schsischer akziseneinneher ① "一所述的选帝侯是他的同名名人，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来自长长一列牧师的队伍。他的太祖父沃尔夫冈·格劳恩在 1575 年是普劳恩(瓦仁布吕克附近)的风琴师，在那里，他的后裔，那位作曲家的雕像使一座公园增色。长尔·亨利希·格劳恩在 1759 年他五十八岁时死于柏林，十七年前，那里新歌剧院的首演就是他的《恺撒与克莱奥佩特拉》。他和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作曲家之一，甚至是最伟大的，据被他的皇家恩主的悲伤所感动的鬼籍簿作者所言。格劳恩(死后)被呈现为多少有点疏远地双臂交叠站立着，在门采尔的弗雷德里克大帝用笛子吹奏格劳恩乐曲的图画里，这幅画的复制品在我的流亡岁月里跟随我遍历了我逗留过的每一所德国公寓。有人告诉我在波茨坦的圣—苏契宫里有一幅当时的画作，展现了格劳恩和他的妻子多萝西·瑞科普坐在同一架羽管键琴前面。音乐百科全书总是复制他在柏林歌剧院的肖像，他在其中看上去像极了作曲家尼古拉·德米特列维奇·纳博科夫，我的表兄弟。一个逗人的小小回声，总数达 250 美元，从一个镀金的往昔的彩色穹顶下面的那些音乐会上传来，温和地到了我手里，那时我身处“嘿尔—希特勒”处处可闻的柏林，正值 1936 年，当时格劳恩家族限定继承的财产，基本上是一

堆漂亮的鼻烟盒和其它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其价值① 德语“波兰皇帝及萨克森选帝侯之税务官”。

40 纳博科夫

在经历了普鲁士银行的许多尊神之后已降至 43,000 reichsmarks ①（约合 10,000 美元），分散于那位节俭的音乐家的后裔，冯·考尔夫、冯·威斯曼和纳博科夫家族中间（第四条线索，阿西纳里·迪·圣·马扎诺伯爵一家，已经消失了）。两位冯·考尔夫女男爵曾留迹于巴黎的警案纪录。一个原名安娜—克里斯蒂安·斯泰格尔曼，一位瑞典银行家的女儿，是我祖母的曾舅公，俄军上尉弗朗霍尔德·克里斯蒂安·冯·考尔夫的遗孀。安娜·克里斯蒂娜也是另一位士兵，著名的阿克塞尔·冯·福尔森伯爵的表妹或爱人，或两者都是；也是她在巴黎，在 1791 年，把她的护照和她定制的崭新马车（一个豪华的物件，构架在高高的红轮子上，以白色的乌得勒支天鹅绒装潢，有暗绿色的窗帘和各种小器具，当时都可算摩登，诸如一个 vas。d 召 voyage ② 之类）借给王室，让他们逃往瓦仁内斯，女皇装扮成她，国王则扮成两个孩子的教师。另一个警察故事则涉及一个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的化装舞会。在一个多世纪前，在巴黎，狂欢周将近，莫尔尼伯爵曾邀请“un。noble dame gu' la russia ap 形 scet hiver la france ③，，（亨利兄弟在 illustration ④，1559 年，251 页 gazette du 尸 ari，⑤ 那一章里这样记录说）参加他家的一个化装舞会。这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冯·考尔夫女男爵尼娜；她五个女儿中

① 德国马克。

② 法语“旅行容器气

③ 法语“俄国在这个冬天带给法国的一个高贵女人”。④ 法语气名流》”。

⑤ 法语“巴黎故事”。

说。d 巴，i 己忆

的长女玛莉亚（1842 — 1926）将在同一年，1859 年的 9 月与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结婚，他是全家的朋友，那时也在巴黎。为了那次舞会，这位太太给玛莉亚和奥尔加订购了两套卖花女的服装，每套 220 法郎。它们的价钱，据 illustration 油腔滑调的报道者说，说明了 643 天的“de nourriture, j' l 叮 er etd, entretie, du pec 形 pin [食物，房租和鞋袜]”，听来古怪。当服饰齐备时，考尔夫太太发现它们“trop dollete ①”而拒绝接受它们。裁缝给她叫来了 huissier（保

证人)，他们就此大吵了一场，而我的好曾祖母（她美丽、热情犷并且，很遗憾我要说，其个人道德远不如她对低开领的态度所显示的那么严肃）则控告裁缝，要求赔偿。她断言带来那两套衣服的 *demofseues de magazi*，② 是 "je, pronelles [泼妇]"，在回答她的责备，即服装开口太低，淑女穿不出去的时候，"se sont permis d'expose, de, t 咽~, 仑 galitaires ju 户 lus mauvais 90 't [竟敢炫耀品味最差的平均观念]"；她说再定做别的奇装异服已经为时太晚，她女儿们没有去参加那个舞会；她指责那位 *huissier* 和他的助手们摊在软椅上却邀请女士们去坐硬椅；她也愤怒而严厉地抱怨那位 *huissis*：实际上威胁要监禁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先生，*uconseillerd 乍 tat, homme sage et plein de mesure* [一位庄重的，严于自制的人]"，仅仅因为上述的那位绅士曾试图把那位 *huissie*，从窗口扔出去。这几乎算不上是个案件，但裁缝败

① 法语“袒脚露背气”② 法语“女售货员”。

42 纳博科夫

诉了。她取回了她的衣服，退还了它们的价钱并外加一千法郎给原告；另一方面，在 1791 年，为克里斯蒂娜制造马车的人呈给她的账单，一笔五千九百四十四镑的款项，则根本没有得到偿付。

德米特里·纳博科夫（以 *ff* 结尾是一个旧大陆时尚），1878 年到 1885 年的国家司法部长，曾尽其所能来保护，如果不是加强的话，六十年代的自由派改革（比如陪审团审判），抵抗保守派的凶猛进攻。“他的行事，”一位传记家说（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俄语第二版），“很像一场风暴中的船长，他会把一部分货物从船上扔进水里以便保全其余的货物。”这墓志铭式的直喻无意间回响着，我注意到，一个题铭学的主题——我祖父早年要把法律扔出窗外的企图。

他退休时，亚历山大三世让他在伯爵头衔和可能是很大的一笔钱之间作出选择——我不知道在俄国一个伯爵爵位到底有什么价值，但与节俭的沙皇的愿望相反，我祖父（像他的叔父伊凡一样，尼古拉一世也给了他一次相似的机会）衷心拥护更为实在的奖赏。（"encore un co...te rati ①"，谢尔盖·谢尔盖维奇干巴巴地评论道。）那以后他一般住在国外。在本世纪初的最初几年他已经头脑不清，但他仍旧坚信只要他留在地中海地区一切就会好转。医生们则抱着相反的观点，认为他在某个山区胜地的气候下或在俄国北部会更长寿。有一个奇特的故事，我还无力将它拼合起来，讲的是他在意大利某地逃离了他的随从。他在那里漫游，以李尔王一般的激情当着① 法语“又一个失败的伯爵”。

说 d 巴 , i 己忆

晒笑的陌生人指责他的孩子们，直到他在一片乱石的荒野被某个平凡的 carabinieri ① 抓获。1903 年冬季，我的母亲，那个老人在发疯的时刻能够忍受其在场的唯一一个人，时常在尼斯陪伴他。我弟弟和我，分别是三岁和四岁，也与我们的英国家庭女教师一起在那里；我记得窗玻璃在微风中的碰响和手上一滴灼热的封蜡造成的疼痛。用一支蜡烛的火焰（一束阳光侵入我跪着的石板，把它冲淡成了骗人的苍白），我忙于把这种材料正在滴落的枝娅变成粘性的，发出神奇气味的，鲜红、幽蓝和铜色的斑点。随后的那一刻我就在地板上嚎叫了，我的母亲慌忙赶来营救，而在附近某个地方我轮椅中的祖父则在用手杖重击着回响不绝的石板。她与他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他使用的语言错误百出。他一直把推着他沿着那条 promenade de , anglais ② 散步的仆人误认为洛里斯—麦里科夫伯爵，他在人十年代的国务内阁里的一位（去世已久的）同僚。“qu'il ' est ' ett 己 femme — c 人 assez — la ! ③ ，，他会向我母亲大叫，用颤抖的手指指着伫足询问他的健康的比利时或荷兰女王。我隐约记得曾跑到他的轮椅前面给他看一块漂亮的卵石，他慢慢地端详着它，然后慢慢地把它放进嘴里。我希望当我母亲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那些时光之际，我曾有过更多的好奇心。他会在一段段越来越长的时期里陷入无意识的状态；在这样的一次昏迷之中他被转移到了他在圣彼得堡宫殿码头的

① 意大利语“宪兵气

② 法语“英格兰人散步场气⑧ 法语“这个女人是谁— 把她赶走 i ”。

纳博科夫

落脚处。当他渐渐恢复意识时，我母亲把他的卧室伪装成了他在尼斯住过的一间。找到了一些相似的家俱，许多物件也由一名特别信使飞速送到，他朦胧的感觉已习以为常的所有那些花朵也有了，它们的种类和丰盛都恰如其分，从窗口就望得见的一小片屋墙也被漆成了明亮的白色，因此每次他恢复到一种相对的清醒时，他都发现自己安全地置身于我母亲巧妙上演的幻觉的里维埃拉；在那里，在 1904 年 3 月 28 日，恰恰在我父亲之前十八年，一天不差，他安宁地死去了。他留下了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最大的是德米特里，他在波兰当时的沙皇领土继承了纳博科夫长子继承地产①；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莉迪亚·艾杜阿多夫娜·弗拉兹—费因，他的第二个妻子是玛莉·瑞德里希；接下来是我父亲；然后是谢尔盖，米滔的总督，他娶了达里亚·尼古拉耶夫娜·图契科夫，斯摩梭斯克亲王菲尔德·马夏尔·库图佐夫的玄孙女。最小的是康斯坦丁，终身未娶。姐妹有：娜塔莉亚，驻海牙的俄国领事伊凡·德·彼得森的妻子，薇拉，运动家和

地主伊凡·皮哈切夫的妻子；尼娜，她与华沙的军事总督饶希·冯·特劳奔伯格男爵离婚后嫁给了对日战争中的英雄尼古拉·考罗梅采夫海军大将；伊丽莎维塔，嫁给了塞因—维特根斯坦—贝尔勒伯格亲王亨利，他死后，又与她的儿子们以前的家庭教师罗曼·莱克曼结了婚；还有娜杰日达，德米特里·冯里亚里亚斯基的妻子，后来又与之离了婚。

康斯坦丁叔叔在外交部门，在他的伦敦生涯的最后阶段① majorat，仅有长子能够继承的地产。

i 兑 0 巴，i 己 1 艺 45 展开了一场与萨布林的痛苦而不成功的争斗，为的是他们中哪一位来领导俄国代表团。他的一生并不多彩多姿，但他有好几次成功地逃脱了一种比 1929 年在伦敦一家医院里杀死了他的气流更不温和的命运。一次是在莫斯科，在 1905 年 2 月 17 日，当时一位老朋友，谢尔盖大公，在爆炸前半分钟伸手要把他让上车，而我叔叔说不，谢谢，他宁可步行，马车就开走了，驰向它与一名恐怖分子的炸弹的致命约会点；第二次是七年以后，当时他误了另一个约会，这回是与一座冰山，碰巧他退掉了他的泰坦尼克号船票。我们逃出俄国后在伦敦时常见到他。1919 年我们在维多利亚站上的相会是我头脑中一幅生动的小插图：我父亲阔步走向他的兄弟，敞开他的怀抱；他退开，并连声说："mi v anglii, mi v anglii [我们这是在英国]"。他迷人的小公寓布满了来自印度的纪念物，如年轻的英国官员的照片之类。他是在大的公共图书馆里很容易找到的《一种困境的考验》和普希金《波利斯·戈杜诺夫》英语改写本的作者；连同他的山羊胡子，他也被描画（与维特伯爵，那两名日本代表和一位仁慈的西奥多·罗斯福一起）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主门厅左侧一幅有关签署朴茨茅斯和约的壁画上——一个合适之极的位置，来让我发现我的用金色斯拉夫字母写下的姓氏，在我第一次经过那里时——身边是一位鳞翅目专家同僚，连说“当然，当然”回应着我识别后的惊叹。图解地看，圣彼得堡以南五十英里的奥列杰日河上的三

纳博科夫

处家族地产，可以描述为一条十英里长自西向东横越卢加公路的链条上的三个相接的环，我母亲的维拉居中，她兄弟的罗杰斯特维诺居右，我祖母的巴托沃居左，那些连锁则是跨过奥列杰日（正确读法为 oredezh'）地界那边的菩提树大道。我如此清晰地看见那三个年轻人（他们年龄的总和与我如今的年龄相等）跟着他们的东道主和两个不认识的人走进庄园。在那个日期紫罗兰的小小碎片透过去年枯叶的地毯显露出来，而新近出现的橙翅尖落在颤抖的蒲公英上。在一瞬间命运可能摇摆在阻止一个英雄的叛逆走向纹架和从俄罗斯手中夺走《欧根·奥涅金》之间；然而两者都没有发生。雷里耶夫在 1826 年被处死于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城堡之上，几十年后，巴托沃被我祖母的母

亲，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希什科夫，后来的冯·考尔夫男爵夫人，从国家手中得到，我祖父在 1855 年前后又从她手中买下了它。纳博科夫家由男女家庭教师培养长大的两代人都把某一条穿过巴托沃那边的树林的小径叫做“le chemin du pendu”，被绞死者最喜爱的走道，在社会上这是指雷里耶夫：冷淡地但也委婉而疑虑地（绅士们在那时候并不常被绞死），仍偏爱着那位十二月党人或谋反者。我足可想象年轻的雷里耶夫在我们树林里杂乱的绿叶中，散着步，读着一本书，那是一种具有他们时代风格的浪漫的步行形式，就像我足可梦想那无畏的海军上尉与他的同志和困惑的群众一起在阴冷的参议院广场上反抗暴政一样；但好孩子们向往的那条长长的，“成年的”p ? "ade ① 的① 法语“散步场”。

说 d 巴，i 己忆 47 名字，在整个童年时代都与巴托沃不幸的主人的命运无关：我的表兄谢尔盖·纳博科夫，生于巴托沃的 lachambred 。 revenant ①，想象那是一个传统的幽灵，而我与我的男教师或女教师则模糊地猜想曾有人发现某个神秘的陌生人在一棵正有一只罕见的天蛾产卵的白杨树上晃来晃去。雷里耶夫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就是“被吊死者”（p oveshenniy 或 vesel ' nik），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但庄园里的各家各户显然都有一种奇特的禁忌，阻止了父母们说出那个幽灵的名字，似乎只要一个具体的指称，那个在一处可爱的乡间命名了一条景色如画的步道的短语的富有魅力的朦胧，就会被打上一种狠裹的色彩。然而，我发现可怪的是认识到即使是我父亲，他对十二月党人有那么多的了解，对他们的同情又远比他的亲友们深，就我的记忆所及，在我们四处漫步和骑车游历期间也从没有一次提到过贡德拉蒂·雷里耶夫。我表兄提醒我注意这一事实，即雷里耶夫将军，那位诗人的儿子，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我祖父 d . h . 纳博科夫的密友，以及 on ne parlo pas d ' cord " dans la maison du pendu ②。

从巴托沃开始，那条车痕累累的旧路（我们曾与普希金一道走过，现在又顺着它折回）向东延伸几英里通到罗杰斯特维诺。就在主桥之前，既可以在开阔的乡野往北转到我们的维拉和它在道路两侧的两座庄园，不然也可以继续往东，走下一座陡峭的山，经过一片满是覆盆子和总状花的旧墓地，过

① 法语“鬼屋”。

② 法语“在吊死鬼的屋子里不谈论绳子”。

纳博科夫

桥到我舅父远在山上的白柱子宅邸。

罗杰斯特维诺地产有一个同名的大村子、广阔的土地，和一座高踞于奥列杰日河上的住宅，座落在卢加（或华沙）公路上，属皇村（今普希金）地区，离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五十英里，十八世纪前曾以旧科波尔斯克地区的库罗维茨领地著名。1715 年左右它是大暴君彼得一世的不幸儿子，亚列克赛亲王的财产。一道。scalie，决 ro 华①的残余和别的我记忆不及的什么东西还保留在这座建筑物的新的解剖学里。我曾摸过那道梯柱，也曾看见过（或踩过？）另外的，被遗忘的细节。从那座宫殿里，顺着那条通往波兰和奥地利的公路，那位亲王曾经逃跑过，只是为了最后被沙皇的代理人，皮奥特尔·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使（在那里他曾为他的主人买下那个小黑人，他的曾孙就是普希金）从南边远到拿波里的地方诱回那座父亲的折磨之宅。罗杰斯特维诺后来属于，我相信，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位宠臣，而在 1880 年左右我的外祖父得到这个领地时，曾为他的长子弗拉基米尔部分重建了庄园，他死于几年以后，十六岁时。他的兄弟瓦西里在 1901 年继承了它，他余年的十五个夏天，有十个是在那儿度过的。我尤其记得那地方冷淡而堂皇的特点，大厅里棋盘格的石板，一个架子上的十只瓷猫，一个葡萄酒冷藏器和一架风琴，天窗和楼上的陈列馆，神秘房间里五色的黄昏，比比皆是的康乃馨和基督受难像。

① 法语“暗梯”

说 d 巴，气己忆

在年轻时卡尔·亨利希·格劳恩有一副出色的男高音嗓子；一天晚上他要在不伦瑞克礼拜堂牧师舒尔曼写的一出歌剧里演唱，他对其中的一些曲调十分厌恶，就以另一些他自己的创作取代了它们。这里愉快的血缘关系震撼了我；但我更喜欢我的另外两个祖先，那个已经提到过的探险家和那位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母亲的外祖父尼古拉·伊拉里奥诺维奇·考兹洛夫（1814 — 1889），俄罗斯帝国医学院的第一任主席和《论疾病观念的发展》或《论病人颈部洞孔的收缩》之类论文的作者。在这一点上，我可以顺便提及我自己的一些科学论文，尤其是我最得意的三篇，“notes on neotropical plebejinae”，（《心智》，第 52 卷，1 — 2 及 3 — 4 号，1945 年），“a new species of cyclargus nabokov”（《昆虫学家》，1948 年 12 月），和“the nearctic members of the genus lycaeides hubner”（《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公报》，哈佛学院，1949 年），那年以后我发现在物质上再也不可能把科学研究与讲课、纯文学，和《洛莉塔》（因为她还在路上——一次痛苦的出生，一个困难的婴儿）联系在一起了。

卢卡维什尼科夫的纹章比纳博科夫的谦逊一些，但也不那么因循守旧。那面盾章是一个 d 。 。 na（原始鼓风炉）风格化的变体，其出处无疑是对我的探险家祖先所发现

的乌拉尔山矿石的熔炼。我希望记下，这些卢卡维什尼科夫们——西伯利亚拓荒者、掘金者和采矿机械师——并不像一些传记家粗心

50 纳博科夫

大意地猜测的那样，与那些同一姓氏的，财富毫不逊色的莫斯科商人有什么联系。我的卢卡维什尼科夫属于（从十八世纪起）卡赞省的地主阶层。他们的矿区位于下塔吉尔斯克附近的阿洛帕耶夫斯克，地处乌拉尔山脉西伯利亚一侧的彼尔姆省。我父亲曾两次乘坐以前的西伯利亚快车在那里旅行过，那是北方快车家族的美丽火车，我曾打算不久后乘坐它，尽管是进行一次昆虫学的而非矿物学的旅行，但革命阻碍了这一计划。

我母亲艾莱娜·伊凡诺夫娜（1876.8.29 — 1939.5.2），父母是地主、保安官兼慈善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卢卡维什尼科夫（1841 — 1901），一位百万富翁工业家的儿子，和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1845 — 1901），考兹洛夫博士的女儿。我母亲的双亲都在同一年死于癌症，他在三月，她在六月。她的七个兄弟姐妹，有五个夭折于童年，而她的两个兄长，弗拉基米尔在一八八〇年，十六岁时死于达沃斯，瓦西里在1916年死于巴黎。伊凡·卢卡维什尼科夫脾气极坏，我母亲害怕他。在我童年时我对他了解的全部只是他的肖像（他的胡子，他脖子上威风凛凛的链条）以及野鸭子和鹿角之类的主要嗜好口味。他打到的一对特别大的熊可怕地高举着前爪，直立在我们乡间宅邸的那间安着铁栅的门厅里。每年夏天，我都以勾着它们迷人的爪子的能力来测量我的身高——先是较低的前肢的爪子，然后是较高的。它们的肚子扫兴地被证明是硬的，有一次你的手指（已习惯于触摸活狗和玩具动物）曾没入它们粗糙的褐色毛发。不时地，它们还常被移出屋去，搬到花园里一个角落去上下拍打和晒干，而可怜的 *mademniselle* 从庄园

说0巴，气己12

的方向走来时，一眼望见两只野蛮的狗熊在树木摇曳的浓荫下等待着她，总会发出一声惊愕的呼叫。我父亲对射击猎物毫无兴趣，在这方面他截然不同于他的兄弟谢尔盖，一位热情的运动家，他从1908年起就为沙皇陛下指挥猎狐犬。我母亲较为快乐的童年回忆之一是曾经在一年夏天与她的姨妈普拉斯科维亚去克里米亚旅行，她的祖父在那里有一处地产靠近费奥多西亚。她姨妈和她曾与他和另一个老绅士，著名的海景画家艾伐佐夫斯基一起散步。她记得画家说（像他多半已说过多次的那样）在1836年，在圣彼得堡一次图画展览会上，他曾见过普希金，“一个丑陋的小个子，带着个高大英俊的妻子。”那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时艾伐佐夫斯基是一个美术学生，离普希金去世不到一年。她也记得大自然从它自己的调色板里添上的一笔——一只鸟留在画家的灰色高

顶礼帽上的白色标记。走在她身边的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是她母亲的姐姐，她嫁给了著名的梅毒专家 v. m. 塔诺夫斯基（1839 — 1906），而她本人也是位医生，一些有关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福利的著作的作者。一天晚上在艾伐佐夫斯基靠近费奥多西亚的别墅里，普拉斯科维亚姨妈在晚餐时遇到了二十八岁的安东·契诃夫医生，她在一次医学交谈中多少有点冒犯了他。她是个非常博学，非常温和，非常优雅的淑女，很难想象她到底是怎样招惹契诃夫的，竟使得他在 1888 年 8 月 3 日致他姐姐的一封信已发表的信里放纵于粗鲁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暴怒。普拉斯科维亚姨妈，我们叫她作帕莎姨妈，时常到维拉来访问我们。她用一种富有魅力的方式来问候我们，冲进保育

52 纳博科夫

室，带来一声响亮的“方。明 u, , le, 君衫执 t, ! ①, , 她于 1910 年去世。我母亲守在她的床头，帕莎姨妈的遗言是：“真有趣。现在我懂了。一切都是水, . 5,) 0 — vod . ②”。

我母亲的兄弟瓦西里在外交部门，然而比起我叔叔康斯坦丁，他对它看轻得多。对瓦西里来说它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多少还说得过去的背景。法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读不出他的俄国长姓，把它简化成了“卢卡”（重音在后一个音节），这远比他的基督教名更适合他。卢卡舅舅在我的童年对我来说似乎属于一个玩具、快乐的图画书、缀满光润的黑色果子的樱桃树的世界：在他那处与我们的地产隔着蜿蜒河水的地产里，他曾给一个角落的整座果园盖上玻璃房。在那年夏天期间，几乎每天午饭时都看得见他的马车从桥上开过，沿着一道年轻极树的栅栏驰向我们的宅邸。在我八九岁时，午饭后他总是 一成不变地把我抱到膝上，并且（当两个年轻的男仆在空空的餐室里擦桌子时）抚摸我，低声哼唱，亲热得有些过分，而我在仆役面前为我舅舅而尴尬，直到我父亲从阳台上喊他“丑 asil 己，口，vou, attend ③, , , 我才得以解脱。有一次，在我去车站接他（那时我肯定十一或十二岁了），望着他从长长的国际卧车上下来时，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已经变得多么黄瘦而平庸 [jaune et laid] 了啊，我可怜的孩子。”在我的第十五个命名日，他把我带到一边，用他鲁莽、精确，又多少有

①, , 法语“早上好，②“全都是水，' o ③ 法语“瓦西里，

孩子们！”有人等你”。

说 0 巴，记忆 53 点过时的法语告诉我他要我做他的继承人。“现在你可以走了，”他又说，“l, audie, ce est finie. je, , ai 户 lu : rien dvous dire . ①”

我记得他是个消瘦、整洁的小个男人，面色忧郁，灰绿色的眼睛里有点锈斑，一丛刷子似的黑胡子，一个易动的喉结在缚住他领带结的猫眼石和金蛇环上面隐秘地起伏。他的手指和袖扣上也带着猫眼石。一小串金链条缠在他瘦弱多毛的手腕上，而在他的鸽子灰，鼠灰或是银灰的夏装的扣眼里通常都有一朵康乃馨。唯有在夏天我才时常见到他。在罗杰斯特维诺短暂逗留一阵之后，他会回到法国或意大利，到他靠近波城的 chateau ②（叫做佩尔皮尼亚），到他靠近罗马的别墅（叫做塔玛林多），或到他热爱的埃及，他会从那里给我寄来图画明信片（棕搁树和它们的反影，日落，手扶膝头的法老们），上面横陈着他浓浓的涂抹。接着，又是在六月，当芳香的 cheryomuh。（总状的旧大陆式乌绸樱或干脆就叫“总状花”，我在关于“奥涅金”的著作中曾为它如此命名）泡沫般盛开时，他的私人旗帜会悬挂在他美丽的罗杰斯特维诺宅邸之上。他带着半打大箱子出门旅行，收买北方快车在我们的乡村小站作一次特别停车，而在允诺了一件绝妙的礼物之后，以白色高跟鞋的碎步，他会神秘地把我引向最近的一棵树并纤巧地摘下一片树叶交给我，说，“尸 ou，mon neveu，la 认 05 ' la

① 法语“接见结束了。我再也没什么要对你说的了。”② 法语“城堡”。

54 纳博科夫

plus bell 。 au oonde — un 。 feuill 己 verte 。 ① ”

或者他会从美国庄严地给我带来《狡猾的爷爷》系列和《巴斯特·布朗》——一个被遗忘的穿泛红色衣服男孩：如果凑近，人们就能看到那色彩其实是一大堆密密麻麻的红点。每一件轶事的结局都是给巴斯特的一顿可怕的捆屁股，它由他腰细如蜂但孔武有力的母亲执行，她使用一只拖鞋，一把头发刷，一柄脆弱的伞，无论什么——甚至一位乐于助人的警察的大头棍——并从巴斯特裤子的后臀部位扬起一团团烟尘。因为我从没被打过屁股，那些图画带给我奇特的外国刑罚的印象，无异于，比方说，把一个双眼圆睁的可怜人埋在一片荒野上滚烫的沙子里直到下巴，像一本梅因·瑞德的书里的卷首插图所表现的那样。

卢卡舅舅似乎过着一种闲散而又奇特地混乱的生活。他的外交生涯是最含混不清的那种。然而，他为精于破译他所懂得的全部五种语言的秘码信息而自豪。有一天我们对他进行 t 一次测验，转眼间他就把数列“5 . 13 24 . 11 13 . 169 , 13 . 5 5 . 13 24 . 11 ”变成了莎士比亚一段著名独白的起首语②。身着排红色外衣，他曾在英格兰或意大利驱狗打猎；身着毛皮大衣，他曾尝试从圣彼得堡乘汽车到波城；披着一件

① 法语“给我的外甥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一片绿叶”。② 可能是《哈姆莱特》3.1 中的“to be, or not to be, ”

说吧，记忆 55 歌剧的斗篷，在巴约讷附近的一片海滩上他差点丧生于一次飞机失事。（当我问他那架被撞碎的邻人号的驾驶员怎么样了时，卢卡舅舅想了一会儿，然后以完全的肯定回答说：“Il sanglotait。551'，u，。，rocher。①，，）他唱舟子曲和流行的抒情诗（“Ils regardent tous deux，en se ma，一群 a，t des 岁 ux ... ② “Elle est morte en hiver，il a dit [悦 i，ette !.. ③ “le soleil rongeait encore，j'ai voulu reoofr les grs，ds bois ... ④ “和几十首别的）。他自己也写音乐，甜蜜的，微波荡漾的那种，也写法语诗，奇怪的是它们像英语或俄语抑扬格诗那样很适于吟诵，并以高贵地漠视无声的安适为特征。他扑克打得极好。

因为他口吃，发唇音也有困难，他把他马车夫的名字从皮奥特尔改成列夫；我父亲（他对他总是有点严厉）责备他有奴隶主心理。此外，他讲话是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过于讲究的结合，他用它们说话都比用他的本国语说话流利得多。当他采用俄语时，总是一成不变地误用或混淆某个极为地道甚至是平易的辞句，例如他会在餐桌前突然叹息一声说（因为总有什么出了差错——一段枯草热病期，一只孔雀的死，一条丢失的狼狗）：“jesuistristeetseulcommeune 勿 linkav pol。[孤寂如一片‘原野中的草叶’]。”

① 法语“他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哭泣。”② 法语“他们两个互相望，互相盯着看... ~”③ 法语“她死在二月，可怜的科丽奈特 1... ”④ 法语“太阳重新照扭，我要重见那些大树... ”。

56

纳博科夫

他坚持说他身患无法治愈的心脏疾病，而当发作来临时，只有仰卧在地板上他才能轻松些。没有人严肃看待他，而在 1946 年末，在他四十五岁时独自一人在巴黎当真死于心绞痛之后，人们是怀着一种尤为特殊的悲痛回忆客厅里那些饭后的事故——猝不及防的仆人端着土耳其咖啡进来，我父亲瞧一眼（带着嘲弄的屈从）我母亲，然后瞧瞧（带着不满）他瘫倒在男仆的过道上的内兄，再望向（带着好奇）表面镇静自若的仆人戴着棉布手套的手托着的盘子上咖啡器皿之间仍在继续的可笑的微颤。

对于他短暂一生的过程中困扰着他的别的，更为奇异的痛苦，他寻求——如果我对这些事理解得正确的话——宗教中的解脱，最初是在某些俄国教派的出路里，最终则在罗马天主教之中。他所有的是一种多彩多姿的神经官能症，这本应有天才相伴但在他的病例中却不然，因此才有了对一道旅行的阴影的寻求。他年轻时被他父亲，一位老派的乡绅（猎熊，一个私人剧场，一大堆废物中的几幅好的古代大师作品）所深深厌恶，谣传说正是他无法遏制的坏脾气成了这个男孩一生的威胁。我母亲后来向我讲述过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全家在维拉的紧张关系，讲到在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书房里发生的恶劣情景，那间阴暗的偏屋对面是一口装着生锈的升降轮的老井，在五棵伦巴底杨树之下。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使用过那间屋子。我在它黑色的架子上收藏我的书和撑板，继而又劝诱我母亲把它的一些家具转移到了我自己在花园一侧的那间阳光充足的小书房，并曾在那里，在一天早上，摇晃它大得惊人的书桌，在它黑色的皮质废料上没有别的，只有一把巨大的

说吧，记忆 57 裁纸弯刀，一把黄色象牙的正宗阿拉伯弯刀，是从一头猛玛的巨獠上切下雕成的。

卢卡舅舅于 1916 年末去世时，留给了我如今已相当于几百万美元的金钱和他的乡间地产，它在一座陡峭的绿色山岭上的白柱子宅第，和它两千英亩的野树林和泥炭沼。房子，我被告知，在 1940 年仍旧耸立在那里，已经收归国有，但孤零零的，成了一座博物馆，为所有可能取道那条从山下穿过罗杰斯特维诺村并跨过河水支脉的圣彼得堡—卢加公路的观光游客而设。由于它水仙花的飘浮岛和水藻的锦缎，漂亮的奥列杰日河在那个地方有一种节庆的气氛。顺着它蜿蜒的航程再往下，在灰沙燕从它们险峻的红色河岸的洞口直射而出的地方，幽深地布满了巨大而浪漫的极树的反影（我们的维拉的边界）；而沿河更往下，一座水磨坊无穷无尽的喧响之流给了观光者（他的手肘支在扶手上）无限后退之感，好像这是时间本身的船尾一样。

下面这一节不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而是为特别的白痴而写，他因为在某次破产中失去了一笔钱，就以为理解了我。我与苏维埃政权的（从 1917 年起）旧怨与任何财产问题毫不相干。对于那些“仇恨赤色分子”只因为他们“窃取了”他的钱和土地的流亡者，我的蔑视是彻底的。我怀了这么多年的思乡病是对失去的童年的一种过度膨胀的感情，不是对失去的银行支票的悲伤。

纳博科夫

最后：我为自己保留向往一个合适的生态场所的权利：

... .. 在我的美利坚的天空下慨叹俄罗斯的一个地方。

普通读者现在可以接着读下去。

我将近十八岁，然后是十八岁出头；恋情和写诗占据了我的大部分闲暇时间；物质问题我漠然处之，而且，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财政背景下似乎没有什么继承能够十分引人注目；然而，在回望那透明的深渊的彼岸时，我发现古怪而且多少有点不愉快的是反省在我拥有那份私人财产的短短几年里，我过分沉溺于青春——它最初的，非同寻常的热情飞速失去的青春——的寻常快乐，既无法从遗产中得到任何特殊的愉快，也无法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夜间将它取消的时候体会到任何愤怒。这一回忆带给了我对于卢卡舅舅忘恩负义的感觉；加入了连那些喜欢他的人们也对他采取的微笑着屈尊俯就的普遍态度这样一种感觉。怀着深深的厌恶，我迫使自己回忆起诺耶尔先生，我的瑞士家庭教师（在其他方面是个最温柔的灵魂）时常对我舅舅最好的乐曲，他既谱了曲子也写了歌词的一段《小诗乐》进行的讥讽的评价。一天在他的波城城堡的露台上，下面是琥珀色的葡萄园，远处是蒙上了紫色的

说 0 巴，i 己忆 59 群山，在他被气喘、心悸、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感觉剥离所折磨的一刻，仿佛在秋季的色彩（用他自己的话描述就是“chapell。a 心 ent。jefe” illes aux ton, viole, : ts ①”）、来自深谷的遥远声音、一群鸽子划着温柔天空的飞行等等的震撼之下 se 磅 battont ②，他写下了那首单翼的《小诗乐》（而唯一记住了这首乐曲及其全部歌词的人是他几乎从未留意过的我弟弟谢尔盖，他也口吃，如今也已经去世了）。

“五，ai : tran 护 arent fait monte，介 la plaine ... ③”，他会以他响亮的男高音这样歌唱，坐在我乡村宅邸的白色钢琴前面——而倘若那一刻我正急步穿过附近的小树林回家吃午饭（在看见他的漂亮草帽和他那一身黑天鹅绒的英俊马车夫的亚速人般的侧影，大张着腥红色袖子的双臂，飞速驰过那道把庄园与车道分开的篱笆边缘之后不久），那悲哀的声音

un vol de tou 以 erelles strie le ciel tendre, les ch 即 santh 亡 mes se parent pour la toussaint ④

就传到我和我的绿色蝴蝶网这里，在那条阴暗、颤抖的小径上，它的尽头是一片泛红的沙地的远景和我们新近重漆过的宅第的一角，是年轻极树干的色彩，那里客厅的窗子打开着，

① 法语“在色彩浓重的树叶丛中火红的小教堂”。② 法语“挣扎着”。

③ 法语“清澈的空气自原野上升· · —”。

④ 法语“斑鸿飞行划破温柔的天空 / 菊花盛开迎接万圣节”。

纳博科夫

送来那受伤的音乐。

真切地追忆往昔的一个碎片的行为似乎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兴趣来做的事情，我有理由相信这种对回溯才能的近乎病态的沉迷乃是一个遗传特征。在树林里曾有过某个地方，一座横跨了一条褐色溪流的小桥，我父亲会在那里虔诚地伫足，追忆在 1883 年的八月十七日，他的德国家庭教师为他网住的那只罕见的蝴蝶。三十年之久的那一幕又会被再次经历。他和他的兄弟们突然间停了下来，怀着无法遏止的激动，看到一只备受渴望的昆虫，它悬在一根木头上，上下浮动，仿佛在警惕地呼吸着，它四片樱红色的翅膀上各有一个帕翁葵的眼斑。在紧张的静默中，他不敢亲自出击，把网交给了正摸索着它的海尔·罗奇，他的眼睛紧盯着那华丽的飞虫。我的陈列柜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继承了那个标本。一个动人的细节：它的翼翅已经“开裂”，因为它从标本板上被取下得太早，太急切了。1904 年夏天在我们与我姑父伊凡·德·彼得森家一起在亚德里亚海滨租下的一个别墅（名字或是“尼普顿”或是“阿波罗”——我还能够认出它在阿巴济亚的侣画里圆齿形的，奶色的塔楼），时年五岁，午饭后闲卧在小床上，我时常翻身俯卧，并且小心地，可爱地，不可救药地，以一种细致入微，同已经形成了“家”这一无法解释的思乡病形象（自从 1903 年以后我就没有见到过）的那几个季节的小得可笑的数目难以协调的方式，我会用我的指尖在枕上描画通向我们的维拉宅

说吧，记忆 61 邸的马车道，右边的石级，左边一条长凳弯曲的板面，在郁金香丛后面开始的栋树的小径，以及一只新落下的马蹄铁，一件收藏品（比我往常在海边发现的生锈马掌大得多也亮得多），在车道泛红的灰尘中闪烁。那段追忆的追忆比前者老六十年，但远不如它奇特。

有一次在 1908 或 1909 年，卢卡舅舅被他在我们的宅子里偶然发现的某一本法语儿童书吸引住了；惊喜地轻叹一声，他发现了他在童年时爱读的一段，开头是：“sophi 。 ，乍 taitp 。 ， joli 。 ... ① “多年以后，我的轻叹回应了他的，当时我偶然在一个幼儿园里再次发现了同样的那些“bi 占 liot 泌。 ue 尺 ose ② “丛书，它们的故事所讲述的男孩女孩过着 vi 己 de 。 触 teau ③ 的理想化变体，我的家庭在俄国过的就是这种生活。故事本身（所有那些 le ，对口 l'heurs de sophie ， les petites filles md 必 les ， le ， vacan " ， ④ ），如今在我看来，是矫柔造作与粗俗的一种糟糕透

顶的组合；但在写下它们时，感伤而怡然自得的德·塞古尔太太，父姓罗斯托普钦纳，是把她先我整整一世纪的俄罗斯童年的真实环境法国化了。至于我自己，当我再次读到苏菲的麻烦——她的缺少眼睫毛和爱吃厚厚的奶油——我不仅体验到了与我舅舅同样的痛苦和欢乐，而且不得不承受一种额外的负担——我对他的回忆，恰恰藉着那些书来重历他的童

- ① 法语“苏菲不高兴· · 一”。
- ② 法语“蔷薇文库”。
- ③ 法语“城堡生活”。
- ④ 法语“《苏菲的不幸》、《模范小姑娘》、《假期》”。

62 纳博科夫

年。我又一次见到了我在维拉的读书室，墙纸上的蓝色玫瑰，打开的窗。它的反光充满了那面椭圆的镜子，这镜子就在我舅舅心满意足地看着一本残破的书时坐的皮躺椅上方。一种安全、舒适、夏季温暖的感觉浸透了我的记忆。那富有活力的现实变成了当今的一个幽灵。镜中光明满溢；一只野蜂已进入房间，撞在天花板上。万物各得其所，永远没有什么会改变，永远不会有谁死去。

[illegible]

第

、四章

我所属的那一类俄国家庭——现在已经绝灭的一类——除了其他的美德之外，还拥有对于盎格鲁—萨克森文明的舒适产物的传统偏向。梨牌肥皂，干燥时沥青般黝黑，放在潮湿的指间举到光亮之中则有如黄水晶，用来照料晨浴。令人

64 纳博科夫

愉快的是那只英国可折叠浴缸愈来愈轻的份量，在它的一片橡皮下唇被开启并且把满是泡沫的内容倾吐进污水桶的时候。“我们再也改进不了膏油，于是我们改进了管子，”

英国牙膏说。早餐时，从伦敦进口的戈尔登糖浆会以它闪亮的圆圈缠绕翻转的勺子，足够的糖浆从勺子里滑到了一片俄国黄油面包上。各种各样舒适、甘醇的物品从涅夫斯基大街的英国商店里稳定有序地来到：水果饼、嗅盐、纸牌、游戏拼图、条纹运动衣、白如滑石的网球。

我学习阅读英语在我能阅读俄语之前。我最早的英国朋友是我语法书里的四个简单的魂灵— ben , dan , sam 和 ned 。对于他们的身份和行踪，经常有一种过分的体贴— " who is dan ? ① , , " he is dan , ② , , " sam is in bed , ③ , , 等等。尽管它总是颇为僵硬而杂乱（编纂者碍于不得不使用—至少在最初的课文里—三个字母以下的词），我的想象还是设法获得了必要的资料。脸色苍白，四肢硕大，默然无声的傻瓜们，骄傲于拥有某些工具（" ben has an axe ④ "），他们现在以一种慢动作的无精打采游荡过记忆最僻远的天幕；并且，与一个眼镜商的视力表中疯狂的字母相似，语法书的文字又一次在我面前隐现。

校舍浸透了阳光。在一个缀满水珠的玻璃瓶里，几条带刺

① "本是谁？"。② "他是丹"。③ "山姆睡在床上"。④ "本有一把斧子"。

说吧，我已忆

的毛虫被喂以荨麻叶子（并且吐出有趣的，橄榄绿的桶状小粪球）。覆盖圆桌的油布散发出胶水气味。克莱顿小姐发出克莱顿小姐的气味。不可思议地，光荣地，室外温度计血色的酒精在阴影中已升至摄氏 24 °（华氏 86 °）。从窗前可以看到方头巾的农家姑娘跪伏在一条花园小径上除草，或轻轻耙松阳光斑驳的沙土。（她们将为国家打扫街道开挖沟渠的愉快日子仍然远在天边。）金色的黄鹂在绿草中散发它们的四个光辉的音符：嘀—得—嘀—哦！

ned 笨拙地经过窗口，由花匠的助手伊万维妙维肖地扮演（他在 1918 年将成为地方苏维埃的一员）。在后来的书页中出现了更长些的句子；而恰在那本褐色的，墨迹点点的书本末尾，一个真实可感的故事打开了它成年的句子（" one day ted said to ann : let us — ① , , ）, 小读者的最高胜利与奖赏。想到有朝一日我会达到这样的精通，我就激动不已。魔法持续下去，而每当又有了一本语法书，我就立刻翻到最后一页，来享受那被禁止的一瞥，看看这位劳累的学生的未来，看看那被应许的土地，在那里，词语最终就意味着意指它们所意指的东西。

夏季的 soomerki — 意为黄昏的可爱的俄语词。时间：这个不得人心的世纪最初十年中黯淡的一点。地点：纬度是你① "有一天泰德对安妮说：让我们——"。

66 纳博科夫

们的赤道以北 59°，经度是我书写着手以东 1000°。白昼的消逝要历经好几个小时，一切——天空，高高的花朵，静静的水——会被保持在一种无限垂挂的状态，被远在一片草地上的一头母牛令人悲伤的嗥叫或者被出自几只鸟的甚至更为动人的鸣叫所加深而不是消除，这些鸟远过河的下游，在那里有一大片幽蓝如雾的水醉沼泽，由于它的神秘与遥远，曾被卢卡维什尼科夫家的孩子们名之为美洲。

在我们乡下宅邸的客厅里，上床之前，我母亲常常用英语念书给我听。当她读到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段，当主人公即将遇见某种奇特的，也许是致命的危险时，她的嗓音就会减慢，她的词语会不祥地间隔开来，而在翻动书页之前她会把它搁在戴着那枚熟悉的鸽血宝石钻戒（在它清澈的表面之中，倘若我是一个更好的相水晶者的话，也许我会见到一间屋子，人，灯盏，雨中的树——将要由那枚戒指支付的整整一段流亡生活）的手上。

那里有武士的故事，他们可怕但令人惊异地洁净无菌的伤口由洞穴中的少女清洗。从一座临风的崖顶，一个头发披散的中世纪女郎和一个身穿紧身裤的青年凝视着被赐福者的圆形岛屿。在“误解”中，汉弗莱的命运时常在人的喉咙口塞进一团硬咽，比狄更斯和都德（伟大的硬咽设计者）的任何东西都更专门化，而一个无耻地讽喻性的故事，“越过蓝色山脉”讲述两对小旅行家——好的克洛伐和考斯利普，坏的巴特卡普和戴西——包含了足够的激动人心的细节，以致使人忘记了它的“寓意”。

环右那些巨大的，扁平的，光滑的图画书。我尤其喜爱蓝

说吧，记忆

外衣、红裤子、煤一般黑的高利沃，他以内衣钮扣作眼睛，和他俗气的五个木头玩具娃女眷。凭着它们剪下美国国旗给自己做衣服的非合法方式（派格拿走了母性的条纹，萨拉·简取走了漂亮的星星），一旦它们中性的关节穿上了衣服，其中两个玩偶就获得了某种柔和的女性气质。双胞胎（麦格和威格）和侏儒仍旧一丝不挂并且，结果是，没有性别。

我看见他们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潜行出门互相投掷雪球，直到远方的晨钟鸣响（“听！”押韵的文本说道）把他们送回保育室的玩具盒。一个粗鲁的玩偶从匣中弹射出来，吓唬我可爱的萨拉，我从心眼里不喜欢那幅画，因为它使我想起孩子们的舞会，这个那个曾经迷住我的漂亮小姑娘在舞会上不小心轧痛了手指或伤了膝盖，立刻就会膨胀成一个脸色发紫的妖怪，满脸皱纹，张大了嘴尖叫。另一次，他们骑车旅行被食人生番

捉住；当通通声四面响起时，我们毫不怀疑的旅行者还在棕榈树环绕的池边解渴。越过我往昔的肩头我再次欣赏这严酷的图画：高利沃，仍旧跪在池边但不再畅饮；他的头发根根直立，他的脸庞司空见惯的黝黑变成了一种古怪的灰烬色彩。还有汽车书籍（萨拉·简，总是我最喜欢的，在夸耀一道长长的绿色烟雾），带有通常的续篇——撞开的，扎着绷带的脑袋。

还有，对——飞船。一码码的黄绸把它制成，外加一个小气球提供给那位幸运的小侏儒单独使用。在飞船到达的无尽海拔上，乘客们依偎在一起取暖，而那位迷失的小单飞者，尽管身在困境中却仍然是我强烈嫉妒的对象，飘荡进了一个霜冻与星辰的深渊——独自一人。

纳博科夫

我继而看见我母亲领我去睡觉，穿过巨大的厅堂，那里楼梯中段不断回旋向上，在楼上的平台与淡绿色夜空之间只有温室般的玻璃窗。一个人可以在大厅光滑的石头地板上后退一步，接着向前稍稍曳步滑行一段，致使那只温柔的手在他的腰背部以纵容的推动来催促他不情愿的躯体。到达楼梯，时，我的习惯是从望柱与第一根栏柱之间的扶手下钻到梯级上。每过一个夏天，挤过去的过程就困难一些；如今，甚至我的影子也要塞住了。

下一个仪式是闭着眼睛上楼。“迈步，迈步，迈步，”传来我母亲的声音，她在领我上去——足可肯定，下一级的地面会接受那位盲童信心十足的脚步；要做的只是把它抬得比通常稍高二点，以免在竖板上磕着脚趾。在自造的黑暗中，这缓慢的，有如梦游的攀登带来了许多显而易见的乐趣。其中最强烈的一种是不知道最后一级会何时到来。在楼梯的顶端，一个人的脚会被自动举起，遵守“迈步”的骗人命令，这时，随着瞬息间一阵细腻恐惧之感，随着肌肉一次猛烈的收缩，会沉入一级楼梯的幻觉，仿佛它已被其本身的虚无那具有无限弹性的质料填满了。

令人吃惊的是在我上床的时刻用过什么消磨时间的方法。确实，整个上楼事务如今呈现出某种超验的价值。然而实际上，我只是尽量延长每一秒钟来拖时间而已。在我母亲让我转向克莱顿小姐或 mademoiselle，让她们给我脱衣服的时候

i 兑 d 巴，i 己 1 乞 69 候，这仍然在继续着。

在我们乡下宅邸里有五间浴室，和一大堆值得尊敬的洗脸架（其中有一个每当我哭泣时就会把它从黑暗的角落里找出来，踩动那肮脏的踏板，在我耻于让人看见的肿胀的脸上感受它摸索着的喷嘴那有助于痊愈的轻抚）。例行的沐浴在晚上进行，晨浴用的是

圆形的，橡皮的英国式浴缸。我的那一个直径四英尺，边缘高及膝盖。在踞着脚坐在筒边的孩子满是泡沫的背上，一壶水由一个系着围裙的仆人小心地倾倒而下。它的温度随陆续不断的导师们对水疗的观点而变化。曾有过那个成熟期开端的寒冷阶段，当时一场冰冷的暴雨由我们的家庭教师下令执行，他碰巧是个学医的。另一方面，晚浴的温度经常令人愉快地保持在列氏 28。（华氏 95°），由一架可爱的大温度计计量出来，它的木质护板（在手柄眼里有一道湿线）使它能够与赛璐璐的金鱼和小天鹅共享浮力。

抽水马桶与浴室是分开的，其中最老的一个是件颇为贵重但阴郁的物品，有某种精美的拼板和一根红色天鹅绒的拉绳，一被牵动，就发出一阵带有美妙变调，被审慎地闷住的咕噜声和吞咽声。从房子的那个角落，望得见长庚星，也听得见夜莺，后来，时常是在那个地方，我创作了我年轻的诗篇，献给无人拥抱的美人，并且不快地俯视，在一面光线暗淡的镜子里，一座奇异的城堡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西班牙突然耸起。然而作为一个孩子，我得到的是一种更不起眼的安排，随随便便地存身在一个狭窄的壁龛里，介于一个柳条篮和通向儿童浴室的门洞之间。这扇门我喜欢让它半开着；通过它我困倦地观看桃花心木浴缸上方蒸汽的闪烁，看天鹅和快艇的幻想

70 纳博科夫

舰队，看其中一艘船上手持着一架竖琴的我，看一只毛绒绒的飞蛾砰砰撞击煤油灯的反射镜，看再远些那扇着色玻璃窗子，看它由彩色方块构成的两个戟兵。从我温暖的座位上俯下身来，我喜欢对准前额的印堂，把我的眉心压在光滑舒适的门框上，然后稍稍转动一下我的脑袋，门就会来回开合，而它的边缘会始终与我的前额保持怡人的接触。一种梦一般的韵律会渗入我的存在。不久以前的“迈步，迈步，迈步”会被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接收过去。并且，将有韵律的图案与有韵律的声音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我会解开亚麻地毯上迷宫般的网纹，找到一张张脸孔，其中有一道缝隙或阴影能给视线提供一个 point d'appui ①。我向父母们呼吁：绝不要，绝不要对一个孩子说，“快点”。

我模糊的远航行程的最后阶段将在我抵达我床铺的岛屿时到来。在游廊或客厅里，生活没有我也继续着，我母亲会从那里上楼来轻声道温暖的晚安吻别。关上的内窗板，一支点亮的蜡烛，仁慈的基督，温顺而柔和，念念有词的小孩子，孩子跪在枕头上，即刻它就要吞没他嗡嗡作响的脑袋。英语祈祷文和塑造了一位晒得黑黑的希腊天主教圣徒的小小偶像构成了一种天真的联想，如今我愉快地回想它；而在偶像上方，在某物（床与门之间的竹帘？）的阴影波动于温暖的烛光的墙上，高挂着一幅加了镜框的透明水彩画，展现出一条黄昏的小径蜿蜒穿过茂盛得吓人的英国山毛榉树林中的一丛，那里唯一的下层植被是旋花，而唯一的的声音是一个人怀坪作响的心跳。① 法语“基准点”。

说0巴，i己忆71 在我母亲曾经给我读过的一个英国神话故事里，一个小男孩从他的床上走进一幅画里，骑着他的玩具马驰过寂静树林中一条彩色的小路。当我跪在我的枕头上置身于磕睡的迷雾和搽满爽身粉的舒适之中，半坐在我小腿上，迅速地念完我的祈祷，我想象着爬进我床铺上方的图画，落进着魔的山毛榉林中的动作——我在适当的时候当真造访了它。

一系列令人迷惑的英国保姆和女教师，她们有的扭紧双手，有的在谜一般地向我微笑，在我重返我的往昔之际前来迎接我。

那里有阴郁的拉谢尔小姐，我回忆她主要是在亨特利和帕麦软饼方面（蓝纸铁皮盒子顶端好吃的杏仁硬糖，底下无味的饼干），她在我刷完牙以后非法地与我分享它们。那里有克莱顿小姐，在我跌坐进我的椅子时，她会戳戳我的脊椎然后微笑着往后缩缩她的肩膀来显示她对我有什么要求：她告诉我她的一个与我同龄（四岁）的侄子经常养毛虫，但有一天早晨她为我收集在一个装着荨麻的开口罐子里的那些全逃走了，花匠说它们已经悬挂了起来。那里有可爱的，黑发的，蓝宝石眼睛的诺考特小姐，她在尼斯或布里乌丢失了一只白色小山羊皮手套，我曾在那里徒劳地寻找它，在石头海滩上彩色的鹅卵石和被海水打磨的玻璃瓶的灰绿色碎片中间。在阿巴济亚，一天夜里可爱的诺考特小姐被要求立即离开。她在保育室的晨曦中拥抱我，身着灰色雨衣，哭泣如一棵巴比伦

72 纳博科夫

柳树，那天我整日沮丧，尽管彼得森的老保姆特地为我做了热巧克力，还有那块特别的黄油面包，我姨妈娜塔机敏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它的光滑表面上画了一朵雏菊，接着又画了一只猫，然后是我刚与诺考特小姐一起读过，并为之哭泣的小美人鱼，于是我又开始哭泣起来。那里有近视的小亨特小姐，她与我们一起在威斯巴登的逗留结束于我弟弟和我——分别是四岁和五岁——设法逃脱了她神经过敏的警戒，登上一艘汽船，让它载着我们顺莱茵河而下畅游了一程才被重新抓获的那一天。那里有粉红色鼻子的罗宾森小姐。那里又有了克莱顿小姐。有一个可敬的人，曾给我读过玛丽·科瑞里的《强大的原子》。还有其他的人们。在某一个时刻她们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法国人和俄国人前来接任；而留给英语谈话的小段时间则属于偶尔与两个绅士，伯奈斯先生和康明斯先生进行的课时，他们俩谁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他们在我的头脑中联系着圣彼得堡的冬天，那里我们有一幢房子在摩斯卡雅街。伯奈斯先生是一个大块头的苏格兰人，有着一张红润的脸，淡蓝色的眼睛和稀少的，草色的头发。他在一家语言学校教书度过早晨，然后将超过这天能够容纳的课程塞进下午。就这样，他从城市的一头旅行到另一头，只能听任 izvozchik（马车）情绪低落的马匹迟缓的小跑把他送到他的学生们那里，幸运的话，两点钟的课（无论什么课）他会仅仅迟到一刻钟，但四点钟的课他就会在五

点过后才来。一面等待着他一面指望他超人的顽强终有一次会面对某一场特殊的暴风雪的灰墙而这巡不前，这紧张是一个人相信在成年的生活中绝不会碰到的那种感觉（但我当真再次体验到了，在轮到我为环

说吧，记忆 73 境所迫而开课的时候，当我在柏林那些布置有家具的房间里，等待着某个面冷如石的学生之时，他每次总会出现，无论我在头脑中给他的道路设置了多少障碍）。

在外面四聚的黑暗，似乎正是伯奈斯先生要到达我们宅邸的努力的一个废弃的产物。即刻男仆会前来放下宽大的蓝色卷帘，拉上印有花饰的窗纱。教室里祖父的时钟嘀嗒作响，渐渐显出一种阴郁的，喋喋不休的声调。我的短裤在腹股沟的紧绷，黑色菱条袜子磨擦着我弯曲的双腿的柔软内侧的粗糙接触，都会与我始终延迟着不去满足的一种卑贱的需要的乏味压力混合在一起。常会有将近一个钟头过去而还是不见伯奈斯先生的迹象。我弟弟会去他的房间在钢琴上弹奏某段练习曲，然后投入又再次投入我所厌恶的某一首乐曲——《浮士德》中不自然的花朵的指导（... 己 ites — lui 宁 u ' ell 。。 st 占 elle ... ①）或弗拉基米尔·兰斯基的哀诉（... kco — dah , koo — dah , k 加 — dah viudalili , '②）。我会离开我们这些孩子居住的顶楼，顺着栏杆慢慢滑到我父母的房间所在的二楼。他们那时经常不在家，而在蜩色四合之中这个地方以一种奇特的目的论的方式影响着我年轻的感觉，仿佛在黑暗中这种熟悉事物的聚集正在尽量形成那明确而长久的形象，那反复的显露最终把它留在了我的脑际。

在隆冬一个严寒的午后的棕色暗影侵入房间，渐渐加深为一种压抑的黑色。一个铜角，黑暗中四下的玻璃或磨光的桃① 法语“... .. 你说她漂亮”。

② “您上哪儿，哪儿，哪儿去了”。

纳博科夫

花心木表面，反映着街上的零星亮光，那里沿街心排开高高的街灯，它们的圆球已经在散发出月色一样的光华。薄纱般的阴影在天花板上移动。寂静里，一片菊花瓣掉在一张桌子的大理石上的干燥声响使人的神经颤动。

我母亲的闺房有一扇临摩斯卡雅街的便于眺望的凸肚窗朝向马利亚广场。用嘴唇压住遮蔽窗玻璃的薄纱，我会透过纱帘渐渐品尝到玻璃的寒冷。在那扇凸肚窗前，几年以后，当革命爆发时，我观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并第一次见到了死人：他躺在担架上正被抬走，而从一条垂挂下来的腿上，一位穿着破鞋的同志不管抬担架者的推打，不断地试图把靴子扒下来——这一切在相当长的一路小跑中进行。但在伯奈斯先生上课的日子里

什么可看的都没有，除了黑暗的，模糊不清的街道和它高悬的街灯远远退去的行列，它们周围的雪花以一种优雅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缓慢运动经过又经过，仿佛要显示这戏法是怎么变的，它又是多么简单。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见一道更明亮的紫色煤气灯光轮中有一道更为丰富的雪流，这时我伫立其中的突出的一圈似乎会慢慢地越飘越高，如同一个气球。最后那些沿街滑行的幻影马车中有一辆会停下来，而头戴狐皮 shapka ① 的伯奈斯先生就在一阵笨拙的仓促中走向我们的房门。

从我先他而至的教室，我听得到他充满活力的脚步重击声越来越近，而无论这一天多么寒冷，在他走进来时他漂亮、红润的脸都会大汗淋漓。我记得在他用最圆的圆体字写下第① 帽子。

说吧，记忆 75 二天要准备的练习时，他按在墨水四溅的钢笔上的可怕力量。通常在上课结束时总会要求念某首五行诗并且得到了同意，这一表演的要点是，在一个人背诵这些诗行时，每当伯奈斯先生可怕地猛捏他握在强劲的爪子里的那只手，其中的“尖叫”一词就由那个人自己不自愿地演示出来：

有一个来自俄国的姑娘她（猛捏）无论何时你拥抱她她（猛捏）她（猛捏）... ..

到那时疼痛会变得如此无法忍受，以致我们从来没有读下去过。

那位安静的，留胡须的，驼背的绅士，老派的康明斯先生在 1907 或 1908 年教我绘画，他也曾是我母亲的绘画导师。他在九十年代初来到俄国，作为伦敦《图画》杂志的国外通讯员和插图画家。谣传战场上的创伤给他的生活笼罩了阴影。一种忧郁的甜蜜风格弥补了他才能的贫弱。他总是穿一件宽大的长外套，除非天气十分温暖，那时他就换成那种叫做 loden 的棕绿色羊毛大氅。

我被他一直放在背心口袋里的特殊的擦字橡皮的用法迷住了，被他那种先扯直纸页，继而用手指背部轻轻掸去 " gutticals of the peacha " （他是这么说的）的风度迷住了。静

纳博科夫

静地，伤感地，他为我图解透视的大理石法则：他优雅地持在手中的，尖得难以置信的铅笔细长而平直的滑动，使他从虚无之中创造出的屋子的线条（抽象的墙，后退的天花板和地板）以一种诱人但索然无味的精确汇集到遥远的假设的一点。诱人，因为它使我想起铁轨，在我最喜欢的面具，一名肮脏的火车司机充血的眼前对称而骗人地聚合

为一；索然无味，因为那屋子仍旧没有家俱，空空如也，甚至缺少人们在一座博物馆无趣的门厅里找到的中性雕像。

图片陈列馆的其余部分构成了它贫瘠的前厅。康明斯先生是一个画日落的大师。他的小水彩画作，由我们家的成员在不同时间以五或十卢布一幅的价格购得，经历着一种多少有点不安定的存在，事实上总是移向越来越阴暗的角落，最后完全被某个雅致的瓷兽或一幅新上框的照片所遮没。我不仅学会了画立方块和锥体，也能以光滑的，互相融合的斜线给它们那些只能被永远掉转过去的部分正确地打上阴影，之后，那位温和的老先生就自得其乐地在我着迷的注视下描画他自己小小的水彩乐园，同一片风景的不同的变体画：一个橘黄色天空的夏夜，一片牧场，它的尽头是一座遥远森林的黑色边缘，一条明净的河流，复现着天空，回转流逝，无穷无尽。接下来，从 1910 年左右到 1912 年，著名的“印象主义者”（那个时期的一个术语）雅列米希前来接任；一个缺少幽默也缺少条理的人，他鼓吹一种“粗犷”的风格，暗色的大片污渍，深棕色与橄榄褐色的涂鸦，我只得以这种手段在大张灰色纸上复制我们以代用粘土塑造的人形，它们就摆在有各种皱褶和阴影效果的一块黑天鹅绒天幕前的一个“戏剧

说 0 巴，i 己 1 艺 77 性”位置上。那是至少三种不同的艺术的令人压抑的结合，全都相差无几，而最后我造反了。

他被有名的多布金斯基所取代，他喜欢利用我们宅邸的平台钢琴给我上课，在它楼下漂亮的会客室中的一间，他以一种特别的无声的方式走进来，似乎是害怕把我从做诗的迷醉中惊醒。他让我凭记忆，以尽可能的细致，描绘我肯定见过几千次而不曾正确地想象过的物体：一盏街灯，一个邮筒，我们自己前门的着色玻璃上的郁金香图案。他努力教我发现沿街一棵无叶树的瘦削枝条之间几何上的谐调，一种视觉上的平等互助系统，这需要线条表现的精密，我在年轻时没有达到，但我却在成年阶段感激地应用了它，不仅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七年里用于描绘蝴蝶的生殖器，当时我全神贯注于一架显微镜的镜眼用印度墨水记下这个或那个结构；而且，也许，也曾在文学创作中以此满足了某种对摄影般的清晰的需要。然而，在感情上，我仍然更为感激我母亲和她那位前教师给我的早期色彩教育。康明斯先生会多么稳当地坐在一张凳子上，两手在身后分开他的一 什么？他是否穿着件礼服大衣？我只看见了姿势— 接着打开黑色的铁皮颜料盒。我喜爱他把他的画笔浸入调色板的敏捷动作，伴随着搪瓷容器发出的一阵快速的叮当声，画笔所抛起的丰富的红色与黄色在里面诱人地形成了杯状；就这样汇集了它的蜂蜜之后，它将不再徘徊和游荡，而它多汁的尖端两三下涂抹，就将以一片平坦的橘黄色天空来浸透那“vatmanski ①”纸张，在那片①“瓦特曼绘图纸的”。

天空仍然潮湿的时候，又会有长长的一道紫黑色云团横过。“这就成了，亲爱的，”他会说道。“那就是全部该有的了。”有一次，我让他给我画一列快车。我注视他的铅笔能干地逐渐呈现出一个火车头的排障器和精致的前灯，看上去仿佛它是六十年代在犹他州岬湾角工作过又二手转给跨西伯利亚铁路的。接着出现了五节令人失望地平淡无奇的车厢。在他大致完成它们的时候，他认真地描出了巨大烟囱里冒出来的充足的烟雾，抬起脑袋，在一阵满意的凝视之后，把图画交给我。我也试图显得满意。他漏掉了煤水车。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我得知了两件事情：伯奈斯，那时已经去世了，在爱丁堡曾作为一位俄国浪漫诗歌的博学的翻译者而著名，这些诗曾是我童年的祭坛和激动；以及我谦卑的绘画教师，我常把他的年龄与叔祖们和老家仆的相对照，大约在我自己结婚的时候和一位年轻的爱沙尼亚姑娘结了婚。当我得知了这些后来的发展时，我体验到一种奇怪的震惊；就好像生活蠕动着爬过童年记忆如此优雅而经济地设置的那道主观界限，从而侵犯了我创造的权利，这记忆我本以为我已经签署并且封存起来了。

“那么雅列米希又怎样呢？”我问 m. y. 多布金斯基，那是在 1940 年代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们正散步穿过佛蒙特的一片山毛榉树林。“还有人记得他吗？”

“事实上，是的，”莫斯提斯拉夫·瓦勒里阿诺维奇说。“他有不寻常的天才。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种教师，但我的确知道你是我曾有过的最没指望的学生。”

79 □□□□□□□□□□□□□□□□□□□□□□□□□□□□
□□□□□□

第

五章

我时常发现，一旦我把属于我的往昔的某一项珍藏的事物赋予我小说中的人物，它就会在我如此唐突地安置了它的人工世界里消瘦下去。尽管它仍旧萦绕在我的脑际，它个人的温暖、它回忆的感召力已经消失，而顷刻之间，它就与我的

80 纳博科夫

小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胜于联系着我往日的自我，在往昔它似乎绝不会受到艺术家的入侵。房宅在我的记忆里碎裂，如在昔日的无声片中一样寂然无声，而我往日的法语女教师，我曾把她借给我书中的一个男孩，她的肖像在迅速枯萎，既然它已陷入了

对一段与我自己的童年毫不相干的童年的描述。内心的我在反抗着虚构作家，而这里就是我挽救可怜的 mademoiselle 遗留下来的一切的绝望努力。

一个大块头女人，一个非常矮胖的女人，mademoiselle 卷入我们的生活是在 1905 年 12 月，当时我六岁，我弟弟五岁。她来了。我那么平淡无奇地看到她浓密的黑发，高高梳起，隐隐然渐成灰白：她稳重的前额上的三道皱纹；她突出的眉头；黑框夹鼻眼镜后面锐利的双眼；那细小的髭毛；那斑斑点点的皮肤，在愤怒时还会泛起一阵的红晕，布满了她短外套镶边的小山脉上如此庄严地铺开的第三层，也是最丰满的一层下巴的地带。现在她坐下了，或者不如说她着手于坐下的工作，她胯部的胶状物震颤着，她硕大的臀部，边上有三个钮扣，小心翼翼地放低；继而，在最后一秒钟，她把她的硕大身躯交给了柳条扶手椅，它出于十足的恐怖，爆发出一阵开裂的响声。

那时我们刚出国一年。1904 年在波里乌和阿巴济亚消夏，以及在威斯巴登过了几个月之后，我们于 1905 年初启程回俄国。月份我记不起来了。一个线索是在威斯巴登我曾被带到那儿的俄国教堂——我第一次到任何地方的教堂——那也许是在四旬斋期间（在礼拜时我问我母亲牧师和执事在谈什么；她用英语低声回答，他们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爱，但我把

说 d 巴，i 己忆 81 她的意思理解成了那两个身穿闪亮的桶状僧衣的华丽人物互相在说要永远做好朋友）。从法兰克福我们冒着暴风雪到达了柏林，第二天清早赶上从巴黎隆隆开来的北方快车。两小时以后它就到达了俄国边境。在冬天的背景下，车厢与火车头的正式调换得到了一种奇特的新涵意。一种激动人心的阳己动 a，“母土”之感，第一次有机地汇入了悦耳地吱吱作响的雪，横穿而过的深深足印，火车头烟囱的红色光泽，在红色煤水车上高高堆起的白桦圆木，它们自有一层能够运送的雪覆盖其上。我还未满六岁，但在国外的那一年，那艰难的决断与慷慨的愿望之年，使一个俄国小男孩接触了成年人的谈话。他不禁以自己的某种方式为一位母亲的思乡病和一位父亲的爱国心所感动。结果是，正是那一次返回俄国，我第一次自觉的返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好像是一次排练——不是绝不会发生的庄严的还乡，而是在我长年的流亡中它永不中止的梦。1905 年在维拉的夏季尚未演化出鳞翅目。村办小学校长领我们进行教学性散步（“你们听见的是打磨一把镰刀的声音，”；“那片地下一季要休闲，”；“哦，只不过是一只小鸟——没有特别的名字”；“那个农民喝醉了，是因为他穷”）。秋天用各种色彩的树叶盖没庄园的土地，而罗宾森小姐给我们展示了那美丽的技巧——那位外交官的儿子，她的小世界里的一个熟悉的人物，曾在上一个秋天把它玩了个够——在地上挑选，在一大张纸上排列枫叶，让它们形成一段几乎是完整的光谱（除了蓝色——一个大遗憾！）。绿色渐渐变成了柠檬色，柠檬色又成了橙色，以此类推从红色到紫色，紫褐色，又是微红，又从柠檬色回到绿色（它越来越难找了，除非仅仅作

82 纳博科夫

为一个部分，最后一道漂亮的边缘)。最初的霜冻袭击了紫苑，而我们还是没有搬到城里。

mademoiselle 从瑞士前来的 1905 — 1906 年冬天，是我童年里在乡间度过的唯一——一个冬天。那是罢工、骚动、警察挑起的大屠杀的一年，我猜想我父亲希望他的家庭远离城市，在我们宁静的乡村住所，那里他从农民中得到的名望会减轻，像他正确地推想的那样，纷乱的危险。那也是少有的严冬，产生的雪像 mademoiselle 也许曾预料会在遥远的莫斯科维的北极阴郁中发现的一样多。她在西维尔斯基小站下车，还必须乘雪橇旅行六英里到维拉，当时我不曾在场向她问候；但我现在做到了，现在我尝试着想象在她难以置信而不合时宜的旅程中她看到和感到了什么。她的俄语词汇，我知道，由一个短短的词构成，多年以后，她将带回瑞士的是同一个孤独的词。这个词语在她的发音中可以按语音学发成“giddy — eh”（实际上是 gde，那个 e 像在“yet，‘中一样），意思是“哪儿？”那真是意味深长。在她口中像是发自某只迷路的鸟的凄厉鸣叫一样，它聚集了那种疑问的力量，满足了她的一切需要。”giddy — eh？giddy — eh？”她会这样呻吟，不仅为了找出她所在的地方，而且也为了表达最深的苦痛：她是个陌生人这一事实，晕船，身无分文，病病歪歪，寻找着那片被赐福的土地，她在那里最终会得到理解。

凭着代表权，我能够想象她，当她站在车站月台的中间，下车伊始，我的幽灵使者徒劳地助她看不见的一臂之力。

· 说 d 巴，气己 1 艺

（“我就在那里，被所有人抛弃了，comm 心 la comtesse karenin”，①“后来她雄辩地抱怨说，尽管不是十分正确。）候车室大门随着一声在严霜的夜晚特有的战栗的哀鸣打开了；一团热空气的云雾冲了出去，喷薄儿如火车头喘出的蒸汽；而现在接任的是我们的马车夫扎哈——一个穿着皮面朝外的羊皮大衣，五大三粗的人，他的大手套从他的红色腰带里伸出来，他就把它们塞在那里面。我听见雪在他的毛毡靴子下碾碎，而他正忙着对付行李，叮当响的马笼头，然后是他自己的鼻子，在他艰难地走到雪橇那里时，他用手指和拇指熟练的抽拉摇晃的手段不断通着它。慢慢地，怀着不可排解的犹豫“材泛 demazelya”，她的这位仆从是这么叫她的，爬了进去，恐惧之极地紧抓着他，以防雪橇在她庞大的形体被安全装入之前开走。最后，她咕噜一声坐下，把她的拳头插进她过于窄小的绒毛手筒里。两匹黑马，佐伊卡和金卡，随着它们的驾驭者多汁的嘴唇顺巴一声，收紧它们的四肢，甩开蹄子，再收紧；于是 mademoiselle 的躯干向

后一仰，而那沉重的雪橇就被拉出了它钢铁、皮毛、肉体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没有摩擦的媒体

，在这里它沿着一条幽灵之路飞驰，一眼望丢几乎没有触及路面。

有一会儿，感谢车站广场尽头一盏孤灯突然的闪耀，一道被大大套张了的阴影，同样套着一个手筒，在雪橇一边驰行，攀上一道雪的巨浪，又消失了，只留下 mademoiselle 被① 法语“像卡列尼娜伯爵夫人一样”。

84 纳博科夫

她后来将怀着敬畏与狂热暗示为“le steppe ①”的东西所吞没。那里，在无边的阴暗之中，远村的灯火变幻无常的闪烁对于她似乎是狼群的眼睛。她冷，她被冻僵了，冻僵“到脑子的中心”——因为她以最狂野的夸张在飞翔，而没有尾随最老生常谈的格言。她不时地回顾，想看清载着她的箱子和帽盒的第二辆雪橇是否在跟着——总是保持同样距离，像探险家所描绘的那些在极地的海水中结伴而行的船舶的幽灵一样。让我不要漏掉月亮——因为肯定有一个月亮，那浑圆的，明净得不可思议的圆盘，如此紧随着俄国的强烈霜冻。它就这样出现了，驰出一群斑驳的小云块，给它们打上了一道迷朦的晕光；接着，当它航行得更高些时，又给雪橇留在路边的辙印镀上一层釉彩，在那里每一个闪亮的雪块都被一道膨胀的阴影所加深。

非常可爱，非常寂寞。但我在这立体的梦境里干着些什么？我是怎样到达那里的？不知不觉中，两辆雪橇溜走了，把一个没有护照的间谍甩在后面，穿着他的新英格兰雪靴和暴风雨衣站在蓝白色的道路上。我耳中的震颤再也不是它们远去的铃声，而只是我年迈的血在鸣唱。一切都静止着，沉醉、着魔于月亮这面幻想的反光镜。然而雪是真实的，而当我俯身向雪，掬起一捧，六十年岁月在我指间碎成了闪亮的霜尘。① 法语“草原”，“荒原气”

说 o 巴，i 己忆

一盏雪花石膏基座的大咖灯驰入幽冥。它轻柔地飘行和落下；记忆之手，此刻戴着一名仆人的白手套，把它搁在一张圆桌的中间。火焰调得很好，而一道红润的，丝绸荷叶边的灯影，镶嵌着洛可可式冬季运动的闪烁，冠于重新调拨的（卡西米尔耳中的棉毛）灯火之上。显现出：一间温暖、明亮、风格独特的（“俄罗斯帝国”）客厅，在一幢白雪覆盖的房子里——很快就要被名为 lech 弓 tea 。① ——它是我母亲的祖父建造的，他害怕失火，让人用铁制成楼梯，因此在苏维埃革命后某个时候这幢房子真的着火被烧为

平地的时候，那些制作精巧，有透孔缕刻的竖板映着天光的梯级仍矗立不倒，孑然一身却依然通向高处。

关于那间客厅，请再来一点吧。家具闪亮的白色造型，它室内装演的刺绣玫瑰。白色的钢琴。椭圆形的镜子。悬挂在绷紧的链带上，它纯净的框额倾斜，它努力保存摇摇欲坠的家具和一道明亮地板的斜坡，这斜坡总是滑脱它的怀抱。枝形吊灯架的垂饰。这一切发出一阵轻微的叮当之声（mademoiselle 将要居住的楼上房间正在搬进东西）。彩色铅笔。它们详尽色谱的广告呈现在盒子上，但从没有为里面那些铅笔完全再现。我们坐在一张圆桌前，我弟弟和我和罗宾森小姐，她不时看她的手表：雪封的道路情况一定很糟；无论如何这个职业有① 法语“城堡气

86 纳博科夫

很多艰辛在等待着那个即将取代她的不得而知的法国人。现在是使用中的铅笔。绿色的笔，手腕仅仅一转，它就能产生一棵乱糟糟的树，或一条潜没的鳄鱼造成的涡流。蓝色笔画出一条简单的直线横过纸页——就有了重重大海的海平面。总有一支无论怎样的钝笔会碍事。褐色笔总是被折断，红色的也是这样，但有时，在它刚刚折断之后，紧握着它，让一片突出的碎片来支撑松动的笔尖，则还可将就一用，但实在不太稳当。紫色的小家伙，我特别喜爱的一支，已经被磨损得这么短，变得很难操纵了。唯有白色的那支，铅笔中细长的白化病人，还保持着它原先的长度，或至少是直到我发现它远非一个在纸页上不留痕迹的欺骗，而是理想的工具，因为在我涂鸦之时我能够想象我所希望的一切。

啊，这些铅笔，也曾被分配给我书中的人物，使虚构的孩子们忙乱终日；它们如今不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在某个地方，在某一章里的一个公寓房子，在某一节中的一间租赁的屋子里，我也曾安放了那倾斜的镜子、灯、枝形吊灯的滴状灯球。物品已经所剩无几，许多已经被挥霍一空。我是否曾放弃了盒子一号（管家的宠物露露的儿子和丈夫），那只沉睡在沙发上的褐色老猎狗？不，我想它仍旧是我的。它灰毛的口鼻在起皱的嘴角生着痕子，缩进了它的腿弯，不时有一声深深的叹息使它的肋部鼓起。它那么老，它的睡眠如此深厚地塞满了梦境（梦见耐咀嚼的拖鞋和几种残留的气味），以至外面低微的钟声叮当敲响之时它也并不惊起。接着有一扇气门在游廊上碰撞，铿锵作响。她终究是来了；我多么希望她不会来啊。

说 a 巴，气己 1 艺

另一条狗，一个凶猛家族的好脾气父亲，一条不让进房间的大丹麦狗，在一场历险记里扮演了一个愉快的角色，那是在此后的某一天，如果不是翌日的话。事情就是这样，我弟弟和我被留下来全权照顾那位新来者。现在我将它重新组合起来，我母亲很可能与她的女仆和小特兰内到圣彼得堡（大约五十英里远）去了，我父亲在那里深深卷入了那年冬天严峻的政治事件。她正在怀孕，十分紧张。罗宾森小姐没有留下来给 mademoiselle 介绍规矩，而是一同离去了——回到那位外交官的家里，我们以往听她谈论这一家像他们日后会听她谈论我们一样多。为了证明绝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我当即制订计划，要重演一年以前我们在威斯巴登逃离可怜的亨利小姐的激动人心的一幕。这一回四面的乡野是一片雪的荒原，难以想象我所谋划的旅行的目标究竟能是什么。我们刚从我们与 mademoiselle 的第一次午后散步归来，我因挫折和仇恨而激动不已。稍稍鼓动了一下，我就使温顺的谢尔盖分担了我的一些愤怒。要赶上一种陌生的语言（在法语方面我只知道几个家常短语），此外我们所热衷的习惯受到禁止，超出了我们忍受的限度。她答应了我们的 bonn 亡 p ? enade ① 原来只是宅子附近的一次乏味散步，那里雪已被扫清，冰冻的地面洒着沙子。她让我们穿往常甚至在最寒冷的日子我们也从来不穿的① 法语“美好的散步”。

纳博科夫

东西——可怕的皮腿套和头巾，它们阻碍着我们的每一个动作。在我引诱谢尔盖去探查那片在夏季是花坛的，凝脂般光滑的雪堆时，她阻止了我们。她不允许我们在风琴管似的排排冰柱下行走，它们从屋檐垂挂下来，又在低低的阳光里辉煌地燃烧。她也以仓 nob 介① 为名而抛弃了我最喜爱的消遣之一（由罗宾森小姐设计）——俯卧在一辆漂亮的小雪橇上，它的前端连着一段绳子，一只戴着露指手套的手拉着我滑过白雪覆盖的小路，而谢尔盖，不是躺而是坐在第二辆装演着红色长毛绒的雪橇上，连着我那辆蓝色雪橇的尾部，而就在我脸前的两只毛毡靴子的脚踵，十分迅速地走着，脚尖微微向内，时而用这个时而又用那个脚掌在一片天然的冰面上滑行。（手和脚属于德米特里，我们最老也最矮的花匠，小路是小栋树的大道，它似乎是我童年的主动脉。）

我向我弟弟讲解一个恶意的计划，并且劝说他接受了它。我们散步归来，就立刻离开了气喘吁吁爬着门厅梯级的 mademoiselle，冲进门里，给她我们正要藏进某个偏僻房间的印象。其实，我们一直疾走到宅子的另一端，然后，穿过一道游廊，又出现在花园之中。上面提到的那只大丹麦狗正慌乱地整到近旁的一个雪堆，但在决定该抬起哪条后腿时，它留意到了我们，立即快乐地奔到我们身边。

我们三个沿着一条相当好走的小径，在跋涉过更深的雪之后，到达了通往村子的道路。与此同时太阳已经西落。夜色神秘地迅速降临。我弟弟声称他又冷又累，但我催促着他并最① 法语“肮脏的”。

说吧，记忆 89 终让他骑上了那条狗（一行中唯一仍在自得其乐的成员）。我们已走了超过两英里，月色明朗如幻，而我弟弟在完全的缄默中，开始不时地从他的承载者身上掉下来，这时德米特里带着一盏灯追上我们，把我们带回了家。“giddy — eh, giddy — eh?” mademoiselle 从门道那边狂喊着。我擦过她身边不发一言。我弟弟放声大哭，并且投降了。那条名叫图尔卡的大丹麦狗又回到他被打搅的事务之中，与房宅四周那些适用而有益的雪堆打交道去了。

在我们童年时我们对于手知道得很多，因为它们居留和徘徊在我们身长的高度；mademoiselle 的手由于它们撒满雀斑的紧皮肤上青蛙般的光泽而令人不快。在她那时候以前从没有陌生人摸过我的脸。mademoiselle 初来乍到就在我的脸上轻拍，以示自发的爱意，使我大吃了一惊。当我想到她的手时她所有的奇行怪癖就回到我眼前。她与其说削不如说剥铅笔的戏法，笔尖指向她裹在绿色羊毛里的硕大而不育的胸脯。她把小手指头伸进耳朵，十分迅速地振动它的样子。她每次交给我一本抄写簿时都遵守的仪式。总是轻轻喘息一下，她的嘴微启，陆续疾速地发出一串气喘的喷吐，她会打开抄写簿在里面制造一个页边空白；就是说，她会用她的大拇指甲锋利地印上一条垂直线，在纸页边上折起，压平，松开，用手腕把它持平整，接着那本簿子就会被敏捷地卷起来并放在我的面前备用。随之而来的是一支新钢笔；在将它浸入洗礼的墨水

90 纳博科夫

瓶之前她会用喃喃的嘴唇弄湿闪亮的笔尖。此刻，欣喜于每一个清晰的字的每一道笔划（因前面的抄写簿结束于完全的粗劣而尤其如此），我会以极度的认真写下 dict 改① 这个词，而 mademoiselle 则在她的拼写练习集里搜索一个好的，难的章节。

与此同时背景已经改变。着霜的树和上有黄色洞眼的高大雪堆已被一名无声的道具管理员搬走。夏季的午后活着，有潜行的云撞开蓝天。长眼睛的阴影在花园小路上移动。顷刻间，课已上完，mademoiselle 在阳台上给我们读书，席子和藤椅在炎热中发出一股饶有风味的小饼干气息。在白色的窗台上，在窗前铺着褪色的白洋布的长椅上，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的长菱形和方块射进几何状的宝石。这是 mademoiselle 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

在那个阳台上她给我们读了多少本书啊！她细小的声音越来越快，从不减弱，没有丝毫的停顿或犹豫，一架值得敬佩的阅读机器，完全独立于她那有病的支气管。这一切我们全听过：lesm 以 heures de sophie , le tour du 人肠九 de en quatre vingts jours , le petit chose , les mi 护 rables , le co 切 te de ① 法语“听写”。

说吧，记忆 91 mont ' crt ' st 。①，还有许多别的。她坐在那里，从她身体静止的禁锢中提取她朗读的噪音。除了嘴唇之外，她的一层下巴，最小但是真实的那一层，是她佛陀般的庞大身形中唯一运动着的细部。黑框夹鼻眼镜反映出永恒。偶尔一只苍蝇会落到她坚硬的前额上，而它的三道皱纹会当即一同跳起，如同三个奔跑者越过三道跨栏。但在她脸上的表情中没有任何改变——多少次，我试图在我的速写簿里描画这张脸，因为它不动声色的简洁的对称给我潜行的铅笔提供的诱惑，远胜于在我面前的桌上或许我正在勾画的那盆花或那只野鸭子。此刻我的注意力还会游荡得更远，而也许正是在那时，她充满韵律的噪音那罕见的纯净达到了它真正的目的。我观看一棵树，它叶片的颤动借用了那韵律。伊戈尔在芍药花中间虚度光阴。一只鹁鸽②走了几步又停下，仿佛记起了什么——又走动起来，体现着它的名字。不知何自，一只狸白蝴蝶停在门槛上，摊开它尖削的暗棕色翅膀晒着太阳，突然间合起双翼，正巧展现出它黑色的下部印着的白色小字母，又同样突然地疾飞而去。但在那无数次阅读中最为经久的魅力则来自阳台两侧嵌在刷白框子里的彩色窗玻璃的丑角式图案。透过这些魔幻的玻璃望去，花园变得奇异地宁静而幽远。如果透过蓝色的玻璃观看，沙子就变成了煤灰，而墨黑的树木飘游在热带的天空中。黄色玻璃创造了一个唬拍世界，额外还有一道浓烈

① 法语“《苏菲的不幸》、《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悲修世界》、《基督山伯爵》”。

② w 砚 tail，一种小鸟，名字直译即为“摇尾巴气”

92 纳博科夫

的阳光的沉酿。红色玻璃使树叶那红玉的幽暗滴到一条维红的小径上。绿色玻璃把绿色的草木浸入一种更绿的绿色。而在如此的丰富之后，转向一小块平常而无味的方形玻璃，上面落着孤单的蚊子或跋足的蚊姥，那就像在不渴的时候饮下一口水一样，会看见熟悉的树木之下一张平淡无奇的长凳。但是在所有的窗子中，这正是在将来的岁月里焦干的乡愁渴望凝视的玻璃窗。

mademniselle 从没有发现过她嗓音平坦的流淌是多么有效。她继而发出的宣告则非常不同。“啊，”她叹息道，“comn。心 on，，aimait ①——我们不是互相热爱

吗！那些在 ch 巨 tean 的美好的旧日！我们有一次埋在橡树下的死去的蜡偶！〔不——一只塞满羊毛的高利沃。〕那个时候你和谢尔盖跑掉了，留下我在树林深处跌绊、哀叫！【夸张。】ah, la fes 淤 que je vonsaz ‘刀 anq 淤② — 呵，我怎样揍了你的屁股！〔她有一次确实想捆我，但这种尝试再也没有重复过。〕votre tante, la 尸 rincesse ③，你用你的小拳头捶她，因为她对我无礼！〔不记得了。〕还有你低声向我诉说你幼年的麻烦的那种样子 i 〔绝没有过门还有我屋子里的那个角落，你爱蜷伏在那里，因为你感到那么温暖和安全！”

mademoisene 的屋子，无论乡下还是在城里，对我来说都是个奇异的地方——仿佛一间温室，遮蔽着一株枝叶茂密，

① 法语“大家多么相爱啊”② 法语“啊，我揍你的那一顿屁股”。③ 法语“你的姨妈，那个亲王夫人”。

说。巴，记忆 93 满是遗尿气味的植物。尽管我们小时它就在我们房间的隔壁，它看来并不属于我们愉快的，通风良好的家。在那令人厌恶的雾霭里，在其他更模糊的臭气之中弥漫着氧化了的苹果皮的褐色气味，灯低低地点亮着，奇怪的物品在写字桌上闪烁：一个涂着亮漆的盒子，里面装着甘草棍，她会用她的铅笔刀切开这种黑色的切片，放在她的舌头下溶化；一张图画明信片，画着一个湖和一座缀满祖母绿窗子的城堡；一个由小银纸片紧紧团起的凹凸不平的小球，它来自她爱在夜里消费的所有那些巧克力；已故的侄子的照片，他母亲的照片，在她那幅材改 e ，。耐。rosa ① 上有她的签名，和某个 monsieur de marante ② 的照片，他曾受他的家庭逼迫娶一位富有的寡妇为妻。

令其他相片黯然失色的是在一个嵌有拓榴石的名贵框子里的那一幅；它以四分之三的视角展现了一个苗条的黑发年轻姑娘，身穿一件紧身衣，有漂亮的眼睛和浓密的秀发。“一条辫子像我的手臂一样粗，一直拖到我的脚踝！”就是 mademoiselle 通俗闹剧式的评论。这就是昔日的她——但我的双眼徒劳地细察她熟悉的形象，试图抽取出它所吞没的那个优雅生命。我受惊的弟弟和我作出的这样的发现却仅仅增加了那任务的艰难；而白天目睹一个衣着厚实的 mademoiselle 的大人们从没有见过我们儿童所见到的，当她

① 图画)。②

拉丁语“哀痛的母亲”（圣母玛莉亚跪在十字架下，或抱着耶稣尸体的法语“马朗特先生”。

纳博科夫

被我们哪一个恶梦中的尖叫所惊醒，形容不整，手持蜡烛，那件几乎裹不住她颤抖的大块头的血红色晨衣的镀金带子闪闪发亮，拉辛的荒诞剧里可怖的耶洗别光着脚踏进了我们的房间。

我一生都是一个糟糕的入睡者。在火车里，把报纸放到一边，交叠起胳膊，立刻就以一种侵犯性的熟悉态度，开始蔚声大作的人们令我震惊，一如那不自制的小伙子当着一个健谈的桶匠而安适地通便，或参加盛大的游行，或加入某个协会以求溶化于其中一样。睡眠是世上最低能的团体，有着最重的税收和最粗野的礼仪。它是一种我发现在贬值的精神拷打。创作的紧张和耗费精力经常迫使我，唉，去吞下一片强效药给我两个钟头的可怖的梦魇，或者甚至接受一次晌午小睡的喜剧性解脱，一个年迈的浪子也许就是这样跳珊走向最近的安乐死；但我全然无法习惯在夜间对理性、人性、天才的背叛。无论我的困倦多么巨大，与意识分离的痛苦对于我是可厌得难以言表。我厌恶索姆奴斯^①，那个黑色面具的刽子手，他把我捆到断头台上；而如果说在岁月的进程中，随着一次远为彻底而更加可笑的崩溃的逼近——它在如今的夜晚，我承认，大大减轻了睡眠的常规的恐怖——我已经习惯于我入睡时的考验，甚至在那把熟悉的斧子从它天鹅绒边框的双层底大盒子里抽出来时，几乎也要摆摆架子的话，起初我并没有这样的慰藉或防卫：我一无所有一除了 mademnisene 卧室里那蕴藏着灿烂光辉的枝形吊灯的一道象征的光芒，那房间^① somnus，睡眠之神。

说吧，记忆 95 的门，凭着我们家庭医生的命令（我向您致意，索科洛夫医生！），总是微微开启着。它闪烁的垂直线（一个孩子的眼泪能将它变成耀目的同情之光）是某种我能够紧紧抓住的东西，因为在彻底的黑暗里我的脑袋会晕眩，我的思想会溶入一种生死搏斗的滑稽摹仿。

星期六夜间时常或应当是一片悦人的景象，因为就是在那一夜，属于古典卫生学派别并把我们的 toquade, anglaises^① 仅仅视为一个伤风之源的 mademoiselle，要耽溺于每周一次沐浴的危险奢华之中，由此允准了我的微光的一次较为长久的借约。但一场更微妙的折磨开始了。我们现在搬到了我们在城里的宅邸，一座漂亮的，意大利式的芬兰花岗石建筑，于 1885 年前后由我祖父建成，（楼上）第三层上方有花卉壁画，第二层楼有个凸窗，座落于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摩斯卡雅街（今赫尔岑大街）47 号。孩子们占据了三楼。1908 年，这里挑选出来的一年，我仍与我弟弟同住一间保育室。分给 mademoiselle 的浴室在离我的床铺二十下心跳左右距离的一道之字形走廊的尽头，而一面害怕她从她的浴室过早地回到我们隔壁亮着灯的卧室，一面又嫉妒我弟弟在隔开我们的涂漆屏风后面低低的均匀呼吸，在这两者之间，我从来无法以迅捷

入睡来对我多余的时间真正地善加利用；而黑暗里一道裂缝仍旧在虚空中显示着我自己的一斑。最终它们会前来，那一声声无情的脚步，疲惫地走过楼道，使得秘密地分享我的守夜的某个易碎的玻璃物品在它的① 法语“英国式狂热”。

96 纳博科夫

架子上惊慌地摇动起来。

现在她已走进了她的房间。一阵活泼的明暗交替告诉我她床头框上的蜡烛接管了天花板上那串球体的职责，后者随着几下咔嗒声疾增了两个自然的，然后是超自然的光明的步骤，咔嗒着一齐熄灭。我的光缝仍在那里，但它已变得陈旧而黯淡，每当 mademoiselle 翻身把床弄得吱吱响时它都摇曳不定。我仍旧听得见她。现在它是一阵白银般的瑟响，拼出“sucha 记”；现在是一把水果刀裁开 la revue 召 de，de “x mo，des ① 书页的嚓嚓嚓。一个衰落期开始了：她在读布尔热，他没有一个词能比他本人活得更长。末日临近了。我处在深深的痛苦中，拼命哄诱睡眠，每隔几秒钟就睁开眼检验已逝的光亮，把天堂想象成一位不眠的邻人在一支永恒的烛光下读一本无穷无尽的书的地方。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夹鼻眼镜盒猛地扣上，杂志胡乱扔到床头柜的大理石上，mademofselle 嚎起嘴唇风暴般地吹气，最初的尝试没有成功，一支摇曳的火苗扭动着躲开了；然后是第二次冲击，火光熄灭。在那漆黑一片中我失去了方向，我的床似乎在慢慢地飘浮，恐惧使我坐起来注视；最后我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在眼球内部的漂浮者中间筛选出了某些更加细微的污迹，它们漫游在无目的的健忘之中，直到记起了一半而停落下来，就像窗帘黯淡的皱褶一样，在窗子后面街灯还遥远地活着。

对于夜间的麻烦，圣彼得堡那些令人振奋的早晨是如此① 法语“《两个世界杂志》”。

说吧，记忆 97 的截然不同呵，那刺痛而温和、湿润而绚烂的北极之春带走了碎冰，带进了海一般明亮的涅瓦河！它使屋顶闪闪发亮。它给街上半融的雪涂了一层浓浓的蓝紫色调，往后我在哪儿都再没有见到过。在那些光荣的白昼 onallal ' tsepromene，n ' quipage ① — 在我们这群人里流行的旧大陆表达方式。毫不费力我就能重历那令人激动的变化，从有着新鲜海狸皮领子，塞得满满的，长及膝盖的尸 olush “bok ② 到锚式铜钮扣的海军蓝短外衣。在敞篷四轮马车里，我靠着一张膝毯的山谷与更加有趣的后座的占据者，威严的 mademofselle 和胜利的，眼泪汪汪的谢尔盖连结在一起，在家里我刚与他吵了一架。在我们合用的覆盖物下面，我时不时地轻轻踢着他，直到

mademoisene 严厉地制止了我。我们驰过法贝尔热的橱窗，它怪异的矿藏，平摆在大理石鸵鸟蛋上饰有珠宝的三驾马车，以及诸如此类为帝室高度赞赏的物品，对于我们奇形怪状的炫耀的表征。教堂的钟在敲响，第一只硫磺蝶在阿奇宫上飞起，再过一个月我们要回到乡下；而当我仰望，我看得见，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高高地拦在街道上空，巨大的，光滑而绷紧的，半透明的旗帜在飘扬，它们的三道宽色带——淡红、淡蓝，和单纯的苍白——被阳光和飞逝的云影剥夺了与一个国庆日的任何过于直截了当的联系，但此刻，在这记忆的城市里，它们无疑在庆祝着那春日的芳香，泥土的吱吱声，腮腺炎的初发，mademoisene 帽子上的那只羽毛零乱，一

法语“人们乘车去散步”。羊皮褂子。

① ②

纳博科夫

眼充血的异国之鸟。

她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七年，课上得越来越少而脾气却越来越坏。然而，与在我们大家庭里经过的英国女教师和俄国男教师的潮涨潮落相比，她似乎像一块顽石，具有肃穆的永久性。她与他们的关系都不好。在夏天，坐下来进餐的人数很少有不足十五人的时候，而在生日，当这一数字上升到三十或更多时，桌前的座次就成了一个有关 mademoiselle 的特别棘手的问题。叔叔阿姨和表兄弟姐妹会在这样的日子从附近的领地前来，村里的医生会坐着狗车来到，也可以听见村办小学校长在凉爽的大厅里揍鼻涕，他在那里走过一面又一面镜子，手里摸着一大把山谷里摘来的微绿、潮湿、扎扎响的百合，或一支色彩如天空的、脆弱的矢车菊。

倘若 mademoiselle 发现她的座位太远，在大桌子尽头，尤其是倘若她在某一位几乎与她同样肥胖的穷亲戚（"jesui : un '划 lp 人 id 。泛一 c 云护 d , elle ① "，mademoiselle 会厌恶地耸耸肩说）面前失去了优先的话，那时她受伤的感觉就会使她的嘴唇在一丝勉强的嘲弄微笑中抽动——而当一个天真的邻居回报以微笑时，她就会立刻摇头，好像是出于某种十分深邃的冥想，说道："excusez — moi , je : ouriaisj mest 汀 stes 户 en 淤 es ② ， ， 。

① 法语“在她旁边我可算得上是窈窕淑女了”。② 法语“对不起，我是在对我忧愁的思考微笑”。

说吧，记忆 99 并且仿佛自然从来不曾希望留给她任何使人极度敏感的品质，她的听觉也很差。有时在餐桌前我们男孩子会突然察觉到两滴大大的泪珠滚下 mademoiselle 丰满的脸颊。“别管我”，她会轻声说道，继续进餐直到没有擦去的泪水使她看不见为止，随着一声心碎的响隔她会起身闯出餐室。真相会一点一点显露出来。主要的话题转到了，比如说，我叔叔所指挥的军舰方面，她感到这里有一种对她那没有海军的瑞士的暗讽。或者这是因为她想象，人们无论何时说起法语，这游戏即在于有意阻止她领导这场交谈并为之增色。可怜的女士，她总是处在这样一种紧张的仓促之中，要在听得懂的桌前交谈奔回俄语之前抓住对它的控制，难怪她总是弄糟了她的角色。“那么你的国会，爵士，进展得怎么样了？”她会猛然间愉快地从桌子的她那一头发话，向我父亲挑战，而他在烦恼的一天之后，并不确实渴望与一个极爱空想的人讨论国家的困难，这个人既不知道也丝毫不关心它们。以为某人谈到了音乐，“但是寂静，同样也可以是美的”，她会咯咯笑着说。“啊，一天晚上，在阿尔卑斯一道荒凉的山谷里，我确实听到了寂静”。像这样的俏皮话，尤其在越来越重的耳聋引她回答没有一个人提出的问题的時候，结果是一阵痛苦的肃静，而不是一支轻快的。auseris ① 火箭的发射。

还有，真的，她的法语是那么可爱！当她字字珠玑的语言潺潺流淌和闪耀，像拉辛虔诚的诗篇中的头韵罪孽一样不受意义的沾污，是否应该注意到她文化的浅薄，她脾气的暴躁，① 法语“闲谈”。

100 纳博科夫

她头脑的平庸呢？是我父亲的图书馆，而不是她有限的学问，教会了我欣赏真诚的诗；然而，她语言的明彻和光彩多少在我身上有一种奇异的激励效果，像那些用来净化血液的闪烁的盐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每想起 mademoiselle 看到出自她大象般身体的夜莺之声是怎样被浪费，怎样地不受珍视的时候必然经受的苦闷，就会使我如此悲伤。她与我们一起待了很久，太长久了，顽固地希望某个奇迹会将她改造成 madame de Rambouillet ① 一类人，在她的光辉魅力下举行一场诗人、君主和政治家的锦绣辉煌的 salon ②。

她本会一直这样希望下去，要不是有了一位兰斯基的话，一个俄国家庭教师，有温和的近视眼和强烈的政治主张，他一直忙于在各个学科上教导我们和参加我们的体育运动。他有几个前任，没有一个是 mademoiselle 喜欢的，但是他，在她说来，是“le mot mbl”。③”。尽管尊崇我的父亲，兰斯基不是很能容忍我们家的某些方面，诸如仆从和法语，他视后者为一个自由派家庭里的一种无用的贵族习惯。另一方面，mademoiselle 断定如果兰斯基仅仅以简短的咕噜（他试图使之德语化，因为缺少一

种更好的语言)回答她毫无主旨的问题,那不是因为他听不懂法语,而是因为他想在每个人面前侮辱她。

我能够听见和看见 mademoiselle 以悦耳的语调,但嘴唇

① 法语“德·朗布依埃夫人”。② 法语“沙龙”。

③ 法语“极端”。

创兑 0 巴, i 己忆 101 却不祥地颤动着,请求他递给她面包;同样,我也能够听见和看见兰斯基对法语充耳不闻,继续喝他的汤,最后,随着一声鞭答的“尸 ardon , 腩 nsieur ① ”, mademoiselle 会猛地伸手横过他的盘子,抓起面包篮,又缩回了手道一声“mer ' ' i ! ② ”如此充满了嘲讽,以至兰斯基毛绒绒的耳朵会变成天竺葵的颜色。“野兽!恶棍!虚无主义者!”过后她会在她的屋子里哭泣—它已不再与我们的相邻,虽然仍在同一层。如果兰斯基碰巧在她每隔十步左右气喘吁吁地停一下,艰难地上楼(因为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宅子里的小液压升降机会经常地,并且颇为侮辱性地,拒绝工作)的时候下楼, mademoiselle 就坚持说他恶意地撞她,推她,把她打倒,而我们这时已经能够看到他踩过她卧倒的身体了。越来越频繁地,她会离开桌子,而她错过的甜食将跟着被圆通地送上去。从她遥远的房间,她会写一封十六页的信给我母亲,而后者慌忙上楼后,会发现她正在戏剧性地装着她的箱子。继而,有一天,她会获准继续收拾她的行李。

她回到了瑞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了,然后是革命。在二十年代初,在我们的通信虎头蛇尾之后很久,凭着流亡生涯中侥幸的一步,我碰巧与我大学里的一个朋友访问了洛桑,

法语“抱歉,先生”。法语“谢谢】 ”。

① ②

102 纳博科夫

因此我想到我不妨去探望一下 mademoisene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她活着,比以往更矮胖,十分苍白,几乎已完全失聪,她以猛烈爆发的爱欢迎了我。那幅希庸城堡①图画不见了,现在代之以一幅过分渲染的三驾马车。她说起她在俄国的生活,如此温柔,仿佛那是她自己失去的祖国。事实上,我在附近发现了一大群这样

的瑞士老家庭女教师。怀着互相比赛回忆的持续激动聚居在一起，她们在一种已经变得与她们格格不入的环境里形成了一个小岛。mademoiselle 的知心朋友，此刻已形同木乃伊的高莱小姐，我母亲原先的家庭女教师，在八十五岁时仍旧刻板而悲观；我母亲结婚以后很久她还在留在我们家里，她回到瑞士只比 mademoiselle 早几年，她们同在我们屋顶下生活的时候，她与她还没有熟到互相交谈的地步。一个人的过去永远是他的家园，这部分地解释了那些可悲的女士们身后对一个遥远的，并且，完全坦率地说，颇为骇人的国度的爱，她们从未真正了解它，她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对它十分满意。

由于 mademoiselle 的失聪，交谈已不可能了，我朋友和我决定第二天给她带去我们推想她买不起的器具。她起先错误地摆弄那件笨重的东西，但刚调节一下立刻就转向了我，泪光模糊的眼里充满了湿润的惊奇和幸福。她发誓她能听见我的每一个字，每一声低语。她听不见，因为我由于迟疑而没有说话。如果我说了，我会是叫她感谢我那位花钱买下这仪器的① ch 泣teau de chillon，瑞士一古城堡，在日内瓦湖边。

说。巴，气已忆 103 朋友。那么，她听见的是寂静吗，她在往昔曾经说听到过的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在那往昔之中，她曾对自己说谎，此刻她在对我说慌。

在启程去巴瑟尔和柏林之前，我偶然在寒冷、起雾的夜里沿湖边散步。一道孤寂的光在一个地方将黑暗朦胧地稀释，并将雾气转变为一场看得见的细雨。“Il pleut toujours”，suisse ①，，是那些无心的评论之一，以往曾让 mademoiselle 流泪。下面，一道宽阔的微波，几乎是一排浪，和某种隐约发白的事物吸引了我的目光。当我凑近轻拍的水，我看见了它是什么——一只年迈的天鹅，一个巨大、笨拙、渡渡鸟一般的生命，正在作出可笑的努力要把自己挪进一条旋泊的船。他做不到。他的翅膀沉重的，无力的拍打，它们紧靠着摇摆而激荡的船的湿滑声响，黑色的波涛胶着的闪烁，它在那里得到了光照——一时间一切都好像充满了那奇特的意义，在梦中有时与一根手指紧紧相连，它压住嘴唇使其噤声，然后又指点什么东西，做梦者在惊醒之前没有时间把它认清。但尽管我很快就忘掉了那阴郁的一夜，正是那个夜晚，够奇怪的，那复合的形象——战栗与天鹅与浪涛——在我几年之后得知 mademoiselle 去世时，首先呈现在我的脑际。

她用了她的一生来感受苦痛：这苦痛是她民族的因素；它的波动，它变化的深度，独自给了她运动与生活的印象。令我烦恼的是，仅有一种苦痛之感，而没有别的，不足以造就一个永久的灵魂。我硕大而抑郁的 mademoiselle 在人间一切无① 法语“在瑞士总下雨”。

纳博科夫

恙但在永恒之中绝无可能。我是否真正把她从虚构中解救出来了？就在我所听见的旋律颤抖和消逝之前，我发现自己怀疑，在我认识她的那些年月里，我是否一直完全忽略了她的什么东西，远比她的下巴或她的癖性甚或她的法语更是她——也许类似于她最后的一瞥，类似于她用来使我在离去时安心于自己的仁厚的辉煌的欺骗，或者类似于那只天鹅，他的痛苦远比一个俯身的舞蹈者苍白的的手臂更接近于艺术真实；简言之，是只有当我在童年的安适中最为热爱的事物与生命化为灰烬或被射穿心脏之后，我才能欣赏的什么东西。mademoiselle 的故事有一个附录。在我最初写下它时，我对某些惊人的幸存者一无所知。就这样，在 1960 年，我在伦敦的表兄弟彼得·德·彼得森告诉我他们的英国保姆，1904 年在阿巴济亚她对我来说似乎就很老了，到那时已经九十多岁并且身体康健；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的两个妹妹的家庭教师波维埃小姐（后来的康拉德夫人），在我父亲之后又活了近半个世纪。她在 1889 年进入她们家，留了六年，是一系列家庭女教师中的最后一个。彼得的父亲伊凡·德·彼得森在 1895 年画的一幅漂亮的小纪念画，展现了巴托沃生活中的各个事件，装饰着我父亲的亲笔题词：acelle、uiotoujourssusefaire aime，。t oui，。，aura jamais：，e faire ou 况 ier ①；附带签名的是四位年轻的男纳博科夫和他们姐妹中的三个，娜塔莉亚、伊莉莎维塔和娜杰日达，以及娜塔莉亚的丈夫，他们的小儿子米蒂克，两个表妹，以及俄国家庭教师伊凡·亚历山得洛维奇① 法语“献给那个永远能够被爱的，难忘的人”。

说 d 巴，气已忆 105·蒂霍茨基。六十五年之后，在日内瓦，我妹妹埃莱娜发现了康拉德太太，此刻已是她第十个十年了。那位古老的女士，跳过了一代人，天真地将埃莱娜误认为我的母亲，然后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在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时常与戈莱小姐一同从维拉开车去巴托沃，正是那些日子，它们长长的光找到了这么多精妙的途径，降临了我。

106

第

、六章

在一个夏季的早晨，在我童年那传说般的俄罗斯，我苏醒后最初的一瞥，看的是白色内窗板之间的缝隙。如果它展现出一道水色的苍白，最好根本不要打开它们，于是也就免去了由小水潭描画的一个阴沉白昼的景象。从一道昏暗的光线，

说 d 巴，气已忆 107 一个人会多么恼怒地推想到铅似的天空，浸透了水的沙子，紫丁香下面碎烂如稀粥的褐色花瓣——和粘在一张潮湿的花园长凳上的那片扁平的，淡黄色的树叶（这季节的第一个无妄之灾）！

但倘若这缝隙是长长一道露珠般璀璨的闪耀，我就赶紧叫窗子亮出它的宝藏。只一推，屋子就会分成光与影。在阳光中浮动的白桦树叶有着葡萄半透明的翠绿色调，与此相对，有极树的黑色天鹅绒，衬着一片浓重得出奇的蓝色，我只在多年以后，在科罗拉多山区才又一次发现过相似的风景。从七岁起，每一种事物，只要我感到与一片上了框子的阳光的四方格有关，就都是在唯一一种情感的支配之下。如果我在早晨第一眼看到的是阳光，我最先想到的，则是它即将产生的蝴蝶。起初事情是够乏味的。在大门正对面，在凌驾着一张长凳的拘楼背脊的郁金香之上，我的指路天使（他的翅膀，除了缺少一道佛罗伦萨式的镶边之外，与福拉·安吉利科^①的加百列相似）给我指出了一位稀客，一只光彩夺目的淡黄色动物，它生着黑斑和蓝色的枪孔，在每一个铬黄圈环的黑色尾部上方各有一粒朱砂的眼斑。它细察着它垂挂而下的倾斜的花朵，它粉似的身体微弯，不倦地扇着大翅膀，而我对它的欲望是我的体验中极为强烈的一次。阿吉尔·尤斯丁，我们城里宅子的看门人；为了一个可笑的缘故（在别处解释）那年夏天碰巧与我们一块在乡下，他设法用我的帽子捉住了它，^① fra angelico（约 1400？1455·28），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派著名画

108 纳博科夫

之后它连同我的帽子一起，被转移到了一个衣橱里，mademoiselle 天真地指望用家用蔡在一夜之间把它杀死在那里，然而，在第二天早晨，当她打开衣橱取东西时，随着一声有力的扑闪，我的凤蛾飞到了她脸上，接着又冲向敞开的窗子，倾刻间就成了一个金色的小点，降落，躲避，飞向东方，穿过森林与冻土，到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和彼尔姆，飞越枯槁的乌拉尔山梁到雅库茨克和上克莱姆斯克，从它丧失了一条尾巴的上克莱姆斯克，到美丽的圣劳伦斯岛，横跨阿拉斯加到道森，沿洛基山脉一直往南——最终，在一场历时四十年的赛跑之后，在博尔德附近一棵当地常见的白杨树下面一枝迁徙的蒲公英上，会被追及和捕获。在博德里安藏书^①中，在 1735 年 6 月 14 日布鲁恩先生寄给劳林斯先生的一封信里，他讲述了一位维农先生追逐一只蝴蝶达九英里才得以将它抓住（《娱乐评论或文学与生活的怪癖》，第一卷，第 144 页，伦敦，1521 年）。

在衣橱事件后不久我发现了一只蔚为奇观的飞蛾，流浪在前厅一扇窗子的一角，我母亲用醚杀死了它。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使用过许多杀戮的媒剂，但是与最初的材料最少的接触也总是会令往昔的门洞点亮，并吸引那横冲直撞的美。有一回，在成年后，我

在切除阑尾时处于醚的药力之下，以一幅移印画的生动，我看见我自己的自我穿着件水手衫，在一个

① bodl 认 n collection，博德里安图书馆为牛津大学的图书馆，是历史最久，最重要的图书馆，藏书只供参考概不外借。现藏四百二十多万册印刷本和五万册手抄本。

说吧，记忆 109 中国女人——我知道那是我母亲——的指引下去袭击一只新出现的皇蛾。这一切都在我的梦里辉煌地重现，正当我自己的要害器官被暴露之时：浸透了的，冰冷的吸水棉花被压在那只昆虫猿猴似的头上；它的躯体渐渐平息的痉挛；针扎进它中段硬壳发出的悦人碎裂声；针尖在铺板软木底座的凹槽上小心翼翼的插入；在整齐固定的半透明纸条下，厚实的，血脉强壮的翅膀对称的调整。

那时我肯定已经八岁，在我们乡下房宅的储藏室里，在各种各样尘封的物品之间，我发现了一些精彩的书，是在我母亲的母亲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并且找了一位著名的大学动物学教授（希姆科维奇）给她女儿私下授课的日子里购得的。这些书有的仅仅是古董，像阿尔伯特·塞巴的四部巨大的褐色对开本著作（*locupletissimi rerum naturalium et animalium historiae descriptio ...* ①），1750 年左右印于阿姆斯特丹。在它们颗粒粗糙的书页上我找到了蛇和蝴蝶和胚胎的木刻画。在一只玻璃瓶中吊住脖子的一个埃塞俄比亚女童的胚胎，每当我翻到它，总是给我一个厌恶的震惊；我也不太关心画页上那头制成了标本的海蛇怪，它的七条蛇颈上有七个狮牙的乌龟头，它古怪臃肿的身体两侧延伸着钮扣似的小瘤，直到一根打着结的尾巴为止。

① 拉丁语“《自然语汇精确描绘大全·一~·》”。

no 纳博科夫

我在那间阁楼里，在满是高山缕斗菜的植物标本、蓝色的 *palemoniums*、朱庇特的石竹、橙红色的百合，以及其它达沃斯花中间找到的其它书籍，更接近我的学科。我抱起一堆堆堂皇不凡、幻想般诱人的书本，把它们搬下了楼：马利亚·西贝拉·梅里安（1647—1717）可爱的苏里南昆虫图片，艾斯帕尔卓越的 *die schmetterlinge Europas* ①（埃朗根，1777 年）和博瓦斯杜瓦勒的 *icones historigues je ne sais quel insecte*，杨 uveaux ou pe。connu 声（巴黎，始于 1832 年）。更加令人兴奋的是那个世纪下半期的作品——纽曼的《英国蝴蝶飞蛾自然史》，霍夫曼的 *die schmetterlinge Europas* 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关于亚洲鳞翅目的 *memoire*，④（有卡夫里金、里巴科夫、拉昂所画的无比美丽的图像），斯库德关于《新英格兰蝴蝶》的巨作。

回首往事，1905 年的夏天，尽管许多方面十分生动，却还绝无一记轻轻的扑翼或一簇彩色的绒毛，环绕或横越与村办小学校长一起散步的道路，给这个时节注入活力：1906 年 6 月的那只凤蝶，尚在路边的一只伞科植物上处于幼虫阶段：但在那个月里我就熟悉了大约二十种普通类型，而 mademoiselle 已经把某条林间小路指为 le ' hemin des papillon , bru 形③ 了，它的终端是一片泥沼的草地，满是珍珠① 德语“《鳞翅目》气

② 法语“《新或罕见鳞翅目的历史画像》气

③ 德语“《欧洲鳞翅目大全》”。

④ 法语“《回忆录》”o

⑤ 法语“褐色蝴蝶之路”。

说吧，记忆 in 边的小纹峡蝶（在我第一份难忘的，具有永不消逝的魔力的小小手稿，理查德·骚斯的《英伦三岛蝴蝶》里就是这样称呼的，当时它才刚刚问世）。下一年我发觉我们的很多蝴蝶和飞蛾在英格兰或中欧没有出现过，而更为完备的地图集帮助了我确定它们。一场重病（肺炎，发烧至摄氏 40 ）。在 1907 年初，神秘地革除了在几个月里使我成为一个神童的颇为惊人的数学天才（如今我没有纸笔就算不出 13 乘 17 ；然而，我可以立即把它们加起来，那个三的牙齿嵌合得很整齐）；但是蝴蝶幸存了下来。我母亲在我的床榻四周堆起了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而描写一个新种类的渴望完全取代了发现一个新素数的渴望。1907 年 8 月一次去比亚里茨的旅行增添了新的奇品（尽管不如在 1909 年那么明确和众多）。到 1908 年，我已经彻底获得了对霍夫曼所知的欧洲鳞翅目的掌握。到 1910 年，我已梦想到了我穿过塞茨的巨大的图画书众。gross schumetterlinge de ; erd 亡① 的第一卷的道路，已经购买了一批新近才被描述的稀有品种，并且正在贪婪地阅读昆虫学期刊，尤其是英语和俄语的。巨变正在系统学的发展中产生。从这个世纪中期起，大陆鳞翅目学已经，在总体上，成为一件简单而稳定的事务，由德国人平稳地操纵。它的高级祭司，施陶丁格博士，也是最大的昆虫商公司的首脑。甚至现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德国鳞翅目学家也没有十分设法来摆脱他的权威引起的催眠符咒。他的学派作为一股科学力量开始失势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当他和他的追随者坚持长久习惯所认可的具体与一般名① 德语“《世界鳞翅目大全》气

称，满足于用肉眼能见的特征来对蝴蝶进行分类时，讲英语的创新者正在引进命名学的变化，作为严格运用优先法则的结果，和分类学的变化，基于对器官的微观研究。德国人竭力忽视新的倾向，而继续珍爱昆虫学形同集邮的一面。他们对“不应被迫去解剖的普通收藏家”的关切可以和通俗小说的神经过敏的出版商纵容“普通读者”——他们不应被迫思考——的方式相比。

另外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变化，恰与我年轻时对蝴蝶和昆虫的强烈兴趣同时出现。维多利亚时期的与施陶丁格式的种类，互不相关而又性质相同，有各式各样的（高山、极地、岛屿等等）“品种”，仿佛微不足道的附属物一样从外部添加到它身上，这样的种类已经被一种新的，多样的与可变的种类所取代，它在系统上由地理的族或亚种组成。这件事进化的一面就这样靠着更加易变的分类方法显现了出来，而蝴蝶与自然的中心问题之间更多的联系是由生物学提供的。摹拟之谜对我有着一一种特殊的魅力。其现象展现出通常联系着人造事物的一种艺术的完美。想想那毒汁渗流的假象吧，它是由一片翅膀上气泡般的痣斑（配有假的反光），或是一只金蛹身上密布的黄色斑点造成的（“别吃我一——我已经被压扁、品尝和抛弃了”）。想想一只卖艺人般的毛虫（属龙虾蛾）的戏法吧，它在幼年期看似鸟粪，但在脱毛后发展起了涂鸦般的膜翅目附属物和巴洛克式的特征，使这奇特的家伙能够同时扮演两个角色（像东方杂耍演员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摔跤手一样）：一只挣扎的幼虫与一只仿佛正在将它耙出来的大蚂蚁。当某一只飞蛾在外形与颜色上与某一只黄蜂相像

说吧，记忆 113 时，它行走和摆动触角也是一种暴躁的，与飞蛾不同的样子。当一只蝴蝶不得不像一片树叶时，不是一片树叶的所有细部都被美丽地呈现出来，而且还慷慨奉送摹仿蛆虫所钻的洞孔的斑点。“自然选择”，在达尔文式的意义上，无法解释摹仿特征与摹仿行为的奇迹般的巧合，人们也无法诉诸“生存竞争”的理论，在一种防卫器官被推至摹仿的精微、繁盛，以及奢华的一个极点，远远超出了一种食肉动物的鉴赏力的时候。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

我曾在各种地区，以各种伪装捕捉蝴蝶：作为一个穿灯笼裤戴海员帽的漂亮男孩；作为一个穿法兰绒裤子戴贝雷帽四海为家的瘦削侨民；作为一个穿短裤不戴帽子的胖老头。我的橱柜大多分享了我们在维拉的房宅的命运。我们城里宅邸的那些和我留在雅尔塔博物馆的小小的补遗物品无疑已被地毯圆皮蠹和其它蛀虫所毁坏。我在流亡中开始搜集的一套南欧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失于巴黎。我从 1940 到 1960 年在美国的全部捕获物（几千个样本，包括伟大的珍品与类型）现在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物馆，它们在那里比在托木斯克或阿托木斯

114 纳博科夫

克① 更安全。愉快得难以置信的记忆，事实上很可以和我在俄国的童年相比，是与我麻州剑桥 mcz ② 的研究工作（1941 — 1948）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愉快的是在二十年间，差不多每年夏季都进行的许多采集旅行，几乎走遍了我所选定的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州。

在杰克逊洞和大峡谷，在科罗拉多州泰路里德的山坡上，在纽约州奥尔巴尼一片有名的松树荒漠，居住着，而且还将居住下去，我描述为新的蝴蝶，品种比编类还要多。我的发现物中有几个是别人已经研究过的；有的在我之后被命名。其中之一，纳博科夫的凤蛾（*ithecia nabo* 乏 *ovi mcdunnough*），1943 年一天夜里，在詹姆斯·劳林位于犹他州的高山小屋的一扇画窗上，被我捉进了盒子，它极富哲理性地汇入了那段始于一片树林的主题性螺旋，这树林座落于 1910 年前后的奥列杰日河畔——也许甚至更早，是一个半世纪以前，新地岛上的那条河岸边。

事实上，在情感或胃口，雄心或成就方面，我所知道的事物中没有多少能够比探究昆虫学的热情更为丰富与强烈。从一开始它就有许多交相辉映的方面。其中之一是独自一人的强烈欲望，因为任何同伴，无论怎样安静，都会妨碍我狂热的专注乐趣。它的欣喜不允许有妥协或例外。在我十岁时，男女家庭教师就已经知道早晨是我的，而小心地远远避开。关于这一点，我记得一位同学的来访，我十分喜欢这个

① *atomsk*，也可译作“原子斯克”。

② 比较动物学博物馆（*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的缩写。

说 d 巴，记忆 115 男孩，曾与之尽情玩乐。他在一个夏夜——我想是在 1913 年——从大约二十五英里之外的一座城里前来。他父亲最近死于一次事故，这个家破产了，那勇敢的少年买不起一张火车票，骑车走了那许多英里来和陪我过几天。

在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我想尽办法瞒着他离开宅子去进行我清晨的远足，连早饭也不吃，以歇斯底里的仓促，我取过我的网、小药筒、杀虫瓶，从窗口逃走。一到树林里，我就安全了；但我还是走个不停，我的小腿颤抖着，我的眼里满含着热泪，我的全身因羞愧和自厌而抽动，眼前浮现出我那可怜的朋友，拖着苍白的长脸和黑领带，在炎热的花园里郁郁不乐——轻拍着喷着气的小狗而百无聊赖，努力为我不在他身边寻找着理由。

让我客观地看看我的魔鬼吧。除了我父母之外，没有人真正理解我的顽固念头，而那是在我遇见一个同病相怜者以前许多年。我最先学到的东西之一，是为了我收集的发展不要听从别人。一个夏日的午后，在 1911 年，mademoiselle 走进我的屋子，手持书本，开口说她要给我看看卢梭是多么机智地责难动物学（支持植物学）的，而那时她将她的大块头降低进一张扶手椅的重力过程已经走得太远，无法被我痛苦的嚎叫所制止了：在那个座位上我碰巧放着一个玻璃盖的柜盘，里面是几个长长的，可爱的大白粉蝶系列。她的第一反应是一种被刺痛的虚荣：她的重量，当然了，不能因损害了它确实已经毁坏的东西而受到责备；她的第二个反应是安慰我：auons

116 纳博科夫

donc , ce ne sont oue des 户动 illonde 户 otager ！① — 而这只把事情弄得更糟。一对刚从施陶丁格公司购得的西西里品种被压碎和挫伤了。一只巨大的比亚里茨样本被完全撕裂。我的一些精选的本地捕获物也已被毁。这一切当中，与这一种属的卡纳里安族相似的一只突变样本可以用几滴树胶修复；但一只精美的雌雄嵌体，左边雄，右边雌，其腹部已经无影无踪，翅膀也已脱落，永远地失去了：可以重新粘上翅膀但无法证明这四片属于那弯针上的无头的胸部。次日清晨，带着一种大神秘的气氛，可怜的 mademoiselle 启程去圣彼得堡，在夜里回来带给我（“比你的洋白菜蝴蝶更好的东西”）装在灰泥上的一只平凡的 urania 飞蛾。“你是怎样拥抱了我，你是怎样地欢欣雀跃啊！”她在十年之后高喊道，发明着一段崭新的过去。我们的乡村医生，我在一次出国旅行时曾留给他一种罕见飞蛾的蛹，他写信告诉我一切都孵化得很好；但实际上一只老鼠已经得到了这些精美的蛹，在我回来时这骗人的老头拿出了几只普通的龟壳蝴蝶，我猜想这是他仓促间在花园里捉到并迅速放进孵化笼里，当作似是而非的替代物（他这么想）的。略胜于他的，是一个热情的厨童，他有时会借用我的器具，两小时后凯旋而归，带回来一大包骚动的无脊椎生命和另外几样东西。松开他用一根细绳扎紧的网嘴，他会倾倒入他丰富的赃物——一大堆炸锰，一些沙子，他在回家路上顺手拔出的一只蘑菇的两部分，更多的炸锰，更多的沙子，和一只被捣碎的小白粉蝶。

① 法语“行了，这只是些菜园子里的蝴蝶而已”。

说 q 巴`记忆 1 17 在俄国大诗人的作品里我只能找到两个真正具有敏感性质的鳞翅目形象：布宁的完美的召唤，对象当然是一只龟壳蝴蝶：

而屋子里将会飞进一只身披锦缎的彩色蝴蝶扑动，瑟响，嚼喂啪啪在蓝色的天花板上... ..

和费特的独白的“蝴蝶”：

我从何处来，我匆匆何处去不要问我；

此刻我落到一枝优美的花上在此刻呼吸。

在法国诗里，人们被缪塞的名诗（在肠 saule ① 中）所打

动：

le pha 必 nedo 形 da 形 saco 衣肖 e 企扩 re traverse lesp 记 se 水 ba “而
s ②

法语“《柳树》”。

法语“那只金色的尺蛾轻盈地飞舞 / 穿过琳香的草地气

① ②

118 纳博科夫

这是在英格兰被称为苹条小卷蛾的尺蠖雄虫在晨昏之际飞行的一段完全精确的描述；还有法尔格恰切得令人着迷的短语（在及，qu' " rejot , r 泌尸，① 中），讲的是一座花园，它在入夜时 s 。 glacrj 己乃 le 。 。 o , m 。 l , aile du grand 卿 ivain ②（杨树峡蝶）。而在英语诗歌里极少的鳞翅目学意象中，我最喜爱勃朗宁的

在我们另一侧是勃然耸立的石头，而一条小径总在山谷与它之间在巨石一边，地衣在那里嘲笑一只飞蛾的斑点，而小小的羊齿草将它们的牙齿嵌入磨光的石菱（“在火炉边，'）

令人震惊的是普通人对蝴蝶是多么的漠不关心。“一只也没有”，在我为了我那怀疑的同伴的好处而有意间他在沿着山路下来时是否见到过任何蝴蝶的时候，这位背囊里装着加缪的健壮的瑞士远足者平静地如此回答，而就在一会儿之前，它们在那里成群结队，曾使你和我引以为乐。同样真实的是在回忆中细致入微，但属于 1906 年以前的一个夏季，也就是说在我第一份地点标鉴上的日期之前，并且从未被重访过的一条小径，当我怀想它的形象时，我却看不清一片翅膀，一记

① 法语“《四天》”。

② 法语“结出青箱，如大峡裸的翅膀”。

说吧。记忆 119 翅膀的扇动、一道蔚蓝的闪光，一朵晶莹点缀着飞蛾的花，就像一道罪恶的符咒投在亚德里亚海滨，隐没了它的所有“ieps 补”（像我们中间讲粗话的人所说的那样）。有朝一日，一位昆虫学家置身于一颗相似行星上的丑恶植物之间，眼前没有一只昆虫。在一个喜气洋洋并且已经除下了帽盔的植物学家身边不倦地工作之时，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样（古怪地证明了一个古怪的事实，即只要有可能，我们童年的场景就会由一个有经济头脑的制片人用作我们成年梦境的一个现成背景），在我从清醒状态中偷运进一张折叠网的某个周期性梦魇里，它海边的山峰铺满了快乐的百里香和草木樨，但不可思议地缺少理应具有的全部蝴蝶。

我也很快发现了一个耽于他安静的追求的“lepidist ②”易于在其他中间激起奇怪的反应。多少次，当一次野餐已经安排停当，而我正自觉地试图瞒着人把我谦逊的工具放进沥青气味的游览车里（配备沥青是为了赶走马身上的苍蝇）或茶叶气味的可折篷旅行车里（四十年前石油精发出这种气味）时，我的某位表兄弟或姨妈就会说道：“你真的必须带上那张网吗？你就不能像个正常孩子那样快活地玩吗？你不认为你正在扫每个人的兴吗？”在巴伐利亚的巴德基辛根，一个路标 nach bodenlaube ③ 附近，我正想加入我父亲和尊敬的老慕容采夫（他在四年前，即 1906 年，曾是俄国第一届国会

① 即鳞翅目（Lepidoptera）。② 即鳞翅目学家（lepidopterist）。③ 德语“往博登湖”。

120

纳博科夫

的首脑）的一次远足，这时后者将他的大理石脑袋转向我，一个十一岁的易受伤害的男孩，以他著名的庄重说道：“跟我们来无论怎么样都行，只是别抓蝴蝶，孩子。它会败坏这次散步的节奏。”在克里米亚，一条黑海边的小径上，在开着蜡一样花朵的灌木丛中，在 1918 年 3 月，一位罗圈腿的布尔什维克哨兵试图拘捕我，因为我向英国军舰打信号（用我的网，他说）。在 1929 年夏天，每当我步行穿过东比利牛斯的一座村庄，并偶尔回顾一下时，我就会看见身后村民们凝固在我的经过将他们捕捉进的各种姿势里，仿佛我是所多玛而他们是罗得的妻子①一样。十年后，在滨海阿尔卑斯山脉，我有一次注意到青草在我身后蜿蜒地起伏不定，因为一个肥胖的乡村警察在跟着我

甸甸前进，看我是否在捉鸣禽。美国对我的网猎活动显示了甚至更多于其它国家的这种病态兴趣——也许是因为我到那里定居时已经四十出头，而人越老，他手中拿着一张蝴蝶网就越显得奇怪。严厉的农夫曾引我注意不可垂钓的告示；公路上经过我身边的汽车里发出嘲笑的野蛮嚎叫；睡意朦胧的狗，尽管对最坏的流浪汉毫不介意，却振作起来扑向我，咆哮不止；小孩子们曾指着我叫他们困惑的妈妈看；心胸开阔的度假者曾询问我是否在抓臭虫作鱼饵；而一天早晨在圣塔菲附近的一片荒原上，靠着开放的高大丝兰指路，一匹黑色的大母骡跟着我走了一英里以上。

① 《圣经》记载，所多玛是上帝决定毁掉的一座城市，罗得被普告在城毁之前离开，其妻因在逃离中掉头回顾，当即化成了一根盐柱。

说吧，记忆

121

甩掉了所有的追逐者，当我走上从我们在维拉的宅邸通向田野与森林的那条崎岖的红色道路，白昼的活力与光彩仿佛是我周围一种同情的颤抖。

非常清新，非常黝黑的 *arran browns*，它隔年出现一次（回忆顺便在这里同意），在纵树丛里轻飞，或是一面在路边的羊齿草上晒太阳，一面显露出它们的红色斑点或花格的流苏。蹦跳在青草之上：一只叫做 *her* 的纤巧的小卷蛾躲过了我的网。还有几只飞蛾在飞行——热爱太阳的漂亮家伙，像彩色的苍蝇在花朵与花朵间航行，或是寻找着躲藏的雌虫的雄失眠者，如那只疾飞过灌木丛的铁锈色橡树枯叶蛾。我留意到（我童年时最难解的迷团之一）被一张蜘蛛网捕获的一片柔软的淡绿色翅膀（到那时我已知道它是什么：一只大尺蠖蛾的一部分）。羊蛾木蠹的巨大幼虫，炫耀地分成了两半，头部扁平，一身肉色而又潮红发亮，一只陌生的小生命，用一句法国式譬喻就是“赤裸如一只蠕虫”，横越过我的小径，正狂乱地寻找一个地方作蛹（蜕变的可怕压力，公共场所里一次不雅的突发病的气氛）。在那棵桦树，园门边矮矮壮壮的那一棵的树皮上，前一年春天我发现了 *sievers' carmelite* 的一个黑色的变种（对于读者来说只是另一种灰色的飞蛾）。小桥下的水沟里，一只明黄色的 *silvius* 弄蝶与一只蜻蜓（对于我只是一只蓝色的蜻属昆虫）打得火热。从一朵花的顶端两只雄铜蝶升到了惊人的高处，一路奋力向上——接着，片刻之后，其

[22 纳博科夫

中之一向下闪电般地回到了池的蓓上。这些都是熟悉的昆虫，但每时每刻某样更好的东西都可能使我伫足，急吸一口气。我记得有一天，我小心翼翼拿着网向一只优雅地

停在一根嫩枝上的奇异灰蝶越靠越近。我能清楚地看见它巧克力褐色腹部上的白色 w 。它的翅膀合着，附翼则在以一种古怪的环形运动互相摩擦着——可能产生某种愉快的细微爆裂声，音调太高，人耳无法听见。我渴望那个特殊种类已经很久了，在足够接近时，我出击了。你听到过网球冠军们漏接了一个好球后的哀叹。你也许见过世界闻名的大师威廉·艾德蒙森在明斯克一家咖啡馆一次同时出战多人的表演中，因一次荒唐的失察而把他的车丢给了当地爱好者，最后获胜的小儿科医师夏赫时，他脸上的表情。但那一天没有人（除了我更年长的自我）能够见到我把一根嫩枝从别无它物的网中抖出来，注视着塔拉丹薄纱布上的一个洞眼。

在两条马车道（一条保养得很好，在我们的“旧”与“新”两座花园之间贯通南北，另一条泥泞不堪又遍布辙痕，通向巴托沃，如果你向西转的话）的交汇处附近，在一道斜坡两侧长满了白杨树的一个地点，我肯定会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里找到打着纯净的白色条纹的蓝黑色大峡蝶，它们滑翔与低徊在沃土之上，当它们停落并合起翅膀时，这土与它们腹部的色调很相配。那就是往日老鳞翅目专家所谓的杨树峡蝶的爱粪的雄虫，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属于它的布科维

说吧，记忆

123

纳亚种。作为一个九岁的男孩，我不知道那个种类，但却注意到了我们俄国北部的样本是多么不同于霍夫曼著作里描绘的中欧形式，就立刻写信给库茨涅佐夫，俄国，或许事实上也是世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鳞翅目学家之一，把我的新样本命名为“众。翻 it i : p 妒 uli rossica ”。漫长的一个月后他寄还了我对“rossica nabokov ”的描写和透明水彩图画，只在我去信的反面写了两个字：“bucovinensis hormuzaki ”。我多么憎恨 hormuzaki ！而当我在库茨涅佐夫一篇后期论文中发现他粗鲁地谈及“总是给杨树若虫的极小变种命名的小学生”时，我又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啊！然而 populi 的失败并未使我气馁，第二年我“发现”了一种“新的”飞蛾。那年夏天我总在没有月亮的夜里，在花园的一块空地上，在青草与它烦躁的萤火虫之上铺开一张床单，又在上面投下一盏乙炔灯的光（六年之后，它将照在塔玛拉身上），勤勉地搜集。飞进那座光彩夺目的斗技场，一飞蛾将从我四周稳固的黑暗里游荡而来，就是用那种方式，在那魔法的床单上，我抓到了一只美丽的金斑蛾（现名夜蛾），像我第一眼就看到的那样，它与它最近的亲族的差别在于它淡紫与栗红（而非金褐色）的前翼，和更狭窄的苞片斑点，而且在我的任何书籍里都没有认得出的图像。我把它的描述和图画寄给理查德·骚斯，想在《昆虫学家》上发表。他也不认识它，但却以最大的善意在英国博物馆藏品中查对它——并发现它早已由克里契马尔描述为 plusia excelsa 了。我收到了那可悲的消息，措辞极

富同情（气·····应该祝贺获得了·····十分稀有的伏尔加地区品种·····可钦佩的形象·····，'），带有极度的自制精神；但多年以后，凭着一次

124 纳博科夫

喜人的侥幸（我知道我不该向人指出这些好事），我把我的飞蛾的最初发现者本人的名字交给了一部小说里的一位盲人，从而对他作出了报复。

让我也召唤天蛾，我童年的喷汽机！色彩在六月的夜晚会经历一段漫长的死亡。开满紫丁香的树丛，我手持网具站立其前，它在暮色里展现出一丛丛毛绒绒的灰色——紫色的幽灵。一弯潮湿的新月悬于附近一片草地的雾霭之上。在以后的年月里，我曾在无数座花园里这样站立——在雅典、昂蒂布、亚特兰大——但我从来没有像在那些渐趋晦暗的紫丁香面前那样，怀着一种如此热切的欲望等待过。而突然间它会来临，那在花朵与花朵间穿行的低沉嗡鸣，那环绕着一只黄绿间绀红的天蛾的流线形身体的颤动的光晕，半空中它在花冠之上保持着平衡，已把长长的舌头插了进去。它漂亮的黑色幼虫（当它喷出印有眼斑的前半段时与一种小型的眼镜蛇相似）两个月后能够在阴湿的柳树丛中找到。就这样，每一个钟点和季节都自有其乐趣。最后，在寒冷的，甚至严霜的秋夜，人们可以在树干上涂抹糖浆、啤酒和甜酒的混合物来引诱飞蛾。透过狂风阵阵的黑暗，人们的灯盏能够照亮树皮上粘乎乎闪烁的沟渠，两三只大蛾子在上面吸着甜食，它们紧张的翅膀半露出蝴蝶的盛装，较低的飞蛾从地衣般灰色的前翼下展现着难以置信的红色绸缎。“*catocala adultera* ①！”我会向屋子亮着灯的窗口方向胜利地尖叫，跌跌撞撞奔回家给我父亲看我的捕获物。

① 伪勋授夜蛾。

说 d 巴，i 己忆。

1 23

将我们的宅邸与草场隔开的那座“英国式”庄园曾是一个广阔而精美的事物，有迷宫般的小径，屠格涅夫式的长凳，还有进口的橡树在土生上长的傲树与桦树之间。防止庄园退回到荒野状态的奋斗从我祖父起就一直在进行，但总是缺少彻底的成功。没有哪个花匠能够对付那些卷曲黑土的小丘，跟鼠排红的手在主道整洁的沙子上不断堆积着它们。杂草和真菌，以及山脊一样的树根在阳光斑驳的小径上横过又横过。熊已经在八十年代被消灭，但偶尔还有一只麋鹿来造访庭园。一块如画的巨石上，攀缘着一株小山藤和一株甚至更小的白杨，手拉着手，像两个笨拙、羞涩的孩子。其它的，更为神出鬼没的闯入者——迷路的野餐者或快活的村民——会在长凳和大门上涂写脏话，使我们苍老

的猎物看守人伊凡发病。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崩溃的过程仍在继续，因为今天，当我企图在记忆中沿着回旋的小路从一个特定的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时，我惊诧地注意到那里有许多遗忘或无知造成的空白，与旧时的地图制作者时常称作“沉睡之美”的无名空缺地带相似。越过庄园，是田野，在无数花朵——延命菊、兰铃花、山萝甸，还有别的一——的熠熠微光之上是蝴蝶翅膀持续的闪耀，如今疾驰掠过我身边，汇成一片缤纷的薄雾，如同那些永远无人探查的，可爱茂盛的草地，从一次洲际旅行的餐车里被瞥见。在这青草的奇境尽头，森林升起如一道高墙。我漫步于此，细察树干（一棵树被施了魔法的，缄默的部分），寻找某

126 纳博科夫

些在英格兰被称为凤蛾的小飞蛾——精巧的小生命，在白昼紧抓着那斑驳的表面，它们扁平的翅膀和裸露的腹部与之混成一体。那里，在那被阳光刺痛的翠绿之海底，我慢步环绕巨大的树干。似乎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对于我会更加甜蜜，胜过能够凭着一好次好运，给早经别人命名的凤蛾的漫长名单增加某些值得注意的新种类。而我杂色的想象，在表面上，近乎怪异地，向我的欲望卑躬屈节（但又自始至终，在布景后面幽灵般的密谋中，冷冷地计划着我命运中最遥远的事件），总是提供给我小号印刷字体的幻觉样本：“迄今已知的唯一样本... ..”“... .. *eupithecia petropolitana* 已知的唯一样本是一个俄国小学生获得的... ..”“... .. 由一位年轻的俄国收集家... ..”“... .. 由我自己在圣彼得堡州皇村区，在 1910 . . . 1911 ... 1912 . . . 1913 年... ..”继而，是三十年后，沃萨奇岭① 上那个有福的夜晚。

起初一 大概在我八九岁时——我的漫游很少远过维拉和巴托沃之间的田野和森林。之后，以六英里或更远的一个特别地点为目标，我会骑一辆自行车到那里去，我的网系在车架上；不过能够骑车经过的林间小路并不很多；当然，也可以骑马去那里，但是，由于我们凶猛的俄国蚊虻，无论时间长短都不能把马拴在树林里；我精神抖擞的红鬃马有一天几乎爬到了栓着它的那棵树上，企图躲避它们：有水纹绸眼睛和老虎身体的大家伙，和有一个更为刺人的吻部，但行动迟缓得多的小动物：当它们紧紧叮在我的坐骑的脖子上时，用① *wasatch range*，美国洛基山脉中南段一支脉。

说吧，记忆

127

戴手套的手一掌把这些肮脏的嗜饮者拍死两三个，给我带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移情的轻松之感（一位双翅目学者对此不会赞赏）。然而，我捕猎蝴蝶总是偏爱步行胜于任何其它的运动形式（自然了，除了一张飞机座位，舒适地翱翔过一座未经勘探的山岭的

植物丛与岩石，或恰好盘旋在一片雨林的鲜花顶篷上空）；因为在你步行时，尤其是在你了如指掌的一个地带，有一种巨大的乐趣就在于偏离既定路线，随处游览路边这片空地，那道山谷，土地与植物的这样那样的结合——仿佛是顺路般地去拜访一只熟识的蝴蝶，到他特别的栖息地，看他是否已经出现，而如果出现了，他又在干什么。一个七月的日子到来了一我猜想是在 1910 年前后——当时我感到了要探查奥列杰日河对岸那片开阔沼地的冲动。沿河走了三四英里之后，我发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天桥。从桥上走过，我能够看见我左边一座村庄的小屋，苹果树，躺在绿色河岸上的一排排茶色松木，和农家姑娘摊在草皮上的衣服形成的明亮斑块，她们在浅水里浑身赤裸，嬉闹又喊叫，对我不怎么留意，好像我是我眼前的回忆的无形的担负者。在河对岸，密密一群亮蓝色的小雄蝴蝶在被踩碎的沃土和牛粪上吸饮着，当我跋涉而过，它们一齐跃起，在空气中片片闪亮，我一走过去，它们就立刻落下。

在寻路穿过几丛松树和矮赤杨树之后我来到了沼泽。我的耳朵一听见我周围双翅目昆虫的嗡嗡声，头顶上一只鹈鸟的歌喉，我脚下的沼泽吞咽的声音，我就知道我将在这里发现十分特殊的极地蝴蝶，它们的图画，或者更好些，从未图示过的描述，我已向往了两个季节。一刹那我就置身于它们中

128 纳博科夫

间了。在小小的，生有幽蓝如梦的果实的沼地覆盆子树丛之上，在死水的褐色眼睛之上，在苔醉与泥沼之上，在芳香的沼地兰花（俄国诗人的，ochna . va fialka ①）的花蕊上，一只黝黑的，冠有一个挪威女神之名的纹峡蝶在轻盈的低飞中掠过。漂亮的 cordigera，一种宝石般的飞蛾，嗡嗡飞遍它所食用的泥地植物。我追逐玫瑰色边缘的黄蝶，灰色大理石花纹的萨提尔②。对盖满我前臂的蚊子毫不介意，我惊喜地轻叹一声：俯身嗅出某个银扣子似的鳞翅目生命，在我的网褶中悸动。透过沼泽的气味，我辨出了我手指上蝴蝶翅膀的细微沁香，随种类而各各不同的一种沁香——香草荚，或柠檬，或馨香，或是一种难以界定的甜蜜香味。仍旧乐此不疲的我决定继续向前。最后我看见我来到了沼泽的尽头。那边上升的地面是一片羽扇盖、缕斗菜、钓钟柳的乐园。美丽大百合在西黄松下盛开。远处，飞动的云影用五彩点染着林带坡的黯淡绿色，和朗斯峰③的灰色与白色。

我承认我不相信时间。我乐于在用过后叠起我的魔毯，把图案的一部分加于另一部分之上。让客人们磕磕绊绊吧。无时间性的最高乐趣——在一片随意挑选的风景里——是在我置身于罕见的蝴蝶和它们食用的植物中间之际。这是迷醉，而在迷醉背后是别的什么，难以解释。它们如向一片瞬息即逝的真空，我所爱的一切急驰而入：一种与太阳和石头浑然为一之

① 夜的紫罗兰

② satyrs , 神话中一种淫荡的山林之神。③ i 才 ongs peak ,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说吧，记忆

129

感。一种感恩的震颤，它也许与之有关 - 一感谢掌管人类命运的守护神，或迁就了一个幸运凡人的温柔幽灵。

130

第

、七章

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里，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所旅行代办处展出了一节三英尺长，褐如橡木的国际卧车模型。在细致逼真方面它完全胜过了我的发条火车的涂漆铁皮。可惜它是非卖品。人们可以看清它蓝色装演的内部，它的车室壁上浮雕的

说吧，记忆

131

皮革里子，它们擦得锃亮的格板、镶嵌的镜子、郁金香形状的阅读灯，和其它令人发疯的细节。宽大的窗子与较窄的窗子错落相间，单扇或是双扇，其中一些是毛玻璃的。有的隔间里还做了床铺。

当时伟大而富有魅力的北方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它优雅的深褐色变成了一种 nouveau — riche ① 蓝色时，就绝不是一回事了) 单由这样的国际车厢组成，每周只跑两次，连结着圣彼得堡和巴黎。我本会说：直达巴黎，倘若旅客们没有被迫在俄德边境(维尔日波洛沃—伊德库恩) 从一列火车转到另一列外表相似的火车的话，在那里宽大而慵懒的俄国六十英寸半轨幅被五十六英寸半的欧洲标准所取代，而煤炭也接替了桦木。

在我意识的遥远尽头，我想我能够揭开至少五次这样的巴黎之行，其最终目的地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1909 年，我现在单独挑出来的一年，我们一行包括十一个人和一条猎狗。戴着手套和一顶旅行帽，我父亲坐在他与我们的家庭教师合用的车室里读一本书。我弟弟和我被一间盥洗室与他们隔开。我母亲和她的女仆娜塔莎占据了我们隔壁的一间车室。接下来是我的两个小妹妹，她们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拉文顿小姐，和一个俄国保姆。我们一行人中落了单的那位，为我父亲照管衣服的男仆奥西普（十年以后，他将被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枪毙，因为他私自挪用了我们的自行车而不是把它移交给国家），则与一个陌生人作伴。

① 法语“新贵的” o

132

纳博科夫 _

从历史与艺术上讲，这一年始于《潘趣》上的一幅政治漫画：英格兰女神向意大利女神俯下身去，在后者的头上已经降落了一块墨西哥的砖头——很可能是任何地震曾给予灵感的最糟的一幅画。那年四月，皮里①已经到达了北极。五月，夏里亚宾②已在巴黎演唱。六月，在新的与更好的齐柏林③的谣传的困扰下，美国战争局已经提出了计划组建一支空军的报告。七月，布莱里奥④从加莱飞往多佛尔（外加他迷失方向时迂回的一小圈）。此刻已经是八月底了。俄国西北部的极树与沼泽飞掠而过，第二天就让位给了德国的松林和石楠。在一张折叠桌前，我母亲与我玩着一种叫做 d " rachki ' ⑤ 的牌戏。尽管还是大白天，我们的牌、一只玻璃杯，以及另一个平面上一只手提衣箱的锁反映在窗上。穿过树林和田野，在突如其来的峡谷里，在疾奔的村落之间，那两个虚幻的赌徒一直稳稳不动地玩着，下着稳稳不动地进出火星的赌注。那是个漫长的，十分漫长的游戏：在这冬日的灰色早晨，在我明亮的旅馆房间的镜子里，我看见那相同的，恰恰是同一些锁在闪烁，它们属于那只如今已经七十岁的箱子，一个高级的，

① robert edwin peary (1556 . 5 . 6 — 1920 . 2 . 20) ，美国北极探险家。

② fyodor (ivanovich) chaliapin (1573 . 2 . 13 ? 193a . 4 . 12) ，俄国男低音歌剧歌唱家。

③ 齐柏林公司制造的硬式飞艇。齐柏林 (ferdinand zeppelin , 1838 . 7 . 8 ? 1917 . 3 , 8) 为德国航空界先驱，第一位硬式飞艇的大规模制造者。④ louisbi 亡 riot (1572 . 7 . 1 ? 1938 . 5 . 2) ，法国飞行家，用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海上飞行。

⑤ 即“杜拉克”o

说0巴,i己书乙133沉重的猪皮泌 cessoire de voyage ①,在一个相似的花环下以厚厚的白银精致地交织着“h,n.”,是1897年为我母亲到佛罗伦萨的结婚旅行而买下的。1917年它把一小批珠宝从圣彼得堡运到克里米亚,随后又运到了伦敦。1930年左右,它把它昂贵的水晶与白银容器弃给了一位当铺老板,空留下了它盖子内侧设计精巧的皮把手。但那次丧失已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在它以后随我旅行的三十年里—从布拉格到巴黎,从圣纳泽尔到纽约,经过了四十六个州里的二百多个汽车旅馆房间和租赁住宅的镜子。我们的俄国遗产中最坚忍的幸存者被证明为一个旅行包,这一事实既是逻辑的,又是象征的。“nebude卜11,ived,ustal〔你玩够了吗,你累了吗〕?,我母亲会询问,然后会一面慢慢洗牌一面沉洒于思索之中。隔间门开着,我能看见走廊的窗子,电线—六根黑色电线—在那里奋力倾斜而上,向天空攀升,无视一个接一个电报线杆分配给它们的闪电火花;但正当这全部六根电线以可悲的高昂士气发动一次胜利突袭,几乎要升上窗顶的时候,就会有特别凶恶的一击将它们击坠,低落到它们原来的高度,而它们又将重新开始。

在这样的旅行里,当我们穿过某个德国大城市,火车把它的步伐改为一种高贵的漫步,几乎擦过楼面与店招的时候,我时常感到一种终点站无法提供的,双重的兴奋。我看见一座城市,它有玩具般的电车、菩提树和砖墙,它走进了车厢,与镜子亲切交往,并且填满了走廊那一侧的窗子。这种火车与城① 法语“旅行必需品”。

134

纳博科夫

市之间的非正式接触是激动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把自己放在某个路人的位置上,我想象他被感动了,像我会感动一样,看见一节节长长的,浪漫的,赤褐色的车厢,带着它们黑如蝙蝠翅膀的廊间帘幕,和它们在低沉的日色中闪着青铜亮光的金属文字,不慌不忙地在一座横跨一条司空见惯的大道的铁桥上通过,接着,刹那间所有的窗子一阵辉耀,绕过了最后一片街区。

那些视觉的混合存在着缺陷。开着宽大窗子的餐车,一幅质朴的矿泉水瓶、斜折的餐巾、仿造的巧克力棍(它的包纸—凯勒牌,科勒牌,诸如此类—包着的只是木头)的远景,起初会被感觉为一个凉爽的休憩所,在摇摇晃晃的蓝色走廊的一个接合处对面;但当一餐发展到了它致命的最后一道,而一个端着满满一盘的平衡演员会越来越可怕地退到我们的桌边,让另外一个平衡演员端着另外满满一盘经过时,我总会发觉车厢,连同东倒西歪的侍者一起,正被无情地捆绑在风景中,而风景本身则经受着一连串复杂的

运动，白昼的月亮顽固地与人们的盘子并排而行，遥远的草地逗人地铺开，附近的树木在看不见的秋千上向着铁轨飞掠而上，一条平行的铁路线突然间与我们的吻合而自尽，一道眨巴着眼的草堤升起，升起，升起，直到这混合速度的小目击者被迫吐出了他那一份。melett 。aux ' onfiture 己 e fraises ①。

然而，还是在晚上，那家 compagni 。介 te , ationaleje , ① 法语“草莓果酱蛋卷气

说吧，记忆

135

wagons — lils et des grands express euroj 醛 ensp 达到了它的名称那魔法的高度。从我在我弟弟铺位下面的床上（他睡着了吗？他根本在那儿吗？）, 在我们车厢的半明半暗之中，我观看事物，和事物的部分，和阴影，和阴影的片断小心翼翼地来回移动但什么地方也不到达。木制品轻轻地呜呜作响，僻啪作响。在通向厕所的门边，一个钩子上的一件黯淡的衣服，以及再往上，蓝色的双层壳的夜灯的流苏在有节奏地摇曳。很难将那些踌躇的通道，那被覆盖着的隐秘，与外面黑夜冒失的奔驰相联系，我知道它在驰过，拉出火星的条纹，难以辨认。我会将自己与火车司机认同，以这一简单的行为来使自己入睡。一种磕睡的平安之感侵入我的静脉，就在我将每件事安排停当之际— 无忧无虑的旅客在他们的房间里享受我正在交给他们的驰行，抽着烟，互相致以会心的微笑，点头，假寐；侍者和厨师和列车卫兵（我不得不把他们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在餐车里寻欢作乐；而我自己，被注视着，满身污秽，从火车司机台上眺望那渐渐变尖的车轨，眺望黑色远方的深红色或祖母绿的尽头。而接着，在我的睡梦里，我会看见某种截然不同的事物— 一个玻璃弹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下滚动或一个玩具火车头侧卧着，它的轮子仍在精神抖擞地运转。列车不时会有一次车速变化打断我的睡眠之流。缓慢的灯光正潜行而过；每一道在掠过时，都要细察同一条缝隙，然后是一轮明亮的罗盘把阴影测量。即刻，列车随着一声威斯汀① 法语“欧洲卧车与大型快车国际公司”。

1 36 纳博科夫

豪斯① 式的叹息停了下来。什么东西（我兄弟的望远镜，第二天才证实）从上面落下。奇怪地令人激动的是带着一部分床布，挪到床脚那里，以便小心翼翼地打开窗罩的锁，它只能向上滑开一半，好像是被上铺的边缘挡住了。

像环绕木星的月亮们一样，苍白的飞蛾回旋在一盏孤灯四周。一份被肢解的报纸在一张长凳上掀动。在火车上某处能够听见沉闷的声响，某个人舒适的咳嗽。车站月台在我面前的部分没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但我仍然无法与它分离，直到它自愿地出发为止。

第二天早晨，潮湿的田野上有畸形的柳树沿一条沟的半径排开，或有一排杨树在远方，地平线上一道奶白色的雾障横过，告诉我们火车正在滚过比利时。它在下午 4 点抵达巴黎，而即使这逗留仅仅是一夜，我也总有时间在第二天中午登上南方快车之前买点东西——比如，一座小小的铜质 tour eiffel 关凡 I ②，颇为粗糙地涂着银漆——它在开赴马德里的路上，在下午 10 点左右，让我们在比亚里茨的拉内格莱斯站下车，距西班牙边境几英里远。

比亚里茨在那些日子仍旧保持着它的特色。布满灰尘的

① 业家。②

georgow 。 ， tingbouse (1846 . 10 . 6 ? 1941 . 3 . 12) ， 美国发明家和工法语“埃菲尔铁塔”。

说：巴，气己书乙 137 黑每树丛和杂草丛生的 terrain ，沙：) en 击，①毗连着通向我们别墅的道路。那座卡尔顿大厦还在建造之中。还得过去大约三十六年，副官少将塞穆尔·马克科罗斯基将会占据 h6tel du palais ② 的皇家套房，它耸立在以前一座宫殿的地方，在六十年代，据说曾有人看见过那位敏捷得不可思议的通灵者，丹尼尔·霍姆在那里用他的赤脚（摹仿一只鬼魂的手）踢打欧仁妮皇后温柔的，虔诚的脸。在赌场附近的步道上，一个芳龄渐老的卖花姑娘，有炭画的眉毛和涂脂抹粉的微笑，机敏地让一束盛开的康乃馨溜进了一位被中途截住的步行者的纽扣眼里，他左聘上盛大的皱纹加重，在他斜眼俯视那支花被羞怯地插入之际。

色泽鲜艳的栋树枯叶蛾在矮灌木丛中追索，与我们的（无论如何，它不在栋树上繁殖）大不相类，这里 speckled woods 的出没之地不是树林，而是篱笆，它们有茶色的，而非苍白泛黄的斑点。cleopatra ，一副热带的相貌，柠檬与橘黄色的硫磺蝶，无精打采地在花园四处蹦跳，在 1907 年已经成了一种感兴，仍旧是网猎的一个乐趣。

沿着那道 plage ③ 后面的界线，各式各样的海滨椅子板凳支撑着在沙子前面玩耍的孩子的父母们。能够看见我跪着企图用一面放大镜点燃一个被发现的蜂房。男人们炫耀着白色的长裤，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它们好像在洗涤中滑稽地缩水了；

① 法语“待售的土地”。② 法语“王官酒店”- ③ 法语“海滨”。

138 纳博科夫

在那特殊的一季，女人们穿着有丝绸翻领的轻薄外衣，戴着顶大而边宽的帽子，密密刺绣的白色面纱，前面饰边的短衫，她们手腕上的饰边，她们阳伞上的饰边。微风在人嘴唇上抹盐。一只迷路的云状粉蝶猛冲过颤抖的 plage。

附加的运动与声音由小贩提供，他们。：} 卖`aca 人 uetes ①、加糖的紫罗兰、有一种天空般绿色的阿月浑子冰淇淋、小口香丸，和鼓鼓囊囊的大块干巴巴、沙子一般、形同薄饼的东西，都来自一口红色的桶。以一种并无日后的重叠使之黯淡的清晰，我看见那个鸡蛋饼小贩踩过粗粉般的深沙，拘楼的背上背着沉重的桶。有人喊他，他就一扭皮带把它从肩头放下，砰地砸在沙地上，状如比萨斜塔，用袖子擦脸，接着就操纵起一种在桶沿上有数字标示的箭头和刻度装置。箭头铿锵作响，噢噢旋转。只能期望幸运来固定价值一个苏的薄脆饼的大小。饼越大，我越是为他难过。

沐浴的过程发生在海滩的另一个部分。职业助浴者，穿黑色浴衣的魁梧的巴斯喀人，在那里帮助女士和孩子享受惊涛拍岸之乐。这样的一位 ba 心 neur ⑧ 会用他的背脊把 cli 胡 t ③ 放到滚滚而来的波浪上，抓住他的手，这时大片满是泡沫的绿色海水上升，旋转，狂暴地从身后落下，以一记有力的重击将人打翻。在这样跌倒一打的次数之后，那位加咕配 ur，闪烁如一只海豹，会带领他气喘吁吁、浑身颤抖、湿流流抽搭着

① 法语“花生”。

⑧ 法语“浴场救生员”。③ 法语“主顾”，“被保护人” o

. 说 n 巴，气已忆 1 39 鼻子的委托人上岸，上到平坦的前滩，那里有一位难忘的灰白鬓发的老妇人从吊在一根衣绳上的几件浴袍中迅速挑出一件。在一间小屋的安谧之中，一个人还会在另一个侍从的帮助下脱掉他湿透的，沾满沙子的沉重浴衣。它会扑通一声落到地板上，而仍然颤抖着的那个人会走出它，在它微蓝的杂乱条纹上践踏。小屋发出松树的气味。那位侍者，有一道荣光焕发的皱纹的驼子，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让人在里面浸泡他的脚。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并且就此在我记忆的玻璃细胞里保存下来了，“蝴蝶”在巴斯喀语中是 miseri 'ole 份 a — 或至少听来如此（我在词典里找到的七个词里最接近的是 micheletea ）。

在那道 plage 较为棕褐也较为潮湿的部分，在一次低潮为城堡产生了最好的淤泥的那一部分，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与一个叫做科莱特的法国小姑娘肩并肩挖掘着。到十一月她将满十岁，我在四月已经是十岁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边缘不整的紫色贻贝壳上，她曾用脚趾修长的脚那赤裸的足心踩过它。不，我不是英国人。她微绿的眼睛似乎也打

上了她五官秀气的脸上泛滥的斑点。她穿着如今会被称为运动衫的衣服，包括一件卷起袖子的蓝色紧身上衣和蓝色的手织短裤。我第一眼把她看成了一个小男孩，接着又迷惑于她瘦削手腕上的手镯和她的水手帽下摇晃不定的褐色瓶塞钻髻发。

140 纳博科夫

她说话像鸟鸣一样，一阵阵快速的叽叽喳喳，混杂着家庭女教师英语和巴黎法语。两年以前，在同一个 plage，我曾热烈地爱慕着基娜，一位塞维利亚自然疗法专家的可爱的、晒得黑黑的、坏脾气的小女儿——我记得（荒唐得很，因为那时她与我都只有八岁）就在她心脏下面杏黄色皮肤上有一个 grai, d' beau 护①，而在她家的寄宿公寓的大厅地板上有一大堆可怕的便壶，满着或是半满着，其中一个表面还有气泡，有一天清晨我访问了那儿，她在穿衣时给了我一只死去的天蛾，是猫发现的。但当我遇见了科莱特，我立刻就认识到这一次才是真的。科莱特对我来说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玩伴都陌生得多！不知怎的我得到了那样的感觉，即她不如我快乐，更缺少爱。她玲珑的，覆盖着软毛的前臂上，一处淤伤唤起了可怕的猜测。“他掐得像我妈一样疼，”她说，谈的是一只蟹。我施展了各种各样的计策把她从她父母那里救出来，我听说他们是“de, bourgeois、d。paris ②”，某人曾耸了耸肩告诉过我母亲。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解释那种轻蔑，因为我知道那些人从巴黎一路乘坐着他们蓝黄色的豪华轿车前来（那些日子里的一种时髦的探险）却乏味地用一列普通客车送来了科莱特和她的狗以及她的家庭教师。那条狗是一只雌的猎狐犬，脖子上挂着铃档，还有一个极善摇摆的臀部。出于纯粹的活力，她会从科莱特的玩具桶里舔食咸水。我记得那只桶上画着风帆、日落和灯塔，但我记不起那条狗的名字，这使我困扰

① 法语“美人痣”② 法语“巴黎的资产者”。

说 q 巴 . 1 己忆

不已。

我们在比亚里茨的两个月逗留期间，我对科莱特的热情完全压倒了我对（'I eopatra 的热情。因为我父母并不切望遇见她的父母，我见到她只能是在海滩七；但我总是想到她；要是我发现她哭过了，我就感到无助的痛苦汹涌，使我的两眼含泪。我无法消灭在她柔弱的颈项上留下叮痕的蚊子，但我能够，并且做到了，与 ~ 个对她无礼的红头发男孩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拳斗。她经常给我一把把温暖的硬糖。一天，当我们正在一起俯身于一条海盘车，而科莱特的小发髻轻触到我的耳朵时，她突然转向我并亲吻了我的脸颊。我的情感如此伟大，以至我能够想到要说的只是，“你这小猴子。”

我有一枚金币，我曾设想用它作为我们私奔的盘缠。我要把她带到哪里去？西班牙？美国？波城那边的山上？“扮一 ba , , l 沙一加 , , 己 an , l 。 montag , 己 ,
① “我曾听到卡门在歌剧中这样歌唱。一个陌生的夜晚，我静卧不眠，倾听大海周而复始的轰响，计划着我们的逃亡。大海似乎在黑暗里上升和摸索，接着重重地俯身扑倒。

对于我们实际的逃跑，我没有什么要报告的。我的记忆保存了这样的一瞬，是她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帐篷的背风一面顺从地穿上绳线底的帆布鞋，而我则把一张折叠网塞进一个褐色纸包。接着的一瞬是我们进入赌场附近一个漆黑：泌 ma ⑧（当然，它全然是无边无际的）的逃亡事业。我们坐在那里，越

① 法语“到那边，到那边，到那山中”。② 法语“电影院”。

142

纳博科夫

过那条狗手拉着手，它在科莱特的膝上不时地叮当轻响，放映的是圣塞巴斯蒂安—场猛冲猛打的，细雨蒙蒙的，但令人极为兴奋的斗牛。我最后的一瞬，是我自己由林德洛夫斯基领着散步。他的长腿以一种不祥的轻快摆动着，我也看得见他严厉凝固的胯部在紧绷的皮肤下工作。我戴眼镜的兄弟，九岁，正被他的另一只手拉着，快步向前走去，怀着敬畏的好奇盯着我，像一只小猫头鹰。

在离开比亚里茨前得到的纪念品中，我最偏爱的不是黑石头的小公牛，也不是堂皇的海贝，而是某件在今天几乎具有象征性的东西—一支海泡石笔套，它的装饰部分上有一个小水晶窥孔。把它举到离眼睛很近处，蒙上另一只眼睛，在摆脱了自己睫毛的微光之后，就能看见里面有一幅奇迹般的海湾与悬崖轮廓的摄影风景，悬崖尽头是一座灯塔。此刻一件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再现那支笔套和它小孔里的微型宇宙的过程刺激我的记忆作出最后的努力。我再一次尝试回忆科莱特的狗的名字—在胜利的狂喜中，沿着那些遥远的海岸，在往昔光润的黄鹗沙滩上，每一个脚印都缓缓地灌满了日落的海水，它来了，它来了，回响又震荡：弗洛斯，弗洛斯，弗洛斯！

我们到巴黎逗留一天的时候，科莱特已经回到那儿了，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还乡之行；在那里，在一片寒冷的蓝天下一座浅黄色的花园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靠着我们的教师之间的安排，我相信）。她带来了一个铁环，用一根短棒来滚动着它，她周围的一切都极为恰当而时髦，有一种秋天的，巴

说吧，记忆 143 黎风格的，te；，、—de —"lle —户 our —fl' " et 介，" 的样式。她从她的家庭女教师那里拿来一件告别礼物并让它溜进我弟弟的手里，一盒糖衣杏仁，我知道，是单给我的；而她立刻就走了，丁铃丁铃轻扣着闪亮的铁环，穿过光与影，一圈圈环绕着一眼被枯叶堵死的喷泉，我就站在它近旁。树叶在我的记忆里与她鞋子和手套的皮革混合在一起，我也记得，她的装束有某个细节（也许是她苏格兰式帽子上的一条丝带，或她长袜上的图案）在那时使我想起一个玻璃弹子里虹一般的螺旋。我似乎仍然抓着那束晕光，全然不知该把它安在什么地方，而她却驾着她的铁圈绕着我跑得更快了，最后融入了由低低的环状栅栏那交织的拱门投在碎石小路上的疏影。

① 法语“城里小姑娘的服饰”。

144

第

、八章

我打算展示几张幻灯片，但首先我要表明这一问题的地点与时间。我弟弟和我出生于帝俄首都圣彼得堡，他在 1900 年 3 月中旬，而我早十一个月。我们童年时雇的英国与法国女家庭教师后来受到说俄语的家庭教师的帮助，最终被他们所取

说吧，记忆

145

代，他们大多数是首都的大学毕业生。这个男家庭教师时代始于 1906 年左右并持续了几乎整整十年，从 1911 年起与我的中学岁月相重叠。轮流而至的每个家庭教师都与我们居住在一起——冬天在我们圣彼得堡的宅邸，其它时候或者在我们离城五十英里的乡村领地，或者在我们秋天时常访问的异国胜地。三年是我（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比我弟弟更能干）甩掉那些鲁莽的年轻人中任何一位的最长时间。

在选择我们的家庭教师方面，我父亲似乎找到了这样一个巧妙的主意，每次雇佣一个不同阶层或种族的代表，以便让我们感受刮过俄罗斯帝国的八面来风。我怀疑在他那方面这是否一个全然有意为之的计划，但回首往事我发现那模式出奇地清晰，而那些家庭教师的形象在我记忆的明亮圆盘中呈现，像那么多的幻灯投影。

在 1905 年曾教我们拼写俄语的可敬而难忘的村办小学校长每天只来几个钟头，因此不真正属于眼前的系列。然而，他有助于连结它的开始与结局，因为我对他的最后的记忆涉及 1915 年的复活节假期，那是我弟弟和我与我父亲和一位伏尔金——最后的，也是最坏的家庭教师——一起度过的，我们绕着我们的领地，在白雪覆盖的乡间滑雪，头上是一片热烈的，几乎是紫色的天空。我们的老朋友邀请我们到他在屋檐上结满冰柱的学校楼房里的寄宿舍，去吃一顿他所说的便饭；实际上那是菜肴丰盛而又计划颇佳的一餐。我仍然能够看见他容光焕发的脸和我父亲美美地堆起的快乐，用以欢迎一道我知道他碰巧厌恶的菜（苦奶油烤兔）。屋子过于暖和了。我解冻的滑雪靴并非人们设想的那样是不透水的。我的眼睛，仍在因

146 纳博科夫

眩目的雪而剧痛，一直试图破解近旁的墙上一幅所谓“凸印的”托尔斯泰像。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某一页上的老鼠尾巴，它完全是由印刷材料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托尔斯泰故事（“主与仆”）形成了作家络腮胡子的脸，我们的主人的相貌，纯属偶然地，与它有点相似。我们正在攻击那只不走运的兔子，这时房门猛地打开了，赫里斯多弗，一个戴着一条女用羊毛头巾，鼻子发青的仆人被靠墙引了进来，挂着一副蠢笑，一个巨大的饭篮子塞满了食物与酒，我刻板的祖母（她在巴托沃过冬）以为有必要把它交给我们，以防万一校长的伙食被证明不够的话。在我们的东道主有时间感到受了伤害之前，我父亲把那连碰都没碰的篮子退了回去，外加一纸简短的便条，它很可能使那好意的老太太感到迷惑，像他的大多数行为使她迷惑一样。穿戴着平滑的丝绸长衣和网线手套，她与其是一个活人，不如说是一段时期，在一张睡椅上度过了她生命的大部分，用一把象牙扇给自己扇风。一盒加“le”，山 gomm 产，或一杯杏仁色的牛奶总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还有一面手镜，因为她每隔一小时左右就要用一个巨大的排红色粉团重新给脸扑粉，而她额骨上那个小痣透过所有的粉呈现出来，像一粒小葡萄干。尽管她在日常生活中有倦怠的特点，她一向都是一位特别耐寒的女人，成年累月睡在靠近一扇敞开的窗子的地方。一天早上，在一夜的暴风雪后，她的女仆发现她躺在一层晶莹的雪下，这场雪扫过了她和她的床，却仍没有侵害她沉睡的健康和红润。如果她爱过谁的话，那只能是① 法语“胶姆糖球”。

说 d 巴，记忆 147 她最小的女儿，娜杰日达·冯里亚里亚尔斯基，为了她的缘故她在 1916 年突然卖掉了巴托沃，在帝国历史入夜的潮水中一桩对谁都无益的买卖。她向我们所有的亲戚抱怨那些黑暗势力，是它们引诱了她天才的儿子去蔑视沙皇行政部门里那种“光辉的”职业，而他的父辈们曾经追逐过它。她发现尤其难以理解的是，她知道我父亲完全赞赏巨大财富的一切乐趣，但他却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派而危害对它的享

受，并由此而帮助掀起了一场革命，从长远来看，像她正确地预见的一样，它将使他沦为一个贫民。

我们的拼写导师是个木匠的儿子。在继之而来的幻灯序列里，我的第一张灯片显示了一位年轻人，我们叫他奥多，一位希腊天主教执事的开明的儿子。1907 年那个凉爽的夏季，在与我弟弟和我进行的散步中，他披着一件拜伦式的黑色斗篷，上有银质的 s 形扣子。在巴托沃的深林里，在溪流一边，据说一个绞刑犯的幽灵出没的地方，奥多会进行一场可说是读神而愚蠢的表演，每次我们经过那里时我弟弟和我都吵着要看。低头扬起他的斗篷，以一种怪诞的，吸血鬼的样子，他会绕着一株阴森的杨树慢慢跳跃。一个湿润的早晨，在那场仪式中他掉下了他的烟盒，在帮着他寻找时，我发现 amur 天蛾的两个新出现的样本，在我们这一带十分罕见——可爱的，天鹅绒般的，泛紫的小生命——静静地交配着，用栗鼠毛的腿紧紧抓住树下的青草。同一年秋天，奥多陪我们到比亚里茨，

148 纳博科夫

几星期后又突然离开，在他的枕头上留下了我们给他的一件礼物，一把吉列安全刀片，和一纸用针别住的便条。对于一段回忆是我自己的还是别人转手给我的，我很少有不了解了的时候，但在这件事上我的确摇摆了，尤其因为很久以后，我的母亲以她怀旧的心情，时常饶有兴味地谈及她不知不觉中点燃的火焰。我似乎记得一扇门半开向一间会客室，在那里，在地板的中间，奥多，我们的奥多，跪伏于地，在我年轻、美丽、惊呆的母亲面前绞着双手。我似乎用我的心灵之眼看见裹在奥多起伏不定的肩头的浪漫斗篷的波动，这个事实暗示了我已经将属于早先的森林舞蹈的某些东西转移到了我们在比亚里茨的套房里那间模糊不清的屋子（在它的窗下，在广场被绳子栏开的那部分，西基斯蒙·勒徐瓦欧，一位当地的气球乘客，正在给一个牛奶冻色彩的巨大气球充气）。接着是一位乌克兰人，一个精力充沛的数学家，有着黑色的胡子和一种才智焕发的微笑。他与我们一起度过了 1907 — 1908 年冬天的一段时间。他也有他的造诣，其中一个钱币消失的戏法尤其吸引人。一枚硬币，放在一张纸上，盖上一个平底酒杯，即刻就不见了。拿一个普通的喝酒的杯子。在杯口上整齐地糊一张纸。纸上要画上直线（要不就是图案）——这会增强幻觉。在一张划了相似的线的纸上放一枚小硬币（二十戈比银币就行）。迅速地把平底酒杯滑过硬币，注意让两套直线或图案吻合。图案的巧合是自然的奇迹之一。自然的奇迹在那个早先的年纪正在开始给我带来深刻的印象。在他出门的一个星期天，这位可怜的魔术师倒在街上被警察推进一间关着一打醉鬼的寒冷囚室里。实际上，他是犯了心脏病，几年后他

说吧，记忆 149 因此而去世了。

下一幅画面看来仿佛是颠倒地映在幕上的。它展示了我们的第三位家庭教师在倒立。他是个大块头，是体格健美得令人生畏的列特，他用手走路，撑起巨大的重量，耍哑铃，并且能够在一瞬间让一间大屋子里充满相当于一支警卫部队的汗臭。当他相信为某件轻微的不端行为（我记得，比如，曾在他下楼时让一粒儿童弹子从上层楼落到他诱人的，貌似坚硬的头上）而惩罚我是合适的时候，他会采用那种奇怪的管教措施，建议与我戴上拳击手套进行一场小小的拳斗。然后他会以剧痛的精确击中我的脸。尽管比起 mademoiselle 会想到的那种把手练得抽筋的 pensum^①，诸如迫使我抄两百遍 *quit '滋, 'bien*，*。h 故 i。bz 'en*^② 这则隽语，我更喜欢这样，但是在他待了暴风骤雨的一个月之后离开时，我并不怀念这个好人。然后来了一位波兰人，他是个英俊的医学学生，有水汪汪的褐色眼睛和光滑的头发，看上去颇像法国演员马克斯·兰代，一位有名的电影丑角。马克斯从 1908 年待到 1910 年，并且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冬日赢得了我的敬佩，那天一场突发的骚乱打扰了我们惯常的清晨散步。挥舞着皮鞭，当时一脸暴怒与痴呆的哥萨克正在推动他们昂首阔步、打着响鼻的矮种马冲向激奋的人群。许多帽子和至少三只胶套鞋黑黑地躺在白雪上。有一个瞬间似乎一名哥萨克在向我们逼近，我看见马克斯从一个内袋里半抽出一支小型自动手枪，我立刻爱上了它

① 拉丁语“额外作业”。② 法语“爱之深，责之严”。

150

纳博科夫

— 但可惜骚乱退却了。有一两次他带我们去看他的兄弟，一位消瘦而显赫的罗马天主教牧师，当马克斯和他在用一连串世喳作响的波兰语讨论着政治或家庭问题时，他苍白的手无心地盘旋在我们小小的希腊天主教脑袋上。我浮想着一个夏日我父亲在乡间与马克斯比试枪法— 用手枪子弹在我们树林里一块禁止狩猎的牌子上凿出无数洞眼。这位愉快的马克斯，他是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因此当他抱怨偏头痛并懒散地拒绝了与我踢足球或到河里泡一泡的时候，我时常会大吃一惊。我现在知道那年夏天他正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她的地产位于十二英里之外。在白天空闲的时刻，他会偷偷到养狗场去给我们用链条锁着的狗喂食和哄骗它们。它们在晚上十一点被放开，在房宅周围游荡，而他不得不在夜里最寂静的时刻，在他溜出去走向灌木丛的时候面对它们，那里有一辆自行车，配有一切附件— 姆指按铃、气筒、褐色皮子的工具箱，甚至裤子夹— 已由一个同盟者，我父亲的波兰贴身男仆秘密地为他准备好了。坑坑洼洼的泥路和起伏的森林小径会把焦急的马克斯带到那遥远的幽会之所，那是个狩猎棚屋— 遵守优雅通奸的伟大传统。黎明的冷雾与四条健忘的大丹麦狗会看见他骑自行车返回，上午八点，新的一天就开始了。我不知道在那年（1909）秋天，马克斯离开他每夜的丰功伟绩的场景，

陪我们第二次旅行去比亚里茨，是否没有某种解脱之感。虔诚地，懊悔地，他请了几天假赴卢尔德，由那位漂亮而放荡的爱尔兰姑娘陪伴，她是我在 plage 最喜爱的玩伴科莱特的家庭教师。第二年马克斯离我们而去，为的是圣彼得堡一家医院 x 线科的一个职位。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说。巴，气已忆 151 间，在波兰变成了，我理解，著名医学人士之类的人。在天主教徒之后来的是新教徒——一位犹太血统的路德教徒。这里他只能以兰斯基的名字出现。我弟弟和我在 1911 年末与他一起去了德国，在我们下一年一月回来，并开始上圣彼得堡的小学之后，兰斯基留了大约三年来辅导我们做家庭作业。从 1905 年冬天开始就与我们在一起的 mademoiselle，就是在他的统治期间，最终放弃了她反对入侵的莫斯科人的奋斗并回到了洛桑。兰斯基出身贫寒，常爱回忆他从毕业于他在黑海边家乡的预科学校到考进圣彼得堡大学这段时期，曾用明亮的海景画装饰从卵石遍地的海滩上捡来的石头，并把它们作为镇纸出售来补贴自己。他有一张椭圆形的绯红的脸，一副无框夹鼻眼镜后面短促眨动、奇怪地赤裸的眼睛和一个刮剃得淡淡发青的脑袋。我们一下子发现了有关他的三件事：他是个出类拔萃的教师；他缺少一切幽默感；以及，与我们以往的教师相反，他是我们需要保护的一个人。只要我们的父母在身边他就感到的安全，也许会在他们缺席的任何时候被我们阿姨们的某次突击所粉碎。对于她们，我父亲针对集体迫害与其它的政府措施的尖锐写作只是一个任性的贵族的怪念头，而我时常在无意中听见她们恐怖地讨论到兰斯基的来历和我父亲“病态的实验”。这样的一次事件之后，对她们我会粗鲁得吓人，并在一间盥洗室的隔离中痛哭失声。我并非特别喜爱兰斯基，他身上总有某种令人恼怒的东西，他干巴巴的嗓音，他过分的清洁，他时常用一块特殊的布擦拭眼镜或用一件特殊的小器具修指甲的方式，他正确得迂腐的言辞，以及也许最主要的，他清晨的奇异习惯，要操着正步（仿佛是

152 纳博科夫

直接从床上下来的，但已经穿上了鞋子和裤子，背后挂着红色背带，而一件奇特的网状背心裹住了他肥胖多毛的躯干）走到最近的水龙头处并在那里把他的净洗礼限于将他排红色的脸、青紫的头盖和胖胖的脖子完全浸没，继而是某种有力的俄国式摸鼻，之后他又操起同一种毅然步伐行进，但此刻却滴滴嗒嗒，近乎盲目地回到他的卧室，他在那里一个秘密地点保存着三条不可侵犯的毛巾（偶尔他会如此 brezglit' v，这是俄语的不可转译的意思，以至他接触了支票或楼梯扶手之后也要洗手）。

他向我母亲抱怨说谢尔盖和我是小外国佬，怪人，纵垮子弟，，nobl，对于诸如冈察洛夫、格里高洛维奇、柯罗连科、斯坦尤科维奇、马明—西比尔雅克和其他令人昏沉的讨厌人物（可与美国的“地方性作家”相提并论），正如他所言，“病态地冷漠”，这

些人的作品，据他说，“令正常的儿童着迷”。隐隐使我气愤的是，他建议我父母让他们的两个儿子——那三个更小的孩子不受他的管辖——过一种形式上更加民主的生活，意思是，比如，在柏林从阿德隆旅馆搬到一条毫无生气的小巷里一所阴郁公寓中的一个大套房，用摇晃颠簸的 schneuzugs ② 的肮脏地板和烟卷的腐败雾障取代绒面地毯的国际快车。在外国城市里，也在圣彼得堡，他会在商店门口凝然伫足，惊奇于我们完全无动于衷的货物。他即将结婚，除了薪金以外一无所有，并且以最大的狡诈和谨慎计划着他

① 冒充高雅者：势利小人。② 德语“快车”。

说 u 巴，记忆 153 未来的家。不时有急促的冲动扰乱他的预算。有一天注意到一个污浊不堪的巫婆贪婪地看着一家女帽店里展示的一顶有鲜红色羽饰的帽子，他就把它买下送给她——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摆脱这女人。对于他自己的添置，他以极大的谨慎来瞄准。我弟弟和我耐心地倾听他详尽的白日梦，他分析了他在脑子里为他的妻子和他自己准备的那个舒适而节俭的套间的每一个角落。有时他的想象会天马行空。有一回它落在了亚历山大，圣彼得堡一家出售可说是令人痛苦的布尔乔亚小古董的商店里一盏昂贵的地窖灯上。不希望这家商店怀疑到他所渴望的是什么物品，兰斯基说只有我们发誓自制并且不用直接的凝视来吸引不必要的注意，他才带我们去看它。作好了所有的预防措施，他把我们带到一只可怕的青铜章鱼下面，而他唯一指明了这就是那向往已久的物件的，是一声微叹。他使用了同样的小心——踮着脚行走和低声说话，为了不惊醒命运的魔鬼（他似乎认为它对他有一种私冤）——把我们介绍给了他的未婚妻，一个娇小，优雅的年轻姑娘，她有受惊的羚羊般的双眼，和插在她的黑色面纱上的清新的紫罗兰的芳香。我们遇见她，我记得，是在一家杂货店里，靠近 potsdamerstrasse 和 privatstrasse ① 的拐角，后者是一条小巷，枯叶遍地，我们的公寓就在那里，他也迫使我们在我们的父母面前保守他的未婚妻在柏林这个秘密，而杂货店橱窗里一个机械模型正在做着刮胡子的动作，电车呼啸而过，雪也开始下了起来。

① 柏林街名。

154

纳博科夫

现在我们作好了准备来处理这一章的主题。在下一年冬天的某个时候，兰斯基想出了那个慢主意，即在隔周的星期天，在我们的圣彼得堡住宅里放映教学的幻灯投影。他计划借助它们，当着一群人，他天真地相信会包括入迷地分享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的男孩和女孩，图解（“丰富地”，他顺了一下薄薄的嘴唇说）指导性读物。除了增加我们知识的储备，他还认为这会有助于使我弟弟和我成为出色的小交际家。用我们作为一个核

心，他在这温怒的中心四周聚集了几层新兵——正好在身边的那些个表兄弟姐妹，我们在每年冬天多少有些沉闷的晚会上碰见的各种年轻人，我们的一些小学同学（他们安静得出奇——但是，唉，记录下了每一件琐事），和仆人们的孩子。在从我温柔而乐观的母亲那里得到了完全慷慨的一臂之力后，他租下了一套精美的仪器并雇佣了一个形容沮丧的大学生来操纵它：在我现在看来，热心的兰斯基像在其它事情上一样，是在试图帮助一位贫穷的同学。我决不会忘记那第一次阅读。兰斯基挑选了一首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它表现一个年轻僧侣的探险，从他在高加索的避难所出发到山岭中漫游，像莱蒙托夫通常所做的那样，这首诗把平凡的陈述与柔和悦耳的神奇 *fata morgana* ① 效果结合在一起。它的长度颇大，而它可说是单调的七百五十行被兰① 意大利语“唇景”，“幻觉

说吧，记忆 155 斯基慷慨地铺陈为仅仅四张幻灯片（第五张恰在放映前被我打破了）。

对火警危险的考虑引导人们挑选了一个废弃的保育室来放映，那儿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圆柱形的热水器，漆着一层铜褐色，和一个跋足的浴缸，它在这时被贞洁地铺上了被单。拉上的窗帘阻止人们看见下面的院子、一堆堆桦木，和包括马厩（它一部分已被改为两辆车的车库）的阴暗房群的黄色墙壁。尽管有一个古老的衣柜和一对箱子的排斥，这间压抑的后房，配有座落在一端的幻灯机、横排的椅子、跪垫，以及安排给二十名观众（包括兰斯基的新娘，和三四位女教师，不算我们自己的 *mademoiselle* 和格林吾德小姐）的长靠椅，看上去拥挤不堪，令人有窒息之感。我的左边，我最坐立不安的表姐表妹中的一位，一个捉摸不透的金发小姑娘，十一岁左右，有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的长发与绛红如贝壳的肤色，坐得与我如此之近，使我感到她屁股上瘦削的骨头每每在和我的靠拢，当她在座位上晃动，摸索她的小盒子，或用手背拂过她沁香的头发与后颈之间，或是互相扣击着双膝，在她黄色长衬衣的铁锈色丝绸下面，那色彩透过她上衣花边隐隐闪烁着。在我右边，则有我父亲的波兰贴身男仆的儿子，一个身穿水手衫的纹丝不动的男孩，他与查列维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靠着一种更加惊人的巧合，还身患同一种可悲的疾病——血友病——因此每年有几次一辆宫廷马车会把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带到我们的住宅，它在缓慢、倾斜的雪中等待又等待，倘若选择那些泛出灰色的雪片中最大的一片，并一直注视着它落下（经过一个人向外凝望的凸肚窗台），就能

156

纳博科夫

看清它相当粗劣的，不规则的形状，还有它飞翔中的摇荡，使人感到沉闷又晕眩，晕眩又沉闷。

灯光熄灭。兰斯基诵读起首的诗行：

时间——并非多年以前；地点——美丽的阿拉格瓦和库拉河在姐妹般的拥抱中流淌和汇合的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耸立着一座修道院。

修道院，与它的两条河一起，在一阵火红的恍惚之中，尽责地出现和滞留（要是能有一个滚筒把它擦掉了多好！）大约两百行，才被一位勉强够格的乔治时代少女所代替，她提着一个大水罐。当操作员抽出一张幻灯片，画面随着奇特的咔嗒一声从幕布上被突然拂去，放大率不仅影响了被展现的图画，也影响了它移走的速度，此外，就没有什么魔幻了。呈现给我们的是司空见惯的山峰而不是莱蒙托夫的浪漫山岭，后者

升起在黎明的荣光之中像烟雾缭绕的祭坛，

而当年轻的牧师在向一个同辈的隐者讲述他与一只豹的格斗哦！我恐惧地看见！

说吧，记忆

157

我自己就是一头豹，狂野而勇猛，他火焰的暴怒，他的咆哮就是我的

——一声温驯的猫叫在我身后响起；也许是年轻的日夫斯基发出的，我时常与他一起上舞蹈课，或者是阿列克·尼特，一两年后他将以促狭鬼现象闻名，或者是我的一个表兄弟。渐渐地，在兰斯基尖尖的嗓音延续又延续的时候，我意识到，除了几个例外——诸如，也许是，萨姆埃尔·索洛夫，我的一位敏感的小学同学——观众们都在秘密地嘲弄那放映，和以后我将不得不对付各种各样的侮辱性评论。我感到了对兰斯基的深深怜悯的战栗——对于他刮得光光的后脑勺下面柔和的皱褶，对于他的勇气，对于他的教鞭神经质的移动，当他把它过于凑近幕布时，色彩会以冰冷的，小猫爪一样的涂抹在上面滑动。将近结束时，程序的单调变得十分难以忍受；慌慌张张的操作者找不到第四张幻灯片，已经把它与放映过的混在一起了，而当兰斯基在黑暗里耐心等待时，有的观众开始举起他们的手把黑影投到受惊的白色幕上，立刻，一个爱讲下流话的敏捷的男孩（基本上那不会是我——我的杰克尔的海德^①呢？）设法映出了他的脚的剪影，这当然引发了某种狂乱的竞赛。当幻灯片终于被找到，并被打到了幕上，我回想起我童年的一次旅行，穿过漫长、黑暗的圣哥撒尔隧道，我们的火车在一场暴风雨中驰入，而我们出来时，风雨已经平

① 杰克尔 (jekyll) 和海德 (hyde) ，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

158

纳博科夫

息了，这时

蓝色，绿色和橙黄，不住地惊奇于它本身的可爱与幸运，

横穿一道岩崖一弯彩虹落下在那里抓到了一头稳步的羚羊。

我要补充说在这次以及以后，更加拥挤、更加可怕的星期天午后放映期间，我脑际时常萦绕着我听到过的某些家庭故事的回响。在八十年代早期，我的外祖父伊凡·卢卡维什尼科夫，没有给他的儿子们找到任何合他意的私人学校，就雇佣了一打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教授，又招集了二十个男孩，创立了一个他自己的学院，在圣彼得堡他的住宅（海军码头 10 号）的厅堂里进行了几个学期的自由教育。这个冒险行动并不成功。他的那些朋友，他想让他们的儿子与他自己的儿子配对，并不总是俯首贴耳，而所招来的男孩里面，许多证明了是令人失望的。我给他塑造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形象，为了他那个顽固目的而探查各所学校，他的悲哀而奇异的眼睛，从照片上看我是如此熟识，在最好的学生中间找出了相貌最好的男孩们。据说他实际上付钱给贫穷的父母以便给他的两个儿子搜集伙伴。尽管我们家庭教师天真的幻灯放映与卢卡维什尼科夫式的狂行关系甚少，我的思想中对这两个事业的联想也无法帮助我去容忍兰斯基把自己弄成一个傻瓜和讨厌鬼，因此我很高兴在又进行了三次放映（普希金的“青铜骑士”；“堂吉诃德”；和“非洲—神奇的土地”）之后，我母

说 0 巴，记忆 159 亲同意了我激动的哀求，整个事务被终止了。

如今我想起了它，它们看上去多么庸俗和浮华，那些肉冻一样的图画，投映在潮湿的亚麻幕布上（是期望潮湿把它们渲染得更华丽些），但是，另一方面，当那些真正的玻璃幻灯片仅仅放在食指与拇指之间被举到光下，它们显露了怎样的可爱啊——半透明的微图，口袋里的奇境，披着宁静明彻色彩的雅致小天地！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在一个显微镜的魔管那璀璨的底部重新发现了同样的精致又无声的美。在用于放映的幻灯玻璃片里，一片风景被缩小，而这激发了人的想象；在显微镜下，一只昆虫的器官被放大是为了冷静的研究。在世界多维的比例中，似乎有着一种精美的会合之处，在想象与知识之间，通过缩减巨大事物与扩大微小事物而达到的，本质上是艺术的一点。

鉴于兰斯基显得是多么多才多艺，他能够多么全面地讲解与我们的小学学习有关的一切，他在大学里不断的磨难就成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它们的原因，最终显露出来，是他对于他如此顽固地抓住不放的金融与政治问题完全缺乏才能。我记得在他不得不参加他最重要的终考之一时，他所处的极度紧张不安。我像他一样担心，就在那临近的考试之前，禁不住在那间屋子门口偷听，房间里我父亲受兰斯基的急切要求而给他进行了一次私下排演，以测试他对查尔斯·纪德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知识。翻阅着书页，我父亲会提问，比

160 纳博科夫

如：“价值的来由是什么？”或：“银行支票与纸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而兰斯基会焦急地清清他的嗓子——然后保持完全的沉默，仿佛他已经断了气。一会儿之后，他甚至也不再制造他那种短促的小声咳嗽了，而静默的间隔只是由我父亲的敲桌子点缀的，只除了一回，在一次急促而充满希望的抗辩努力中，那受苦的人突然喊道：“这个问题书里没有，先生！”——但它就在那里。最后我父亲叹息了，轻轻地但清晰可闻地合上教科书，评论道：“golubchik [我亲爱的小伙子]，你只有不及格——你简直什么也不知道。”“这个我不同意您，”兰斯基不无尊严地反驳道。僵硬地坐着仿佛被绑着，他乘坐我们的汽车驶往大学，在那里待到黄昏，又坐着一辆雪橇，蜷作一团，在一场暴风雪中回来，并在无声的绝望中走上了他的房间。将近他与我们相处的结尾时，他结了婚并去高加索度蜜月，到莱蒙托夫的山脉，然后回到我们这里再过一冬。他不在的时候，在1913年夏，一位瑞士家庭教师，诺耶尔先生前来接任。他是个体格健壮的人，有一口粗糙的胡子，他给我们读罗斯丹^①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把每一行都夸张地读得华丽之极，他的嗓音从笛子变到巴松管，根据他所摹仿的人物而定。打网球轮到他发球时，他会坚定地站在底线上，他的粗腿穿着皱褶的本色布裤子，叉得很开，并会突然在膝盖处弯曲一下，给网球以惊人但奇特地毫无效果的一击。当兰斯基在1914年春天永远离开我们时，我们雇了一位来自一个伏尔加省份的年轻人。他是个出身体面的富有魅力^① edmond rostand (1565 . 4 . 1 ? 191a . 12 . 2)，法国戏剧家。

说d巴，记忆161的小伙子，一位不错的网球手，一位杰出的骑手；能依靠这样的才赋使他大感轻松，因为在那段最后的时期，我弟弟和我都不太需要他的一位乐观的资助人曾向我父母保证那可怜的人能给予我们的教育帮助。就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期间，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狄更斯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导致了我的一次突袭打赌，给我赢来了他的指节铜套。在那以后他就小心不在我们面前谈及任何文学人物和主题了。他很贫穷，从他褪了色的大学校服上散发出一股奇特、含糊、幽微，并不全然令人不快的气味。他有美好的风度，可爱的脾气，一手难忘的书法，都是刺和须荏（它的相似之物我只在疯子的书信里见过，唉，自从纪元1958年起我有时就会收到它们），

和对于那些淫猥传闻的无止境的爱好（他以一种梦幻的，天鹅绒般的嗓音把它们秘密地喂给我，而不使用一个猥亵的词语），它们是关于他的伙伴和 poule^① 的，也有一些涉及我们的不同亲属，其中之一，一位时髦的太太，年龄几乎是他的两倍，他不久就娶了她只为了把她摆脱掉——在他此后供职于列宁的政府机关期间——他将她赶进了一个劳动营，她后来就死在了那里。我越是想到那个人，我就越是相信他完全不正常。我没有全然失掉兰斯基的行踪。凭着他继父的一笔贷款，在他尚与我们一起时，他就开始了某项异想天开的事务，包括尽可能买进和开发各种发明。说他把它们据为己有是既不温厚又不公正的；但他采纳它们谈论它们时常带有一种暗示了自然的父亲身份的热情与温柔——他的一种既无事实支持^① 法语“情妇”。

162

纳博科夫

也看不出什么欺诈的动情的态度。一天，他骄傲地邀请我们大家来用我们的车试验一种由他负责的新型走道，它由（就我尽力透过时间的幽暗辨认出的那种奇异微光而言）金属条的离奇编织构成。结果是车胎被割破。然而，他在另一件热门货的购买上获得了安慰；他所谓的“电飞机”的蓝图，它看似一架老布莱里奥，但有一——这儿我再次引用他的话——一个“流电”马达。它的飞翔只在他的梦境里——还有我的。在战时，他推行了一种奇妙的马食，形状如 golette^① 似的薄饼（他会自己啃一些又给朋友一点），但大多数马匹仍坚持吃它们的燕麦。他用许多其它的专利做交易，它们全都很疯狂，而他在通过继父的去世继承了一小笔遗产时，已经负债累累。这肯定在 1918 年初，我相信，因为他曾给我们写信（我们正在雅尔塔地区陷入困境）向我们提供钱和各种帮助。他果断地把遗产投入东克里米亚海滨的一个游乐园，费尽了心机来获得一个好乐队，建造了一个某种特殊木材铺成的溜冰场，还建起了由红绿球灯照亮的喷泉与瀑布。1919 年，布尔什维克前来并且关上了灯，兰斯基逃到法国；我最后一次听说到他是在二十年代，据说他那时在里维埃拉靠在海贝和石头上画画来谋取一条朝不保夕的生路。我不知道——也宁可不去想象——在纳粹入侵法国期间他会怎样。纵然他有一些古怪，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纯洁、非常正派的人，他的个人准则像他的语法一样严格，而他怡人的 ji 走 tant^② 我愉快地回忆：kolokololit 妙 shchik：

① 法语“荞麦粉或玉米粉薄饼”。② 听写。

说吧，记忆 163 户 ere 差 olotili vi 泥 ara 占差 avs 人 ih 勺 a viuhol 妙，“教堂的敲钟人屠杀四出的水鼠”。多年以后，在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碰巧向一个动物学家引用了这个绕口令，他当时问我俄语是否像普遍认为的那么难。几个月后我们

再次相遇时他说：“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那些莫斯科察鼠：为什么要把它们说成是遍地爬行出来？它们是刚冬眠过了或是隐藏着，还是怎样呢？”

在想到我轮流不断的家庭教师时，我关心他们引入我年轻生活的奇怪的不合谐，及不上关心那种生活本质上的稳固与完满。我愉快地目睹了记忆的无上成就，就是它在把往昔延缓与游荡的乐调汇入它的皱褶时，对内在和谐的巧妙利用。我乐于想象，在那些杂乱和音的完善与分解之中，某种东西在记忆里持久一如那张长桌，它时常在夏季的生日与命名日被搬到户外用于吃下午巧克力，在桦树、酸橙与枫树的小径出发的地方，在分开庄园与房宅的花园地产中平坦的沙子空地上。我看见桌布和坐下的人们的脸分享着光与影的生机，在一种运动，一种奇异的叶饰之下，它无疑已被热情洋溢的纪念与无尽的回归的同样本能所夸大，它使我永远从外面，从园子的深处——不是从宅子里——走向宴会桌，仿佛心灵为了回到那里而唯有如此，迈着一个因激动而脆弱的浪子的无声脚步。透过一个颤抖的菱镜，我辨出亲友与常客的形象，暗哑的嘴唇在被遗忘的谈话中静静浮动。我看见巧克力的蒸汽和一块块乌饭树果浆饼。我留意到一个旋转的翅果的小直升飞

164

纳博科夫

机轻轻落到桌布上，而横过桌子的，是一个年轻姑娘裸露的手臂懒懒地伸得尽量地远，它的绿松石静脉的下面朝向片片阳光，手掌摊开，懒懒地期待着某物——也许是胡桃夹子。在我当时的家庭教师坐着的椅子上，是一个变化多端的形象，一系列的淡入和淡出；我思想的振动与叶影的振动混合，把奥多变成马克斯把马克斯变成兰斯基又把兰斯基变成小学校长，而这颤抖的变形的整个队列又被重复下去。接着，突然间，正当颜色与轮廓最终落到他们各不相同的职责上——微笑的，琐屑的职责——某个按钮就被按下，而声音的激流又得到了恢复：一起说话的噪音，一个胡桃被敲开，一个被漫不经心地传递的胡桃夹子的咔嗒声，三十颗人的心脏用它们均匀的跳动淹没了我的；一千棵树的萧瑟与叹息，响亮的夏鸟地方性的协奏，以及，河对岸，在充满韵律的树林之后，沐浴的年轻村民们混乱而热情的喧嚣，像背景中一片狂热的掌声。

第九章

165

第九章

我面前有一本弄脏了的大剪贴簿，以黑布装订。它收有旧的文件，包括文凭、草稿、日记、身份证、铅笔写的便条，和一些印刷品，它们曾在布拉格处于我母亲细致的保存之下，直到到她在那里去世，但继而，在 1936 到 1961 年间，它们经历

166 纳博科夫

了各种变迁。凭着那些纸张与我自己的回忆，我写作了我父亲的简短传记如下。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法理学家、出版家与政治家，司法部长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纳博科夫与玛莉亚·冯·考尔夫女男爵的儿子，1870 年 6 月 20 日生于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1922 年 3 月 28 日在柏林被一名刺客的子弹杀害。直到十三岁，他一直在家由法国与英国女家庭教师和俄国与德国男家庭教师来教育；从后者中的一位那里他获得并传给了我 *passio et morbo aurelia* 、。①。在 1553 年秋季，他开始进入“高校预科”（对应于美国的“中学”与“初级大学”合在一起），地点是当时的加加林大街（大概在二十年代被目光短浅的苏维埃人改换了名字）。他想要超群出众的欲望是不可遏止的。在一个冬夜，拖欠了一次作业，而宁可得肺炎也不愿在黑板前受到嘲笑，他把自己暴露在极地的严霜下，怀着得到一场适时的疾病的希望，只穿着他的长睡衣坐在敞开的窗前（它朝向宫殿广场和它被月色擦亮的旗竿）；第二天他仍旧享有完全的健康，而颇为不值地，得病的却是那令人惧怕的教师。十六岁时，在 1887 年 5 月，他完成了大学预科课程，得到一枚金牌，并在圣彼得堡大学学习法律，1891 年 1 月毕业。他在德国继续他的学习（主要在哈雷）。三十年以后，他的一个曾与他一起在黑森林骑车旅行过一次的同学把那本《包法利夫人》送给了我孀居的母亲，我父亲当时就带着这本书，曾在它的衬页上写道“法国文学不可超越的珍珠”——一个仍①拉丁语“鳞翅目的感情和痛苦”。

说 d 巴，i 己忆 167 然成立的断言。

在 1897 年 11 月 14 日（在我们这个很看重纪年的家庭里，这个日子以后每年都小心翼翼地加以纪念），他娶了埃莱娜·伊凡诺夫娜·卢卡维什尼可夫，一个乡邻的二十一岁女儿，他与她生了六个孩子（第一个是个流产的男婴）。

1895 年他被任命为议院的初等议员。从 1896 到 1904 年他在圣彼得堡的帝国法理 (尸 ravovedeni 亡) 学院开刑法课。议会的议员在进行一次公开行动前必须请求“法院部长”的允许。这一允许，自然，我父亲在 pravo ① 杂志上发表他的著名文章《基什涅夫喋血记》时并没有请求，他在文章中谴责了警察在挑起 1903 年基什涅夫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帝国的判决下，他于 1905 年 1 月被免去了法院里的头衔，之后他断绝了与沙皇政府的一切关系并坚定地投入了反专制的政治活动，同时继续他的法理学工作。从 1905 年到 1915 年他是国际刑法协会俄国部的主席，在荷兰会议中，他在需要时把俄语和英语的演说口译成德语和法语，反之亦然，他以此自娱并震惊了四座。他雄辩地反对极刑。他在私下与公开的事物上都毫不偏离地遵循他的准则。在 1904 年一次官方宴会上他拒绝为沙皇的健康干杯。据说他曾冷静地在报纸上登广告出售他的议会制服。从 1906 到 1907 年他与 l . v . 海森和 a . l . 卡明加合编了俄国的少数自由派日报之一，rech (“言论”) 与法理学杂志尸 ravo 。在政治上他是个“kadet ”，也就是 kd ① 《法律》。

168 纳博科夫

(kon , titutsionno — den , okratichesk 叮 a 尸 art 妙 a ①)，后来被更加恰切地改名为人民自由党 (尸 art 勿 anarodnoysvobodi) 的一个成员。以他强烈的幽默感，看到苏联辞典学家在他们难得对他一写的评语中，对他的主张与成就作出的那些尽管可恶但却无济于事的大杂烩，他想必会忍俊不禁的。1906 年他被选进了第一届俄国国会 (尸 e 二 aya duma ②)，一个仁厚而英雄的机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 (但受苏联宣传所传染的外国出版家却经常把它与古老的，b ayar dum 。③ “们混为一谈！)。他在那里做了几次光辉的演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不到一年以后，当沙皇解散了杜马时，许多成员，包括我父亲 (他就像一张在芬兰火车站拍摄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把火车票塞在帽箍下)，一道去维堡补开了一个非法会议。1908 年 3 月，他开始了三个月的监禁期，这是对他和他的团体在维堡发布的革命宣言的多少有点姗姗来迟的惩罚。“今年夏天 v . 得到了 ' £ ge 汀 as ' [speckled woodsj 吗？”他在一张从监狱里传出的秘条中问道，它通过一名被收买的警卫，和一位忠实的朋友 (卡明加) 传到了我在维拉的母亲手上。“告诉他我在监狱天井里看见的只有硫黄蝶和菜粉蝶。”他释放后被禁止参加公民选举，但 (在沙皇治下多么普通的悖谬之一) 可以在尖锐的自由派 rech 上自由地做事，一个他每天投身达九个小时的工作。1913 年，他被政府课以一百卢布的象征性罚款 (大约是今

① 立宪民主党。② 第一杜马。③ 贵族杜马。

169

天同样数目的美元)，因他从基辅报道，在那里一场疾风暴雨的审讯之后，贝里斯被发现毫无为了“仪式的”目的杀死一个基督教男童的嫌疑：法律与公众舆论在旧俄偶尔仍能获胜；它们只剩下五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他被动员并被送往前线。最终他被安排在圣彼得堡的总参谋部。军纪阻止了他在 1917 年 3 月的自由派革命最初的骚动中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从一开始，历史似乎就急于剥夺他一个完全的机会，不让他在一个西方模式的俄罗斯共和国里展露他巨大的政治家天才。1917 年，在临时政府的开始阶段——就是在 kadet 们仍然参与其中的时期——他在部长理事会中据有负责的但并不引人瞩目的执行秘书职位。在 1917 — 18 年的冬季，他被选入了立宪议会，结果却是在它解散时被精神抖擞的布尔什维克水手关押起来。十月革命已开始了它的航程，它的警察已活跃万分，但在那些日子里秩序与反秩序的混乱有时也会站到我们一边：我父亲沿一条阴暗的走廊而行，看见尽头一扇敞开的门，出门进入一条旁街，并寻路到了克里米亚，背着他吩咐他的贴身仆人奥西普给他带到一个隐秘街角的背包和我们的好厨师尼古拉·安德烈维奇主动添上的一袋鱼子酱三明治。从 1918 年中期到 1919 年初，在布尔什维主义者两次占领之间的间隔中，在与邓尼金部队中好战分子的不断磨擦中，他是地方性政权之一——克里米亚政府的司法部长（“最少的司法”部长，他时常沮丧地说）。1919 年，他开始了自愿的流放，最初住在伦敦，然后又在柏林，他与海森合作，在那里编辑自由派的流亡者日报 *rul*，（“方向舵”）直到 1922 年被一名罪恶的暴徒刺杀，那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

170 纳博科夫

任命为俄国移民事物官员。

他著作宏丰，主要写的是政治和刑法学题材。他熟知妙 *fond* ① 几个世纪的散文与诗歌，背下了几百首诗（他最喜爱的俄国诗人是普希金、丘特切夫，和费特——他发表了一篇有关后者的很好的论文），是一位狄更斯权威，并且，除了福楼拜外，还高度赞赏司汤达、巴尔扎克和左拉，从我的观点看是三个可厌的庸人。他承认创作一篇故事或一首诗，一切故事或诗，对于他就像构筑一台电机一样是不可理解的奇迹。另一方面，他写作法理学与政治作品则毫无困难。他有一种准确的，虽然颇显单调的风格，它在今天，尽管充斥着古典教育的旧大陆式比喻和俄罗斯新闻夸张的陈腔滥调，却有着——至少对我疲惫的耳朵而言——它本身的一种吸引人的灰色庄严，奇特地与他彩色的，奇趣横生的，时常是诗意的，偶尔是粗俗的日常谈吐（仿佛属于某个更老更穷的亲戚）恰成对照。他的某些声明（始于“*grazoaiane !*”，意为“*git 卿 ens !*”②）与社论现存的草稿是以一种描纹簿式的斜体，美丽柔滑，规范得不可思议的书法写下的，几乎没有

修改，一种纯净，一种确实，一种心与物的共同作用，我发现十分有趣的是将它与我自己老鼠一般的字体和一团糟的手稿，与这些字行大屠杀式的重写和修正作一对比，我正是在此刻用两个小时写下它们来描绘他无瑕书法的两分钟疾行。他的草稿是对直接的思想的清晰抄录。就这样，他以罕有的轻快和迅速（别扭地坐

① 法语“彻底地”。② 法语“公民”。

说 d 巴，记忆 171 在一座悲哀宫殿的教室里一张儿童书桌前）写下米哈依大公退位（继沙皇放弃了他和他儿子的王位之后）的文章。毫不足怪他也是可敬的演说家，一个“英国风格”的冷静演讲者，避免了切肉的手势和煽动的虚浮吠叫，而在这里也一样，要是我面前没有一张打印的稿纸，我就是个可笑的用词不当者，什么也没有继承下来。

直到最近我才第一次读到他于 1904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重要著作 *sbornik stat* *po ugolevnomu pravu*（一部刑法论文集），此书十分罕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一册（以前是一位“米哈依·伊夫戈拉维奇·霍杜诺夫”的财产，衬页里有他紫色墨汁的印章），由一位善良的旅行者，安德鲁·菲尔德交给了我，他在 1961 年访问俄国时在一家旧书店里买下了它。那是一本共 316 页包括十九篇论文的书。在其中一篇“性犯罪”，写于 1902 年）里，我父亲讨论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颇具预言性地，（在伦敦）“小姑蚰 l, ge le 户 lus tendre ①（v nezhneyshem vozrast'），就是从八岁到十二岁，被献给好色之徒（slastolyubtsam）”的案例。在同一篇论文里他揭示了一条通向各种反常行为的十分自由与“现代”的途径，偶然中给“同性恋”发明了一个方便的俄语词：ravnopoliy。把他在各种期刊，如 *rech* 或 *provo* 上简直数以千计的文章——开列出来将是不可能的。在以后的一章里我说到他讲述战时一次前往英格兰的半官方访问的书，颇有历史趣味。他属于 1917—1919 这几年的一些回忆录发表在由海森书局出版① 法语“在最温柔的年纪”。

172 纳博科夫

于柏林的 ar 人 i、, , ·, , 55 秃卿 re、, oly, , tsii ④，上。1920 年 i 月 16 日，他在伦敦国王学院举行了一次讲座，论“苏维埃统治与俄国的未来”，一星期后发表在《新联邦》第十五期的增刊上（整洁地贴在我母亲的剪贴簿里）。在同一年春天我把它大部分背了下来，准备在剑桥一次联合辩论会上与布尔什维主义对阵；（获胜的）辩论者是一个来自《曼彻斯特卫士》的人；我忘了他的名字，但记得我在背完了我记下的东西之后就哑口无言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治演说。在我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流亡者杂志了，eat : 1 zhizn'（“戏剧与生活”）开始连载他的童年回忆（现在他与我有所重合——太简短了）。我发现文中精采地描写了第三预科学校里他迂腐的

拉丁文教师的可怕脾气，以及我父亲对歌剧的很早的，并且终其一生的感情：他肯定听过 1880 年到 1922 年几乎每一位第一流的歌唱家，而尽管没有能力演奏什么（除了十分威严地奏出“鲁斯兰”序曲最初的和音外），却记得他最喜爱的歌剧的每一个音符。顺着这颤抖的琴弦，一个错过了我的悦耳基因通过我父亲从十六世纪的风琴师沃尔夫冈·格劳恩那里滑到了我儿子身上。

我十一岁时我父亲断定我在家里已经得到，并且仍在得到的教育会因我进入特尼谢夫学校而获得有益的补充。这所在圣彼得堡最引人注目的学校之一，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机构，① 《俄国革命文献》。

说 q 巴，i 己忆

1 73

远比它所属的一般类型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形式要现代与自由得多。其学习课程由十六个“学期”组成（j 又个预科班），在美国大略与中学的最后六年加上大学的最初两年相等。1911 年 1 月我注册入学时，我发现自己是在第三“学期”，或根据美国体制是八年级的开始。

学校教学从九月十五日到五月二十五日，其中有几个间断：学期期间的两星期间隔一似乎是给那棵巨大的圣诞树腾出位置，它的星星触到了我们最漂亮的一间客厅的淡绿色天花板——和一星期的复活节假日，期间彩蛋活跃了早餐桌的气氛。因为霜雪从十月一直持续到五月，我对学校的记忆的中介无疑是直接与冬季有关的。

伊凡第一（有一天他死去了）或伊凡第二（他会看到我派他去执行浪漫差事的时候）在上午八点左右来叫醒我，外面的世界仍旧笼罩在严寒的褐色阴影中。卧室的电灯有一种阴沉、粗糙、黄疸病的色调，使我的两眼疼痛。把我鸣唱的耳朵靠在手心，把我的手肘支在枕头上，我会强迫自己准备十页未完成的作业。在我的床头桌上，在一盏有两个青铜狮头的矮壮的灯边，站着一座不寻常的小钟：一个直立的水晶盒子，在里面写有黑色数字的，象牙白的，纸一般的薄片从右轻弹到左，每片都停留一分钟，像老式电影银幕上的广告剧照一样。我给了自己十分钟来翻印脑中的文本（如今这会花去我两个钟头！），又用，比如说，十二分钟来洗澡，穿衣（在伊凡的帮助下），急奔下楼，吞下一杯温热的可可，在它的表面我从中心弹掉了一圈褐色起皱的皮肤。早晨乱七八糟，而诸如一位了不起的橡皮一样的法国人卢斯塔洛先生给我开的拳击与

1 74 会内博科夫

剑术课这样的事就不得不放弃了。

然而，他仍旧差不多天天都来，与我父亲斗拳或击剑。外衣刚穿上了一半，我就会冲过绿色的会客厅（一种冷杉、热蜡和红橘的气味在圣诞节过后还会在那里萦绕不去），奔向图书馆，那里传来了一种跺脚与刮削声的混合。在那里，我会发现我父亲，一位大块头的，精力充沛的人，穿着他的白色训练服而愈显高大，在刺击和闪避着，而他身手敏捷的教师则在钝头剑的铿锵之中加进一声声短促的喊叫（" battez ! ① " " romp ' z ! ② , , ）。

稍有些气喘，我父亲会从他流着汗的脸上摘下凸面的击剑面具来亲吻我早安。这个地方令人愉快地联结了博学与体育，书籍的皮革与拳击手套的皮革。肥胖的扶手椅沿着排满了书的墙壁站立着。一个在欧洲购得的精致的“拳击球”物件——四根钢柱支撑着上面挂有梨形拳击袋的板架——在空旷的屋子尽头闪烁。这个装置的目的，尤其与它的沙袋机关枪似的啦一嗒一嗒的声音有关，在 1917 年受到了质疑，而仆役长对它的解释勉强为几个从窗口进来的全副武装的苏维埃街头战士认可为正确。在苏维埃革命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圣彼得堡后，那个图书馆就分崩离析了，但它不寻常的零星残余却总在国外出现。大约十二年以后，在柏林，我从一家书店捡出了这样一个流浪者，戴着父亲的。x libri : ③ 。非常合适，它原来

① 法语“刺！”。② 法语“停下！”。③ 藏书标记。

说吧，记忆 175 是威尔斯的《世界间的战争》。而当又一个十年过去，有一天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里我发现，索引中编入我父亲名下的，是在那些幽灵书籍仍旧红润而光亮地站在他的书架上时，我父亲私印的一本整洁的目录。

他将重新戴上他的面具并继续他的跺脚和刺击，而我则从来路跑回去。门厅的大火炉里圆木发出细碎的声音，在这温暖之后，户外的空气给人的肺叶一记冰冷的震撼。我要确知我们的两辆汽车里是哪一辆，是本茨还是沃尔斯莱等候着送我上学。前者，一辆灰色的小轿车，由一位温和的，脸色苍白的司机沃尔科夫驾驶，是较老的一辆。它的轮廓与在它之前的那辆乏味的，没有车鼻也没有响声的电动四轮车相比肯定显得更为精神抖擞；但是，一旦那相对较长的黑色英国豪华轿车来与它分享车库，就轮到它获得了一种过时的、头重脚轻的外貌，有一个令人悲伤地畏缩的车盖。

乘上较新的汽车就是饶有兴味地开始了一天。皮洛戈夫，第二位司机，是一个十分矮壮的伙计，一身黄棕色的皮肤与他穿在灯芯绒衣服外面的皮衣的色度和他绑腿的橙褐色很是相配。但在行车中某个障碍迫使他采用刹车（他以一种富有弹性的特别方式突然

鼓起自己而做到这一点) 时 , 或者当我试图通过刺耳但并不十分有效的传声筒与他交谈而打扰了他时 , 透过玻璃隔墙看得见他粗壮的颈项会转成深红。他坦率表示更偏爱驾驶我们有三四个季节在乡下使用的吃苦耐劳的可

176

纳博科夫

折车篷奥派尔 , 并且以每小时六十英里来驾驶它 (要认识到这在 1912 年是怎样的猛冲猛撞 , 就得考虑到当今的速度膨胀) : 的确 , 夏日的自由的本质 — 没有学校 , 远离都市 — 在我的头脑中恰恰总是与摩托夸张的吼叫联系在一起 , 打开的消音器会在长长的公路上把它减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皮洛戈夫应征入伍后 , 他被黝黑的 , 眼里充满野性的契加诺夫 , 以前的一位赛车好手所取代 , 他在俄国和国外都参加过各种比赛 , 并在比利时一次严重的车祸中撞断了几根肋骨。后来 , 在 1917 年的某时 , 在我父亲从克伦斯基的内阁辞职后不久 , 契加诺夫决定 —— 尽管我父亲表示强烈的反对 —— 为了把强有力的沃尔斯莱汽车从充公的可能中拯救出来而将它拆开 , 把它的各部分分散到只有他一人知道的隐藏地点。更晚些 , 在一个可悲的秋天的阴郁中 , 由于布尔什维克占了上风 , 克伦斯基的一位支持者向我父亲要一辆结实的汽车 , 首相倘若被迫仓促离开的话也许用得着它 ; 但我们虚弱的本茨力不从心而沃尔斯莱则令人窘急地消失了 , 而如果说我还珍藏着对那个要求 (最近被我卓越的朋友所否认 , 但那当然是他的副官作出的) 的记忆 , 那只是出自一个作曲的观点 —— 是因为 1791 年瓦仁内斯插曲中克里斯蒂娜·冯·考尔夫方面那逗人的主题曲的回声。

尽管在圣彼得堡大雪比在 , 比方说 , 波士顿周围远为平常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城市里众多的雪橇中间往复通行的几辆汽车似乎从来不曾陷入现代汽车在新英格兰一个美好的白色圣诞节上陷入的那种可怕麻烦。许多陌生的力量已镶嵌入这个城市的建筑中。一个人被诱导去猜想雪的排列

说 0 巴 , 记忆 177 — 沿着人行边道的整洁的堆积 , 和步道八角形的木墩上光滑稳固的铺陈 — 是靠着街道的几何学与雪云的物理学之间的某种邪恶合作达到的。无论如何 , 驶到学校从来用不了一刻钟。我们的宅邸是摩斯卡雅街 47 号。然后是奥金斯基亲王府 (45 号) , 然后是意大利大使馆 (43 号) , 然后是德国大使馆 (41 号) , 然后是宽阔的马利亚广场 , 那以后房屋号码继续缩小。在广场北侧有一个小公园。在它的一棵菩提树上有一天人们发现了一只耳朵和一根手指 — 一个恐怖分子的残骸 , 他的手是他在广场对面的屋子里安装一个炸药包时滑脱的。同样的那些树 (一层珍珠母雾气中的一种银丝花边图案 , 背景里圣以撒的青铜圆顶破雾而出) 也曾目睹了爬进枝叶间徒劳

地企图躲过镇压第一次革命（1905 — 1906）的骑马宪兵队的孩子们被随意射落。很多这样的小故事都紧紧联系着圣彼得堡的广场和街道。

到了涅夫斯基大道，要沿着它走很长一段路，这期间的乐趣是毫不费力地追上某个披着斗篷的卫兵，他乘着一对黑色种马拉的雪橇，它们喷着气，在阻止硬雪块飞到乘客脸上的明亮的蓝色网罩下面奔驰。左边的一条街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卡拉伐娜雅（卡拉凡之街）——它把一个人带过一家难忘的玩具店。接着是锡尼塞力马戏团（以其角力赛闻名）。最后，在横穿一条冰封的运河之后，就歌到了莫霍伐雅街（莫塞斯之街）的特尼谢夫学校的门前。

1 78

纳博科夫

属于俄国伟大的无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是他的选择，我父亲认为让我加入一个以其民主原则，其在阶级、种族与信仰问题上的一视同仁及其迄今为止的教育方法而著名的学校是正确的。除此之外，特尼谢夫学校在时间或空间上与其它任何学校都毫无二致。像在所有的学校中一样，男孩子容忍一些教师而厌恶其他的，并且，像在所有学校中一样，有一种顽厉隽语和色情知识的不断的交流。我在运动方面很出色，原不会感到整个事情太阴郁，要是我的教师不那么热心地努力拯救我的灵魂的话。

他们责备我不顺从我的环境；责备我“炫耀”（主要是在我的俄语文章里撒英语和法语词的胡椒粉，它们对我来说是平淡无奇的）；责备我拒绝接触盥洗室里肮脏的湿毛巾；责备我打架时用我的指关节而不是俄国斗殴者采用的捆耳光似的拳背抡击。对运动知之甚少的校长，尽管极为赞赏它们的协作美德，对我在足球赛里总是守门“而不是与其他球员一起到处跑”感到怀疑。另一件激起怨恨的事是我乘一辆汽车来去学校而不像别的男孩，乖乖的小民主派那样乘街车或马车。随着他的脸在一种厌恶的禹扭中皱起，一位教师向我建议，我至少能够把汽车停在两三条街区之外，这样我的同学就用不着看见一个穿制服的司机摘下帽子的景象了。好像学校是在允许我捻住一条死老鼠的尾巴提着它到处走，条件是我不把它在人们的鼻子底下晃悠一样。

说 . d 巴 , i 己忆

1 79

然而，最糟的情况出自甚至那时我还是对任何种类的集体行动或联合格格不入这一事实。我激怒了教师中最温和最善意的人，因为我谢绝加入课外小组活动——严肃挑选

官员、阅读历史问题报告的讨论社，以及，在高年级，讨论当前政治事件的更加野心勃勃的集会。要我从属于这个或那个小组的压力从未突破过我的抗拒，但却引向了一种紧张状态，尽管使每个人都在反复谈论我父亲所树立的榜样，也几乎不曾使之稍有缓和。

其实，我父亲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但就像经常发生在著名父亲的孩子身上的那样，我观看他的行动是透过自己的一枚菱镜，它把我的教师望见的可说是质朴无华的光分割成了许多令人着魔的色彩。有鉴于他的各种趣味——犯罪学的、立法的、政治的、编辑的、慈善的——他不得不参加许多委员会议，而它们又经常在我们的宅邸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即将举行，这总能从我们巨大而回声荡漾的门厅远端一个奇怪的声响里推断出来。在那里，在大理石楼梯下的一个壁完里，当我从学校回来时，我们的，hveitsar（看门人）会忙着削铅笔。为那个目的他使用一架有一片呼呼旋转的轮子的老式机器。他一手飞快地转动着它的手柄，一手握住插入侧面一个洞口的一支铅笔。多年来他一直是——可以想见的“忠仆”的最平凡的典型，充满了古怪的聪明才智，他以一种急促的方式，用两根手指持胡子，先左边再右边，而一种细微的烤鱼气味总是飘悬在他周围：它发自他神秘的地下室寓所，在那里他有一个奇胖的妻子和双胞胎——一个与我同龄的小学生和一个常来常往的，易动感情的小黎明女神，有着斜视的蓝眼睛和铜

180 纳博科夫

色的短发；但那铅笔的杂务肯定使可怜的老尤斯丁十分难过——因为我可以欣然对他抱以同情，只用十分尖锐的铅笔写东西的我把 b3 的花束存放在我周围的小瓶子里，每天把这机械（夹在桌边上）的把手转动一百遍，它在它小小的抽屉里如此迅速地堆积起了那么多茶褐色的粗烟丝。后来披露他早就与沙皇的秘密警察接触了——当然与捷尔任斯基或雅哥达的人相比还是新手，但仍旧十分麻烦。例如，早在 1906 年，警察因为怀疑我父亲在维拉领导秘密会议，就曾雇用尤斯丁效力，他立刻就以某个我已记不得的托辞，但却带着窥探以后的任何进展这一深远目的，请求我父亲在那年夏天带他到乡下去做一个特别仆人（他在卢卡维什尼科夫家当过餐室侍者）；还是他，无所不在的尤斯丁，在 1917 — 1918 年的冬天英勇地带领获胜的苏维埃代表上到我父亲在二楼的书房，又从那里穿过一间音乐室和我母亲的闺房，到最南端我出生的那间屋子，到墙上的壁完，到五彩火炉的冠冕，它形成了对他曾给我捕到的凤蝶的一个合适的报偿。

在夜间八点左右，大厅将容纳一大堆厚大衣与套鞋。在图书馆隔壁，一间委员会议室里，在一张铺着厚毛呢的长桌前（那些被美丽地削尖的铅笔铺开在桌上），我父亲和他的同事将聚集起来讨论他们反对沙皇的某个阶段。在噪音的嘈杂之上，一座高大的时钟会在一个黑暗角落突然发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乐音：越过会议室是神秘的幽深之所——储藏室，一道盘旋的楼梯，一个勉强可算是餐具室的房间——我表兄尤里和我时常在去

得克萨斯的路上拔出手枪逗留于此，而一天夜里警察把一个肥胖而睡眼惺松的间谍也安置在那里，他被

i 兑 a 巴，i 己门艺

181

发现时正从我们的图书馆员柳德米拉·波里索夫娜·格林伯格面前艰苦地跪爬下来。但我怎么能与学校教师讨论这一切呢？

反动报刊从未停止过攻击我父亲的党，而我也早已习惯于一遍遍出现的或多或少是粗俗的漫画——我父亲和米留科夫把圣俄罗斯装在一个盘子里端给犹太世界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有一天，我相信是 1911 年冬，最强有力的一份右派报纸雇佣一名可疑的记者编造了一篇下流的文章，其中隐含着我不愿置之不理的嘲讽。由于这篇文章的实际作者有名的卑鄙使他“不配决斗”（neduelesposobniy，如俄国决斗规则中所说的那样），我父亲叫出了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的多少不那么声名狼藉的编辑。

一次俄国式决斗是比传统的巴黎品种严重得多的事件。那位编辑用了好几天来决定是否接受挑战。在这些日子的最后一天，一个星期一，我一如往常去上学。作为我不读报的后果，我对整个事件一无所知。这一天的某个时候我觉察到一份翻到某一页的杂志正被互相传阅并引起了窃笑。一次准确把握了时机的猛扑使我拥有了被查明为一份廉价周刊的最近一期，其中包括对我父亲挑战的一段耸人听闻的描述，以及对他让他的敌手选择武器这件事的愚蠢评论。狡诈的讽刺针对的是他回到他在自己的写作中所批判的封建习俗中去了。还有许多谈的是他仆人的数目和他衣服的数目。我发现他选中了他的内兄科罗麦耶采夫，日俄战争的一位英雄作他的助手。

182 纳博科夫

在对马海峡战役期间，我的这位当时据有上尉军衔的叔叔设法将他的驱逐舰排在着火的旗舰一边而救出了海军总司令。课后，我查到这份杂志属于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指控他背叛和嘲弄。在随之而来的搏斗中，他仰面撞到一张书桌上，他的脚卡在一个缝里摔断了脚蹠。他卧床达一个月，但勇敢地在他家人和我们的教师面前隐瞒了这一事件中我的那一份。看到他被抬下楼的痛苦在我主要的苦恼中消失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那天没有汽车来接我，而在乘一辆出租雪橇回家，那寒冷、沉闷、缓慢得难以置信的行驶中，我有足够时间来细想问题。现在我懂得了为什么昨天我母亲与我在一起的时间这么少，又总不下楼进晚餐。我也懂得了泰尔南特，一位甚至比卢斯塔洛更好的 m。2tred'。 ， es ① 近来在给我父亲进行什么特殊训练。他的对手将选择什么，我一直

在自问——刀还是子弹？或者选择已经作出了？小心翼翼地，我想起了我父亲在击剑中那敬爱的，熟悉的，生气勃勃的形象，并试图将那个形象，减去面罩和填塞物，转移到决斗场上，在某个仓库或骑马学校里。我想象他和他的对手，两人都敞着胸，穿着黑裤子，在狂暴地格斗，他们奋力相搏的动作以那种甚至最优雅的剑客在真正的遭遇战中也避免不了的笨拙为特征。这图景是如此令人厌恶，我如此鲜明地感到了一颗即将被刺穿的疯狂跳动的心脏的成熟与赤裸，以至我发现自己希望的是一件在瞬间显得更为抽象的武器。但不久我就陷入甚至更深的苦痛中了。

① 法语“军械导师”。

说吧，记忆 183 当雪橇沿着涅夫斯基大街爬行之际，那里朦胧的灯光在四合的嗅色中游动，我想到我父亲保存在他书桌右边上首一个抽屉里的沉重的黑色勃朗宁。我知道这把手枪以及他书房里别的，更容易见到的东西；在那些日子时髦的水晶。bjet . , d ' art ① 或有纹理的石头；闪烁的家庭照片；巨大的，被柔光照亮的佩鲁吉诺②；小小的，蜜一样明净的荷兰油；以及，就在书桌那边，巴克斯特③为我母亲画的玫瑰与雾气的蜡笔肖像画：艺术家用四分之三的视角描画她的脸，精彩地展示出它的精美特征——上面一片灰色头发（她在二十几岁时它就变灰了），前额的纯净曲线，鸽子兰的眼睛，颈项的优美轮廓。在我催促那年老的，破烂玩具似的驾驶者开快些时，他仅仅会斜到一边，他的手臂作出一种特别的半圆形动作，以便让他的马相信他将要抽出他一直插在他右脚毡靴里的短鞭；那将足以使那匹毛发零乱的小马作出一种加速的表演，像驾驭者所作的拔出他的 knutishk 。① 的表演一样含混。在我们裹着飞雪的驰行造成的近乎幻觉的状态中，我重演了一个俄国男孩如此熟知的所有著名决斗。我看见普希金，第一次射击就受了致命伤，冷酷地坐起来向丹蒂③发射他的手枪，我看见莱蒙托夫在面對马尔蒂诺夫⑥时微笑。我看见矮胖的索比诺

① 法语“艺术品”。

② perugino（约 1450 ? 1523 · 3），意大利画家。③ i 龙 on bakst（1855 . 2 . 8 ? 1924 . 12 . 28），俄国画家。④ 小鞭子。

⑤ george d ' anth 傀男爵，法国侨民，在决斗中杀死了普希金。⑥ martinov，军官，在决斗中杀死了莱蒙托夫。

184 纳博科夫

夫在兰斯基一边跌倒，他的武器脱手飞进了乐队。有点名气的俄国作家都不忘描写 un 。 rencontre ①，一次敌对的遭遇，当然总是古典的 duel 廿 vofon 形②式样

(不是电影或漫画中著名的背对背开步走向后转砰砰的表演)。在几个显赫家庭中，在多少是近期的几年里都曾有过决斗场上的可悲死亡。我梦幻的雪橇缓缓驶进摩斯卡雅街，决斗者们阴暗的侧影也互相缓缓走向对方，平端他们的手枪开火——在黎明的缝隙里，在乡间领地的潮湿空地，在阴冷的军训场，或在两排极树间的飘雪之中。

而在这一切之后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深渊，我绝望地试图从它的边缘绕过，否则我会泪下如雨，这就是我对我父亲的尊敬下面的温柔友情；我们完全的一致魅力；我们在伦敦报纸上关注的温布尔登球赛；我们解决的象棋难题；每当我提及当今某个小诗人时，从他的舌尖滚滚而下的普希金五音步诗。我们的关系特点是习惯性地交流手织的废话、可笑地断章取义的句子、对假想语调的自荐的摹仿以及作为快乐家庭的秘密规则的所有那些私下玩笑。与那一切并行不悖的，是他在行为问题上极其严格，而在对一个孩子或一名仆人发脾气时耽于尖锐的批评，但他天生的人情味太深了，使他不能够责备奥西普准备了错误的衬衫而造成了地地道道的失礼，而对一个男孩的傲气深为理解便平息了责备的严肃并导致了突然的宽宥。就这样，有一天在得知了我谨慎地用一把刀片割

① 法语“一次遭遇”。② 法语“自由决斗气

说吧，记忆 185 开腿部膝盖上方（我还有着那道刀疤）以便躲过课堂上一次我没有准备的背诵后，当他似乎无法作出任何愤怒的时候，我与其说高兴，不如说是困惑了；他继而承认他童年时一次同样的违犯行为，奖励了我对真相的不加隐瞒。

我记起那个夏季的午后（那时已经显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实际上只过去了四五年），他冲进我的屋子，抓过我的网，奔下走廊的台阶——一会儿之后就漫步而归，食指与拇指间是罕见的俄国杨树峡蝶雌虫，他在他书房的阳台上看见它在一片杨树叶上晒着太阳。我记得我们骑着自行车沿卢加公路的漫长行驶；以那种有效的途径——有力的小腿、灯笼裤、花呢上衣、格子帽——他将成功地骑上他鞍座高高的“杜克斯”，他的仆人会把它牵到门口，好像它是一匹马一样。四下察看着它的光泽，我父亲会戴上他的小山羊皮手套，并在奥西普焦急的目光下试验轮胎是否够硬了。然后他会抓紧车把，把他的左脚搁在车架后端伸出的一个金属橙上，用他的右脚在后轮的另一面踩下，在三四次这样的驱策之后（自行车此刻已启动），悠闲地把他的右腿转移到踏板的位置，向前移动左脚，并坐到车垫上。

最后我到家了，一进入前厅我就听见了响亮的，快乐的声音。靠着梦境安排的适时性，我的海军上将叔叔正在下楼。一位没有手臂的大理石希腊女人在楼上红地毯的平台上管辖着盛放来访者名片的孔雀石碗盏，我父母仍在那里向他说话，而当他走下台阶时，

他笑着仰望并用戴在他手上的手套拍打着栏杆。我立刻知道不会有决斗了，挑战遇上了一个道歉，一切都平安无事。我擦过我的叔叔走上平台。我看见我母亲日日

186 纳博科夫

如此的平静面容，但我无法看我的父亲。接着它发生了：我的心在我的体内涌动，就像布伊内号在她的舰长将她开到燃烧的苏沃若夫号旁边时激起的波涛一样，而我没有手绢，而十年将要过去，在 1922 年的某个夜晚之前，那一夜在柏林的一次公开讲演中，我父亲在演讲者（他的老友米留科夫）前面挡住了两名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子弹，而在勇猛地打倒了刺客中的一个时，被另一名致命地击中。但那未来的事件并没有在我们的圣彼得堡宅邸的明亮阶梯上投下阴影；那停留在我头上的凉爽的大手没有颤抖，一个困难的象棋布局的几条行棋路线也还不曾交织到棋盘上。

第十章

187

第十章

梅因·瑞德上尉（1818 — 1883）经翻译和简写的西部蛮荒小说，本世纪初在俄国儿童中极为流行，而他在美国的声名已经消失很久了。由于懂英语，我可以品味他未经删节的《无头骑士》原本。朋友俩交换了衣服、帽子、马鞍，于是那不该

188

纳博科夫

杀的就被错杀了——这就是它错综复杂的情节的主要漩涡。我拥有的版本（可能是一个英国版）收藏在我记忆的书库里，是一本红布装订的臃肿的书，有一幅水灰色的卷头插画，它的光泽在这本书还是崭新的时候被一叶薄纸的纱帘遮蔽着。我见的这叶纸已经离散——最初被不正确地折叠，然后又被撕下——但是卷头插画本身，无疑描绘了路易斯·波因德克斯特不幸的兄弟（也许还有一两只郊狼，除非我想到的是《致命射击》，梅因·瑞德的另一个故事），暴露在我想象的火光下已经如此之久，以至今天已经完全被漂白了（但是奇迹般地被真实的事物所代替，如我在1953年把这一章译成俄语时提到过的，也就是被你我在那年租用的一个大农场里望见的风景所代替：一片仙人掌与丝兰的荒原，那天早晨从那儿传来一只鹤鹑的悲鸣——甘贝尔氏鹑，我相信——使我沉浸于一种受之有愧的成就与褒奖的感觉。

现在我们要见一见我的表兄尤里，一个面黄肌瘦，有短发的圆脑袋和明亮的灰眼睛的男孩。双亲已离异的儿子，没有家庭教师照顾，一个没有乡村家园的城里孩子，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不同。他在华沙过冬，与他父亲叶甫根尼·劳希·冯·特劳奔伯格男爵，那儿的军队总督一起，消夏则在巴托沃或维拉，除非随他的母亲，我古怪的尼娜姨妈到国外，到乏味的中欧温泉浴场去，她在那里进行漫长孤独的散步，而把他留给送信的男孩和家庭女仆们照料。在乡下，尤里很晚起床，我在四五个小时的捕猎蝴蝶之后回来午餐前见不到他。从他最早的童年起，他就是无所畏惧的，但对“自然史”却是厌恶而又警惕，从没胆量触摸蠕动的东西，无法忍受一只小青

说“巴”，气已忆189 蛙像一个人一样被囚禁在拳头里东碰西撞的娱人轻搔，或者一只爬上人的赤裸皮肤的毛虫小心翼翼、凉爽悦人、起伏有致的抚摸。他收集涂彩的铅制小士兵——这些对我毫无意义，但他熟知它们的制服像我熟知各种蝴蝶一样。他不玩任何球类游戏，没有能力投准一块石头，不会游泳，但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不会，而有

一天，当我们试图渡过一家锯木厂附近的一条河，从水面上漂浮的一堆松木上走过时，他差一点就被淹死了，当时一根特别湿滑的树干在他脚下突然扑通一声滚动了起来。

我们初次相识是在 1904 年圣诞节前后（我五岁半，他七岁），在威斯巴登：我记得他从一家纪念品商店里出来奔向我，手持一个 brelogue ①，一支寸把长的银制小手枪，急着要给我看——突然间摊开手脚倒在了便道上，但当他爬起来时并没有哭，对一个流血的膝盖毫不在意，仍旧抓着他小巧的武器。在 1909 或 1910 年夏天，他热情地把我引进梅因·瑞德书籍的戏剧可能性中。他读了它们的俄文本（除了姓氏之外什么都比我更加俄国得多），而在寻找一个可以演出的情节时，总想将它们与费尼莫尔·库柏和他自己火热的发明联结在一起。我以较为超然的态度看我们的游戏，并试图忠实于原著。演出一般在巴托沃的花园里举行，那里的小路甚至比维拉的更加曲折和坑人。我们共同猎杀别人用的是弹簧枪，它以相当大的压力射出长如铅笔的小棍（从它们的铜质尖端我们果断地扭下了保护性的橡皮吸杯）。以后是各种型号的汽枪，它们发射蜡制小① 法语“小饰物，小物件”。

190

纳博科夫

球和小束的飞弹，会造成不致命但时常是剧痛的后果。1912 年，他带来的那把动人的镀有珍珠母色的左轮枪，被我的家庭教师兰斯基平静地拿走并锁了起来，但那是在我们把一个鞋盒盖子炸成了碎片（作为真正的事物，一个么点的前奏曲）之后，当时我们轮流在一段绅士风度的距离外举起这个盒盖，在一条谣传许多晦暗的岁月之前曾有过一次决斗的绿色大街上。下一年夏天他与他母亲一起远在瑞士——而在他死去（1919 年）后不久，在重访那年六月他们居住的一家旅馆，走进同一个房间时，她把手插进一个扶手椅的凹缝中搜寻一根落下的发针却掏出了一个小胸甲骑兵，已经没有了坐骑，但蹲踞的双腿仍旧夹住了一匹无形的战马。1914 年 1 月当他前来进行一个星期的访问（现在是十六岁半对我的十五岁，间隔开始显露出来了），我们在花园里单独见面时，他立即做出的第一件事，是从一个新奇的银烟盒里随随便便地拿出一支“唬拍嘴”香烟，他叫我观看铭刻在烟盒镀金的内侧的方程式 $3 \times 4 - 12$ ，这是纪念他终于同 g 伯爵夫人共度的二个夜晚的。现在他正与赫尔辛福斯一位老将军的年轻妻子和加特契纳一位上尉的女儿恋爱。我怀着一种绝望目睹了他的世故作风的每一次新的表露。“我在哪儿能打个多少是私人的电话呢？”他问道。于是我领他穿过五棵杨树和那口古旧的干井（就在几年前我们曾被三个吓坏了的花匠用绳子从那里拖出来）到仆役厢房的一条过道，那里鸽子的咕咕叫从一座诱人的窗台上传来，那里一道印满阳光的墙壁上挂着我们乡间宅

邸中最偏僻也最古老的电话，一架箱子似的庞大的古怪机械，要叮叮当当地摇动它的曲柄才能引出一

创艳 d 巴, i 己 1 艺 1 91 位嗓音轻微的接线员。尤里甚至比前些年那个野马骑手更加轻松和易于相处了。坐在一张靠墙的极木桌上,摇晃着长腿,他与仆人们聊天(一件我大概不会做,也不知道如何去做的事)一面前是一位留着鬓脚的年老侍者,我从未见他笑过,或是一个厨房里的轻浮女人,我只在那时才留意到她光光的颈项和大胆的眼睛。在尤里结束了他第三次长途通话(我怀着一种混和着慰藉与惊诧的心情注意到他的法语是多么吓人)之后,我们走到村里的杂货店,在别的情形下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去访问它,更不用说在那儿购买一磅黑白向日葵籽了。在我们散步的整个回程中,在傍晚准备着休憩的蝴蝶群中,我们大声咀嚼和吐壳,他向我展示怎样像输送带那样操作:在右侧的后齿间咬开种籽,用舌头舔出果仁,吐出两半的外壳,把果仁移到左边的臼齿,并在那里咀嚼,而一颗已同时在右边喷开了的种籽也正被依次处理。谈到右边,他承认他是个坚定的“保皇派”(有一种与其说政治的不如说是浪漫的性质)继而又痛责我所主张的(并且完全抽象的)“民主主义”。他背诵了他流畅的剪贴簿诗歌并骄傲地声言他曾受到迪拉诺夫—托姆斯基,一位时髦的诗人(他赞赏意大利隽语和片断的题目,诸如“失恋之歌”,“夜的尸灰瓮”等等)的褒奖,为了他动人的“长”诗“vnemlyn 耐 ze ya”(“我倾听缪斯”)和“lyubvikon 心 zlya”(“爱的挫败”),而我以我最好的(尚未派过用场的)发现来还击:“z 反 p 沉)ed'”(“圣诫勺和”,pos 泣 pivat”,(“嗤之以鼻”)。他对托尔斯泰排斥战争艺术怒不可遏,又对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王子敬佩有加——因为他刚刚发现了《战争与和平》,这本书我第一次阅读是十一岁(在柏林,

1 92 纳博科夫

在一张土耳其式沙发上,在我们阴郁的洛可可式 privatstresse 公寓里,公寓面对着一个有落叶松与地情的黑暗、潮湿的后花园,它们像一张旧明信片一样,永远保存在那本书里)。

我突然间看见自己穿着一所军官训练学校的制服:我们在 1916 年再次散步走向村里,并且(像毛里斯·杰拉尔德和注定要死的亨利·波因德克斯特一样)已经交换了衣服——尤里身着我的法兰绒裤子和条子领带,那年,在他逗留的短短一周里,我们设计了一个我们从未见人描述过的奇特娱乐。在一个茉莉花环绕的圆形小运动场中心有一架秋千,在我们花园尽头。我们把绳索调节到让绿色的秋千板仅仅在一个人的额头和鼻子上方几英寸处擦过,要是他仰卧在下面的沙子上的话。我们中的一个将站在板上开始这游戏,以越来越大的势头晃悠秋千;另一个则将躺下把后脑搁在一个做了标记的地方,从看上去一个极高的高度,打秋千者的踏板会从仰卧者的脸上疾速地呼啸而过。三年以

后，作为邓尼金部队里的一名骑兵军官，他在克里米亚北部与红军的战斗中被杀。我看见他死在雅尔塔，他整个前面的头盖骨被几颗子弹的冲力推后，在他超过了他的分遣队，鲁莽地独自进攻一片红军机枪网的行动中，它们就像一架秋千的铁板击中了他。

最近我重读了《无头骑士》（一个乏味的版本，没有插图）。它有它的要点。例如，在我主纪年（那位上尉会这么说）

说。巴，记忆 193 1850 年，得克萨斯州一家圆木为墙的旅馆里的那个酒吧间，和它穿着短袖衫的“沙龙职员”——一位自作自受的纹裤子弟，因为那衬衫是一件皱巴巴的“上好的亚麻加饰带”衬衫。彩色的玻璃酒瓶（在它们中间一座荷兰时钟“悦人地嘀嗒作响”）就像“他肩膀后面闪闪发亮的一道红晕”，像“环绕他沁香的头颅的一道光轮”。从杯子到杯子，冰块、酒和莫农加希拉河流过。一种察香、苦艾酒与柠檬的香味充满客厅。它的荧光灯的光耀在地板的沙子上显现出“痰液形成的”黯淡星标。在我主纪年的另一年——也就是 1941 年——我在达拉斯与沃思堡之间一个加油站的霓虹灯下抓到了一些很好的飞蛾。酒吧间里走进了那个恶人，那个“抽打奴隶的密西西比人”，义勇军的前任上尉，漂亮的，装模作样的，脸现不豫之色的卡西乌斯·卡尔豪恩。在祝酒“美国属于美国人，混乱属于一切外国闯入者——尤其是 d — d [一个在我第一次绊在上面时使我深感困惑的遁词：死的？可憎的？] 爱尔兰人！”之后，他故意与野马骑手毛里斯（鲜红的头巾，开叉的天鹅绒裤子，爱尔兰的热血），一位年轻的马匹商人碰杯，他其实是一位男爵，毛里斯·杰拉尔德爵士，像他受惊的新娘在书末将会发现的那样。像这样错误的震动，也许就是那位生在爱尔兰的作家在这个接纳了他的国家如此迅速衰落的原因之一。碰杯以后，毛里斯立刻以如下顺序作出了几个行动：他把他的杯子放到柜台上，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块丝绸手绢，从他刺绣的衬衣胸口擦去了“威士忌的污迹”，把手绢从右手换到左手，从柜台上拿起干了一半的杯子，把它剩下的内容泼到卡尔豪恩的脸上，平静地将杯子放回到柜台上。这一序列我

194 纳博科夫

仍旧牢记在心，我和我表兄曾如此频繁地表演过它。决斗在那里进行，随后，在腾空了的酒吧间里，两个人使用了科尔特的六发式手枪。尽管我对这场搏斗很有兴趣（... 双方都受了伤... 他们的血在铺了沙子的地上四处流淌... ），我还是禁不住在想象中离开沙龙，混到旅馆前肃然无声的人群里，来认出（在“沁香的黑暗”里）某些“职业可疑的”se ooritas ①。

怀着甚至更大的兴奋我读到路易斯·波因德克斯特，卡尔豪恩的漂亮表妹，一个糖蔗种植者，“他这一阶层最高贵和最高傲者”的女儿（尽管一个种糖蔗的老头怎么会高贵

与高傲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她在嫉妒的剧痛中(我在痛苦的晚会上,当马拉·日尔夫斯基,一个脸色苍白,黑发上扎着白色丝绸蝴蝶结的小女孩突然而难解地不理睬我时,我就会深深地感受到它)显现,站在她的 azotea ② 边缘,她白皙的手放在“仍旧沾着夜露”的扶手的笠石上,她的双乳在迅速抽搐的呼吸中起伏,她的双乳,让我再读一遍,起伏着,她的长柄眼镜指向... ..

那副长柄眼镜我后来发现在包法利夫人手中,以后,安娜·卡列宁拥有了它,然后它又转到了契诃夫的带宠狗的太太的财产里,又被她丢失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了。当路易斯举起它时,它朝向牧豆下面迸出火星的阴影,她所选中的骑手正在

① 西班牙语“女士气”② 西班牙语“屋顶平台”。

说 d 巴,记忆 195 那里与一个有钱的 haci 阴 dado ① 的女儿,多尼亚·伊西多拉·科瓦鲁比奥·德·洛斯·里阿诺斯进行一次天真的交谈(她“头发茂盛的脑袋可与一匹野马的尾巴相媲美”)。

“我有过机会,”毛里斯后来向路易斯喊道,像一个骑手对另一个喊叫一样,“对多尼亚·伊西多拉有用,有一次把她从几个粗鲁的印第安人手里救了出来。”“一次微不足道的效劳,你这么说的!”年轻的克瑞奥勒喊道。“一个要为我做那么多的男人——”“你会为他做什么?”毛里斯急切地问。“尸ardieu! ② 我将爱他!”“那么我会付出我的一半生命看你落到野猫和他的醉鬼同伴手里——用另一半把你从危险中救出来。”

在这里我们发现大胆的作者插进了一段奇怪的自白:“我一生中曾有过的最甜蜜的吻是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生命,在猎场 lf——在她的鞍上斜倚过来亲吻我,当时我正坐在我的鞍上。”

这一个“坐”,我们要承认,给那个上尉如此平静地“有过”的亲吻提供了持续时间和身体,但我不禁感到,即使在十一岁年纪,马上的做爱并非没有它特殊的局限。此外,尤里和我都知道有一个男孩曾尝试过它,但那位姑娘的马把他的马推进了一条沟里。在矮橡林里的冒险使我们精疲力尽,我们躺在草地上谈论女人。我们的天真无知如今在我看来几乎是难以置信的,鉴于形形色色的“性爱自白”(可以在哈夫洛克

西班牙语“牧场主”。法语“当然”。

① ②

· 艾里斯或别处找到)，其中包括像疯子一样交配的小娃娃。性的贫民窟我们仍然一无所知。倘使我们曾碰巧听说过两个正常的小伙子面对面痴呆地手淫（就像现代美国小说里如此同情地描写的那样，包括了所有的气味），仅仅这样一种行为的观念对我们来说就会像和一个缺肢畸胎同眠一样滑稽和不可能。我们的理想是圭尼维尔女王，伊西多拉，一位不那么无情的 beu。dame ①，另一个人的妻子，骄傲而驯良，时髦而忠实，有窈窕的脚踪和窄小的双手。我们和别的小男孩时常在舞蹈课或圣诞树晚会上遇见的袜子整洁、脚穿低跟舞鞋的小姑娘们把圣诞树所有的魔力、所有的甜蜜和星星保存在她们火焰闪烁的虹膜里，她们戏弄我们，她们转头回盼，她们愉快地加入我们隐约中节日般的梦境，但是她们，那些小仙女，属于和我们实际上向往的青春美人和大帽子荡妇不同的另一类生物。在逼我用血签署了一个保守秘密的哲言之后，尤里向我讲述了华沙的一位有夫之妇，他在十二岁时与她秘密相爱，而几年之后他就与她做爱了。相比之下，我恐怕，向他讲述我海边的玩伴听来会是乏味的，但我记不起发明了什么替代物来与他的浪漫史相匹敌。然而，大约在那个时候，一场真正的浪漫冒险确实向我走来了。现在我要做的是某件十分困难的事，一种带有威尔士式摇摆的双重筋斗（老杂耍演员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要完全的安静，好吗。

① 法语“美人”。

说吧，记忆

197

在 1910 年 8 月，我弟弟和我与我们的父母和家庭教师（兰斯基）一起在巴德基辛根；那以后我父亲和母亲去慕尼黑和巴黎旅行，又返回到圣彼得堡，然后到柏林，我们男孩子和兰斯基一起正在那里渡过秋天和初冬，让人给我们补牙。一位美国牙医——洛威尔或洛文，我没有记清他的名字——在用支架毁坏我们的相貌之前扯下了我们的几颗牙齿，又用两股线把别的扎紧。甚至比用橡皮梨子在一个牙窝里注入灼热的疼痛这种行为更加凶恶的，是棉花垫——我无法忍受它们干燥的接触和吱吱的尖叫——手术者为了方便时常将它们刺入牙龈与舌头之间；而在无依无靠的双眼前面的窗玻璃上，会有一种透明，一片凄凉的海景或灰色的葡萄随着阴沉天空下遥远电车的回响而震颤。“in den zelten achtzehna ①，，- 这地址以抑扬格跳着舞回到我身边，接下来立刻就是把载往那里的奶色出租车低声细语的驰行。我们设想了赎回那些个可怕早晨的一切补偿。我弟弟热爱 unter den linden ② 附近的连拱廊那里的蜡像——弗雷德里克的掷弹兵，与一具木乃伊交谈的波拿巴，年轻的李斯特，他曾在睡梦中创作了一首狂想曲，以及马拉，他死于一只鞋；而对于我（我还不曾得知马拉是一个热情的鳞翅目学者），在那个连拱廊，格鲁① 柏林街名。

② 下锻树街。

198 纳博科夫

伯的著名的蝴蝶商店的角落里，一个极高的，狭小的楼梯的顶端有一个樟脑气味的乐园，我总是隔一天爬上去一次询问查普曼的新灰蝶或曼的最近被重新发现的白粉蝶是否终于替我买到了。我们试着在一个公共球场打网球；但一阵冬季的冷风总是驱赶着枯叶扫过，另外，兰斯基并不真会打球，尽管坚持连外衣也不脱就和我们一起进行一种不平衡的三人比赛。结果是，我们的下午大多在 kur 勿 rstendamm 的一个滑轮溜冰场上度过。我记得兰斯基不屈不挠地滑向他试图抓住的一个柱子，但却随着一阵可怕的铿锵之声跌倒在地；坚持了片刻之后，他会满足于坐在长毛绒栏杆一侧的圆木中的一根上消费一块块微咸的咖啡蛋糕，上面有着 to 成① 惯奶油，而我则一直自满地赶过正在勇敢地跌跌撞撞的可怜的谢尔盖，在一个人头脑中回荡又回荡的那些烦恼的小图景之一。一支军乐队（在那时，德国还是音乐之乡）由一个少见地抽搐不定的指挥所操纵，每十分钟左右就活跃一番，但几乎无法淹没无数轮子不尽的，连绵的轰响。

在俄国存在过，而且无疑仍然存在着，一类特别的学龄男孩，他们不一定在外表 t 健壮或在精神状态上出众，事实上在课堂上时常是无精打采，一副可说是骨瘦如柴的体格，甚至，也许还有点肺结核的样子，却在足球和象棋方面十分出类拔萃，并且学习任何种类的技巧型运动和游戏都极其的轻松和优雅（博尔雅·希克，科斯蒂亚·布凯托夫，著名的夏拉巴诺夫兄弟一如今他们在哪里，我的队友和对手？）。我是个① 法语“扭曲的”。

说吧，记忆 199 很好的滑冰手，而转换到滑轮对于我并不比用一把安全刮胡刀代替一把普通的更难。很快我就在溜冰场的木制地板上学会了两三种灵巧的步法，而我在舞厅里也不曾以更多的兴味或能力跳舞（我们，希克们和布凯托夫们，是糟糕的舞厅舞蹈者，通常是如此）。那几位教师穿着鲜红的制服，半是轻骑兵半是旅馆侍从。他们都说这种那种牌子的英语。在平常的游人中间，我很快注意到一群年轻的美国女士。起初，她们全都混和在一个明亮的异国之美的共同圆环里，区别的过程开始于我的一次独舞期间（和摔了我在溜冰场上曾经摔过的最惨的一跤前几秒钟），当时在我旋转而过之际某人正谈到我，而一个美妙的，鼻音很重的女声回答道，“对，他真熟练，不是吗？”

我仍旧能够看见她一身定做的海军蓝衣服的高高身影。她巨大的天鹅绒帽子由一根耀眼的针钉住。为了明显的缘故，我断定她的名字是路易斯。晚上，我会静卧不眠，想象各种各样浪漫的事情，想到她的杨柳细腰和白皙的颈项，并为一种我以前只联想到温怒的短裤的烦恼而担忧。一天下午，我看见她站在溜冰场的门廊里，而教师中最为精神

抖擻的那位，一个卡尔豪恩式的油头粉面的流氓，正搂着她的腰，带着一脸歪扭的嬉笑询问着她，而她在正望着别处，并在他的掌握下孩子般来回转动着腰肢，在随后的夜里他就被射杀，被套索套住，被活埋，被再次射杀，被掐死，被辛辣地侮辱，被冷酷地瞄准，被宽宥，被留下熬过羞耻的一生。

原则性很强而颇为单纯的兰斯基是第一次出国，他在使观光的快乐与他的教学职责保持和谐方面有些困难。我们对

200 纳博科夫

此加以利用并将他引向我们的父母不大会让我们去的地方。例如，他无法拒绝 wintergarten ①，于是，在一天夜里，我们就置身于那里，在一个音乐厅包厢里喝着冰巧克力。表演沿着通常的过程发展：一位穿晚礼服的魔术师；接着是一个胸脯上闪烁着金钢钻的女人，在绿光与红光交替的流淌中以颤音唱出一段协奏咏叹调；接着是一个以轮滑溜冰的小丑。在他与一场自行车表演（往后要说到它）之间，有一项节目叫做“加拉姑娘”，随着我在溜冰场上翻筋斗时体验到的那种幻灭与可耻的肉体震动，我认出了我的美国女士们手挽着手，在尖声尖气的，无耻的“姑娘”花环中，一个个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地波动着，从十个裙边花冠中射出十条相似的腿，有节奏地高高举起。我找到了我的路易斯的脸的所在——立刻知道全都过去了，我失去了她，我将永远不会原谅她唱得那么响，笑得那么红润，用那种与无论是“骄傲的克莱奥勒”还是“可疑的 se 彻 l. itas”的魅力都如此不同的荒谬方式来打扮自己。我当然无法全然停止想到她，但那震惊似乎在我体内展开了某个归纳的过程，因为我很快就注意到任何女性形式的出现都会伴随着我已经熟知的那种令人困惑的烦恼。我向我父母问起它（他们已来到柏林看我们过得如何），我父亲沙沙翻动着刚刚打开的德国报纸并以英语回答（其中有一段可能是引文的改写——他时常为了展开话题而采用的一种说话方式）：“那只是，我的小男孩，自然的又一种荒谬的联系，就① 德语“冬园” o

说 d 巴，记忆 201 像羞耻与脸红，或者悲哀与红眼睛一样。“丁”对卿 vl' entde mourir ①”，他突然加了一句，用的是另一种不知所措的声音，转向我的母亲。

" da : htot [大致就像‘天哪’]！”她痛苦地惊呼道，双手紧抓住裙摆。“pora domoy 仁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她作出了决定，好像托尔斯泰的逝世是启示录中灾难的预兆一样。

现在开始那场自行车表演——或至少是我对它的改写。随后的那个夏天，尤里没有到维拉访问我们，我只能独自对付我浪漫的焦虑。在下雨的日子，蜷缩在一个很少使用

的书架脚下，在一道尽其所能挫败我的短暂探究的光下，我时常在布鲁克豪斯《百科全书》的俄语八十二卷版本里查阅晦涩的，晦涩地逗人并且耗人精力的术语，在书里为了节省地方，这个或那个词条的题目，在整篇详细讨论里，都会缩略为它的大写字头，因此以七一号铅字密集排印的字行，除了加重人们注意力的负担之外，还获得了一场化装舞会的浮华魅力，在其中一个远非过于熟悉的词的缩写与一个人渴望的眼睛玩着捉迷藏：“摩西企图取缔 p . 但失败了... .. 在现代，好客的奥地利 p . 在玛丽亚·特雷西亚治下获得繁荣... .. 在德国许多地方来自 p . 的收益到了牧师手中... .. 在俄国，p . 从 1843 年起得到了官方的宽容... .. 在十或十二岁被她的主人，他的儿子① 法语“托尔斯泰去世 r ”。

202 纳博科夫

或一名仆人所诱奸，一个孤几几乎一成不变地以 p . 为结局。” - 一诸如此类，这一切都把神秘感，而非冷静的阐释，加于我初次沉浸于契诃夫或安德烈夫时遇到的娼妓之爱的典故。蝴蝶的捕猎和各种体育占据了阳光明煦的钟点，但多少运动都不能阻止每天傍晚驱使我进行发现的茫然旅行的不眠不倦。在大半个下午驱马奔驰之后，在多彩的黄昏骑自行车是一种奥妙的，几乎是抽象的感觉。我把我那辆恩菲尔德自行车的把手颠倒过来降低到鞍座以下的水平，把它转变为我的一种赛车样式的构想。我会沿花园的小径疾行，循着昨天那两道邓洛普轮胎有图案的辙印；灵巧地躲过树根的山脊；挑选一支落地的枝条，猛地用我敏感的前轮折断它；在两片扁平的树叶间扭摆，然后是在一块小石头和前一夜它被从中移出的小洞之间穿过；享受溪上一座桥短短的平坦；沿着网球场绳栏的边缘而行；擦开花园尽头一扇刷白的小门；然后，在一种自由的忧郁迷醉中，沿着长长的乡间道路被晒硬了的，带有悦人粘性的边缘飞驰。

那年夏天我总会驶经某间小木屋，在低低的落日下它映着金黄色，在它的门口，波兰卡，我们马车夫长扎哈的女儿，与我同龄的一个姑娘，会站在那里，倚靠着门框，她赤裸的手臂交叠在胸前，是俄国农家女特有的一种轻柔、舒适的样子。她会望着我驰来，现出一种动人的欢迎的容光，但当我骑得更近些时，它就会缩减到一半的笑容，然后是她紧闭的嘴角上一线微弱的光彩，而最后这也会荡然无存，这样当我到达她面前时她圆圆的漂亮脸蛋上就毫无表情了。然而，我刚一经过并在猛冲上山前转头看最后的一眼时，那笑局就会重现，

说吧，记忆 203 那谜一般的光彩又将展现在她亲爱的脸上。我从未对她讲过话，但在我中止在那个时辰骑车经过以后很久，在两三个夏天之中我们目光的联系又时不时地恢复了起来。她会从不知什么地方出现，总是稍稍站开一些，总是光着脚，在她的右腿肚上擦着她的左脚背，或用她的小指轻拢她淡褐色头发中散开的丝缕，并且总是斜倚

在什么东西上——在我的马加鞍时靠着坚固的门，当整队的乡下仆从正在九月一个霜冻的清晨目送我们回城过冬时，则靠着一棵树的树干。每一次，她的胸脯都显得更柔软，她的前臂也更有力量一点，有一两次，就在她漂泊到我所知的范围之外（十六岁时她嫁给了很远一座村子里的一个铁匠）以前不久，我认清了在她相隔很宽的红褐色眼睛里有一种温和的嘲弄的闪烁。说来奇怪，她仅仅凭着不让她的微笑消失，就成了第一个具有深刻的力量在我的沉睡中烧出个洞的人，无论我何时梦见她，都会摇撼着我进入潮湿的苏醒，尽管在真实生活中我害怕她结满土块脚和气味陈旧的衣服使我厌恶，甚至更胜于害怕以准地主式居高临下的陈腐来侮辱她。

她有两个特别鲜明的特征，我乐于将它们同时举到眼前来总结她时时萦绕的形象。第一个在我心中居住了很长时间，与我联想到门廊与日落的波兰卡完全分开，仿佛我瞥见了她可怜的美的仙女般的化身，较少受到打扰。六月里的一天，在她与我都是十三岁的那一年，在奥列杰日岸边，我正忙着收

204

纳博科夫

集一些所谓的绢蝶——确切而言，是 *parnasst' u, mnemosyne* — 古老血统的奇特蝴蝶，有瑟瑟作响的，闪亮的，半透明的翅膀和柔黄花一样刺绣的肚子。我的搜寻将我引向了一片茂密的奶白色总状花和黑色赤杨的灌木丛，就在寒冷的蓝色河水边上，而突然间那里爆发出一阵激水和喊叫的声音，在一丛芳香的灌木后面，我望见波兰卡和另外三四个光身子的孩子在几英尺之外的一个旧浴室的废墟那里洗澡。潮湿，喘息，她的狮子鼻的一个鼻孔在抽动，她青春焕发的身体的肋骨窠她苍白的，有天鹅般粉刺的皮肤下拱曲，她的小腿肚子上缀有斑斑黑泥，一把弯弯的梳子在她湿润乌黑的头发上燃烧，她正从莲花茎秆的呼啸声与哗啦声中爬开，一个剃光了头，肚子鼓鼓的姑娘和一个腰间系着一种当地用来抵抗邪恶之眼的线绳，兴奋得没羞没躁的小伙子正在把这些茎秆从水中拔出来并用它们驱促着她；有一两秒钟——在我怀着一种厌恶与欲望的阴郁迷茫悄悄爬开之前——我看见了一个陌生的波兰卡，在断裂了一半的码头的木板上颤抖地跪坐着，双手交叠掩住胸脯来抵挡东风，一面吐出舌尖讥笑着她的追逐者。

另一幅画面涉及 1916 年圣诞期间的一个星期天。在华沙铁路线的希维尔斯基小站铺满积雪的宁静月台上（它与我们的乡间地产最近），我观看着一片遥远的银白色树丛，它在入暮的天空下变成了铅，我等待它射出在一日滑雪之后带我回到圣彼得堡的那列火车黯淡的紫烟。那烟及时出现了，而在同一个瞬间，她和另一位姑娘走过了我身边，厚厚地裹着头巾，穿着巨大的毡靴和可怕的，没有形状的，长长的棉外衣，粗

说吧，i 己忆 205 糙的黑布上撕裂的口子露出了胎心，她经过时，波兰卡，她眼睛下面有一块乌青，肿胀的嘴唇（她丈夫在星期六揍她吗？）以焦虑而充满韵律的音调说道，不是特别向着哪个人：" a barchuk — to meny " ne priznal [看，少爷不认识我了] ——"那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她说话。

我童年时常骑车经过她的村舍的那些个夏夜，如今在用她的那副嗓音向我说话。在田野中一条道路上，在它与荒凉的公路交汇的地方，我会下车并把自行车斜靠着一根电报线杆。一次日落，其辉煌几乎是可怕的，会在一展无余的天空中徘徊。在它难以觉察地变化着的积聚之中，一个人能够挑选出苍弯的机体上色彩明亮的结构细部，或黑色云堤上闪耀的裂口，或看似荒岛屋景的平坦而飘渺的海滩。那时我不知道（现在我完全懂得了）对这样的事物该干些什么——怎样摆脱它们，怎样把它们改造成某种能够以印刷文字移交给读者的东西，让他来对付那幸福的震颤——而这种无能增添了我的压抑。一个庞大的阴影会渐渐地侵入田野，电报线杆在宁静中嗡嗡作响，夜间的食客爬上了它们的植物的茎秆。细咬，细咬，细咬——一只条纹漂亮的毛虫，斯普勒之中不曾描画过，它紧抓住一支风铃草的草茎，用它的聘部沿着最近的叶子边缘咬啮而下，从它上面啃下了一个悠闲的半圆，接着再次伸长脖子，又再次缓缓弯曲它，加深那齐整的凹面。自动地，我会把它，连同它的一点植物碎屑，扫进一个火柴盒带回家去，让它在

206 纳博科夫

来年产生一个光辉的奇迹，但我的思绪却在别处：基娜和科莱特，我海边的玩伴；路易斯，那个骑手；节日舞会上所有那些面色红润，束着低低的肩带，发如青丝的小姑娘；愁闷的 g . 伯爵夫人，我表兄的女人；在我的新梦的烦恼里微笑的波兰卡——所有人都将混和起来形成某个我不认识但注定很快就会认识的人。

我记起一次特别的日落。它把一点余烬借给了我的自行车铃。头顶上，在电报线黑色的音乐之上，一群有红鹤的维红边缘的长长的紫黑云团，一动不动地悬在一片扇形的布局中；整个景象如同色彩与形状构成的奇异的欢呼！然而，它在消逝，其它的一切也在变暗；但就在地平线上方，在一个明彻的，青绿色的空间，在一片黑色的层云下，目光发现了一片远景，只有傻瓜才会把它误认为这次或无论哪次的日落的多余部分。它占据了浩大天空中一个很小的区域，有一种奇特的洁净，像倒持望远镜见到的那样。它铺展在那里等待着，一族缩微的宁静云彩，一堆光芒四射的盘绕，因其油滑如脂与极其辽远而仿佛一种年代错误；辽远但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奇异地缩小但形状毫无瑕疵；我神奇的明天万事俱备，就要交到我的手上。

第十一章

2 () 7

第十一章

为了重建 1914 年的夏天，令人迷醉的作诗狂热最初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个季节，我真正需要的只是描画某一座亭阁。在那里那个瘦长的十五岁小伙子，当时的我，在一场暴风雨中寻找遮蔽，在那年六月暴风雨格外的频繁。我每年至少会梦见

208

纳博科夫

我的亭阁两次。通常，它出现在我的梦里，完全独立于它们的主题，当然了，主题可以是任何东西，从诱拐到动物崇拜。它垂挂在四周，可以这么说，有一位画家签名的严谨。我发现它紧贴着梦幻的画布一角，或被巧妙地嵌入了画面中某个装饰性的部分。然而，有的时候，它似乎悬在中等的距离，一种微不足道的巴洛克风格，却又与那些漂亮的树木，黑色的极树和明亮的杨树相和谐，它们的树液曾流遍它的横梁。彩色玻璃那酒红色、瓶绿色和暗蓝色的菱形给它的窗格带来一种教堂般的意味。如今它就像在我童年时一样，一个强健古老的木结构，在我们维拉庄园里较古老的，位于河边的那一部分的羊齿草峡谷上。就像那时一样，或许更完美一些。在真实的情形中有几块玻璃不见了，碎叶曾被风席卷进来。拱曲着横过那道山涧最深的部分的狭窄小桥，有那座亭子像一道凝结的虹在中途升起，这桥在下了一段雨后潮湿得好像涂上了某种黑色的，并且在一种意义上具有魔力的油膏。在词源学上，“亭阁”与“papt 'll' o ①”有很紧密的联系。里面没有家具一类的东西，除了一张以锈锁锁在墙上的折叠床在东窗下面，从它的两三个没有玻璃或玻璃黯淡的窗格，在臃肿的蓝色与沉醉的红色之间，可以望见河水。在我脚下的地板上一只死马蝇仰卧在一朵桦树柔黄花的褐色残骸一边。而门内侧的一块块碎石灰曾被各种闯入者用来匆匆记下这样的词句：“达莎、塔玛拉和列娜到此一游”或“打倒奥地利！”

暴风雨很快过去了。雨曾是一片狂倾而下的水，树木在其① 拉丁语“抛弃；亭阁，帐笼”。

说吧，记忆

209

间扭动和翻卷的雨，突然间减小到无声的黄金斜线，在一片菜地渐渐平息的骚动背景下断断续续变成了长短不齐的冲刷。耽于声色的蓝之峡谷在浩大的云间扩张——一堆接一堆的纯白与紫灰，lepota（意为“堂皇的美”的陈旧俄语），飞动的神话，树胶水彩与海鸟粪，在它们的弧线之中可以辨认出一个乳房的典故或一个诗人的死亡面具。

网球场成了一片大湖区。

远过庄园，在蒸汽腾腾的田野上方，一道彩虹滑入了视野；田野尽头是一片辽远的极树林刻痕累累的黑色疆界；彩虹的一部分在其上横过，而森林边缘的那一段闪烁着，最为神奇地透过了在它前面被描画的现出晕光的薄雾的淡绿与绛红：一种温柔和光荣，构成了太阳归来在亭阁地板上呈现的五色菱形反影的穷亲戚。

一会儿之后我的第一首诗开始了。是什么触发了它？我想我知道。没有风吹拂，一滴雨的纯粹重量，闪烁在一片心形树叶上寄生的奢华之中，导致了它的尖端垂下，而那看似一滴水银球的表演了一次突然的滑奏，滑下主脉，接着，脱下了它晶莹的重负之后，那释然的叶子又直立了起来。尖端，树叶，垂落，解脱——发生了这一切的瞬间在我看来并不那么像一段时间的碎片，而更像它的一道裂缝，一下遗漏的心跳，立刻就被韵律的喋喋快语所偿还：我有意说“喋喋快语”，因为当一阵风刮来时，树木会迅捷地开始一同垂落，粗糙地摹仿着那刚刚过去的倾泻，正如我已经在喃喃吟出的诗节相似于我在心脏与树叶一瞬间浑然为一时所体验到的震惊之感。

2 10

纳博科夫

在午后不久渴望的炎热中，长凳、桥与树干（事实上是一切，除了网球场）以难以置信的迅速在变干，而很快我最初的灵感也所剩无几了。尽管光明的裂缝已经合上，我仍旧固执地继续吟作着。我的媒介碰巧是俄语，但也不妨是乌克兰语，基础英语，或沃拉卜克语。我在那些日子里创作的那种诗歌几乎仅仅是我作出的一个活着的标记，经历着或已经经历，或希望经历某种强烈的人类情感的标记。那是个指明方向的现象但不是艺术的现象，因此可与路边一块岩石上油漆的条纹或指出一条山间小路的一堆柱状石垒相比。

然而，在一种意义上，一切诗歌都是有关位置的：试图表达一个人相对于被意识拥抱的宇宙的位置，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冲动。意识的手臂伸开并摸索，它们越长越好。触角，而非翅膀，是阿波罗的自然器官。维维安·布勒德马克^①，我的一位哲学界的朋友，时常说科学家看见空间中一点上发生的一切，而诗人感到的则是时间中的一点上发

生的一切。沉思着，他用他魔杖般的铅笔轻敲他的膝盖，而在同一个瞬间一辆汽车（纽约牌号）沿着道路开过，一个孩子磕撞着邻居家门口的一扇纱门，一个老人在土耳其斯坦一座雾气迷朦的果园里喊叫，一小粒余烬般灰的沙子在金星上被风卷动，格勒诺布

① vivian bloodmank，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变位字，即同样字母的不同组合。

说吧，记忆 211 尔一位雅克·希尔施博士戴上他的阅读眼镜，其它数以亿兆计的这类琐事在出现——一切都在形成事件的一个瞬间的透明网络，诗人（坐在一张草坪倚子_匕在纽约伊撒加）是它的核心。

那年夏天我要开发“宇宙同步”（再次引用我的那位哲学家）的任何财富实在是太早了。但我至少确实发现了，一个人希望成为一个诗人就必须具备同时思考几件事的能力。在伴随着我第一首诗的创作的懒散漫步中，我遇见了村办小学校长，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好人，他对我父亲极为爱戴（我再次欢迎这一形象），总是紧握着一束野花，总是在微笑，总是在出汗。在与他彬彬有礼地谈论我父亲突然进城的旅行时，我同时以同样的清晰，不仅记下了他枯萎着的花朵，他飘动的领带和他鼻孔肉乎乎的涡旋式螺纹上的黑头粉刺，而且还有从远处传来的一只布谷鸟沉闷的轻啼，停在路上的一辆西班牙女王的闪光，以及记忆中村办学校空气清新的教室里那些图画的印象（放大的农业害虫和留胡子的俄国作家），那里我曾访问过一两次；而——继续列一份表格，它几乎没有发挥出整个过程超凡脱俗的简洁——某一段毫不相干的回忆的悸动（一只丢失的步程计）从邻近的一个脑细胞里被释放出来，而我正在咀嚼的一根草柄的香味混和着布谷鸟的音符与纹峡蝶的摹仿，就在这时我甘美地，宁静地觉察到了我自己多方面的觉察。

他满面红光。他鞠躬（以一位俄国激进分子的过分方式），向后退了几步，转过身，喜气洋洋地继续走他的路去了，而我也捻起了我诗篇的线。在我忙于别的事情的短暂时间里，这

212 纳博科夫

些已经被我串在一起的词语出现了某种变化：它们不像它们在间断前那么光彩夺目了。某种怀疑出现在我脑际，就是我也许在经营废品。幸运的是，这凶险的感觉冷冷的闪耀并不持久。我试图回报的热情再次接管并将它的媒介交还给了一种幻觉的生命。我回顾的一排排词语又变得如此璀璨，它们小小的胸膛挺起，制服整洁，于是我把我从眼角瞥见的衰弱归入了纯粹的想象。

除了轻信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年轻的俄国作诗者还要对付一种特殊的障碍。与讽刺诗或叙事诗的丰富词汇相反，俄语挽诗患着一种词语贫血的糟糕病例。只有在十分内行的手中它才能超越它卑微的起源——苍白的十八世纪法国诗歌。的确，在我的日子里一个新流派正在撕碎旧的韵律，但保守的初学者在寻找一种中庸的工具时仍转向后者——也许是因为他不希望由于探索危险的形式而偏离简单情感的简单表达。然而，形式作出了报复。十九世纪初俄国诗人把柔顺的挽歌扭曲成为那种相当单调的格局导致了某些词语，或某些词语类型（诸如 fol amour ① 或 la, gureux。t 沪 vant ⑧ 的俄语对等物）被一遍又一遍地组合，而后来的抒情诗人在整整一个世纪都无法动摇这种情况。

① 法语“喊狂的爱气”② 法语“忧郁而妄想的气”

说吧，记忆 213 在四或六音步的抑扬格特有的一种特别顽固的布局中，一个冗长、蠕动的形容词会占据一行诗里最后三个音步中最初的四五个音节。四音步句的一个好例将是 ter — pi 阮 s — chts — len — n 刃 mu — kl （忍受不可胜数的折磨）。年轻的俄国诗人们易于以致命的轻松滑入这诱人的音节陷阱，我选择 beschlennle 作为它的例解，仅仅是因为它很好翻译，真正的宠物是 zadumchivl。（沉思的），utrachennle（迷失的），muchitel, n 诊。（痛苦的）等等，这类典型的挽歌成分，全都以第二个音节为重音。尽管长度很大，那一类词语一个词身只有一个重音，因而，这一行的倒数第二个韵步就遇到了一个通常不重读的音节（俄语的例子是 ni，英语的则是“la”）。这产生了一种悦人的疾行，然而，也一种过于熟悉的效果，无法补偿意义的平庸。

作为一个天真的初学者，我陷入了歌唱的描述词所设下的所有陷阱。并非我没有努力。事实上我竭尽全力作着我的挽歌，在每一行都花费了无穷无尽的苦心，挑选又抛弃，以一个品茶者目光呆滞的庄严在舌头上滚动着词语，但它仍会前来，那凶险的背叛。镜框驾驭图画，外壳塑造果肉。词语的陈腐秩序（短动词或代词—长形容词—短名词）造成了思想的陈腐混乱，而像 p, ta gorestn le gryozi，翻译过来加上重音可以写成“诗人忧郁的白日梦”，这样的一些诗行致命地通向一个以 rozi（玫瑰）或 beryozi（桦树）或 grozl'（暴风雨）为结尾的押韵诗行，因此某些情感与某些环境相联系不是靠着一个人意志的自由行动，而是靠着传统那枯萎的丝带。无论如何，我的诗离它的完成越近，我越是肯定，无论我看到在我面前

214 纳博科夫

的是什么，别人也会看见。当我注目于一朵肾形的花坛（也留意到一片绯红的花瓣躺在沃土之上，一只小蚂蚁细察着它腐烂的边缘）或思索着一根桦树干日晒的横隔膜，某个歹徒曾在那里剥下它纸一样的，椒盐色的树皮，我当真相信这一切也会被读者透过

我诸如 utrachennl 。rozi 或 zajumc 人 iv 妙 beryozi 这样的词语的神奇面纱而感觉到。我当时没有想到，远非一层面纱，那些贫乏的词语是如此晦涩，以致于，事实上，它们形成了一堵墙，人们在其中能够分辨出的一切只是我所摹仿的大小诗人被精心打扮的一点一滴。多年以后，在一个异国城市污浊的郊外，我记得曾见过一道围栏，显然它的木板是从另外某个地方弄来的，显然在那儿它们曾被用作一个巡回马戏团的墙篱。动物们被一个多才多艺的宣传员画在上面；但搬走了这些木板，然后再匆匆把它们拼凑起来的无论是谁，他都肯定是瞎了眼睛或不正常的，因为此刻这栏杆只呈现出动物被拆散的部分（此外，它们有的还颠倒了）- 一个褐色的腰臀部，一个斑马的头，一条象腿。

在物的平面上，我紧张的劳动以大量阴暗的行动与姿态为特征，诸如行走、坐下、躺卧。这些又每每再次碎裂成没有空间重要性的碎片：比如，在行走阶段，某一刻我也许会在公园深处漫游，接下来就会在宅第的屋子里踱步。或者，看看坐着的阶段，我会突然觉察到一盘甚至记不得下过刀叉的东西正在被移走，而我的母亲，她的左颊抽搐着，每当她担心

说 0 巴，记忆 215 时就会这样，在长桌另一端她的座位上仔细观察着我的忧郁和缺少胃口。我会抬起头来解释——但桌子消失了，我独自坐在路边的一个树桩上，我的蝴蝶网的棍柄以富有节奏的动作，在泛出褐色的沙子上画了一个弧形；地上的虹，笔划深度的变奏补偿了缤纷的色彩。

当我无可救药地投身于完成我的诗否则就去死的时候，出现了最为恍惚的状态。几乎没有一下惊奇的刺痛，我发现自己不在别的地方，而在那间曾经是我祖父书房的寒冷、发霉、甚少使用的屋子里的一张皮沙发上。在那张长沙发上我俯仰着，在一种爬虫似的静止中，摇晃着一条手臂，使我指节轻轻触摸地毯的植物图案。之后，当我从那恍惚之中醒来，那微绿的植被仍然在那里，我的手臂仍在摇晃，但此刻我是躺在摇摇欲坠的码头，我所触摸的蓬花是真实的，而水上赤杨树叶波动着的圆满阴影——被神化的墨点，大得出格的变形虫——在有韵律地浮动，伪足伸缩不定，它们在被缩短时，会在它们的圆形边缘碎成不可捉摸而流动的小黑点，而这些又会再次聚集起来重新形成摸索着的终端。我重新陷入了我隐秘的迷雾之中，而当我再次伸出头来，支撑我伸开的躯体的已经成了花园里一张低矮的长凳，而我的手垂在其中的那些活的阴氩，此刻在地面上移动，在紫罗兰的色调中而不是在水的黑色与绿色里。在那种状态里普通的存在尺度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至我不会惊讶于走出它的隧道而直接进入凡尔赛的花园，或蒂尔加滕区，或红杉国家公园；而颠倒过来的是，如今当旧日的恍惚出现时，我很愿意在从中苏醒时发现自己高卧于某一棵树上，在我童年的斑驳长凳上方，我的腹部抵

着一棵粗大；舒适的枝条，一条手臂垂挂在树叶间，上面移动着其他树叶的阴影。

在我不同的位置中，不同的声音传到我这里。它会是晚餐锣，或不那么平常的某物，如一个筒风琴的粗鲁音乐。那位老流浪汉会在马厩近旁的什么地方演奏，而凭借着早年吸入的更直接的印象，我会在心中从我的栖息之地看见他。描画在他的乐器前部的是勉强可算巴尔干农夫的人们在 palmoid 柳树中跳舞。他不时地把曲柄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我看见了秃头小母猴的紧身短外衣和裙子，她的衣领，她脖子上新鲜的疮疤，每一次那个人拉它，狠狠揍她时她都紧紧抓住的链条，而几个仆人站在周围，打着哈欠，露齿憨笑——头脑简单的，被一只猴子的“姿态”逗得直乐的人们。只在几天前，在我回忆着这些事物的地方附近，我遇见过一个农夫和他的儿子（你在早餐食品广告上看见的那种热情健康的小孩子），他也相似地被一只年轻的猫折磨一只幼小的金花鼠的景象所吸引——让它跑几英寸又再次猛扑到它身上。它的尾巴大部分已经掉了，臀部在出血。由于它无法靠奔跑逃脱，那大胆的小家伙尝试了最后一招：它停下来侧身躺着，来同地上的一点光影混和到一起，但它肋部过于剧烈的起伏暴露了它。夜晚的来临所启动的家庭唱机，是我能够通过我的诗歌听见的另一件音乐机械。在聚集着我们的亲朋好友的露台上，它从它的铜吹管中发出我这一代人钟爱的所谓 ts lganski ' roman ，之。这些曲子或多或少是吉普赛歌曲的无名摹仿——① 茨冈人浪漫曲。

说吧，记忆 217 或这样的摹仿的摹仿。构成它们吉普赛性的是一声单调的悲鸣，间有一种打隔声，一个害相思病的清晰可闻的碎裂声。它们最好的时候，它们就成了真正的诗人（我特别想到了亚历山大·勃洛克）作品中四处震颤的沙哑乐音的缘由。它们最糟时，会有如平庸文人创作的，由巴黎夜总会里最壮实的妇人吟诵的流氓素材。它们的自然环境特征是流泪的夜莺，开放的紫丁香和喃喃低语着，为地主士绅的庄园增色的树木。那些夜莺颤声歌唱，而在一丛松树中落日在不同程度上以炽烈的火红捆绑着树干。一只铃鼓，仍在跳动着，似乎躺在入暮的苔鲜上。有一会儿，那嘶哑的女低音的最后一个音符透过蜩色追逐着我。当宁静重归，我的第一首诗已触手可及。

那其实是一次痛苦的调制，在它伪普希金式的变调之外还包含有许多借用。独有丘特切夫的雷声的一阵回响和来自费特的一道折射的阳光还算是情有可原。其余的，我依稀记得提到过“记忆的刺痛”- vospominan ' ya zhal 。（我真的把它想象为骑在一条洋白菜毛虫身上的一只雌蜂的输卵管，但没敢这么说）——和一个遥远的筒风琴的旧大陆风格的魅力。最糟的是来自阿普丁和康斯坦丁大公的 ts 19 " ski 式抒情诗的可耻的零零碎碎。它们是由一个还算年轻而颇有魅力的姨妈传给我的，她也能够朗诵路易·布瓦易哀的著名篇章（au "

fem 。。①），其中有一把隐喻的小提琴弓被不和谐地用来在一把隐喻的吉他上演奏，以及许多艾拉·惠勒·威尔考克斯的作品——与这位女王和她的宫女的一次惊人的成功表演。看来几乎不值得花时间补充，在主题进行时，我的挽歌处理了一个备受爱戴的情人的失去——戴里亚，塔玛拉或莱诺尔——我从未失去过，从未爱过，从未遇见过她，但全都注定要遇见，要爱，要失去。

出于我愚蠢的天真，我相信我写下的是一件美丽而神奇的东西。当我带着它向家里走去，尚未写下，但已如此完善以至连它的逗号都印在了我的头脑里，像一只枕头在一个睡者芽上的褶皱一样，我毫不怀疑我母亲会用骄傲的愉快的眼泪祝贺我的成就。她在那个特别的夜晚过于专注于其它事件而听不进诗的可能性根本没有进入我的脑际。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更加渴望过她的赞赏。我从来不曾更加脆弱。我的神经在激动，由于大地的黑暗，我没有留意到它在把自己包裹起来，也由于苍弯的赤裸，我也没有注意到它在脱下王袍。头顶上，在划分着我消溶着的小径的没有形状的树木之间，夜空苍白地缀满了星星。在那些年月，那星群，星宿，星际空间和所有其它令人敬畏的景象那神奇的杂乱在我体内激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恶心与彻底的恐惧之感，仿佛我是在无限空间的悬崖上颠倒着从地球垂挂而下，而陆地的重力仍旧抓着我的脚躁，但任何时刻都可以把我放开。

除了角落里两扇楼窗（我母亲的居室）之外，房子已经① 法语“《致一位女士》”。

说吧，记忆 219 漆黑一片。守夜人把我让进来，慢慢地，小心地，这样才不致扰乱我疼痛的头脑中词语的安排，我走上了楼梯。我母亲斜倚在沙发上，手里是一本圣彼得堡的 rech，膝上有一本没有翻开的伦敦《时代》。一架白色的电话在她身边玻璃面的桌子上闪烁着。夜已深了，她仍旧期待着我父亲从圣彼得堡打来电话，他被战争临近的紧张局势耽留在那里。一张扶手椅站在沙发边上，但我总是避开它，那是由于仅仅看到它的金色缎面，就会使我的脊椎里又出一阵有饰边的颤抖，像夜晚的闪电一样。轻轻咳嗽一声，我坐到一张脚凳上，并开始了我的背诵。这样进行下去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对面的墙，在回忆中我如此清晰看见它上面一些椭圆形镜框的小幅照片和剪影，一幅索莫夫的透明水彩画（年轻的桦树，半道彩虹——一切都柔婉而湿润），亚历山大·贝努瓦的一幅辉煌的凡尔赛之秋，和我母亲的母亲在童年时画的一张蜡笔画——又是那座花园亭阁，它漂亮的窗子被连锁的枝条遮住了一部分。那幅索莫夫和那幅贝努瓦如今在某个苏维埃博物馆里，但那座亭阁绝不会被国有化。

我的记忆在最后一节的开端犹豫了一瞬间，在那里有那么多敞开的词语曾被尝试过，以致于最终选中的那一个此刻多少被一排错误的入口遮掩住了，这时我听见我母亲在抽泣。即刻我就背诵完毕并抬起头来看她。她沉醉地笑着，透过流下她脸颊的泪水。

“多么精彩，多美啊，”她说，带着她仍在增长着的微笑的温柔，她交给我一个手镜，我于是看到了我颧骨上的血迹，在某个无法断定的时候，我在那里凭着把我的脸颊撑在我拳头上的无意识动作压死了一只开怀畅饮的蚊

220 纳博科夫

子。但我看见的比这更多。注视着我自己的眼睛，我有了发现我寻常自我的渣滓那样一种震撼性的激动感，仅仅是一个升华了的本体的残余，我的理智尽了极大的努力才在镜子里把它重新拼合了起来。

第十二章

221 □□□□目□□□□□□□□□□

第十二章

我第一次遇见塔玛拉— 给她一个与她的真名有同样色彩的名字— 的时候，她十五岁，而我大一岁。地点就在圣彼得堡南面地势崎岖但漂亮的乡村（黑的椒树，白的桦树，泥炭田，草地，荒漠）。一场遥远的战争在乏味地进行着。两年之

222 纳博科夫

后，俄国革命到来，导致我离开了这片难忘的风光。事实上，那时候，在 1915 年 6 月，晦暗的预兆和后台的轰响，荒谬巨变的灼热气息，已经在影响着俄国诗歌中所谓的“象征主义”流派了— 尤其是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篇。

在那年夏初和上一年的整个夏天，塔玛拉的名字总是意外地出现（有着虚假的质朴，如此典型地属于打算认真着手时的命运）在我们的地产（禁止入内）和奥列杰日河对岸我舅舅的土地（严禁入内）各处。我会发现它是用一根棍子写在庄园大道泛红的沙子上的，或是用铅笔涂在一扇刷白的边门上，或新近刻划（但没有刻完）在某张古老长凳的木头上，仿佛自然母亲在对于塔玛拉的存在给予我神秘的预先告知。那个寂静的六月傍晚，当我发现她十分安静地站在一丛桦树中（只有她的眼睛在动），她似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在那里的，在那些警戒的树木中间，有着神话中一次启示的缄默的完满。她拍死了她等着落下来的马蝇，接着赶上了另外两个呼喊着她的，不那么漂亮的女孩。少顷，从河上的一个有利地形，我看见她们走过了桥，灵巧的高跟哒哒而过，三个人全都把手藏在她们海军蓝外衣的口袋里，并且，因为有苍蝇，还不时地摇晃她们系着丝带，花枝招展的脑袋。很快我跟踪塔玛拉来到了她家在村里租住的质朴的 dachka（夏季村舍）。我会在近处骑马或自行车，怀着一阵耀眼的爆炸的突然感觉（此后我的心不得不用很长时间才从它落到的地方返回了原处），我时常在道路的这个那个乏味的拐角遇见塔玛拉。自然母亲除去了她的第一个女伴，然后是另外一个，但直到八月— 1915 年 8 月 9 日，以彼得拉克式的精确，在那个季节最晴朗的下午

说吧，记忆

223

四点半，在我留意到我的闯入者进来的那座五彩窗的亭阁——直到那时，我才鼓起了足够的勇气来向她说话。透过那面被细心拭过的时间透镜，她脸孔的美仿佛像往日一样近，一样明亮。她矮小，有点趋于丰满，但很优雅，有纤细的足踝和柔韧的腰肢。一滴挞粗或切尔克斯的血液也许解释了她快乐的眼睛微微的歪斜，与她青春焕发的脸颊的幽暗。一层轻柔的软毛，与人们在杏仁果上发现的相似，以一圈光耀的美丽圆边画出了她的侧影。她责备她浓密的褐发难以管束，并威胁要把它剪短，并且确实在一年之后剪短了它，但我总是回忆起它最初的样子，被激烈地编成一根很粗的发辫，在她脑后弯上去用一个黑色丝绸的大蝴蝶结系住。她可爱的颈项总是裸露着，即使在圣彼得堡的冬天，因为她设法得到允许免除了一个俄国女学生制服上令人窒息的领子。无论何时她说出一个逗人的见解或是从她大量储存的二流诗歌中抽出一段叠韵诗句，她总是以一种最动人的方式来扩大她的鼻孔，带着一丝愉快的鼻音。然而，我从来无法完全肯定她何时严肃何时又不然。她准备就绪的笑的涟漪，她飞快的说话，她非常依赖小舌的 r 的滚动，她的下眼皮温柔、潮湿的闪烁——事实上，她的所有特征都令我狂热地沉醉，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它们并不泄露她这个人，而是倾向于形成一道灿烂的面纱，每当我试图多了解她一点，它们就使我陷入困境。当我告诉她我们将在 1917 年末，我一完成学业就结婚时，她会静静地称我傻瓜。我想象过她的家，但十分模糊。她母亲的名字和父名（这是我对这个女人了解的一切）有商人阶层或圣职人员的意味。她的父亲，我推想，对他的家庭几乎毫不关心，

224

纳博科夫

是南方某地一处大领地的管家。

那一年秋天来得很早。到八月底，一层层落叶堆积，深及脚踝。有奶色边缘的黑如天鹅绒的赤峡蝶在空地上飞渡而过。那位家庭教师，我兄弟和我在那年夏天被托付给他乖僻的照料，常躲在灌木丛中，借助于他在阁楼上找到的一副望远镜窥视塔玛拉和我；但有一天，却轮到了这个窥视者被我舅父紫红色鼻子的老花匠阿波斯托尔斯基（偶尔是除草姑娘的一个大特技表演家）所观察，他很温和地向我母亲汇报了这件事。她无法宽容窥视，此外（尽管我从未对她说起过塔玛拉）从我以一种值得褒扬的客观精神向她朗诵的，而她珍爱地用一本特别的札记簿抄录下来的诗里，她对我的浪漫史了解了她想要了解的一切。我父亲随他的团体到别处去了；当他一个月后从前线归来，在得知了这桩事之后，他确实感到有责任向我问几个相当令人发窘的问题。但我母亲心灵的纯洁支持着她，并且还将支持她，度过更糟的困境。她满足于怀疑地，但也不无温情地摇头，叫仆役长每夜在亮着灯的露台上给我留一些水果。

我带我可爱的姑娘到树林中所有那些秘密地点，我曾在那里如此热情地做过遇见她，创造她的白日梦。在一片特别的松树丛中，我离弃想象的织物，我品尝了现实。那年我舅父不在，我们因此也能自由地迷失于他巨大、茂密、两个世纪之久的花园了，在它从中心一座喷泉放散而出的主道与迷宫般的小径上有染上绿苔的石头雕成的古典跋涉者。我们“摇晃着手”走路，充满乡村风情。我在沙砾车道的边界上，在老普里亚波斯托尔斯基遥远慈祥的目光之下为她摘下天竺牡丹。时

说 d 巴，记忆 225 常，当我送她到家，或到她家附近，或至少到村里的桥上时，我们就感到不那么安全了。我记得在某一扇白色大门上胡乱刻下的，联结我们姓名的文字，带有奇特的小字尾，以及，与村子里痴呆者的涂抹稍稍隔开些，用我熟知的粗糙字体写下的古训“审慎是热情之友”。有一次，在日落之际，在橘黄与黑色的河边，一个年轻的 dachnik（度假者）手里提着个骑行背囊，在经过时向她鞠躬；对此她羞红了脸像一本小说里的一位姑娘，但只带着一丝勇敢的嘲弄说，他一辈子从来没骑过马。又一次，当我们出现在公路的一个拐角，我的两个妹妹因她们狂热的好奇心，差点儿跌出转弯驶向桥头的那辆红色家用“鱼雷”。

在黑暗的雨夜我会把我的自行车灯与碳化钙的魔灯装到一起，遮住一根火柴不让狂风吹灭，并且，在玻璃中囚禁了一支白色火焰，小心翼翼地驶入黑暗。我的灯投下的光圈将衬出在路心错杂的水潭与边缘上长长的草地之间，道路那潮湿、平滑的肩膀。像一个摇晃的鬼魂，当我开始疾驰下山冲向河水的时候，苍白的光线会迂回穿过拐角处一道土堤。过了桥道路再次向上倾斜，与罗杰斯特维诺—卢加公路交汇，就在那交汇点上方，一条步道在滴水的素馨花丛中攀上了一道险峻的陡坡。我只有下来推车。当我到达了坡顶，我灰蓝色的灯光跳动着横过我舅父那闻无声息，门关闭的宅邸背后六根柱子的柱廊—像它在今天，半个世纪后会是的那样闻无声息，门关闭。那里，在她追踪着我的车灯上升的之字形的那个拱形遮蔽所的角落里，塔玛拉会等待着，在宽阔的栏杆上背靠着一根柱子休憩。我会关上灯摸索着走向她。一个人感动得更加

226 纳博科夫

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讲述一个人总希望能幸免被囚于词语动物园的许多别的东西—但聚集在房屋近旁的古老的菩提树在不倦黑夜中吱哑作响，汹涌澎湃，淹没了摩涅莫绪涅的独白。它们的喟叹将会平息。可以听见门洞一边的雨滴，水的一个小小的好事者，在稳稳地冒着气泡。有时，另外的某一阵瑟响打乱了树叶中雨的节奏，会使塔玛拉转头朝向一声想象的足音，接着，凭着一线微光—此刻升起在我记忆的地平线上，透过那所有的雨水—我能够辨认出她脸的轮廓；但并没有什么东西，没什么人要害怕，立刻她会轻轻呼出她已屏住了一会儿的呼吸，而她的眼睛又会再次合上。

随着冬季的到来，我们不计后果的罗曼史被移植到了严酷的圣彼得堡。我们发现，我们已渐渐习以为常的森林中的安全被可怕地剥夺了。声名狼藉到足以接纳我们的旅馆耸立在我们勇气的边界之外，而安顿下来的恋爱的伟大时代也还远不可及。在乡下如此令人愉快的秘密如今成了一个负担，我们两人谁也无法面对在她家或我家当着别人会面这个主意。因此，我们被迫在城里四处漫游（她，穿着她灰色毛皮的小外衣，我，白色的鞋罩和上等羔皮的领子，我天鹅绒镶边的口袋里有一个指节铜套），这种对于某个庇护所的不懈追求产生了一种无望的奇怪感觉，而它又接着预示了其它的，更往后也更孤独的漫步。

我们逃学：我不知道塔玛拉的程序是怎样的；我的手段

说 d 巴，记忆 227 包括说服两个司机中随便哪位在上学路上的这个或那个拐角处停下（两个都是讨人喜欢的好人并且事实上拒绝了我的金子——便利的五卢布硬币，它们从银行里出来是灿然生辉的十或二十枚一串令人垂涎、沉甸甸的香肠，如今我能自由地享受它们的美好回忆，既然我流亡中骄傲的贫困也是一件过去的事了）。我们了不起的，显然能够买通的尤斯丁也没有找我什么麻烦，他在我们底楼接电话，那架电话机的号码是 24 — 43, dvadts " t ' chet 1 resorok tri ；他机敏地回答说我的喉咙发炎了。那么，我疑惑，倘若我就在此刻从我的书桌打一个长途电话会发生什么？没有回答？没有这个号码？没有这个国家？或者会有尤斯丁的声音说着“moy 口户 ochtenicts 。”（“我尊敬的”的逢迎的缩略语）？那里毕竟还存在着大肆宣扬的早已过了一百五十岁的斯拉夫人和库尔德人。我父亲在他书房里的电话（584 — 51）没有列在号码簿上，而我的礼仪导师在试图了解我恶化的健康的真相时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尽管有时我曾一连缺席三天。

我们在结霜的公园大道的白色花边下行走。我们偎依在冷冷的长凳上——在首先扫去了它们洁净的雪层，继而除去我们被雪包裹着的手套之后。我们出没于博物馆。它们在工作日早晨令人昏昏欲睡，少有人迹，并且十分温暖，与严寒的薄雾和垂挂在东方的窗口，像一轮泛红的月亮似的红日恰成对照。我们在那里会寻找安静的后房，无人注目的临时凑数的神话集，蚀刻画，徽章，古文字展品，印刷的故事——诸如此类的可怜事物。我们最好的发现，我想是一个存放扫帚和梯子的房间；但一连串突然开始在黑暗里滑动和落地的空框子

228

纳博科夫

吸引了一位好事的艺术爱好者，我们就逃走了。爱尔米塔什，圣彼得堡的卢浮宫，提供了很好的隐避处，尤其是在底层的某一间大厅里，在装有甲虫的陈列框中间，在卜塔的高级祭司纳纳的石棺后面。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馆，两个保藏着讨厌的学院派绘画如希施金作品（“一座松林里的空地”）和哈拉莫夫作品（“一位青年吉普赛人头像”）的展厅（30 和 31 号，在它东北角）由于有一些带抽屉的陈列台，提供了一点隐秘——直到一个脏嘴的土耳其战役老兵威胁说要去叫警察为止。于是我们从这些大博物馆退到了较小的，比如说，苏沃洛夫，我记得那里一间布满旧战甲锦缎，和撕裂的丝绸旗帜的最为寂静的屋子，有几个戴着假发，蹬着沉重的靴子，穿着绿色军装的玩偶守卫在我们身边。但无论我们到哪个地方，在访问了几次之后，一成不变地，这个那个古老的，眼色朦胧的穿毛毡底靴子的侍者就会满腹狐疑，而我们就只有把我们短暂的激情移往别处——到教学博物馆，到宫廷马车博物馆，或到一个小小的，连向导书也不开列的旧地图博物馆——然后再次离开进入寒冷之中，进入某个有大门和下巴上套着圆环的绿狮子的小巷，进入在那些日子里对我如此珍贵的“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多布金斯基，亚历山大·贝努瓦——的风格独特的雪景之中。

在黄昏，我们在涅夫斯基大街的两个电影院（帕里西亚纳和皮卡迪里）中的一所，坐进最后一排座位。这门艺术在前进着。海浪被染上了一种多病的蓝色，而当它们驰入并在一块黑色的，记忆中的石头上撞成泡沫（比亚里茨的处女崖——我想，再看一遍我四海为家的童年的海滩是滑稽的），有一架

说吧·记忆 229 特别的机器摹仿拍岸大浪的声音，发出一阵冲刷的瑟响，它从不管怎么设法随同画面迅速停止，而是在三四秒钟里陪伴下一个景象——比如一场短暂的葬礼，或槛楼的战俘与他们衣着整洁的捕获者。有的时候，主要影片的题目往往摘自某首通俗诗歌或歌曲，会是十分拐弯抹角的，诸如《菊花不再盛开在花园》或《她的心是他手中的一件玩具像玩具一样它碎了》。女明星们有低低的前额，华丽的眉头，描得太黑的眼睛。那时最受欢迎的演员是莫祖辛。有一位著名的导演在莫斯科乡下买了一座白柱子的宅邸（并非不像我舅父的那幢），它出现在他制做的所有影片里。莫祖辛会乘着一辆新奇的雪橇驶向那儿，他会凝注钢铁般的目光于一扇窗中的灯光，而在他下愕紧张的皮肤下一块著名的小肌肉出现了一阵微颤。在博物馆和电影院不接纳我们，而夜还未深的时候，我们便转而去探索这个世上最枯搞和最神秘的城市的荒原。孤寂的街灯被我们眼睫毛上冰冷的潮气变成了有菱刺的海生物。当我们横穿巨大的广场，各种各样的建筑幻影就在我们面前以无声的突兀升起。我们感到一阵寒冷的震颤，大致上不是联系着高度而是深度——一道深渊敞在一个人脚下——这时被擦亮（被奴隶们擦亮，又被月色擦亮，在黑夜那被擦亮的虚空中平滑地旋转着）的高大的花岗岩独立柱石在我们上方耸起，支撑着圣以撒大教堂神秘的堂皇。我们在这些仿佛属于石头与金属的崇山峻岭的悬崖上停下来，手拉着手，怀着小人国民的敬畏，引颈探头观看新的浩大景象在我们

面前上升——一座宫殿柱廊的十个光润的灰色男像柱，或一座花园的铁门近旁一个细纹斑岩的大瓶子，或那硕大无朋的柱子，在

230 纳博科夫

它顶端有一个黑色的天使，他与其说装饰着，不如说困扰着月色洋溢的广场，并且上升又上升，徒劳地努力伸向普希金的“exegi monumentum”的基座。

后来，在她少有的忧郁时刻，她断言我们的爱没有经受住那个冬天的压力；出现了一点瑕疵，她说。在那些个月份里，我一直在写诗给她，为她，写她，每星期两三首；1916 年春天我出版了它们的一本合集——而当她引我注意到我在酝酿这本书时根本不曾留意的东西时，我大吃了一惊。就在那儿，同样的不祥瑕疵，无趣的空洞音调，口齿伶俐的暗示，暗示我们的爱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永远无法重获它开端时刻的奇迹，那些雨中菩提的瑟响和疾动、乡野的同情。此外——但这在那时我们谁也没见到——我的诗是幼稚的产物，完全没有价值并且绝不应该出售。这本书（它有一册，唉，仍旧存在于莫斯科列宁图书馆的“闭架书库”里）只配得到它在少数几位从无名期刊上注意到它的批评家们撕扯的爪子下得到的东西。我学校里的俄国文学教师，弗拉基米尔·希皮乌斯，我极为尊敬的一位第一流的，尽管多少是秘密的诗人（他在天才上超过了，我认为，他著名得多的表姐妹，女诗人和批评家季娜依达·希皮乌斯）带了一本到班上，将他激烈的嘲讽（他是个红头发的激烈的人）应用于我最浪漫的诗行，从而引发了我班上大多数同学的一阵狂笑。他著名的表妹在文学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请求我父亲，它的主席，请他告诉我，我永远永远都成不了诗人。一个好意的，贫穷而毫无才气的记者，他有理由感谢我父亲，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热情得不可思议的文章，大约五百行字洋溢着过分的赞誉；它被我父亲及时地截了个下

说 n 巴，记忆 231 来，我记得他和我，在我们阅读那份手稿时，咬牙切齿并且呻吟——我们家庭在面对无论什么趣味可怕的或属于一个孩子的过失的东西时，所采用的一个仪式。整个事件永远治愈了我对文学声名的一切兴趣，很可能还导致了对评论的几乎是病态的和并非总是有道理的冷漠，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我身上剥夺了据说大多数作家都经历过的那种感情。1916 年那个春天正是我视为一个圣彼得堡春天的典型的一季，当时，我回想起，这样的具体形象，如塔玛拉，头戴一顶陌生的白帽子，置身于一场争夺激烈的校际足球赛的观众中间，在那个星期天，最为光彩夺目的幸运在这场球赛里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在门前化险为夷；还有一只赤峡蝶，恰与我们的罗曼史同龄，在太阳下晒着它挫伤的黑翼，它们的边缘此刻被冬眠所漂白，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里一张长凳的背面；还有在锋利的空气中此起彼落的教堂钟声，在涅瓦河令人愉快地不结冰的，浪涛翻滚的黑蓝色之上；还有在柔黄花周中骑兵卫队大道上遍撒五彩碎纸的半融之

雪的市场，它充满了吱吱作响和暴烈的喧哗，它的木头玩具，它的土耳其玩物的高声叫卖，以及被称为 amerikanskije zhiteli（“美国居民”）的笛卡尔式魔鬼——玻璃小妖怪在装满了粉红或郁金香色彩的酒的玻璃瓶里上下跳动，像真正的美国人（尽管所有用上的绰号都是“异国风情的”）在摩天大楼的长矛中，在办公室灯火在冷绿的天空中熄灭时所做的那样。街上的激奋使人陶醉于树林和田野的渴望。塔玛拉和我尤其急于回到我们旧日的胜地，但整个四月她母亲一直摇摆在于再次租用同一间农舍和便宜地在城里住下去之间。最终，在某个条件（被塔

232 纳博科夫

玛拉以汉斯·安徒生的小美人鱼的坚毅接受了下来）下，农舍得到了租用，一个光荣的夏季立刻包围了我们，她就在那里，我快乐的塔玛拉，踮起了她的脚尖，试图拉低一根总状的枝条来摘下它起褶的果子，整个世界和它的树木在她欢笑的眼球中旋转，而她的努力产生的一片黑影在她高举的手臂下面，在她黄色洋装的天然丝绸上形成。我们迷失在遍生苔鲜的树林里，沐浴在一个童话的小海湾，在花冠一边发出永远相爱的誓言，她像小俄国美人鱼一样，如此热衷于摇晃这些花，而在秋初她搬到了城里去寻找工作（这就是她母亲设下的条件），在接下来的月份里我根本见不到她，仿佛正沉迷于那种我想一种高雅的 *littérateur* ① 会寻求的那种变幻的体验。我已进入了一种过度感伤与敏感的阶段，它将持续十年左右。从我现今的塔楼里望着它，我看见我自己一瞬间是一百个不同的年轻人，全都追求着那个变幻无常的姑娘，置身于一系列同时或重叠的爱情事件，有的快乐，有的卑鄙，范围从一夜的冒险到耗费时日的交涉和掩饰，带来十分平庸的艺术效果。如今在重筑我的往昔之时，不仅这经历，那些迷人的女士的阴影对我一无用处，而且它还创造了一种麻烦的散焦，无论我如何咬啮记忆的螺栓，我都无法回忆起塔玛拉与我分手的方式。这种模糊不清可能也有另一个原因：这之前我们已分离过太多的次数。在乡间的最后一个夏季，我们时常在夜晚流动的黑暗中，在戴面具的月亮与雾气迷朦的河水之间的老木桥上，在每次幽会之后永别，我会吻她温暖湿润的眼睑和被冷雨打① 法语“文学”。

说 0 巴，记忆 233 湿的脸，接着立刻回身走向她作第二次告别——接着是漫长、黑暗、摇摇晃晃的上坡行驶，我缓慢、疲惫地踩着踏板的脚试图强压下那恶魔般强壮而富有弹性的黑暗，它拒绝呆在下面。

然而，我的确以伤心的生动，记得在 1917 年的某一个夏夜，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分离的冬季之后，我在一列郊区火车上偶然遇见了塔玛拉。在两站之间的几分钟，在一节摇摆着呼啸着的车厢的连廊里，我们站在一起，我处于一种强烈的窘迫，一种不知所措的懊悔的状态中，她在吃一根巧克力棍，有条不紊地咬下它坚硬的小块，谈论着她工

作的机关。在轨道一侧，在微蓝的沼泽之上，燃烧的泥炭的黑烟与一片巨大的境拍色日落闷烧着的残骸混和在一起。我想公开的记录可以证明，亚历山大·勃洛克甚至就在那时，正在把我所见到的那股泥炭烟和残败的天空记在日记里。后来在我生命里有一个时期，我也许发现了这与我看塔玛拉的最后一眼有关，当时她在梯极上转头看我，然后下车走进了一个小站散发着茉莉花香气的，蟋蟀狂叫的黄昏；但今天没有什么能黯淡这痛苦的纯粹。

在这一年末，当列宁接管了政权，布尔什维克立刻将一切置于权力的维持之下。我父亲曾被选入过在其初始阶段曾竭力阻止苏维埃确立的立宪议会，他决定尽可能长地留在圣彼得堡，但把他的大家庭送往克里米亚，一个仍旧自由的地

234

纳博科夫

区（这自由只有几星期的时间了）。我们分两批走，我弟弟和我与我母亲和三个弟妹分开旅行。苏维埃时代还只不过是乏味的一星期；自由派报纸仍在出版；在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送我们离开，与我们一起等待时，我不动声色的父亲坐到餐柜一角的桌前，用他流畅而“天衣无缝的”（排字工人是这么说的，惊奇于没有修改）书法，在那些有格子的，与印刷的字体成比例的特殊长纸条上写下一篇纲领文章给奄奄一息的 rech（或者也许是某个临时出版物）。就我所记忆的来看，如此迅速地把弟弟和我送走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留在城里就有可能被召入新的“红”军。使我烦恼的是在十一月中旬，在采集季节过后很久才去一个迷人的地方，因为我从来不善于挖掘虫蛹（尽管，最终，我的确在克里米亚我们的花园里一棵大橡树下面翻出了几个）。在我们每人脸上各画了一个精美的十字之后，我父亲相当随便地补充说很可能，ves' a vozm □ zhno，他再也见不到我们了，这时烦恼就变成了痛苦；于是，穿戴着战壕的大衣和黄卡其布的帽子，手臂下夹着他的公事包，他步入蒸汽的浓雾离开了。

漫长的南行开始得还算不错，彼得格勒—辛菲罗波尔的头等卧车里暖气仍在嗡鸣，灯盏仍旧完好，一位算得上有名的歌手穿着戏装，一束褐色纸做的菊花贴在她的胸口，她站在走廊里，轻拍着玻璃，什么人正沿着它走过和招手，这时火车开始滑行，没有一下震动表明我们正在永远离开那座灰色的城市。但过了莫斯科以后不久，一切舒适均告结束。在我们缓慢阴郁的行程中的几个地方，列车，包括我们的卧车，被从前线回家的或多或少布尔什维克化的士兵所检查（他们或

说 d 巴，记忆 235 者叫做“逃兵”或者叫做“红色英雄”，这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观点）。我弟弟和我认为把自己锁在车厢里，反对一切妨碍我们的企图是相当有趣的。几

个士兵在车厢顶上行走，还变本加厉地试图把我们房间的通风口用作厕所，而且并非毫无成效。我弟弟是位第一流的演员，设法激起了一场严重的斑疹伤寒的一切症状，这在车门终于打开时帮助了我们。在第三天清晨，在一个迷朦的车站，我利用那些快乐行程中的一个间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沿着拥挤的走廊小心翼翼地移动，跨过打着鼾的人们的身体，下了车。一片奶色的雾悬在一个无名车站的月台上一 我们在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什么地方。我穿着鞋罩戴一顶圆顶礼帽。我所持的手杖，一件收藏家的物品，曾属于我舅舅卢卡，由淡色的，斑点美丽的木头制成，把手是一个缠绕着金色花环的光滑的粉色珊瑚球。倘使我是那些潜伏在那个车站月台上的雾气中的悲惨游民中的一个，看见一个瘦弱的年轻纹裤子弟来回踱步，我是不会抑制住袭击他的诱惑的。正当我要上车时，它发出一阵痉挛并开始启动了；我的脚滑了一下，我的手杖就被甩到了轮下。我对这东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事实上，我在几年之后大意地丢失了它），但我正被观看着，而青春期 *amou, propre* ① 的火焰驱使我去干我无法想象我当今的自我会干的事情。我等待着一，二，三，四节车厢经过（俄国火车在积聚动力时相当慢），当最后枕木显现出来时，我从它们中间拣起我的手杖，奔跑着追赶恶梦般疾退的保险杠。一个无产者坚定的手臂帮我爬了上来，以此① 法语“自爱”。

236 纳博科夫

遵守了感伤小说的（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倘使我被留在后面，那些规律仍旧会是好的，因为我会被带到塔玛拉的近旁，那时她也已迁往南方，居住在离那个荒唐事件的场景不到一百英里的一座乌克兰小村庄里。

她的行踪我在到达南克里米亚之后一个月左右便得知了。我的家庭安顿在雅尔塔附近，在加斯普拉，靠近科莱兹村。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国的；那气息不属于俄国，那声音不属于俄国，那头每夜啼鸣，像穆斯林寺院的报时人从尖塔（一种细高的蓝色塔楼，在一片桃色天空前映出剪影）上开口吟唱一样的驴子，肯定是巴格达式的。还有我站在一条白奎的马径上，近旁是一条白奎的河床，互不相连的，蜿蜒的水箍在那里细细流过椭圆形的石头——我就在那里，手持一封塔玛拉寄来的信。我望着陡峭的雅伊拉山脉，黑色的陶里松树的上等羔皮直铺到它们的岩崖；看山海之间丛林般的大片常青植被，看半透明的绯红天空，一弯羞怯的新月在那里照耀，身边仅有一颗潮湿的星星；而整个不自然的风景给我一种出自《天方夜谭》的一个插图漂亮，虽然遗憾地有所删节的版本的印象。突然间我感到了流亡的所有苦痛。有过普希金的例子，当然了一 曾在放逐中漫游此地，在那些移植的柏树与月桂之间的普希金——但尽管他的挽歌会产生某种推动，我并不认为我的激情是一种装腔作势。此后几年，直到一本小说的写作使我摆脱了那种丰富的情感，失去故土对于我一直是与失

说吧，记忆 237 去我的爱相提并论的。

与此同时，我家庭的生活完全改变了。除了精明地埋进了一个滑石粉盒的正常内容中的几件珠宝之外，我们彻底破产了。但这是件十分次要的事情。当地的鞋鞋政府已被一个崭新的苏维埃所扫除。在 1917 — 1918 年冬季，直到多风与明亮的克里米亚春季，痴呆的死亡摇摇晃晃地走在我们身边。每隔一天，在白色的雅尔塔码头（在那里，像你记得的那样，契诃夫的“带宠狗的太太”中的太太在度假的人群中丢失了她的长柄眼镜），各种各样无害的人们脚上被预先系上重物，然后被专程从塞巴斯托波尔运来的残忍的布尔什维克水手射死。我并非无害的父亲到那时，在几次危险的冒险之后，已经与我们在一起了，并且在那个出肺病专家的地区采取了摹仿一个医生的伪装，但不改变他的名字（“简单而优雅”，一位象棋讲解者会这样谈论棋盘上对应的一步）。我们住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别墅里，一位好朋友，苏菲亚·帕宁伯爵夫人把它交给我们支配。在某些夜晚，在有关刺客前来的谣言特别盛行时，我们家庭的男子轮流在房宅四周巡逻。夹竹桃叶的纤影会在沿着一道苍白的墙吹来的海风中小心翼翼地移动，仿佛在指点着什么，带有极大的隐秘气氛。我们有一支猎枪和一支比利时自动手枪，并尽力去藐视那声言任何人非法拥有火器都要就地正法的法令。

机遇对我们很不错；在一月里的一个午夜，当一个强盗般的形象，严严实实地裹在毛皮里，爬进我们中间时，在我们所受的惊吓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原来是我们以前的司机契加诺夫，对于乘在火车缓冲器和货运车厢上，从圣彼得

238 纳博科夫

堡一路驶过了俄罗斯广大、霜寒和野蛮的大片土地，他根本没当回事，仅仅是为了把我们的某个好朋友出乎意料地送给我们的一笔大受欢迎的钱给我们带来。他也带来了在我们圣彼得堡的地址收到的邮件；其中便有塔玛拉寄来的那封信。逗留了一个月后，契加诺夫宣布克里米亚的风景使他厌倦，并且离开了——一路回到北方，肩扛一个大包，内有倘使我们认为他渴望的话会愉快地交给他的各种东西（诸如一个裤子夹，网球鞋，睡衣，一个闹钟，一个熨斗，其它几件可笑物品，我忘了是什么东西），而它们的消失只是渐渐显露出来的，如果不是被一位贫血的年轻女仆怀着复仇的热忱指出来的话，他也会曾偷窥过她苍白的魅力。够奇怪的，他劝说我们把我母亲的宝石从滑石粉盒（他曾侦察过它）转移到花园里一株多功能的橡树下挖开的一个洞里——他走后它们就全到了那儿。

然后，在 1918 年的一个春日，在开花的杏树垂红色的粉扑使幽黯的山麓生机勃勃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消失了，一支安静得出奇的德国人军队取而代之。爱国的俄罗斯

人矛盾于两种情感的折磨。德国人在西方正在战败，悄悄地来到雅尔塔，带着缺乏信心的微笑，一支灰色幽灵的军队，易于为爱国者所忽视，它也的确被忽视了，除了对于出现在公园草坪上的无精打采的勿践踏草地招牌的几阵可说是忘恩负义的窃笑之外。几个月后，在很好地修复了政委们空出的各个别墅的水管之后，又轮到德国人消失了；白军从东方渗入，并很快开始与从北方进攻克里米亚的红军作战。我父亲成了座落于辛非罗波尔的地方政府的司法部长，而他的家庭寄宿在雅尔

说 q 巴，记忆 239 塔附近，在里伐迪亚庭园，沙皇以前的领地。一片与白军占领的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卤莽、忙碌的欢乐情景，以一种通俗化的变体，带回了和平年代的宜人气象。咖啡馆生意好得惊人。各种各样的剧院都兴旺发达。一天早晨，在一条山间小路七，我突然遇见了一位陌生的保皇党人，他身着一件切尔克斯服装，有一张紧张、流汗的脸，涂着奇异的黄色。他在愤怒地拉拽他的马，而它对他则毫不留意，继续以一种奇怪地蓄意的步行走下陡直的小路，像一个被冒犯的人离开一个晚会一样。我见过奔离的马匹，但我此前从未见过走离的，而当我认出了那个不幸的骑手就是塔玛拉和我在银幕上如此经常地欣赏的莫祖辛时，在我震惊之余，更感到了一种喜出望外。电影《哈吉·穆拉德》（根据托尔斯泰关于这位勇敢的，善于调马的山中酋长的故事改编）正在那个地区的山区牧场上排演。“叫那只野兽停下〔derzhite prok 加 toe zhivtno。〕”，“他看见我时咬着牙说，但在同一瞬间，随着一阵轧轧响和碾碎石头的离音，两个可靠的糙粗人奔下来援救了他，而我攀缘而上，带着我的蝴蝶网，走向高高的山崖，藻虾属眼蝶的界海种族正在那里等待着我。

在 1918 年的那个夏天，一个海市屋楼的青春的可怜的小绿洲，我弟弟和我时常造访那个拥有海滨领地奥莱兹的友善而怪癖的家庭。一种戏谑的友谊很快在我的同龄人莉迪亚·t 和我之间发展起来。许多年轻人总在周围，四肢棕黑、戴着手镯的年轻美人，一位叫做索林的著名画家，演员们，一位芭蕾男演员，快乐的白军军官，其中一些人将很快死去，而另一方面海滩聚会，毯子聚会，营火，月光粼粼的海和克里

240 纳博科夫

米亚的 mascat 玩 nel ① 的丰富存储，许多爱情娱乐在继续着；整个这段时间里，衬着这轻浮、颓废和多少有点不真实的背景（我乐于相信它唤起了普希金在一个世纪前访问克里米亚时的气氛），莉迪亚与我玩着我们自己发明的一个小小的绿洲游戏，这个主意包括嘲弄地摹仿一种传记方法，它仿佛被投入了未来，并由此把一个似是而非的现在改造为一种平行的往昔，就像一个颤抖的回忆者所感觉的那样，他透过一道无助的雾障，回想起他与一位大作家在两人都年轻时的熟识。例如，或者是莉迪亚，或者是我（那是个偶然的灵感的问题）会在晚饭后，在露台上说：“那位作家爱在晚餐之后出

去到露台上来，“或”我会永远记得 v . v . 在一个温暖的夜里作出的评论：‘这是，’他评论说，‘一个温暖的夜晚’，；或者，更愚蠢的：“他有在抽烟之前点着它的习惯”——这一切都是以非常深沉、怀旧的热情讲出来的，在那时似乎热闹而又无害于我们；但现在——现在我发觉自己疑惑着，我们当真没有在不知不觉中打扰了某个邪恶而怨毒的魔鬼吗？

在那些个月份里，每次一只邮包从乌克兰运到雅尔塔，都会有我的塔玛拉给我的一封信。没有什么比信件，托那位想象不到的传递者的福，通过内战的奇异混乱的方式更加玄奥的了；但每当由于那混乱，我们的通信出现了某种中断时，塔玛拉都会那样行事，好像她把递送归为普通的自然现象，诸如天气或潮汐，人事无法影响它们，她会责备我不给她回信，而我事实上在那些月份里除了给她写信和想她之外什么也没① 一种康香葡萄。

说 d 巴，气己忆

241

干一 尽管我有过许多次的不忠。

设法在一篇虚构作品中保存年轻时收到的一封真实情书的小说家是快乐的，他把它镶嵌于其中，像一颗子弹在无力的肉体中，非常稳固地嵌在里面，在伪造的生命之间。我但愿已用那种方式保留了我们的全部通信。塔玛拉的信是我们如此熟知的乡村风景的一个被确认的追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遥远但清晰得不可思议的唱和，回应着我曾献给她的，表现力远逊的抒情诗。以我无法解开其秘密的毫不娇纵的词语，她高中女生型的散文能以震荡的力量召唤圣彼得堡乡野的潮湿树叶的每一阵簌簌之声，每一片被秋天打上锈迹的羊齿草叶。“下雨时我们为何感到如此快乐？”她在她的最后一封信中问道，仿佛回到了纯粹的修辞来源。“bozhe moy ”（是 mon dieu ① — 而不是“我的上帝”），它到哪里去了，那遥远、光明、持久的一切（俩少。。to jalyoko 。,, vetloe , miloe — 在俄语中这里不需要主语，因为这些是担任抽象名词脚色的中性形容词，在一个赤裸的阶段，在一片柔和的光下。塔玛拉，俄罗斯，归入旧园的野生林地，我北方的桦树与极树，每次我们从城里回到乡村消夏，我母亲都要跪吻土地的那一幕，et la montagneetlegra , dc 肥 ne ② — 这些事物

① 法语“我的上帝”。② 法语“还有山岳和巨大的橡树”。

242

纳博科夫

有一天被命运胡乱捆扎起来投入了大海，将我与我的童年彻底分离。然而，我不知道，对于更加麻木不仁的宿命，对于我们不妨说，时间的一种原本就缺少前途的，光滑、安全、小城镇式的连续性，是否真有许多要说的。当一个人五十岁时仍旧居住在他童年的鱼鳞板房里，于是每次他打扫顶楼都会碰见同一堆陈旧的褐色课本，仍旧混杂在后来的一堆堆死去的物品之中。在那里，在夏季的星期日早晨，他的妻子在边道上停下一两分钟，忍受那可怕的，絮絮叨叨、浓妆艳抹、上教堂的麦吉女人，回到 1915 年，那个女人曾是漂亮、顽皮的玛格莉特·安，有着薄荷清香的嘴和纤细的手指。

我自己命运中的断裂在回忆中给了我一种晕眩的快感，我无论如何不会错过。自从与塔玛拉的那场书信往来起，乡愁在我身上就成了一件敏感而特别的事情。如今，雅伊拉山 _ 乱蓬蓬的青草，乌拉尔山脉中的一座峡谷，或咸海地区的盐碱洼地，它们在头脑中的形象在思乡与爱国方面对我的影响就像，比如说，犹他州那么少，或那么多；但给我无论哪座大陆上的任何相似于圣彼得堡乡野的东西，我的心就溶化了。重睹我往日的环境究竟会是怎样，我几乎无法想象。有时我幻想自己重访它们，带着一份假护照，用一个假设的名字。这是能够做到的。

但我从不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我已太无所事事，太长久地梦想过它。相似地，我在克里米亚的六个月停留的后半段里，我曾用那么长的时间计划加入邓尼金的部队，与其说想骑着一匹戴着头盔的萧萧战马冲进圣彼得堡遍地鹅卵石的郊野（我可怜的尤里的梦想），不如说是想要到塔玛拉身边，到她

说 0 巴，记忆 243 的乌克兰小村庄里，以致到我作出了决定时，这军队早已不存在了。在 1919 年 3 月，红军突入克里米亚北部，从各个港口，一场反布尔什维克部队的纷乱疏散开始了。在塞巴斯托波尔湾一片玻璃般的海上，在岸上射击的狂野的机关枪下（布尔什维克军队刚刚占领港口），我的全家和我乘着一艘载着干果货物的小而质劣的希腊船 nadezhda（希望号）启航前往君士坦丁堡和比雷埃夫斯。我记得当我们蜿蜒着驶出海湾时，我试图专注于同我父亲下的一盘棋——一匹马已经丢了脑袋，一张扑克牌的碎片代替了一个找不着的车——而离开俄国的感觉被那烦恼的思绪完全掩蔽了，就是无论有红军还是没有红军，塔玛拉寄来的信仍然会，奇迹般地毫无必要地，到克里米亚南方来，会在那里寻找一个逃亡的收信者，会无力地来回扑动，如迷乱的蝴蝶被释放于异域，在错误的纬度上，在陌生的植物之间。

第十三章

244

第十三章

在 1919 年，取道克里米亚与希腊，一群纳博科夫——事实上是三个家庭——从俄国逃往西欧。我弟弟和我被安排去剑桥，靠一笔与其说是作为智力价值的承认，不如说是政治灾难的补偿而颁发的奖学金。我家庭的其他成员想在伦敦停

说 d 巴，记忆 245 留一段。生活费用将由那堆珠宝来偿付，它们是由娜塔莎，一位有远见的老女仆，就在我母亲 1917 年 n 月离开圣彼得堡之前，从一个抽屉里塞进一个泌 cessaire ① 的，它们在一段短暂时期内，在一个克里米亚花园里，曾经历过埋没，或许是某种神秘的成熟过程。我们离开了我们在北方的家园，在俄国南方的狭长地带进行一段我们想到会是短暂的等待，一段谨慎的栖留；在希腊，在两个春天的月份里，面对毫不宽容的牧羊犬经久不息的怨怒，我徒劳地寻找着格鲁纳的橙翅尖，埃尔德里希的黄蝶，克鲁帕的白粉蝶：我处于这个国度的错误的部分。肯纳德班轮潘诺尼亚号在 1919 年 5 月 18 日（二十一岁对我来说太过匆匆）离开了希腊驶向纽约，但让我们在马赛下船，我在船上学会了狐步舞。法国在煤一般黑的夜里呼啸而过。当多佛尔——伦敦列车悄悄停下时，苍白的海峡仍在我们体内摇摆。维多利亚火车站肮脏的墙上，重复的灰色梨树图画给我童年时英国女家庭教师用在我身上的浴皂做着广告。一星期后我已经在慈善舞会上与我的第一个英国恋人，大我五岁的一位任性的，杨柳细腰的姑娘跳起了贴面舞。我父亲以前曾经访问过伦敦——最后一次是在 1916 年 2 月，当时他与俄国出版界的另外五个卓越代表一起，被英国政府邀请来观察一下英国在战争中的努力（据传它没有在俄国公众舆论方面获得充分的好评）。在路上，受到我父亲和科内·库科夫斯基要求以 afrika 为韵脚作诗的挑战，诗人兼小说家阿列克赛·托尔斯泰（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伯爵毫无关系① 法语“用品盒”。

246

纳博科夫

系）尽管晕了船，还是写出了这迷人的对句

vizhu pal , . u 1 kafrika eto 一习入 ka

（我看见一棵棕榈树和一个小黑人。那就是非洲。）

在英格兰访问者们参观了舰队。继而是接连不断的宏大宴会和演讲。俄军对埃尔祖鲁姆适时的占领和英格兰悬而未决的征兵提案(“你也将前进吗 还是等到 3 月 2 日?”双关语① 的海报这样提问)给了讲演者容易的话题。有过一次官方宴会,由爱德华·格雷爵士主持 和一次对乔治五世的逗人的采访 库科夫斯基 团中的。心 hnt terrlbi`②, 坚持询问他是否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著作— “dze ooarks of ooald”。那位国王被他的提问者的语调难住了,而且,无论如何,他从来不是一个贪婪的读者,就干净利索地以询问他的客人对伦敦的雾怎么看来回击(后来库科夫斯基常常得意洋洋地引述这件事,作为英国伪善的一个事例— 因一个作家的品行而避讳他)。

最近一次对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访问表明以上的事件并未出现于我父亲的著作 izvoyuyushcheyanglii, 彼得格勒, 1916 年(《战时英格兰报道》))— 事实上, 他惯常的幽默在其中的样本没有多少能够胜过对他与 h . g . 威尔斯进行的一

“也将前进 (march too) ”与“3 月 2 日 (marchz) ”谐音。法语“可怕的家伙”。

① ②

说 q 巴, 记忆 247 次羽毛球赛(还是一场墙手球?) 的描写, 或对佛兰德尔的几条一线战壕的叙述, 在那里殷勤的款待甚至允许了一颗德国手榴弹在来访者身边几英尺之内爆炸。在以书的形式出版之前, 这则报道连载在一份俄语日报上。其中, 怀着某种旧大陆式的天真, 我父亲提到了把他的天鹅牌自来水笔赠送给杰利科海军上将, 他在餐桌上曾借用它来签署一份菜单并称赞了它的流畅与娴雅的笔尖。对这支钢笔的样式的这一不幸的揭示迅速在伦敦报纸上得到了回响, 是一个马比及托德有限公司的广告, 它引用了这段话的译文, 并描画了我父亲在一片海战的混乱天空下把这家的产品交给大舰队的总司令。但此刻没有宴会, 没有演讲, 甚至没有与威尔斯玩的墙手球了, 事实证明不可能令他相信布尔什维主义仅仅是野蛮压迫的一个特别残忍而全面的形式— 其本身像荒漠的沙子一样古老— 而根本不是那么多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什么新得富有魅力的革命实验。在榆树公园花园里一个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昂贵的月份之后, 我父母和三个弟妹离开伦敦去了柏林(在那里, 直到他在 1922 年 3 月去世为止, 我父亲一直与伊奥西夫·海森, 人民自由党的一位同仁一起编辑一份俄国流亡者报纸), 而我弟弟和我则去了剑桥— 他去基督学院, 我去三一学院。

我有两个弟弟, 谢尔盖和基里尔。基里尔, 最小的孩子(1911 — 1964), 也是我的教子, 在俄国家庭里事情就是这样。

在我们维拉的会客室里，在洗礼的某个阶段，我小心翼翼地抱起他，然后把他交给他的教母，艾卡特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丹扎斯（我父亲的大表姐，也是普希金那次致命的决斗的助手 k.k. 丹扎斯上尉的一个侄孙女）。在童年，基里尔与我的两个妹妹一起属于那间遥远的保育室，在城里的房宅和庄园里都与他两个兄长的套间如此明确地分开着。在我侨居欧洲的两个十年，1919 — 1940 年，我很少见到他，那以后则从未相逢，直到我在 1960 年再次访问欧洲，此后是十分友好而快乐的聚会的一段短暂时期。

基里尔在伦敦、柏林和布拉格读书，在卢万上的大学。他娶了吉尔伯特·巴尔班森，一位比利时姑娘，经营（幽默地但并非不成功地）布鲁塞尔的一家旅游代办处，在慕尼黑死于一次心脏病发作。

他爱的是海滨胜地和丰富的食物。他像我一样厌恶斗牛。他说五种语言。他是个天才的恶作剧者。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的现实是文学，尤其是俄国诗歌。他本人的诗篇反映了古米廖夫和霍达维奇的影响。他发表得很少，他对他的写作总是保持沉默，像对他被戏谑遮蔽的内心一样。

由于各种原因我发现要谈论我的另一个弟弟过于困难了。对塞巴斯蒂安·奈特（1940 年），对它的 glieriettes ① 和自作对手的结合的那种迂回的追求，与我在这本回忆录的第一稿中停步不前而如今又直接面对的工作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除了我在早先的章节里勾勒的两三次可怜的小小冒险之外，① 法语“鸟笼，亭子”。

说。巴，记忆

249

他的童年很少与我的汇合。在我最丰富最详尽的记忆中，他仅仅是个阴影。我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他呢，娇生惯养的见证人。生于 1900 年 3 月 12 日，剖腹产，在我之后十个半月，他比我早熟并且在外表上看更老些。我们很少在一起玩耍，他漠不关心我所热衷的大多数事物——玩具火车、玩具手枪、红印第安人、红纹丽峡蝶。六七岁时，在 mademoiselle 的纵容下，他对拿破仑发展起了一种热烈的崇拜，上床时要拿着一个他的铜质胸像。小时候，我是吵闹的，冒险的，近乎一个恃强凌弱者。他安静而倦怠，与我们的导师一起度过的时间远比我多。十岁，他开始对音乐感兴趣，从那以后他上了数不清的课，\

与我们的父亲一同去参加音乐会，在楼上一架听力所及的钢琴前成小时地连续演奏歌剧片断。我会从后面爬上去戳他的两肋——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们在不同的学校上学；他上的是我父亲以前的 glmnas 州。①，穿正规的黑色制服，在十五岁时，他在上面增加了一点非法的润饰：鼠灰色鞋罩。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在他的书桌上发现并阅读了他日记中的一页，并在愚蠢的惊奇中把它出示给我的家庭教师，他立刻就把它给我的父亲看了，它意外地对他行为上的某些怪异提供了一次回溯往事的澄清。我们两人都喜欢的唯一运动是网球。我们经常一起打网球，尤其在英格兰，在肯兴顿一个不规则的草地球场，在剑桥一个良好的泥地球场。他是个左撇子。他是个糟糕的口吃者，妨碍了对争议点的辩论。尽管送球无力和缺少任何真正的① 高中。

250 纳博科夫

反手，要打垮他却并不容易，他是那种发球从不双误，并像一堵砰然作响的墙一样把每个球都送回来的球手。在剑桥，我们比以往任何地方见面都多，并且，只此一次，有几位共同的朋友。我们双双以同样的学科，同样的学位毕了业，之后他迁往巴黎，在以后几年里他在那里开了英语和俄语课，就像我在柏林所做的那样。

我们再次见面是在 1930 年代，并且在 1938 — 1, 40 年，在巴黎保持十分友好的关系。他时常到波瓦露街来上门聊天，我就与你和我们的孩子寄住在那里两间破旧的屋子里，但事情就是这样（他外出了一段时间），他在我们离开之后方才得知我们已启程去了美国。我最荒凉的回忆联结着巴黎，离开它的解脱是不可遏止的，但我很遗憾他只能结结巴巴地向一个无动于衷的看门人诉说他的惊讶。我对他在战时的生活所知甚少。有一段时间他被聘为柏林一个机关的翻译。作为一个坦荡无畏的人，他在大学生面前抨击了那个体制，而他们告发了他。他被捕了，被控为一个“英国间谍”，并被送往汉堡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在 1945 年 1 月 10 日，他死于饥饿。正是那些生命中的一个，无望地要求享有某种被延误的事物——同情，理解，无论什么——对这样一种要求仅仅加以承认是无法取代它，也无法挽救它的。

我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并不吉利。在十月里阴暗而潮湿的一天傍晚，怀着沉面于某些怪诞的戏剧表演之感，我

说 a 巴，记 1 乙 251 穿上我刚刚获得的，泛蓝的黑色学位长袍，和黑色的四方帽第一次拜访 e . 哈里森，我的学院导师。我走上一段楼梯，敲响了一扇微启的沉重大门。“进来，”传来一个遥远的声音，带有空洞的突兀之感。我穿过一间勉强可算会客室的房间走进我导师的书房。褐色的黄昏抢在了我的前面。书房黯然无光，唯有一只大火炉在闪耀，边上一个暗淡的形象坐在一张更暗淡的椅子上。我上前说道：“我的名字是——”我迈步碰翻了地毯上摆在哈里森低低的柳条扶手椅一边的茶具。他从他的座位上侧身弯腰扶正茶壶，又掬起它所吐出的茶叶，并把它们倒回里面。就这样我一生中的大

学时期开始于一个窘迫的音符，一个在我的三年居留期间可说是不断重复的音符。哈里森先生认为让一个“白俄”与另一个寄住在一起是个好主意，因此，起初，我与一个困惑的同胞同处于三一巷的一套公寓里。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学院，而我则留下成了那几间宿舍的单独住客。它们与我遥远并且到如今早已不存在的家相比似乎是肮脏得不可忍受的。我清楚地记得那壁炉台上的装饰（一个玻璃烟灰碟，上有三一学院的徽章，是以前某个寄宿者留下的；一只海螺，在里面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海滨夏季被囚禁的嗡鸣），和我的女房东的旧机械钢琴，一架可怜的奇异机器，充满了破裂的，压碎的，卡住的音乐，一个人试上一遍就敬谢不敏了。狭窄的三一巷是一条肃穆的并且可说是悲哀的小街，几乎没有交通，但有一段漫长而耸人听闻的往昔，始于十六世纪，那时它是芬德西尔弗巷，尽管当时由于它阴沟的恶劣状况，通常被称作一个更加粗俗的名字。寒冷使我吃尽了苦头，但是，据一些人说，剑桥卧室的

252 纳博科夫

极地温度使盥洗架上水罐里的水结成坚冰，则是不实之词。其实，水面上很少会有一层以上的薄冰，而这很容易用牙刷来敲成叮当响的碎片，在回忆中，这是一种对于我美国化的耳朵甚至有某种节日般的魅力的声音。否则，起床就毫无乐趣了。在我的骨骼中我还感觉得到清晨走上三一巷去浴室的步行的寒冷，一个人曳足而行，喷吐出苍白的呼吸，睡衣外面穿着薄薄的睡袍，手臂下夹着一只冷冷的胖胖的海绵包。世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引诱我紧贴着我的皮肤穿一件使英国人秘密地保持温暖的“毛衣”。大衣被视为柔弱。普通剑桥生通常的服装，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左派诗人，都有一种强壮与肮脏的特征：他的鞋子有厚厚的橡皮底，他的法兰绒裤子是黑灰色的，而有钮扣的汗衫，称为“jumper”，在他的诺福克外衣里面是一种保守的褐色。我估计可以称之为同性恋者的团体穿的是无带低跟鞋，非常淡的灰色法兰绒裤子，一种明黄色“jumper”，和一套好衣服的外衣部分。到那时我青年期对衣物的专注已经衰弱了，但是依照俄国的礼仪风尚，穿着拖鞋四处走动，免用袜带，戴着缝在衬衫上的假领——那些日子的一次大胆创新——看来确实可说是一种乐趣。

我懒散地参加的温和的假面舞会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这样琐屑的印象，以这种风格继续下去将是乏味的。我在英国的大学岁月的经历其实就是我努力成为一个俄国作家的经历。我感觉剑桥与它所有著名的特征——令人肃然起敬的榆树，有纹章的窗子，饶舌的塔钟——在它们自身方面没有结果，而只是为了铸造和支撑我富足的乡愁而存在的。从情感上说，我处在一个失去了一位慈爱的女亲戚的人的处境里，认识到

说吧，记忆

— 太晚了— 出于被照例麻醉了的人的灵魂的某种慵懒，他从未费心去全面了解她，而她是值得去了解的，他也没有彻底地向她表露他当时尚未觉察到，而如今则是不可排解的，爱的信号。当我用剧痛的双眼在我的剑桥宿舍里的火炉边沉思，灰烬的一切有效的平凡，孤独与遥远的琴音压迫着我，扭曲着我脸上深深的皱纹，像一个飞行员的脸被他幻想般的飞行速度破坏了形状。我也想到了我在我的国度错过的一切，想到倘若我曾经猜到过我的一生会以这样一种剧烈的方式转变的话，我绝不会不去留意和珍视的那些事物。

对于我在剑桥遇见的一些流亡者同胞中的几位，我感觉的大致倾向是如此的明显和熟悉，以至于倘若形诸词语就会陷入平直并显得几乎不正确了。与那些白俄中较白的人在一起，我很快发现爱国主义与政治已经减低为一种猜忌的愤恨了，它指向克伦斯基更多于指向列宁，仅仅来源于物质的困苦与丧失。接着，我也卷入了与我的一些英国熟人的几次十分出乎意料的争论，他们被认为是有文化与机敏的，并且是高尚的，但是与他们的一切礼貌与高雅相反，在讨论到俄国时他们都会陷入最令人震惊的胡言乱语之中。在这里我要挑选出我认识的一位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一个瘦长的巨人，他对一支烟斗的缓慢而多样的操作，在你与他意气不投时就极度恶化，而当你与他合得来时就会令人愉快地缓和下来。我与他有过多次政治上的争论，它们的激烈，当我们转向我们两人都珍视的诗人时，就一成不变地烟消云散了。今天他在他的济辈中并非默默无闻，我毫不迟疑地承认，这是个相当没有意义的句子，但我还是尽量隐瞒他的身份；让我以“内斯比

254 纳博科夫

特”这个名字来指称他吧，我曾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或现在断言曾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不仅因为他曾被宣称为相似于那个时代一个地区性的平庸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早期肖像，他最初的小说之一（“我的同路人”，另一个恰切的评注）曾由某位 r . 内斯比特·班翻译过，而且还因为“内斯比特”具有一个好处，能够进入与一个我必须立即唤出的名字，“易卜生”的一种耽于声色的回文联想^①。

一些人的主张很可能是对的，就是英国与美国自由主义舆论在二十年代对列宁主义的同情是由本国政治的考虑掀起的。但这也起因于简单的消息误传。我的朋友对俄国的过去有的只是很少量的了解，而这少量也还是通过受了污染的共产主义渠道到达他那里的。当他被要求为列宁所批准的兽性恐怖—拷问间，溅满血污的墙—进行辩解时，内斯比特会在火炉栏杆把手上敲下他烟斗的烟灰，不祥地重新交叠起他穿着大而沉重的鞋子，灵巧地交叠的双腿，低声说出“联合封锁”之类的事情。他把各种颜色的俄国流亡者，从农民社会主义者到白军将军概括为“沙皇主义因素”—正不亚于如今的苏联作家之挥舞“法西斯蒂”这一术语。他从未认识到倘若他与其他的外国理想主义者是身在俄国的俄

国人，他和他们早就被列宁的政权消灭了，自然得就像兔子被雪貂和农人消灭一样。他坚称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较之最为黑暗的沙俄时代，被他严肃地称为“较少的言论多样性”的情况，原因在于“俄国缺少任何的言论自由传统，”他从，我相信，在那① 内斯比特（nesbit），易卜生（ibsen）。

说吧，记忆

255

些日子里，他从能言善辩的英美列宁主义者写下的“俄国黎明”之类货色中获取的见解。但最令我恼怒的也许是内斯比特对列宁本人的态度。一切有文化，有辨别力的俄国人都知道这位狡黠的政治家在美学问题上所拥有的鉴赏力和趣味大约相当于一个福楼拜式或皮埃尔①一类的普通俄国布尔乔亚（那种凭籍柴可夫斯基的末流歌诗来欣赏普希金，听意大利歌剧流泪，受任何讲述故事的绘画蛊惑的人）；但内斯比特和他志趣高雅的朋友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最新艺术潮流的敏感的，具有诗意心灵的赞助者与倡导者，而当我试图解释在先锋政治与先锋艺术之间的联系只是字面的（被苏维埃宣传愉快地利用），以及一个俄国人在政治上越是激进，他在艺术这一面就越是保守的时候，他会报以一丝高超的微笑。我有许多这样的真相供我支配，我乐于炫耀一番，但牢牢地自封于他的无知的内斯比特只把它们当成想象。俄国的历史（比如，我会宣布）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两者，由于某种原因，同样令内斯比特恼怒）：第一，作为警察的进化（一种奇怪地非私人的和超然的力量，有时在虚空中运转，有时毫无用处，在别的时候其残酷的迫害胜过了政府）；第二，作为一种神奇的文化的发展，一个热爱自由的俄国人要表达自己有着不可比拟地更多的手段，而所冒的危险时常是不可比拟地更少。自从1860年代的改革以来，这个国度拥有了（尽管并不总是坚持）一种任何西方民主都会为之骄傲的法制，一种使暴君却步不前的充满活力的公众舆论，各种色度的被广泛①法语“市侩”。

256 纳博科夫

泛阅读的自由派政治思想期刊，以及尤其引人瞩目的，无畏而独立的法官（“哦得了吧……”内斯比特会插话说）。在革命者当真被捕时，到托木斯克或奥姆斯克（今鲍姆斯克①）的流放与列宁所引入的集中营相比只算得上一次休闲的假期。政治流刑犯笑闹剧般轻松地逃出西伯利亚，证据是托洛斯基的著名逃亡——圣列夫，圣诞老人托洛斯基——乘着一辆驯鹿拉的圣诞雪橇快乐地归来：接着，是狼烟，接着，是愚蠢，接着，是屠夫与闪电！

我很快觉察到如果我的观点，国外支持民主的俄国人的那种并不特别的观点，被 in, itu ② 支持民主的英国人怀着痛苦的惊讶或有礼貌的讥嘲接受下来的话，另一群人，英国极端保守分子则焦急地站到我一边，但这样做却是出于那样一种赤裸裸的反革命动机，以致他们可鄙的支持仅仅令我窘迫。事实上，我自豪的是甚至在那时就认清了如今那么明显的东西的病征。如今一个家庭圈子已经渐渐形成，连结着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丛林空地里愉快的帝国建造者，法国警察，不值一提的德国产物，善良的上教堂的俄国或波兰老 pogromshchl ' k ③，瘦削的美国私刑者，长着坏牙，在酒吧间或厕所喷出反少数民族的故事的人，以及，在这亚人类圈子的另一点上，那些身着华丽的约翰·赫尔德裤和高肩外衣的无情的，浆糊面孔的机器人，那些在我们所有的谈判桌前隐现的

① bombsk，也可译作“炸弹斯克”。② 拉丁语“在其位置上”；“原本是”。③ 大屠杀的组织者或参加者。

说 d 巴，i 己忆 257 sitzriesen ①，苏维埃国家在 1945 年前后输出他们——或者我应该说它们？——此前已经淘汰培育和裁制了两个十年，这期间在国外人们的服装式样有时间进行改变，因此那种具有无限用途的布料的代表所能引起的就只有残酷的耻笑（这在战后英格兰发生过，当时一个著名的苏联职业足球队球员们碰巧穿着便衣结队而行）。

很快我就离开了政治而专注于文学了，我把《伊戈尔远征记》（十二或十八世纪晚期的那首无与伦比的神秘史诗）中的红色盾牌与蓝色闪电、普希金和丘特切夫的诗歌、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散文，还有探索与描述了中亚荒野的伟大的俄国自然主义者的精彩作品邀请到我在剑桥的房间。在市场的一家书店里，我意外地遇见一部俄语著作，转手的达尔四卷本《现行俄语解释辞典》。我买下了它，决定每天至少读十页，匆匆地摘记下那些会令我特别愉快的词语和辞句，而且我将这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害怕由于外国的影响，我从俄国抢救出来的仅有的事物——她的语言——会丧失与腐败，这种恐惧已变得确定无疑地病态了，并且比两个十年之后我所体验到的，对于我从来就不能将我的英语散文提高到接近我俄语水平的任何高度这样一种恐惧更令我不安得多。我时常彻夜不睡，被堂吉诃德式的一堆厚重的书本包围着，创作① 交椅上的巨人。

258

纳博科夫

典雅并称得上不结果实的俄语诗歌，它们与其说是出自某种强烈情感的活细胞，倒不如说是围绕着一个我想为了它本身而使用的生动词语或一个字面的意象。倘若我那时发现了如今看得如此清楚的，那些在我房间里跑来跑去，像驯服的老鼠一样遍布我全

身的各种同时代（“乔治时期”）英语诗歌模式对我的俄语结构的直接影响，是会使我大吃一惊的。再想想我所花费的劳作！突然，在十一月的一天凌晨的钟点里，我会觉察到那寂静与寒冷（我在剑桥的第二个冬天看来是最冷的，也最多产的一个）。我在其中看见了一场传说中的战斗的红色与蓝色火焰已经降为古老的极树间一次北极日落的阴郁闪耀。我还是无法迫使自己上床，与其说是害怕失眠，不如说是害怕受床单的寒冷峻使的不可避免的双重收缩，还有那称作下肢不宁性焦虑的奇怪行为，一种不倦的痛苦状况，肌肉感觉的一种剧烈增长，导致人的四肢不断地改变姿势。于是我会堆上更多的煤并把伦敦《时代》上的一页纸铺在火炉乌黑冒烟的狭口，如此完全屏蔽住它敞开的幽室，来帮助火焰重新烧旺。一阵嗡嗡的声音会在绷紧的纸张后面响起，它将获得鼓皮的光滑与明亮的羊皮纸的美丽。少顷，当嗡嗡声变成一种咆哮，在纸页的中心会出现橙黄的一点，而那里无论是一片什么样的铅字（比如“联盟并不命令一个基尼或一支枪”或“... 涅墨西斯对于东部与中部欧洲共同的迟疑与不果决的报复... ”），都以不祥的清晰浮现出来——直到那橙黄的一点突然燃烧起来。接着那冒着火苗的纸页，发出一只解放了的凤凰的呼啸，会飞上烟囱汇入群星。如果那只火鸟被见到就得付出五先令的罚金。

说吧，记忆

259

那个文学群落，内斯比特和他的朋友们，一面称赞我夜间的努力，一面对我所参加的各种其它事情皱起眉头，诸如昆虫学、恶作剧、姑娘们，尤其是体育。我在剑桥进行的比赛中，足球素来是一块当风的空地，在一段可说是混乱之极的时期之中。我疯狂地迷上了守门。在俄国和拉丁国家，那种勇敢的艺术总是笼罩着一个独特魅力的光圈。远离，孤独，冷静，那高超的门将在街上身后总跟着狂喜的小孩子。他作为激动的崇拜的对象，与斗牛士和飞行专家一比高低。他的汗衫，他的尖顶帽，他的护膝，从他短裤后袋伸出来的手套，把他与队里其他人分开。他是孤鹰，神秘的人，最后的防守者。摄影家们尊敬地屈下一膝，在他飞身作出一个壮观的鱼跃横过门口用他的指尖使一记闪电般的低射偏离时，拍下他的快照，而体育场欢呼起来，而他在一两个分秒中直直地卧躺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大门仍旧安然紧闭。

但在英格兰，至少在我年轻时的英格兰，对于炫耀的全国性恐惧和一种对于队内固定配合的过于严格的专注使门将的怪癖艺术无法得到发展。这至少是我对于在剑桥的赛场上不是大为成功所挖掘出来的解释。哦，诚然，我有过我光辉的，令人振奋的日子——草皮的香气，那位著名的，在球队间穿插的前锋，盘带着他飘忽不定的足尖前面那只褐色的新球离我越来越近，然后是那匕首般的射门，幸运的扑救，它被延长的震痛——

但还有别的，更加值得记忆，更加秘密的日子，在阴郁的天空下，门区里一片黑泥，足球像干果布丁一样腻滑，而我的脑袋在一夜无眠的作诗之后，受着神经痛的折磨。我会糟糕地扑接——然后从网中找回皮球。慈悲为怀地，比赛

260 纳博科夫

会摇摆到水渍的球场的对面。一场虚弱，厌倦的细雨会落下，犹豫一阵，又再继续下去。柔和的嘎嘎叫声中透出一种几乎是呢喃的温柔，羽毛残破的白嘴鸦会在无叶的榆树上来回扑动。雾气会汇集起来。此刻比赛会成为一串头颅的模糊起伏，在正与我们较量的圣约翰队或基督队或者无论哪支球队的遥远球门附近。远处朦胧的声音，一声喊叫，一记口哨，一个大脚的砰然之声，那一切都完全无关紧要并且与我毫无关系。我与其说是个足球大门的看守者，不如说是个秘密的看守者。交叠着双臂我倚靠在左边门柱上，享受闭上眼睛的奢侈，如此我将倾听我的心跳，感到我脸上盲目的细雨，听到远处比赛断断续续的声响，想到自己就像想到一个奇妙的异国生命，披着一个英国足球选手的伪装，用一种没有人懂得的语言构思着有关一个没有人知道的遥远国度的诗篇。我与我的队友相处得不太好，这并不奇怪。

我在剑桥的三年里没有一次——再说一遍：没有一次——造访过大学图书馆，甚至也没有费心去找出它的位置（我现在知道它的新址了），或弄清楚是否存在着一个可以借书出来在寄宿舍里阅读的学校图书馆。我逃课。我溜到伦敦或别的地方。我曾同时置身于几场恋情。我曾与哈里森先生进行可怕的交谈。我把鲁伯尔特·布鲁克的二十首诗、《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罗曼·罗兰的《科拉·布鲁尼翁》译成了英语。学究式地看，我足可以升入地拉那的 m.m. 学院了。人们在比赛之后喝茶时吃的热小松饼和圆脆饼，或者在晖色四合的街道上与自行车铃声混合在一起的报童伦敦东区口音的喊叫“笛手！笛手！”——这类事物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

说d巴，记忆261 比如今更显得是剑桥的特征。我没法不认识到，除了动人的但多少是短暂的习俗，比礼仪或规则更深，确实存在着某种有关剑桥的残余物，许多严肃的校友曾试图给它下出定义。我把这基本财产视为一个人对一段不受阻碍的时间的不断觉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 would 到剑桥去寻找我足球靴上的圆头钉在一个张着大口的球门前的黑泥上留下的，或跟随我帽子的阴影穿过方庭走向我导师的楼梯的脚印；但我知道在我经过那些可敬的墙边时，我想到了弥尔顿、麦尔维尔和马洛，怀着比一个旅游者更多的激动。从时间上说，一个人曾观看过的东西都不是关闭的，一切都是进入它的自然通道，这样一个人的头脑就渐渐习惯于在一个特别纯净和富足的环境里工作，而且，因为从空间上看，窄巷、修道院的草地、黑暗的拱门在肉体上阻碍着一个人，所以时间的那种易弯的半透明质地，相对而言，就特别受到头脑的欢迎，就像一扇窗前的海景会令人

大为振奋，哪怕他并不关心航海。我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没有任何兴趣，并且十分肯定剑桥无论如何都没有影响到我的心灵，尽管实际上是剑桥给我非常特殊的俄国思想不仅提供了偶然的框架，而且还有它的真正色彩和内在的韵律。环境，我猜想，确实会对一个生命产生作用，倘若在那个生命体内已经有了某种回应的微粒或气质的话（我在童年就已吸收了英语）。对此我最早有所知觉恰是在离开剑桥之前，我在那里的最后与最悲伤的一个春天期间，当时我突然感到我心中的某种东西正在与我眼前环境自然地接触着，正如它与我在俄国的往昔接触一样，以及这一和谐状况正是在我终于完成了对我人工的但确凿得美丽的俄罗斯世界的重建那一刻达到的。

262

纳博科夫

我想我曾经问心有愧的极少的“实际”行动之一，就是使用那水晶般的材料去获得一个优等学位。

我记得在卡姆河上方头平底船与独木舟梦幻般的漂流，唱机里夏威夷的悲鸣漫过阳光与阴影，一个姑娘倚在我曾做梦领航的平底船的垫子上，她的手轻轻地来回旋转她孔雀般明亮的阳伞。鲜红色果实的栗子树满满张开扇形；它们密密地沿着河岸层叠铺展，它们挤满了河里的天空，它们特别的花朵与树叶图案造成了一种。n' escalier ① 效果，尖尖地呈现出某种华丽的绿色与旧玫瑰缀锦。空气像克里米亚一样温暖，有某种开花灌木丛的同样甜蜜而毛绒绒的气味，我从来就无法将它认清（后来我在南方各州的花园中捕捉到了它的闪现）。一座意大利式桥梁的三个弯拱，跨过狭窄的溪流，连结在一起，靠着它们在水中近乎完美，近乎毫无波动的复制品的帮助，形成了三个可爱的卵形。至于河水，则是在内拱弧的石头上投下了一片花边似的光，下面人们的小舟滑行而过。不时地，在一棵开花的树的荫蔽下面，一片花瓣会落下，落下，落下，而怀着见到了一种无论是崇拜者还是无心的观赏者都不应见到的某种事物的奇怪感觉，一个人会转眼瞥视它的倒影，它迅速地—比花瓣坠落更快—升起来与它碰面。而在一秒钟的瞬间里，一个人害怕那戏法将失灵，那被赐福的油将不被① 法语“楼梯状”。

说吧，记忆

263

点燃，那反影将会错过，花瓣独自飘走，但每一次那精巧的聚会都发生了，有着一个诗人的词语在中途遇见他的，或一位读者的回忆那样一种神奇的精确。

在大约十七年的别离之后，当我重访英格兰时，我犯下了那个可怕的错误，不是在复活节期辉煌的末尾去再次游览剑桥，而是在二月里一个阴天的日子，它只使我回想起我自己零乱陈旧的乡愁。我毫无希望地试图在英格兰找一个大学职位（我在美国获得那一类工作的轻易对我来说，在回顾之中，是惊喜感激的一个长久源泉）。从各方面看这次访问都不成功。我与内斯比特在一个小地方用了午餐，那儿理应充满了回忆，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变化，并没有。他已戒了烟。时间柔和了他的容貌，他也不再像高尔基或高尔基的翻译者了，但看上去有点像易卜生，只少了猿猴似的植被。一种意外的担心（为他看房子的表姐或女仆刚被转到比奈的门诊所或类似地方）似乎阻止了他专注于我想对他谈论的十分个人的和急迫的问题。《潘趣》的精装本堆在某个小前厅的一张桌子上，那里曾经放着一缸金鱼——一切看来是多么不同啊。女侍者们所穿的华美制服也不一样了，她们中没有一个像我记得如此清晰的特别的一位那么漂亮。可说是绝望地，仿佛在与厌倦作斗争，易卜生谈论起了政治。我深知该期待什么——对斯大林主义的谴责。在二十年代早期内斯比特曾错把自己奔放的理想主义当作了可怖统治中的某种浪漫而仁慈的事物。易卜生，在同样恐怖的斯大林的日子里，把他自己的知识量的增长误认为是苏联体制的质变。波及“老布尔什维克”，他年轻时代的英雄们的大清洗的晴天霹雳，给了他一次有益的震动，在

264 纳博科夫

列宁的日子里从索洛夫斯基强制劳动营或卢布扬卡地牢里传来的所有呻吟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怀着恐惧他讲出了艾兹霍夫和雅各达的名字——但全然忘记了他们的前任，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当时间改进了他对于同期的苏联事务的判断力之际，他并没有费心去重新考虑他年轻时先入为主的观念，仍旧在列宁的短暂统治中看到了一种富有魅力的 *quinquennium neronis*。

他看了看表，我也看了看表，我们分手了，我在雨中漫游全城，接着访问了 the backs ①，注视了一会儿光秃秃榆树的黑网中的白嘴鸦，注视雾气凝为珍珠的草皮上初放的番红花。当我在那些被歌唱的树下漫步时，对于我的学生岁月，我试图使自己沉溺于那种迷醉怀旧的情绪，与那些岁月里我对于我的童年所体验到的同样的情绪，但我能唤起的一切只是支离破碎的小图画：m.k.，一个俄国人，消化不良地咒骂着一顿学院大厅聚餐后的反应；n.r.，另一个俄国人，像个孩子似地四处嬉戏；p.m.，手持一本刚从巴黎偷运过来的《尤里西斯》冲进我的房间；j.c.，静静地进来说他也刚失去了父亲；r.c.，诱人地邀请我与他同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一游；克里斯多弗·某某，伍妮地退出一次安排就绪的网球双打，因为他得知他的搭档是个印度人；t.，一个老而虚弱的侍者，在大厅里把汤溅在了 a.e. 豪斯曼身上，后者猛地站起身来，像一个人从恍惚中惊醒；5.5.，他无论如何都与剑桥没有干系，但他曾在一次文学

聚会(在柏林)上坐在椅子上打瞌睡,① 剑桥大学某些学院里在剑河(the river cam)沿岸的草地和校园。

说吧,记忆 265 被一位邻座碰了一下,也突然站起身来— 在某人朗读一个故事的中途;刘易斯·卡罗尔的睡鼠,出人意料地开口讲一个故事;e . 哈里森出人意料地赠送给我《什罗普郡羊童》,一本关于青年男子与死亡的小小诗集。

那乏味的一天缩减到了灰暗西方的一道淡黄色条纹,这时,出于一种冲动,我决定去造访我年老的导师。像个梦游者,我爬上熟悉的梯级,自动地敲响了写着他名字的虚掩的门。以一种少了一点突兀,但多了些空洞的嗓音,他叫我进来。“我不知道您是否记得我... ..”我开口说道,这时我穿过昏暗的房间来到他坐在安适的火炉边的地方。“让我看看,”他说,在他低低的椅子上慢慢转过身来,“我好像不是十分... ..”一声阴郁的碎裂,一声宿命的回响:我迈步碰翻了立在他的柳条椅脚下的茶具。“哦,对了,当然了,”他说,“我知道你是谁。”

第十四章

266

第十四章

螺旋是个精神化的循环。以螺旋的形式，这循环被松开、旋散，不再是恶性的；它被解放了。我对此进行思考时还是个小学生，我也发现了黑格尔的三级序列（在旧时的俄国是如此流行）仅仅表现了一切事物在它们与时间的关系上本质的

说吧，记忆 267 螺旋性。旋转接着旋转，每一个合题都是下一序列的正题。倘若我们思考最简单的螺旋，有三个阶段要区分开来，与三级论的相对应：我们可以称“正拱”为从中心开始那缠结的小弯曲或拱形；“反拱”是在继续着第一个拱形的过程中与之相对的更大的拱形；还有更为巨大的拱“合拱”，继续第二个拱，同枢循着第一个拱的外侧。依此类推。

在一粒玻璃小球里的一个彩色螺旋，我就是这样看我自己的一生。我在我的祖国俄罗斯度过的二十年（1899 — 1919 年）代表正面拱形。在英格兰、德国和法国的二十一年自愿流亡（1919 — 1940 年）提供了明显的反拱。在接纳了我的国家度过的时期（1940 — 1960 年）则形成了一个合拱——也是一个新的正拱。此刻我关心的是我的反拱阶段，尤其是我 1922 年从剑桥毕业后在欧洲大陆的生活。

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我看见自己，以及成千上万的别的俄国人，过着一种奇特但无论如何说不上不愉快的生活，处于物质的贫穷与智识的奢华里，在幽灵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我们，流亡者们，碰巧居住在他们或多或少是幻想的城市里。这些土著对于心灵之眼就像玻璃上刻画的形象一样扁平 and 透明，尽管我们使用他们的小器械，对他们的小丑鼓掌，摘下他们路边的李子和苹果，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却从不存在那种在我们自己中间如此广泛的丰富的人际交流。这有时显得是我们忽视了他们，就像一个妄自尊大或愚蠢透顶的入侵者忽视一大批无形无名的土著人一样。但偶尔，事实上是十分经常地，我们通过它真诚地夸耀我们的痛苦与艺术的那个幽灵世界，会造成一种可怕的惊厥，向我们展示谁

268 纳博科夫

是无形的俘虏，谁又是真正的主人。我们对这个或那个冷冷地给予我们政治收容所的国家完全的肉体顺从，在必须取得或延长某份毫无价值的“鉴证”，某张令人气愤的“身份证”的时候，就变得令人痛苦地明显了，因为那时一个官僚的地狱会试图阻止这位请

愿者，他会消瘦下去，而他的卷宗则会在老鼠胡须的领事和警察的办公桌里越来越胖。dokumentl 有人说，是一个俄国人的胎盘。国际联盟给失去了俄国公民资格的流亡者配备了一份所谓的“南森”护照，一份十分次要的证件，有一种憔悴的绿色调。它的持有者略胜于一个出狱的罪犯，并且每次他希望从一国旅行到另一国都必须经过最严酷的考验，国家越小，它们造成的忙乱就越是恼人。在他们的腺体背面某处，当局分泌出了那样一种观念，就是无论一个国家会是多么坏，任何逃离它的人本质上都是可鄙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国家政体之外；因些就以某些宗教团体看待私生子的那种荒唐的谴责来看待他。我并非全都同意成为杂种和鬼魂。一些俄国流亡者珍视的，有关他们怎样在各个部门，p 八诉 cturc ，② 和尸 olizeipraesidium ，③ 里侮辱或愚弄了高级官员的回忆是甜蜜的。

在柏林或巴黎，流亡者的两个大都会，俄国人形成了殖民营地，它们的文化系数大大超过了它们座落于其中的必然更加稀释的外国人社区的文化平均道。在那些殖民地里他们

① 文件。② 法语“警察局”。③ 德语“警察局”。

i 兑 d 巴，气己月艺

269

只与自己人往来。当然，我所结交的俄国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民主团体，而不是美国俱乐部妇女一提到“白俄”就会想到的“你知道，是沙皇的谋士之流”，那种更加华而不实的人物。在那些居留地里生活是如此充实和热烈，那些俄国“intelligent”（这个词比在美国使用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社会理想主义而较少高级趣味的意义）既无时间也无理由在他们的圈子之外寻找纽带。今天，在一个新的，备受热爱的世界里，我像当初不再禁止自己玩接七牌戏那样容易地学会感到习以为常的是，那些外向型人和世界主义者们每每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责备我是反面的势利眼，在我偶然向他们提到这些往事，坚持说在西欧度过的将近五分之一世纪的时期里，在我认识的少数德国人与法国人（大多数是女房东和文人）中，总共只有两个好朋友的时候。

不知怎么回事，在我客居德国的幽闭岁月里，我从未碰见那里的那些彬彬有礼的音乐家，他们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演奏他们的狂想曲直到深夜；或那些把猎物钉在他们帽子顶上的快乐的老猎手，理智时代曾这样以他们取乐：拉布鲁耶尔的为寄生虫化的蠕虫流泪的绅士，盖伊的“庄重甚于聪明的哲学家”，他，要是你乐意的话，“在蝴蝶中穷追科学”，以及，不那么无礼地，蒲泊的“好奇的德国人”，他们歼如此珍视“那些”昆虫集市”；或纯粹是那些所谓完全与友好的人，在上次战争中来自中西部的思乡的士兵似乎

偏爱他们远甚于谨慎的法国农夫，甚于敏捷的 madelonII。相反，在记忆中挑选两次大战间我的一小批非俄罗斯与非犹太的熟人时，我发现最为生动的形象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大学生的身影：他有很

270 纳博科夫

好的教养，安静，戴眼镜，他的嗜好是死刑。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他让我看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一个购买到的系列（" ein 赫 chen retouchl ' ert ① "，他皱了一下雀斑点点的鼻子说），它描绘了在中国一次常规死刑的各个连续阶段；他十分内行地评论那杀人的刀的壮丽，评论刽子手与牺牲者之间完美的合作精神，其高潮是这被砍头的结合体中拍摄得十分清晰的脖颈里喷薄而出的雾一般灰的鲜血那名副其实的泉流。相当地富有，这位年轻收集家有钱旅行，也确实在为他的哲学博士学位而研究的人文学课程之间旅行。然而，他抱怨持续的坏运气，并补充说如果他在短期内见不到什么真正好的东西，他会忍受不住这辛劳。他曾出席了巴尔干的几次不坏的绞刑，和巴黎阿拉戈大道上一次大肆宣扬的，尽管可说是凄凉的机械 guiuotinade ②（他爱使用他认为是适当的法语），但不知怎的他从未接近到足以细致地观察一切，而他雨衣袖口里那架极为昂贵的微型相机工作得并不像他希望的那么好。尽管身患重伤风，他还是旅行到雷根斯堡，那里砍头是用一把斧头来狂暴地进行的；他曾期望那场景中出现伟大的东西，但是，令他深为失望，犯人显然已被麻醉，简直根本就没有反应，除了在戴面具的刽子手和他笨重的同伴一齐落到他身上时，软弱地滚落于地。迪特里希（我熟人的名字）希望有朝一日到美国去目睹几次电刑；从这个词语，凭着他的天真，他引出了形容词“有劲的”，这是他从他的一个到过美国的表兄弟那里

① 德语“修过一点点。”② 法语“斩首”。

说 d 巴，记忆 271 学来的，而带着一道热望的担忧的额纹，迪特里希怀疑在施刑期间，是否真有烟雾的精彩喷发自人体的自然洞孔。在我们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相遇时（他还剩有一点东西，我要为了可能的用途而把它们归档）他向我讲述，怀着悲哀更多于愤怒，说他有一次整整一夜耐心地观看他的一个好朋友，那个人决定击毙自己，并同意以射向嘴的天花板来做到这一点，在一道良好的灯光下面对这位具有癖好的人，却因缺少雄心和荣誉感，最终反倒无望地身体发僵了。尽管我很久以前就失掉了迪特里希的行踪，我很可以想象他鱼蓝色的眼里平静的满足，正当他如今（也许就在我写下这行字的瞬间）给他拍着大腿，捧腹大笑的老战友们看一大批从未期望过的珍宝——他在希特勒治下拍摄的极其二 u , derbar ① 的照片。

对于流亡的阴暗与光荣，在我的俄语小说，特别是其中最好的一部，*dar*（最近以英语出版，即《天赋》）中，我说得已经够多了；但这里迅速地重述一遍将是方便的。很少有例外，一切具有自由派思想的群体——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史学家、哲学家等等——都离开了俄国。那些没有离开的不是在那里凋萎下去，就是因顺从了国家的需要而钻污了他们的天才。幸运的侨民团体此刻能够如此全然不受惩罚地追求他们的事业，以至于，事实上，他们有时常自问那种享有彻底① 德语“奇妙的，精彩的”。

272 纳博科夫

思想自由的感觉难道不是正因为他们工作在一片彻底的虚空中吗。的确，在流亡者中有足够数量的好读者，保证了在柏林、巴黎，和其它城市以相对巨大的规模出版俄语书刊；但因为那些写作无一能在苏联流传，整个事情就获得了某种微弱的不真实的气氛。书种的数量比任何一本特定著作出售的册数更引人注目，而出版社的名字——奥里翁，宇宙，逻各斯，等等——有一种出版星象学或房事文学的公司所有的热狂、不稳定、轻微违法的外表。然而，在宁静的回忆中，单从艺术与学术的标准来判断，由流亡作家 *in vacuo*。① 创作的书籍，无论它们有什么个人的错误，在今天看来都更持久也更适于人的消费，胜过了在同样的那些年里出现的奴性的，出奇地偏狭而抱残守阙的政治意识流，它们来自有一个父亲般的政府供以墨水、烟斗和羊毛衫的苏维埃年轻作家笔下。*ru*’ 日报的编辑（也是我第一本书的出版者），伊奥西夫·弗拉季米洛维奇·海森，以极大的宽容允许我用我不成熟的诗篇去填满他的诗歌栏目。柏林的蓝色傍晚，街角上开花的栗子树，晕眩，贫穷，爱情，店铺里过早点亮的灯光的橘黄色调，和一种肉体的痛苦渴望，渴望仍旧清新的俄国气息——这一切就被配上格律，以普通的字体誊写下来送到编辑办公室里，近视的 *l.v.* 会在那里把新诗捧近他的脸，在这短暂的，或多或少是触觉的认知行为之后把它放进书桌。到 1928 年，我的小说的德语译本开始带来一小笔钱，而在 1929 年春天，你与我在比利牛斯网猎蝴蝶。但是在 1930 年代末期我们才

① 拉丁语“在虚空中”，*in vacuo*

翻艳 0 巴，*i* 己 1 艺 273 永远离开了柏林，尽管那以前我时常旅行到巴黎公开朗读我的作品。

与流亡生活的迁徙与戏剧性的特性一起，很可说是它的一个特点的，是那些文学朗读会反常的频繁，它们总在私人住宅与租赁的大厅里举行。各种类型的表演者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头脑中上演的木偶戏里。曾有过那位苍老的女演员，她有宝石似的双眼，先是紧握一块手绢压住发热的嘴一小会儿，继而使某段有名的诗篇屈从于她缓慢明澈的嗓音一半溶化，一半抚爱的动作，来激起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思乡的共鸣。有过那位毫无希望的二流作家，他的嗓音跋涉过一片有节奏的散文之雾，人们看得见他可怜，笨拙，

但又小心翼翼的手指神经质的颤抖，每当他把他已读完的那一页藏到即将出现的下面，使他的手稿在朗诵时始终保持着它可怕而可怜的厚度之时。还有那位年轻诗人，他嫉妒的兄弟们在他身上没法看不到一道令人不安的天才的纹理，像一只臭融的条纹一样突出；站在台上，面色苍白，眼里闪烁着灵光，两手空空，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在世上停泊，他会向后甩一下头，用一种极为恼人的，滚滚而来的吟诵献上他的诗，在结尾嘎然而止，砰地关上最后一行诗句的大门，等待掌声填满静寂。还有那位老。he, ma l tre ①，一粒粒滚落他读了无数遍的一个可敬故事的珍珠，而总是以同样的仪态，挂着那副吹毛求疵的厌恶表情，与他著作集的卷头画页上他高贵地布满皱纹的面容毫无二致。

① 法语“亲爱的先生”。

274 纳博科夫

我猜想一个超脱的观察者很容易嘲弄所有那些简直摸不准的人们，他们在一座外国城市里摹仿一个死去的文明，1900 — 1916 年（甚至在那时，在二十和三十年代，它们听来就像是公元前 1916 — 1900 年了）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遥远的，几乎是传说的，几乎是苏美尔的海市屋楼。但至少他们是反抗者，像自从俄国文学存在以来的大多数俄国大作家那样，并且忠实于他们的正义与自由感所渴望的这种反叛状况，就像在沙皇的压迫下所做的一样强烈，流亡者们把娇生惯养的苏联作家的行为，那些作家对每一个政府法令的每一道阴影的诚惶诚恐的反应，看作极为非俄罗斯和不齿于人类的；须知奴颜卑膝的艺术正在那里以精确的正比与最初是列宁的，后来是斯大林的政治警察的日益增高的效率同步成长，而成功的苏联作家就是那个以其灵敏的耳朵在一个官方提议的轻声细语尚未成为一声巨吼时就抓住了它的人。

由于他们在国外的作品的流传受到限制，甚至老一辈的，声名在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得到确立的流亡作家也不能指望他们的书籍为他们谋生。为一份流亡者报纸写一个每周专栏从来不足以使口腹与笔两全。不时地，翻成别国文字的译文常带来出乎意料的一勺；但是，另一方面，老作家们则有各种流亡者组织的资助、公开朗读的收入和慷慨的私人捐赠而得以苟延生命。较年轻的，不那么知名但更善于适应的作家靠从事各种职业获取偶然的补助。我记得曾教过英语和网球。我耐心地反对柏林商人坚韧不拔的癖好，就是把“生意”说得与“晕

说 . n 巴 , i 己忆

眩”合辙押韵^①；像一个制作精巧的机器人，在一个长长的夏日缓慢浮动的云层下面，在尘土飞扬的网球场上，我也曾把球一个接一个喂给球网那边他们晒得黑黑的，短发的女儿们。我从我的俄语《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得到了五美元（在德国通货膨胀期间可算是一大笔钱）。我帮助编纂了一本外国人看的俄语语法书，其中第一个练习是以 *madom, y. doktor, vot banan*（太太，我是医生，这是香蕉）这些词语开始的。最好的是，我时常为一份流亡者日报，柏林的 *rul*，制作最早的俄语纵横字谜，我给它起名为 *krest lovit, l*。我发现回想那段畸形的生活是奇特的。撰写内容提要的人所深爱的是一个青年作家（写生活与思想——它们当然比仅仅写“艺术”重要得多了）干过的或多或少是世俗的工作的名单：报童、冷饮店职员、教士、摔跤手、钢铁厂领班、公共汽车司机，等等。啊，这些职业一个也不曾是我的。

我对我的写作的热情使我与国外各种各样的俄国作家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年轻，对文学的兴趣比我如今强烈得多。当今的散文与诗，耀眼的行星与苍白的星系，一夜夜从我阁楼的窗前流过。那里有不同年龄与天份的独立作家，有集团与派系，其中许多年轻的或尚且稚嫩的作家，他们有的颇具天才，聚集在一位哲学化的批评家周围。这些秘教传播者中最重要的一位结合了知识的才赋与道德的庸俗，对现代俄国诗歌的鉴赏力的一种神秘的确信与对俄国经典作品的一点零碎知识。他的团体相信无论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简^①“生意”（*business*）与“晕眩”（*dizziness*）词尾相同但发音有别。

276

纳博科夫

单否定还是西方民主的惯常理想都不足以建立起一种流亡文学能够倚靠的哲学。他们渴望一个信条就像一个被关押的吸毒者渴望他的宠物天堂。可说是病态地，他们羡慕巴黎天主教团体那种温和的微妙，这是俄国神秘主义如此明显地缺乏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毛毛雨雾无法与新托马斯主义思想相抗衡；但别无它途了吗？人们发现，对一个信仰系统的向往，在某个被接受的宗教边缘上不断的摇摆，带来了它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满足。只是在很久以后，在四十年代，那些作家中的某些人才终于发现了一个直接的斜坡，来以一种或多或少是跪着的姿态滑下来。这个斜坡就是那种热情的国家主义，它可以把一个国家说成是好的和值得热爱的，仅仅因为它的军队赢得了一场战争。然而，在三十年代早期，国家主义的悬崖几乎没有被觉察到，而秘教传播者们仍在热衷于不可靠的延宕的震颤。在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上他们是奇怪地保守的；对于他们拯救灵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互相标榜，最后才是艺术。如今回首的一瞥记下了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这些国外的纯文学作家在摹仿家乡的被束缚的思想，断定作一个团体或一个时代的

代表要比当一个独特的作家更加重要。伏拉迪斯拉夫·霍达塞维奇在二十和三十年代时常抱怨年轻的流亡诗人们借用了他的艺术形式，同时却追随流行的 a, 90155 。① 和重塑灵魂的领导派别。我对这个尖刻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喜爱，他由反讽与金属般的天才造成，他的诗歌是一个奇迹，像丘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诗一样复杂。在肉体上，他有① 法语“焦虑，恐慌”。

说吧，记忆

277

一种病态的特征，有蔑视的鼻孔和突出的眉头，而当我在头脑中追忆他时，他坐在他的硬椅子上从未站起来过，他瘦瘦的双腿交叠，他的两眼闪烁着敌意与机智，他细长的手指把一支。户 oralve 汀① 香烟的半段旋进一个烟嘴。现代世界诗歌中很少有堪与他的《沉重的诗琴》里的诗篇相比的，但不幸的是对于他的声名，当他道出他的僧厌时他耽溺于完全的率直，给他在最强有力的批评集团中造就了一些可怕的敌手。并非所有的秘教传播者都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阿廖沙；在团体中也有一些斯梅尔贾科未，而霍达塞维奇的诗就以一种报复性喧闹的彻底被贬低下去了。

另一个独立作家是伊凡·布宁。我总是偏爱他鲜为人知的诗歌，胜于他著名的散文（在他作品的框架里，它们的相互关系令人想起哈代的情形）。那时候我发现衰老这一个人问题令他极为烦恼。他对我说的第一件事是满意地讲述他的状态比我更好，尽管他比我年长大约三十岁。他身受刚刚获得的诺贝尔奖的恩泽并邀请我到巴黎某个昂贵而时髦的餐馆去谈心。可惜的是我对饭店或咖啡馆有一种病态的厌恶，尤其对巴黎的一我憎恶人群、匆忙的侍者、波希米亚人、苦艾酒的调制、咖啡、zakusk'，歌舞表演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喜欢以一种躺卧的姿势（在一张长沙发上最为合意），在宁静中吃喝。谈心，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忏悔，也不对我的路。布宁，一个活泼的老先生，拥有一套丰富而不纯的词汇，迷惑子我对红褐色的松鸡毫无反应，我童年时已经吃得够多几，并对我拒① 法语“未加工的香烟”。

278 纳博科夫

绝讨论末世学问题感到愤怒。将近一餐之末时我们互相已完全厌倦了。“你将在可怕的痛苦与完全的孤独中死去，”我们走向衣帽间时布宁尖刻地说道。一位颇具魅力、相貌瘦弱的姑娘取过我们大衣的牌子并立刻抱着它们倒在低低的柜台上。我想帮布宁穿上他的无肩缝大衣，但他用他张开的手作出一个骄傲的手势阻止了我。仍在马马虎虎地挣动— 他这时在试图帮助我— 我们出门进入了一个巴黎冬日苍白的荒凉之中。我的同伴正要扣上他的领子，忽然一种惊奇与痛苦的表情扭曲了他英俊的脸。小心翼翼地解

开他的大衣，他开始拖曳他手肘下的什么东西。我上前帮助他，最后我们一同从他的袖子里拔出了我的羊毛长围巾，那姑娘把它塞在了错误的大衣里。这东西一寸寸出来；就像解开一个木乃伊，我们在这过程里慢慢地互相绕着转身，受到三个路边娼妓粗野的取笑。然后，这操作结束后，我们不发一言走到街角，我们在那里握手和分手。后来我们时常碰面，但总是在别的人们中间，基本上是在 1.1 . 冯达明斯基（一个圣徒与英雄一般的魂灵，他为俄国流亡文学所做的比别的任何人都多，他死于一所德国监狱）的宅邸。不知如何布宁和我采用了一种戏谑和相当压抑的交谈方式，美国“打趣”的一个俄国类型，而这在我们之间排除了任何真正的交流。

我遇见过别的许多俄国流亡作家。我没有遇见早逝的玻普拉夫斯基，在近旁的巴拉卡琴之间一把遥远的小提琴。睡吧，哦莫莱拉，鹰华多么可怕

说 d 巴，气已忆 279 他震响的调性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篇脾气暴躁的评论，我在其中因他尚未成熟的诗作中琐细的瑕疵而对他进行了攻击。我遇见了聪明，严谨，富有魅力的阿尔达诺夫；苍老的库普林，小心翼翼地拿着一瓶 vi , ordinaire ① 穿过下雨的街道；艾亨伐尔德— 华尔特·彼得的一个俄国翻版— 后来被一辆电车撞死；马里娜·茨维塔耶娃，一个双重间谍的妻子，和天才的诗人，在三十年代后期她回到俄国并在那里去世。但我最感兴趣的作家自然是西林②。他属于我这一代人。在流亡中产生的年轻作家中他是最孤独也最傲慢自大的一位。从 1925 年他第一本小说的发表开始，在随后的整整十年里，直到像他的出现一样奇特地消失之时，他的作品一直在批评家中间激起一种强烈的和颇为病态的兴趣。就像在八十年代旧俄时评家会指责他缺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关注一样，流亡文学的秘教传播者也责备他缺少宗教的洞见和道德的专注。有关他的一切都注定要侵犯俄国的习俗，尤其是俄国的礼仪感，在如今，比方说，当一个美国人在一个显赫的苏联军人面前碰巧两手都插在裤兜里懒洋洋地站着时，他就是在如此危险地冒犯着它。相反，西林的崇拜者则了解他的许多，也许太多了，不寻常的风格、光彩照人的精确、有效的想象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俄国读者已被提高到了俄国现实主义的坚实坦诚，并曾戳穿颓废骗子的伎俩，他们感动于他清晰但古怪地引人入歧途的语句那镜子般的角度，以及那个有

① 法语“普通的酒”。② sirin，纳博科夫当时的笔名。

280 纳博科夫

实，就是他书籍的真正生命流入了他言辞的形象，一们批评家曾将它们比为“面对一个连续世界的窗子……一个旋转的推论，一系列思想火车的影子。”西林横穿过流

亡的黑暗天空，用一句更具保守性质的直喻来说，像一颗流星，他消失了，身后留下的不外乎是一种模糊的焦虑之感。

在我二十年的流亡生涯里，我花费了惊人的大量时间来制作象棋难题。某种形势被精心制造在棋盘上，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给定的步数内将死黑方，一般是两至三步。这是一门美丽、繁复、不结果实的艺术，它与这一游戏的普通形式的联系只在，比如说，一个领域的特性既被一位变戏法者在编织一个新节目时也被一位网球选手在赢得一次比赛时所利用这一限度之内。事实上，大多数棋手，爱好者和大师都一样，对这些高度特殊化的，充满想象的，漂亮的谜团仅仅抱有温和的兴趣，而且尽管赞赏一个引人入胜的难题，要他们制作一个，却会被彻底难倒。

属于一个准音乐，准诗歌，或十分确切地说，诗歌数学的类型的灵感，伴随着沉思那样一盘象棋布局的过程。时常在一天中友好的正午，在某项琐碎工作的空余时间，懒散地尾随着一段偶然的思索，毫无先兆地，我就会体验到一种精神快乐的刺痛，此刻一个象棋难题的花蕾在我头脑中怒放，允诺了我一夜的劳动和满足。它可能是将一种不寻常的战略技巧与一条不寻常的防线结合起来的新方法，它可能是人的真

说吧，记忆

281

实配置的闪现，最终带着幽默与优雅，它会呈现出一个我以前无望表达的艰难主题；或者它可能仅仅是在我思想的迷雾中由棋子代表的各种势力单位做出的一个姿态——一种迅速的哑剧，暗示出新的和谐与新的冲突；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属于一种特别令人激动的感觉秩序，如今我与它唯一的不和是，对一个个雕像或它们的精神对应物的疯狂操作，在我最充实和多产的岁月里吞没了那么多时间，我本可将它们献给词语的冒险。

行家们划分了象棋难题艺术的几个学派：英美派，把精确的结构与迷惑人的主题形式结合起来，拒绝局限于任何传统的规则；条顿派粗野的光辉；捷克风格的高度完善但圆滑而麻木得令人不快的产物，与它对某些不自然条件的严格奉行；陈旧的俄国终局研究，它们达到了这一艺术的光辉顶点，以及所谓“艰巨任务”型的机械的苏联难题，用深思熟虑地将主题运用到它们的最大程度来代替艺术的策略。可以这样解释，象棋中的主题，是伏击、后撤、牵制、解围等等这类技巧；但只有在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时这个难题才是令人满意的。达到魔道程度的欺骗，和达到古怪边缘的创新，是我对策略的概念；而尽管在结构问题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可能，我都尝试着服从经典的规则，诸如节省力量、联合、xlj 除松散的枝叶等，我还是一直准备着为奇异内容的急需而牺牲形式的纯净，导致形式像一个装着一个骚动的小妖魔的海绵包一样膨胀和爆发。

构想一个布局的主要情节是一回事，建成它又是一回事。头脑的紧张是可怕的；时间的元素从人的意识中一齐滴落：筑

282

纳博科夫

造的手在盒中摸索一个卒子，抓住它，而头脑仍在沉思一个陪衬物或一个临时替代物的需要，而当拳头张开时，也许整整一个小时已经过去，在策划者白热的冥想中燃成灰烬了。他面前的棋盘是一个磁场，一个压力与深渊的罗网，一片星光灿烂的苍弯。象在棋盘上移动，如同探照灯一样。这个或那个马是一个杠杆，被调整又尝试，被再三调整和尝试，直到这道难题达到了美与惊奇的必要高度为止。多少次，我曾竭力束缚住白后的可怕力量，以避免一个双重的结果！要知道象棋难题中的竞赛并不真正在于白方与黑方之间，而是在制作者与假想的解题者之间（就像在一篇第一流的小说作品里真正的冲突不是在人物之间而是在作者与世界之间一样），那么一道难题的大部分价值就要归于“尝试”的次数——欺骗的明摆着的步着，虚假的气氛，宽阔的弈棋路线，布置得狡猾而可爱，把可能的解题者引入歧途。但无论我能对制作难题这件事说什么，看来我还是没有充分地传达出这一过程迷醉的核心以及它与创造性头脑的各种其它的，更加兮开和卓有成果的操作之间的联系，这些操作从对危险海域的探测到写作那些不可思议的小说，在其中，作者处于一场明彻的疯狂里，自己建立了某些独特的规则来遵守，某些恶梦般的障碍来攀越，怀着一个神从最不可能的成分——石头、炭、盲目的悸动——建造一个活生生的世界的热忱。至于构思难题，这件事还伴随有一种甘醇的肉体满足，尤其是在最后第二次排演中，棋子们开始恰切地体现出制作者的梦想之时。有一种安适之感（它回到一个人的童年，回到床上的游戏计划，把玩具的各个部分嵌入脑中的角落）；有一个棋子在另一个棋子背后，从一个

说吧，记忆 283 遥远的格子的安宁与温暖中偷袭的良好途径；也有一架上足了油，擦得锃亮的机器的平滑移动，它在两根轻提又轻搁一枚棋子的交叉的手指接触下漂亮地运转着。

我记得一个特别的难题，我曾努力构想了几个月。一个夜晚到来了，我终于设法表现了那特别的主题。它是为了十分内行的解题者的娱乐而制作的。头脑简单的人会完全弄错这个难题的要点洛未曾经为思想深奥的人准备的愉快苦恼就发现它相当简单的“正题”答案。后者会在一开始就被一个幻想的行棋模式所欺骗，其基础是一个时髦的前卫主题（把白方的王暴露给对方将军），制作者花费了最大的苦心才把它“培植”起来的（一个不显眼的卒子只要隐晦地走一小步就能推翻它）。经过了这座“反题”地狱，那位到这时头脑已经极度复杂的解题者会想到那简单的关键一步（象走到。2），就像某

人捕猎野鹅可以从奥尔巴尼取道温哥华、欧亚大陆和亚速尔群岛到达纽约一样。这条冤枉路的愉快经验（陌生的风景、铜锣、老虎、异国风俗、一对新婚男女绕着一个土制火盆的圣火连转三次的巡行）足可补偿这欺骗给他造成的痛苦了，而此后他就到达了那简单的关键一着，这将带给他一种深刻的艺术愉悦的合题。

我记得曾经从专注的象棋思考中慢慢摆脱出来，而在那里，在一张巨大的奶色与暗红色相间的英国式皮制棋盘上，无瑕的局势最终平衡了，像一个星群。它运转了。它活了。我的斯淘顿棋子（我父亲的一个英国化的兄弟康斯坦丁给我的一套，有二十岁了），茶色或黑色木头的，大得光彩夺目的棋子，直立起来高达四又四分之一英寸，展现着它们闪亮的轮廓，仿

284

纳博科夫

佛它们意识到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唉，要是凑近细看，就看得见有的棋子已经磨损了（在它们的盒中旅行经过了我在那些年里不断更换的五六十个寄宿舍之后）；但国王的车的顶端和国王的马的眉头仍旧呈现出画在它们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红冠，令人想起一位快乐的印度人额上的圆形标记。与时间在棋盘上结冰的湖泊相比只是它的一条小溪，它的手表呈现出三点半。季节是五月—五月中旬，在1940年。前一天，在几个月的追求与诅咒之后，一份贿赂的催吐剂被交给了正确的办公室里的正确的老鼠，并最终导致了一份 visa des 喇 ie ①，轮到它决定了横渡大西洋的许可。突然间，我感到随着我象棋难题的完成，我一生中的整整一个时期到了一个满意的结尾。周围的一切十分宁静；好像被我的解脱的性质搅起了微微的涟漪。睡在隔壁的是你和我们的孩子。我桌上的灯罩着蓝色的方糖纸（一种逗人的军事预防措施），结果是灯光在烟雾重重的涡形空气中打上了一种月光的色调。严严实实的窗帘把我与灯火熄灭的巴黎隔开。从座位上垂下一份报纸头条在讲述希特勒进攻低地国家。

在我面前有一张纸，在那个巴黎之夜，我在它上面描画了这道难题的形势和图解。白方：王在 a7（意思是第一直列，第七横列），后在 b6，车在 f4 和 h5，象在 e4 和 h5，马在 d5 和 e6，卒在 b7 和 g3；黑方：王在 e5，车在 g7，象在 h6，马在 e7 和 g5，卒在 f6，d6 和 d7。白方先，两着之内将死。虚假的气氛，难以抗拒的“尝试”是：卒到 b5，成为一个马，紧跟着① 法语“离境签证”。

说吧，记忆 285 有三个美丽的杀着，回击黑方所展开的牵制；但黑方可以击败整个辉煌的事态，只要不牵制白方而代之以谦恭地在棋盘上别处走一个缓着就行了。在画着那图解的纸张一角，我注意到某个印戳，它也装饰着我在1940年5月从法国带

到美国的其它纸张与书籍。那是个圆形印章，是光谱中的最后一种颜色- violet de bureou ①。在它的中心有两个十二点活字大小的大写字母 r . f .，意思当然是秘 publique francal ' se ②。其它字母是更小的型号，环绕着拼出 co 川，。 l 。 de , i 挽肠 rmation ，③。然而，只是在多少年之后的今天，那个戳记所允许通过的，藏在我的象棋符号中的信息才可以，而事实上也的确，泄漏了出来。

① 法语“办公室紫色”。② 法语“法兰西共和国”。③ 法语“信息检查”。

第十五章

286

第十五章

它们在经过，飞逝，飞逝，那些匆匆的岁月——用一种撕裂灵魂的贺拉斯式屈折来讲。岁月在经过，我亲爱的，很快就没人会知道你我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的孩子在成长；帕埃斯图姆，雾气迷茫的帕埃斯图姆的玫瑰，已经凋谢；头脑呆板

说 d 巴，气己门艺

287

的傻瓜们在修补和篡改自然的力量，温和的数学家似乎已将这预演过，令他们自己暗中吃惊；因此也许是到了检验古老的快照，列车与飞机的洞壁画，鼓鼓囊囊的橱柜里玩具的岩层的时候了。

我们还要回溯得更远，到 1934 年 5 月的一天早晨，并且恭敬地把柏林一个地区的图样标识在这固定的一点上。我正在那个地方，在上午 5 点，从拜恩林广场附近的产科医院步行回家，在这之前几小时我把你送到了那里。春日的花朵在一家出售镜框和彩色照片的商店的橱窗里装饰着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左派的麻雀群在郁金香与菩提树上举行响亮的晨会。一派澄澈的黎明完全揭开了空街的一侧。另一侧，楼房望过去仍是寒冷的蓝色，各种各样长长的阴影渐渐被缩短，用的是年轻的白昼在一座修饰一新、清扫一新的城市里接替黑夜的平淡方式，在这里遮荫树木汁液丰富的气味下面有沥青步道的浓重气味；但对我来说这件事的视觉部分显得十分新鲜，就像用某种不寻常的方式来置放桌子一样，因为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在黎明见过那条特殊的街道，尽管，另一方面，我时常在阳光和煦的傍晚经过那里，怀里没有孩子。在那不太熟悉的时辰的纯净与空泛之中，阴影处于街道错误的一侧，在它身上笼罩了一种并非不优美的颠倒之感，正如在一个人看见一家理发店的镜子里反映的橱窗之时，那忧郁的理发师一边磨着他的刮胡刀，一边把他的凝视转向那镜子（他们在这样的时刻都是这么做的），同时，被框在那被反映的橱窗里，一段人行道把漠然的行人的队列调到相反的方向，进入一个抽象世界，它突然间不再有趣，并释放出

288

纳博科夫

一道恐惧的激流。

每当我想起我对一个人的爱，我惯于从我的爱——从我的心脏，从一个私人事件的温柔核心——画出半径，画到宇宙的遥远得难以置信的地点。有什么东西在驱使我去把我爱的意识与不可想象不可计算的东西相比，诸如星群的行为（正是它们的遥远显得是疯狂的一个形式），永恒的可怕陷阱，未知后面的不可知，无助，寒冷，空间与时间令人厌恶的错杂迷离与互相渗透。这是一个有害的习惯，但我对它无能为力。这可以与一个失眠者的舌头不由自主的轻弹相比，它在他口腔的黑夜里检查一颗崎岖的牙齿，这样做挫伤了自己但它仍旧坚持不懈。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在偶然触碰到某物——一根门柱，一段墙壁——后，只有经过手与屋子里各个物体的表面的某种十分迅速而有条理的接触过程之后，才能回到一种平衡状态。这无法抑止；我必须知道我站在何处，你和我的儿子站在何处。当那缓慢的行动，爱的无声爆炸在我体内发生，打开它溶化的边缘，用比任何想象得到的宇宙中物质与能量的积聚巨大得多、持久得多的某种事物的感觉来将我压倒，那时我的思想只能掐一下自己看它是否真的醒着。我只有迅速列出一份宇宙清单，就像一个人在梦中试图用认清他在做梦来宽恕他处境的荒谬。我只有让所有的空间，所有的时间加入我的情感，加入我凡尘的爱，以便除去它凡尘的边界，以此来帮助我反抗在一个有限存在中发展起了一个感觉与思想的无限这样一种完全的堕落、荒谬和恐怖。

因为，在我的形而上学中，我是个坚定的非联邦主义者，讨厌穿过神人同性的乐园的组织旅行，所以我听从我自己的，

说 o 巴，记忆 289 并非微不足道的智慧，在我想到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在我，就像现在，回顾我对我们的宝贝几乎像苦娃达^①一般的关切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作出的发现（大概所有父母都作出过）：你静静地展示给我看的那只小手的微型指甲完美的形状，它像岸上的海星一样躺在你的掌中；四肢与脸颊的皮肤质地，关切被以一种黯淡的，远离的情调引向它，仿佛触摸的轻柔只能以距离的轻柔来回报；某种游动的，倾斜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在虹膜那黝黑泛蓝的色彩周围，它似乎仍保存着它所吸收的古老、奇幻的树林的阴影，那里飞鸟多于老虎，果实多于荆棘，那里，在某个斑驳的深处，曾诞生了人的思想；尤其是，一个儿童进入接下来的一维，进入眼睛与目力所及的物体之间新建立的关系的第一次旅行，搞生物统计学或做老鼠迷宫生意的家伙们以为他们能够解释它。我忽然觉得可以得到的有关思想诞生的最近似复制品是那种惊奇的刺痛，它的到来总是随着那精确的一刻，就是当一个人凝视着一片嫩枝与树叶的丛莽，猛然察觉到曾经看似那树丛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的东西，竟是一只伪装得令人惊叹的昆虫或飞鸟之时。

也有深深的快乐（归根结底，科学的事业要产生什么别的呢？）在于解开人的心灵最初的盛开之谜，办法是假设在自然的其余部分的生长中有一段耽于声色的停顿，一种闲荡与

①。。uvade，一种原始风俗，在婴儿初生时，父亲躺在自己的床上，好像他本人在经受分娩的痛苦和照管要儿，他还要绝食，净身或遵守各种各样的戒律。

290 纳博科夫

虚度，它首先允许了 homo poeticus ① 的形成——没有它 sapiens ② 就无法获得进化。实际上是“生存搏斗”！战斗与劳作的诅咒将人引回到野猪，到咆哮的野兽对觅食的疯狂冥顽。你我时常注意到一个家庭主妇诡诈的眼睛里狂热的闪光，在一家杂货店的食物之上或在一家肉铺的陈尸所各处飘荡。世上的辛劳者们，解散吧！古书错了。世界是在一个星期天创造的。

在我们儿子的整个童年岁月，在希特勒的德国和马其诺的法国，我们或多或少常常是拮据不堪，但了不起的朋友们留心着他随时能得到最好的东西。尽管对此没有多大力量，你和我对他的童年与我们自己在富足的往昔的摇篮时代之间任何可能的缝隙都共同地投以警戒的目光，而友好的命运就是在这里出现的，每当那缝隙有开裂的危险便将其弥合。接着养育宝贝的科学也经历了飞行或耕耘所经历的同一种伟大的，流线形的过程——我，在九个月大时，一次喂食并没有一磅的脱水菠菜，一天也没有一打橘子的汁水；而你所采用的婴儿卫生法比我们当宝贝时老保育员们能够梦想到的一切都高雅和审慎得难以相比。

我想布尔乔亚父亲们——穿着大尖翻领的衣服、铅笔条纹的裤子的工人，矜持的，打着办公室领带的父亲们，与今

① 拉丁语“诗人” ② 拉丁语“智人气”

说0巴，记忆291 天年轻的美国老兵们，或者与十五年前一位快活、无业、生于俄国的侨民是那么不同——不会理解我对我们孩子的态度。每当你抱起他，满怀着温暖的信条，庄严如一个偶像，等待着在把一个横向的宝贝竖起来之前那个喂奶后的解除信号时，我常常既加入你的等待又分担他的饱食那被我夸大的紧张，因此相当恼恨你对我感到是一种痛苦抑郁的事情将会迅速消散所抱的快乐信念；而最后，当他庄严的嘴里不再升起和爆裂出直率的小泡沫时，我常常体验到一种可爱的轻松，而你则发出一声庆祝的呢喃，低俯下身将他交给了他的摇篮那白框的螟色来照管。

你知道，我的手腕仍然感觉得到推婴儿车人的诀窍的某种回声，例如，为了让车子倾斜并爬过街沿而施于把手的伶俐的，向下的压力。先是一辆比利时样式的精美的鼠灰色车子，有肥胖的 autoid 车胎和豪华的弹簧，大得没法进入我们狭小的电梯。它带着缓慢威严的神秘在走道上开动，深陷其中的宝贝仰卧在里面，严严实实地盖着羽绒、丝绸和毛皮；只有他的眼睛在警惕地移动，有时它们华丽的睫毛迅速地一翻，它们转向上方，跟随枝条图案的蔚蓝色向后退却，这蔚蓝色从竖起了一半的车篷边缘流逝不绝，而即刻他会向我的脸投来怀疑的一瞥，看嘲笑的树木与天空是否不与喋喋不休的饶舌和父母的幽默一样属于，也许，事物的同一种秩序。接下来是一辆较轻的童车，在这一辆里，当他驶去时，他会试图起身，紧握着他的皮带；抓住车缘，站在那里与其说像游艇上一位摇摇晃晃的乘客，不如说像一艘宇宙飞船上的一位出神的科学家；环顾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温暖世界斑斑点点的一团

292

纳博科夫

乱麻；怀着哲学的兴味注视那个他设法扔出了船外的枕头；有一天皮带绷断，他自己跌了出去。更晚些他乘坐那种叫做散步车的小型奇异装置中的一辆；从最初富有弹性和安全的高度他越来越往下，直到他一岁半左右，他从座位上向前滑下，以脚踵撞击步道，从而在移动的散步车前面接触了地面，这预示着他将在某个公共花园里被释放。一道新的进化之浪开始澎湃，又渐渐地将他从地面举起，当时他获得了一辆四英尺长，涂着银色的梅塞得斯赛车作为第二个生日的礼物，它由内部的活瓣启动，像一架风琴，他时常乘坐着它，发出一种汽筒打气似的叮当声，来回行驶在 kur 勿 rstendamm 的步道上，而一扇扇敞开的窗里传来一位独裁者众多的咆哮，他仍在我们已远远甩在后面的尼安德特谷里捶打着自己的胸膛。有关男孩子对有轮子的事物，尤其是火车所抱的情感的种系特征的研究也许会得到回报。当然，我们知道那位维也纳江湖郎中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我们会听任他和他的旅行伙伴们驾着他们三流的思想之车摇摆行进，穿过性神话的警察国家（独裁者们无意中忽视了精神分析是个多大的错误啊——本来可以用那种方式如此轻易地腐蚀整整一代人！）。飞快的生长，迅速变量的思想，循环系统的滑行铁道——一切活力的形式都是速率的形式，难怪一个正在发育的孩子渴望将最大的空间乐趣注入最短的时间，从而使自然超越自然。人心中最隐秘的是挣脱与超过重力，克服或重新制定地球的引力之可能性所能引来的精神快乐。光滑的圆形物体仅仅以一圈圈的滚动来统治空间，而不是为了前进而劳累地举起沉重的手足，这奇迹般的悖论肯定曾给予年轻的人类一种最为有

说 d 巴，记忆 293 益的震惊。当他光着屁股蹲坐着，这个做梦的小野人所凝视的营火，或者一场森林大火坚定的前进——我猜想，这些也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影响了拉马克背后的一两个染色体，西方遗传学家对这种方式是不愿阐释的，就像职业物理学家不愿讨论内部的外部，弯曲的所在一样；因为每一个向度都预先假定一个它能够在其中行动的媒介，而倘若在事物的螺旋形旋开之中，空间扭曲成了某种近似于时间的东西，而时间也继而扭曲成某种近似于思想的东西，那么，肯定会有另一个向度随之而来——也许是一个特殊的空间，我们相信不是旧的那个，除非螺旋又成了恶性循环。

但无论真相会是什么，我们绝不要忘记，你和我，我们要在这个或另外某个战场上永远保卫那些桥梁，我们曾在上面与我们的小儿子（从二岁到六岁的任何时候）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一列火车从「面穿过。我见过大一些但不那么快乐的孩子们停留片刻，为了靠在栏杆上向碰巧从下面开过的火车头那麻木的烟囱吐唾沫，但无论你还是我都无意赞同两个孩子里较为正常的，是实用主义地分散了一次朦胧的出神那无目的的心情激昂的那一个。你从没有截短或调整过在拱形大桥上那许多次耗费时光的停留，那时我们的孩子怀着一种乐观主义和无止境的耐心，会期望在远方，在房屋黑色的后墙之间，众多的铁轨全都汇聚起来的一点上会有一个信号灯闪烁，或者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火车头显形。在寒冷的日子里他穿一件羊羔皮外衣，戴一顶相似的帽子，两者都是一种浅棕色，杂以霜似的灰白，这些，以及手套，以及他信念的炽热使他一直红光满面，也使你保持温暖，因为你为了不让你

294

纳博科夫

纤细的手指冻僵而要做的只是交替用你的左手和右手抓住他的一只手，大约每一分钟替换一次，并为一个大婴儿的身体所产生的不可思议的热量惊奇不已。

在速度之梦以外，或者与它们相关联，每个孩子心中都有那种本质上是人性的冲动，要重塑大地，要改造一个脆弱的环境。这解释了一个孩子在挖掘中，在为他喜爱的玩具开凿道路和隧道中获得的快乐。我们儿子有一辆马尔康姆·坎贝尔爵士的蓝鸟的模型，是涂漆的铁皮做的，有可卸下的轮子，他会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玩耍着它，太阳会在他稍稍长了点的漂亮头发上打出一种光轮，把他赤裸的背部变成一种太妃糖的色泽，上面交叉着毛织海军蓝短裤的肩带（在他脱掉衣服时，看得到自然的白色垫在他臀部，系在他身上）。在我一生中，我从没有坐过如此之多的长凳和公园椅子、石板和石阶、阶梯栏杆和喷泉池沿，像在那些日子里那样。柏林的格鲁内瓦尔德的湖泊四周人口稠密的松树荒漠我们只是偶尔去过。你曾质疑一个地方自命为树林的权利，当它如此布满了弃物，垃圾遍地，远比附近城市里光润的，自知的街道更加零乱之时。奇怪的东西出现在这格

鲁内瓦尔德。一片空地中央，一个铁床架展示着弹簧的解剖学的景象，或一个女裁缝的黑色模特儿躺在一丛开花的山植树林里的仪容，令人疑惑究竟是谁曾费心把这些那些四散的物品搬到一片没有路的树林中这样遥远的地点。有一次我遇见一面破得不成样子但仍旧警醒的镜子，充

i 兑。巴，i 己门艺

295

满了森林的反影——好像喝醉了一种啤酒与尊麻酒的混合物——带着超现实主义的高傲，斜倚着一棵树干。也许对这些市民游玩场地的此类入侵是即将到来的混乱的零碎景象，毁灭爆炸的一个预言性恶梦，颇像先知卡廖斯特罗在一个皇家花园的哈哈声中瞥见的那堆死人头颅。而离湖更近些，在夏天，尤其在星期天，这地方满是处于裸露与日光浴的各个阶段的人体。只有松鼠和某些毛虫还穿着它们的外衣。腿脚发灰的主妇穿着她们的运动装坐在滑腻的灰沙上；讨厌的，海狮嗓子的男人，穿着泥污的游泳短裤，到处嬉戏；漂亮得惹人注目但打扮拙劣不堪的姑娘们，注定要在几年后——确切地说，是1946年初——突然生下一大堆无辜脉管中流着突厥或蒙古血液的孩子，正被追逐和捆屁股（对此她们会哭叫，“噢——呜！”）；而这些不幸的嬉闹者，以及他们脱下的衣服（在地上各处整洁地铺开着），发出的气息与一片死水混和起来，形成了一个气味的地狱，不知怎的，我在任何别处都没有发现它们被重现过。在柏林的公共花园和城市园林中不允许人们脱衣；但衬衫可以解开扣子，而一排排年轻人，是确切的北欧型，闭着眼睛坐在长凳上，向着太阳那举国称善的行为显露出他们面额与胸部的粉刺。在这些记录中流行的令人作呕并且可能夸大了的颤栗，我猜想，也许归因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持久的恐惧，害怕某种污浊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你一向视之为可恶的陈腐，并且不无一种特别的市侩气的，是那种认为小男孩们为了快乐就应当憎恨洗涤和热爱杀戮的观念。我乐于回忆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小公园；我乐于拥有哈佛和阿诺德植物园的杰克教授告诉他学生他拥有的那种闭着

296 纳博科夫

眼睛，仅凭嫩枝透过空气的飒然瑟响来分辨它们的能力（“角树，郁金香，伦巴底杨树，啊——一份折起来的《抄本》”）。时常，当然了，我可以断定这个那个花园的地理位置，凭着某个特殊特征或特征的结合：沿着狭窄的碎石步道排开的矮黄杨树窄边，都像戏剧里的人物一样互相接触；抵着一道紫杉的长方体围栅的蓝色矮长凳；一块有一道天芥菜边框的正方形玫瑰花坛——这些特征明显联系着柏林郊区街道交汇处的小块园地。同样清晰地，一张薄铁皮椅子，底下躺着它细长的阴影，微微倾向中心的一侧，或一架愉快地傲慢，尽管显然有点精神变态的旋转洒水机，在晶莹的青草之上的喷洒中悬

着一弯隐秘的虹，则拼成了一座巴黎式公园；但，像你会深深理解的那样，记忆之眼如此坚定地谛视着一个蹲坐在地上的小小形象（在一辆玩具火车里装满了卵石，或冥想着一位花匠的软管那明亮、潮湿的橡皮，上面粘附着水管刚从其上滑过的一些碎石），以至各种各样的处所——柏林，布拉格，弗兰曾斯巴德，巴黎，里维埃拉，又是巴黎，昂蒂布角等等——失去了所有的主权，汇集起它们石化的将军和落叶，粘起它们连锁的小径的友谊，结合在一个光与影的联邦之中，光着膝盖的优雅儿童踏着呼啸的溜冰滑轮飘行而过。不时地，一片被辨明的历史背景会帮助认出地点——并用其它的文件代替一种个人想象所猜测的那些文件。我们的孩子在柏林那个微风荡漾的日子大概已三岁了（在那里，当然了，没有人会不熟悉无所不在的元首画像），当时我们站立着，他和我，在一块病容憔悴的三色紫罗兰花坛前，它们每一张仰起的脸现出一种有似胡须的黑色污痕，而在我可说是

说。巴，i 己忆

297

愚蠢的激励下，评价它们与一群上下起伏的小希特勒的相似点是极为有趣的。同样，我也能给巴黎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命名，在那个地方我在 1938 或 1939 年注意到一个十岁左右的文静姑娘，她有一张不动声色的白皙的脸，穿着黑色、破旧、不合时令的衣服，看来是从一个孤儿院里逃出来的（顺理成章地，后来我瞥见她被两个追来的修女掳走了），她用一根线灵巧地缚住了一只活蝴蝶，用那恶作剧的缓绳通着那漂亮的，无力地扑动着的，受了轻伤的昆虫（也许，是那所孤儿院里大量优雅的针线活的副产品）。你曾经常地责备我，在我们去比利牛斯阿尔卑斯旅行中，我在进行平常的昆虫学研究时不必要的残忍；因此，如果说我把我们孩子的注意从那自命的提坦妮亚^①身上引开了，并不是因为我怜悯她的红纹丽峡蝶（俗称为 admiral），而是因为她阴郁的运动中有某种隐隐约约令人厌恶的象征主义。事实上，这令我想起一个法国警察曾经玩过——无疑仍然在玩——的简单、老套的把戏，他在把一个红鼻子的工人，一个星期天的闹事者带往监狱时，用一个小鱼钩钩住了这个人不在意然而有感觉也有反应的肉身，从而把他变成了一种温顺甚至敏捷的附庸。你和我都竭力以警戒的温柔来包围我们孩子那轻信的温柔，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个事实的对抗，就是暴徒们留在一个运动场的沙箱里的污秽，是可能的侵害中最不严重的，以及那所有的恐怖，前几代人在心理上曾将它们拒斥为时代错误或是仅仅发生在可汗国家和清王朝的事情，其实就在我们周围。

^① titania，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仙后。

当时间流转，而傻瓜创造的历史的阴影甚至败坏了日曆的精确之际，我们在欧洲各地更为不倦地旅行，似乎不是我们而是那些花园与公园在旅行。勒诺特尔^① 四面辐射的大道和繁复的花坛被留在身后，像转入了侧轨的火车。我们在 1937 年春天旅行到布拉格给我母亲看我们的孩子，那里有斯特罗莫夫卡公园，越过人工修剪的藤架是它自由、波动的远方的气氛。你也会记起那些阿尔卑斯植物——景天属和虎耳草——的石头花园，它们可谓是护送着我们进入萨瓦山，在一个假日（由我的翻译者所出售的什么东西来偿付）中与我们相会，然后又跟着我们回到平原的城市。在疗养胜地的古老公园里，钉在树干上，带袖子的木手所指的方向传来了露天音乐柔和的砰响。一条聪明的步道伴随着主要的车道；不是每处都与它平行，而是自由地认明它的导向，从鸭塘或荷花池向后跳跃，在这点或那点汇入梧桐树的队列，公园就在那里发展了一种城市之父的凝固并构思起了一座纪念碑。根，记忆中的翠绿的根，记忆与刺鼻的植物之根，根，总而言之，能够攀过一些障碍，穿透别的障碍，巧妙地进入窄缝，从而横跨长距离。于是，那些花园和公园与我们一起横跨了中欧。碎石步道汇聚与中止在一个 rond — pofnt ^②，看我们在一道私人篱笆下寻找一个球时俯身和畏缩，那里，在潮湿的黑土上，除了一张打了孔的淡紫色电车票或一点沾了泥的薄纱和棉毛之

① andr le n 6tre (1613 . 3 . 12 ? 1700 . 9 . 15) ，法国园林建筑师，曾受法王委托设计凡尔赛宫的园林。

② 法语“圆点”。

说月巴，i 己忆 i

299

外，什么也探查不到。一圈圆形座位会围住一株粗大的橡树树干来察看是谁正坐在对面，并发现有一位沮丧的老人在读一份外语报纸和挖鼻孔。叶子光润的常青植物环绕着一块草坪，我们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发现一只活青蛙闯进一片修剪过的灌木丛的整洁迷宫，而你说你认为要下雨了。在某个更远的舞台上，在不那么铅灰的天空下，有一片玫瑰山谷和交错小径的奇景，格子棚摇晃着它们的爬藤，准备一有机会就变成一行藤架上的葡萄，或者，倘若没有机会，就展示出古怪的公共厕所里最古怪的一个，丫件牧人小屋般的可怜事物，其清洁令人生疑，有一位女仆身着黑而又黑的织物守在门口。走下一片斜坡，一条石板小路小心翼翼地前进，每次都先迈同一只脚，穿过一座鸢尾植物的花园；到山毛榉下面；然后转变成了一条迅速移动的小径，打着马蹄铁印的粗乱图案。我们孩子的腿长得越长，花园和公园似乎也总是移动得越快，而到他四岁时，树与开花的灌木丛坚定地转向了大海。就像见到一位厌倦的站长站在一个人的列车并不停下的某个小站被速度所剪短的月台上，这位或那位灰色的公园警卫也在退却，正当这公园

不停地流淌，向南把我们带往橘树、杨梅、含羞草的雏鸡毛和一片无瑕天空的 pato tendre ①。

山坡上的梯级花园，一系列平台，它们的每一级石头阶梯都射出一只俗丽的炸猛，它们向着大海一道崖一道崖地放低，有橄榄和夹竹桃在它们急着要获得一片海滩风景的仓促中稍稍地互相倾侧。我们的孩子一动不动跪在那里，在一片颤① 法语“温柔色彩”。

300 纳博科夫

动的阳光之雾里被拍照，映着海光，在我们保存的快照里海是一片奶似的朦胧，但在生活中曾是银蓝色，更远处有大片的紫蓝色，那是暖流造成的，配合和证明着（听见那被退缩的海浪滚动的卵石了吗？）滔滔不绝的老诗人和他们微笑的比喻。而在大海所舔食的糖果般的玻璃球— 柠檬、樱桃、薄荷— 和成群结队的卵石，和饰有凹槽、内部光润的小海贝之间，有时会出现一片片碎陶，其光彩与颜色仍旧美丽。它们被呈现给你或我检阅，而假如它们有靛青的袖章，或叶饰的条带，或任何一种快乐的表征，并被断定为精美的，它们就叮当一声落进玩具桶，不然，则有一声扑通和一道闪光标志着它们回归了大海。我并不怀疑在我们孩子发现的那些微微凸起的花饰陶器碎屑中有那么一片，它的涡形图案的边缘精确地符合，并接续了，1903 年我在同一片海滩上找到一个碎片的图案，而这两片也与我母亲在 1882 年在那个芒通海滩上发现的第三片，与一百年前她的母亲发现的同一件陶瓷的第四片相吻合— 依此类推，直到这一组各个部分的集合，倘使得到保存的话，被置放在一起形成那个完整的，彻底完整的碗，它曾被某个意大利男孩打碎，上帝知道在何时何地，而此刻则被这些铜的铆钉所修复。

在 1939 年秋，我们回到了巴黎，在下一年的 5 月 20 日左右我们再次靠近了大海，这回是在法国西海岸，在圣纳泽尔。此地，一座最后的小花园把我们包围，这时你和我，还有我们已满六岁的孩子在我们中间，穿过它走向船坞，在那里，在面对着我们建筑后面，尚普兰号班轮等待着把我们送往纽约。那座花园按法国人的语音称作，kwarr，俄国人则称作

说吧，记忆 301 . ckver，也许因为它是我们通常在英国公共广场或其左近发现的那种东西。铺展在往昔最后的界限上，也在当今的边缘，它仅仅作为一个几何学图案留存在我的记忆中，无疑我能轻易地在里面填上似是而非的花朵的色彩，假若我不慎打破了纯净记忆的寂静，这寂静从一开始（也许，只除了我自己疲劳的血液的压力造成的某种偶然耳鸣以外）我就避免去打扰它，而是谦恭地倾听。关于这中色的开花图案，我真正记得的，是它与横渡大西洋的花园和公园的聪明的主题性联合；因为突然间，当我们走到它小径的尽头，你和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我们没有立刻给我们的孩子指出，以便

完全地欣赏那种震惊、沉迷与欢欣，当他发现他在浴盆里摇晃的各种玩具船舰那大得不真实，现实得非现实主义的原型时，他将会体验到它们。在那里，在我们前面，一排破败的房屋矗立在我们和港口之间，而在目光碰上各种各样的伎俩，诸如在一根晒衣绳上跳着步态舞的淡蓝与排红色内衣，或一个女士的自行车和有条纹的猫孤单地分享着一座铁铸的底层阳台的地方，最令人满意的是在屋顶与墙垣错杂的角度之间认清一艘辉煌的大船的烟囱，从凉衣绳后面呈现出来，像是出自一幅涂鸦的画——发现水手藏起了什么——发现者一旦看见就再也无法将它漠视。

302

纳博科夫

语是雕琢和打磨的，缺少出自血肉的、天然的粗糙质地，但那种精美唯有钟表匠的手艺能够比拟。它的结构是回旋的，充满重叠和交响，通过人和字的相似纹理展现出一个又一个主题：意识的觉醒、母亲、祖先、蝴蝶、爱情、诗、冒险、流亡、写作、象棋难题……在这些主题之中交织着另一些更为普遍的主题：政治、历史、革命、战争、人性、祖国……同时这又是一本讲述时间与回忆，创造与现实，魔术与美的书。要在回忆录里装进这么多东西，而又要写成一部杰作是困难的，况且回忆录又是这样一种失败的体裁：它的目的是回到过去，去复制一段已经消失的现实——这是一盘与时间的棋局，而“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口”，开始和结局之间是无可挽回的“一道短衡的光缝”。这种绝对性使纳博科夫的努力不得不是相对的，象征的，把它变成一道象棋难题，在其中时间只是作为一个怒象的、虚构的对手，然而正是在这里自由意志击败了时间的“恶性循环”。

314 纳博科夫

在这种想象性的回忆中，“时间扭曲而近于思想”，“另一个时空之维接踵而来——也许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不是原来的那个，“它具有理智时间的“易弯的，半透明的质地”，甚至能够折叠，“将图案的一部分置于另一部分之上”，构成一幅新的“移花印画”：“记忆的无上成就，就是它在把往昔延缓与游荡的乐调汇入它的折皱时，对内在和谐的巧妙利用。”（第八章）

因为这，《说吧，记忆》容纳了如此之多的年代错误。当遥远的字件和人物被不知不觉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在同一个场景中，甚至合而为一时，连结它们的是一丝气味、一个姿势、一件纪念品，它们本质上的同一性，证明了时间本身的虚妄。——纳博科夫宣称“我不相信时间”，因为真正存在的是那些元素般的，“无时间性”的片断，它们不再是个人的，死去的，而进入了不朽的领域。这也许对应了博尔赫斯的断言：“吟诵一行

莎士比亚诗句的人难道不就是，真实地，莎士比亚？”（博尔赫斯：《对时间的新驳斥》））

这些碎片被纳博科夫撷取，在怒象的熔炉里炼成黄金。像蝴蝶一样，事物经过了多阶段的蜕变，不再是本来面目了，得到揭示的也不是生活的真理，而是来源于生活的艺术：一部作品的真正考验。《说吧，记忆》迷宫般的布局与巴洛克式回环往复的风格达到了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完美和谐，以一种“魔法的形式”，“一个自发的巫术与欺编的游戏”，“对称、叠合、倒映、变形，它既掩盖又揭示，既将人引入歧途，又充满隐喻，给人启迪，深刻体现了自然的精微（也是蝴蝶所体现的）：昨功利主义的伪装，源于平庸现实的美丽的

说d巴，记忆315 升华——它是“记忆的幕拟所创造的”（《自传：一种文学行为的变化结构》）。而阅读这部作品，就是辨认和欣赏那“难解的透明水印，在艺术之灯被：点亮，照彻生活的大页纸时，它独特的图案昭然可见。”（第一章）这同样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翻译《说吧，记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我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并作出多大的真实程度反映了作者的个人生活，而是它给创造性的写作，给回忆录这一文体提供了上述那些可称之为新的东西。

这个译本是对1990年花城版译本（它在严格意义上只能算是一个节译本）的全面修订，尽可能改正了其中的误译，并力图更忠实于原文的文体风格。在那个译本中被编辑小心地删去的内容，这次也已悉数补入。然而，几个提难词语（纳博科夫为提高阅读和翻译难度而特意设下的障碍），虽经译者努力查索仍不得其解，只能原文照录。这是此译本留下的最大遗憾。

陈东报 1995 年 4 月于上海

